外国考古学史

●杨建华/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

外国考古学史

杨建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

外国考古学史

杨建华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黄凤新　　封面设计：张沭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125号）　　长春市永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99年12月第1版
印张：8.125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99千字　　印数：800－1800册

ISBN 7－5601－1749－X/K·61　　定价：12.00元

序

我非常荣幸而愉快地被邀请为这本考古学史的专著写一篇序。它是为中国读者所写的第一本这类历史著作，并且是由对当前西方世界考古思想的最新发展有广泛深入了解的作者杨建华所著的。

经历了大约40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如发掘新的聚落或者重要的未被盗掘的墓群；也不只是研究工作中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诸如航空摄影或遥感技术的发展和放射性碳测年法的出现。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思想的发展史。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我们怎样开始重建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它们为什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变化和发展？关于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精神生活我们都知道些什么？这些都是理性的、观念层次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与其说是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不如说是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这本书正好介绍和记录了近来所发表的对考古学本身性质的重要的新见解。

我预言，这种经验不久也将在具有丰富考古遗址资源的中国考古学中得到验证。对于史前时代的研究和理解有文字的城邦的出现，中国都是世界上关键地区之一。中国的考古学实践有着自己的规章制度和各种组织。但是在我10年前访问中国

时，我发现有关考古学理论的问题的讨论不像西方那样活跃。例如在剑桥大学，我们鼓励活跃的讨论和理论辩论，正如杨建华在这里时看到的那样。重建、理解和解释我们人类的早期历史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极富有挑战性的心智上的努力。从事这个研究计划，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我们关于当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结构的知识总是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些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思想的未来的发展，将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丰富的考古遗存，而且还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深邃的、不同流派的史学传统这一优势。我希望这本书，通过阐释和回顾这些发生在中国以外的争论，将会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克林·伦福儒

（剑桥大学考古学系教授
Jesus 学院院长）

1994 年 7 月 22 日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RCHAEOLOGY OUTSIDE OF CHINA' BY PROFESSOR YANG JIANHUA

It is both an honour and a pleasure to be invited to write a preface to this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e first such history to be written for a Chinese readership and by an author, Yang Jianhua, with a broad and sound knowledge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rchaeologic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or so we have come to realise, especially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 tru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is not simply one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 of unearthing new settlements or important unplundered tombs. Nor is it simpl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cientific techniques of research —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erial photography of remote sensing, or of radiocarbon determinations for chronology, In fact the tru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is as much tha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the most difficult advances are the conceptual ones, How do we begin to reconstruct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prehistoric societies? Why did they change and develop in the way that they did? What can we say of their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lives? These are all questions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nd they can be answered not so much by new discoveries or excavations as by analytical and conceptual advances, This book introduces and documents this important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very nature of archaeology which has recently taken place.

I predict that the same experience will soon prove valid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With its abundant wealth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China is one of the key areas of the world for the study of prehistory, and for the understnading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literate, urban state. Already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is both disciplined and well organised. But I found on my own visit to China a decade ago, that theoretical issues in archaeology were not so energetically debated as in the West. In Cambridge, for instance, we encourage lively debate and theoretical argument, as Yang Jianhua will have observed during her stay here. The project of reconstructing, explaining, and interpreting our early past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intellectual endeavours for any modern society. Nor can it be undertaken without a realisation that our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various ways colours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 These are complex issu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in China will be of worldwide importanc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richness of China's archaeological record, but also by virtue of the deep and varied tradition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China, both under the ancient Empires and in more recent times. I hope that this book, by illuminating and reviewing discussions that have taken place outside China, will make its contributions also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ithin China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olin Renfrew
22nd July 1994

前　　言

正如人在认识上的艰难课题莫过于认识人本身，考古学上的一个难解之结是对考古学自身的认识。考古学的形成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而对考古学史的总结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有必要和可能对学科发展进行历史的总结，是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这说明学科发展已经从个别方法的讨论上升到从总体把握学科体系。通过历史途径全面掌握一门学科要比具体归纳途径和系统演绎途径具有其巨大的优越性。①

考古学史将考察学科本身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领域的实际知识是怎样积累的；各种结论在现有知识基础上怎样形成的；积累资料和得出结论的手段和方法及各种概念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在学科的不同阶段起着什么作用；以及外学科的影响。虽然考古学史涉及的内容十分繁杂，但总的说来它是在考古和考古学家的发展中考察历史事实的。因而可以从两方面把握考古学发展的主线：一方面是考察考古学家对考古学对象的认识过程，包括了资料的积累和综合以及研究成果的形成；另一方面是考察考古学家在研究中使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以及对学科自身的认识。前者体现了考古学本体论，后者是考古学方法论。对考古学对象的认识是对学科自身认识的一个前提，而对学科自身认识的发展及方法的创新又反过来促进了对

---

① 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考古学对象研究的深入。在考古学史的阶段划分上，后者往往起了更大的作用。

在考古学萌芽期，研究对象仅仅是单个遗物，研究方法只是借助于文献做一些推测。考古学形成期出现了第一个解释遗存的方法，即从生产技术进步的角度对遗存作发展阶段的研究，从三个时代的划分到法国旧石器时代的细致分期，一切遗存都被纳入一个单线的进化过程中。研究对象从遗存本身扩展到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地层学和类型学开始分别被使用。考古学成熟期出现了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从而打破了单线进化的模式，使考古学彻底摆脱了历史文献中年代学的束缚，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考古学文化成为考古学中，尤其是史前考古学中组织和解释考古材料的基本单位。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结合为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提供了重要手段，并使得遗存之间的关系成为日益重要的研究对象。一开始使用文化概念时，人们主要对追寻文化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即文化史研究，而不是研究文化的内部构造。功能主义的出现，渐渐地引导人们从对这些文化间外部联系的研究深入到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对其内在结构的关注，即文化形态的研究。所以功能主义是考古学文化由时空为纵横轴的平面研究转入内部结构的主体研究的关键，这就是考古学转变期。对考古学文化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把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文化序列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这正是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主要任务。研究对象扩大到从已知推测未知，研究方法更广泛地借助于自然科学和民族学成果，对遗存之间关系从地层学这种纵向联系扩展到背景（context）研究、聚落研究这种横向联系。研究领域从自然环境、生产技术和经济形态扩大到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变化，并开始试图了解当时人们的思维和观念，这条考古学发展主线向人们暗示了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它正如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在本书序中预言的那样：要回答考古学上的理论问题，“与其说是

依靠新的发现和发掘，不如说是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意义的考古学起源于欧洲，后来又传入美洲，形成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本世纪初又传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本书只包括世界考古学史的一部分，然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欧、美两地的考古学史。它不仅包括欧美考古学者在自己国家从事的考古活动，还包括他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作。中国考古学自本世纪初在西方影响下产生以来，已取得辉煌成就，具有自身特色。对于中国考古学现状的认识，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且还要从横向比较加以考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对外国考古学史的介绍和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国外考古学成果及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考古学。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上通过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可以提高我们的考古研究水平，完善各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在实践中，中国正处在国家经济建设大发展阶段，为学科提供了大量收集资料的宝贵机遇。了解世界考古的最新信息，有助于增强资料收集的目的性，从而提高资料收集水平，增大资料的信息量，为我国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于西方考古学史，格林·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①] 和《考古学简史》以及威利，G·和萨布罗夫，J·A·合著的《美洲考古学史》是目前世界上最丰富、最全面的考古学史专著。这些作者是欧美考古学的权威学者，因此他们对考古学史的考察是站在当时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在中国，至今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外国考古学史。笔者从事这方面教学多年，准备尽

①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自己的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该书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对二战以前的考古学历史，基本是按已发表的有关资料加以重新综述的，本书的图大部分选自《美洲考古学史》。其后的内容，尽可能通过查阅原著重新总结。70 年代以后的考古学，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研究成果，都很少有人做过系统总结，而这部分对我国的考古学者又最有意义。所以本人尽了最大可能进行了全面收集和总结。去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为我提供了理想的机会。伦福儒教授给了我很大帮助和指教，并为书作序，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是近十年来在吉林大学对考古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外国考古学史的产物。它首先是供专门和系统学习考古学的学生和学者使用的，但我亦希望有兴趣概观此领域的外行也觉得本书既有可读性又极富教益。本书是作为吉林大学八五教材出版计划得以出版的。在此，对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务处和出版社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作　者

第二版前言

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并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思考。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以外地区的考古学，作为同一学科在不同地区的实践，既有共性又有差别。同样，考古学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历程，也应是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性。那么，中外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内在脉络？任何一个考古学研究或一个考古学派，无论它有多么强的独立性和个性，总是与此前或此后的研究存在着明显或隐晦、简单或错综、紧密或间接的非单纯的而是多重的联系。所以揭示各学派之间的内在联系，便可以寻找到考古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但中外的考古学脉络之间有多大的共性和差异呢？它们之间的共性是考古学内在发展规律的反映，是我们对任何一个孤立的考古学研究的意义进行准确定位和深刻把握的一个基本前提。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外考古学区别的根本出发点。

一

关于中国考古学史，目前只有对考古学的某一阶段[①] 或

---

①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三联书店 1997。

某些重要人物[①] 和事件以及理论方法的论述，尚不见全面综合性的论著。在这些研究中，有对中国考古学史内在发展脉络的精辟论述。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②] 中提出了“表达中国考古学前进与发展的主流”的六件大事：

1. 1921 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 1931 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 1948 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

4. 1959 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5. 1975 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

6. 1985 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这六件事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复杂纷纭的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世纪，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内在脉络：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田野考古作为收集遗存主要手段的确立；后冈三叠层代表着中国考古学的层位学的形成；《瓦鬲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的典范；夏鼐先生的文章代表了中国考古学者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水平；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将以考古学为单位的研究带入以地区为单位的研究，建立了各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前五件大事所表现的顺序为：田野发掘——层位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这五件大事不仅有时间

---

① a. 张忠培、黄景略：“梁思永先生与现代考古学”《考古与文物》，1981 年 3 期。

b. 俞伟超、张忠培：“编后记”《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c.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路上不会消失的足迹——悼念夏鼐先生”《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 1987 年。

②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上的先后，而且在逻辑上也有规律，即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没有田野发掘，就不需要也不会产生考古层位学；没有层位学证据，很难确认代表年代发展的类型学；没有考古发掘提供的层位上的共生和类型学提供的组合，就不会形成具有时间、空间和组合三要素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没有考古学文化这个史前考古学遗存的研究单位，就不会有各地区的时空框架。上述五个事件是在当时的诸多同类事件中选取的水平最高影响面最大的，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六件大事是苏秉琦发表的《辽西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的演讲。这是将以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的研究全面推向考古学文化结构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在这之前关于文化结构和发展过程的研究都是零星的，超前的。这一转变是以中原及附近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普遍建立为基础的，因此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展。苏先生及时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研究重点的战略调整。所以第五件大事和第六件大事之间出现了研究层次的变化，体现了考古学发展中质的飞跃。综观80年代末的考古杂志，很少再有单纯以时空框架为课题的论文，学者多是力图以慎密的时空框架研究为基础来说明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至少是有这种意图。中国考古学界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二

外国考古学史，我们主要了解的是欧美地区的考古学家的考古史。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里也存在着与中国考古学大致相近的发展脉络：

1．18～19世纪英国人威廉坎宁顿对索尔茨伯里平原的发掘和美国人托马斯·杰弗逊对弗吉尼亚土丘的发掘；

2. 19世纪40年代丹麦人沃尔赛对丹麦的史前墓葬和泥炭沼层的小规模地层发掘至19世纪下半叶谢里曼在希沙立克的大规模地层发掘；

3. 1903年瑞典人蒙特柳斯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后日本人译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考古类型学；

4. 1924～1925年麦克迪在《人类的起源》中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普及了这一概念；

5.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基德尔在美国西南部建立了第一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

6. ①美国考古学家克拉孔在1940年发表的“中美洲研究的概念结构”和1948年泰勒发表的“一个考古学研究”，批评了以年代学为惟一目标的考古学，提出了要通过对遗存功能的研究进入到古代人类行为和考古学文化结构、社会组织的研究。出现了聚落考古和生态考古等方法；

②1962年宾弗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提出了新考古学派；

③1984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编辑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标志着新学派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反过程考古学等等的兴起。

前五件大事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道路基本相同，体现了田野发掘——层位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地区年代序列建立这一发展主线。第六件大事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体现了它的出现契机与中国的有很大不同。克拉孔和泰勒的文章是对原有年代学研究的剧烈反叛，说明美洲考古的转变是以否定前者为代价的。到新考古学派时，把前后两者更加激烈地对立起来，并冠之以归纳和演绎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这时考古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甚至新术语多不是来自考古学本身，而是来

自文化人类学等外学科。只有进入 80 年代以后，考古学才走向更加务实的阶段，在原有扎实的年代学基础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成果。

三

以上中外两地考古学发展主线的比较说明，考古学发展中存在一条共同的发展脉络。它是由考古学科的特点，即学科的性质、对象和方法所制约的。考古学首先要解决的是遗存的年代问题。标志着考古学形成的三期说就确立了这一目标，层位学和类型学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考古学研究的不是某个人的遗存，而是某一群人的遗存，它构成了考古学文化。考古学解决的年代不是单个遗存的年代，而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最终必然形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的二维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中外两地的发展主线一致，但是仍然各具特色。

蒙特柳斯的类型学和苏秉琦的类型学代表着中外两个传统。他们分别以金属器和陶器为研究对象。国外的陶器研究中很少有像蒙氏那样细致的类型学研究。他们多注重某一种陶器在某一层位出现的比例，用单峰曲线来表示每件器物出现、发达和衰亡的过程。每种器物往往只给一个编号，而不注重同类器物之间内在传承的“式”和并行发展的“型”的辨认及其反映出的器物内在发展规律。我国的类型学以陶器研究为主，尤其注重对炊器的研究。除研究每件器物出现的时代外，注重对同一类器物之间内在发展演变的分析，辨认出同一发展序列的“式”和并行发展的“型”，并由此把不同考古学文化分为具有同一发展谱系的和不同发展谱系的。这种对器物自身发展的研究是由“物”研究“人”的可靠途径。例如晋中地区夏商时期的陶鬲可分为高领鬲、翻缘鬲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它们

分别代表了本土文化、商文化和二者的融合[1]。通过对不同时期这三型鬲的研究可以看出商人对晋中地区文化传播势力的消长以及本地居民做出的反映。如果和同时期其他具有商文化影响的土著文化比较可以看出商王朝对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策略[2]。这种由器物形态入手发掘其背后的历史意义的类型学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中国考古学者在长期时间中总结出来的。

基德尔的美国西南地区年代序列的建立与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研究，虽然都是由考古学文化本位发展到地区本位，但研究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美洲地区年代序列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全美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最后分为石器期、古代期、形成期、古典期和后古典期几大阶段，比较同一时期各地区发展的异同，其目的是为了阐明美洲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国各地区系类型的研究注重文化区的划分，不同时期各地文化之间的关系和谱系，最终是为了说明中华的文化、民族和国家的形成。

中国和欧美在第六件大事上差别最大。欧美不仅出现的早，而且经历曲折，其中还可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40 年代的功能考古、60 年代的过程考古和 80 年代的社会考古，反映出文化人类学对考古学的巨大影响。人类学注重对文化结构的分析和文化的全面复原，对现存原始文化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的全面研究为考古学提供了文化个案分析的典范，并且由文化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进入到文化发展过程的研究。这一点正是我国由历史学发展而来的考古学所缺乏的。中国考古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秦汉帝国的形成始终是先秦考古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这一目标，开展了区系类型的研究，又进入到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探

---

① 晋中考古队："山西太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 3 期。

② 张忠培、朱延平、乔梁："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 1994 年。

讨，在其发展中吸收了国外考古学的新理论和方法。所以中国考古学是在肥沃的史学土壤中形成的。它就如同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根基，并不断地吸收外来的新因素丰富自己，但始终不会改变前进的方向。

纵观世界上有历史传统地区的考古学的发展，在其早期都有一个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过程：在埃及有1822年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释读的成功；在两河流域是1847年罗林生对贝希斯敦铭文的考释；在中美洲19世纪下半叶有福斯特曼通过玛雅文手稿“德累斯顿手本对玛雅文字中有关数字和历法方面文字的破译；在中国是对殷墟甲骨文的释读。这些成就使当地的考古学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历史学基点上。在历史传统地区的考古学都有对当地古文字的研究，如埃及学、亚述学和古文字学，它们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桥梁。美洲大部分没有历史传统的地区的考古学是和人类学密切结合；而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考古则与艺术有着密切联系。正是由于全世界人类历史的丰富性，才导致今天世界各地考古学的多样性。但各地相似的发展阶段又表现出共同的发展脉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考古学萌芽期（文艺复兴—19 世纪 40 年代）………………………………（1）
一、欧洲的古物学 ………………………………（1）
1．古物学的历史背景……………………………（1）
2．古物学的兴起………………………………（3）
3．古物学向考古学的过渡………………………（6）
二、美洲的推测阶段 ……………………………（8）
1．印第安人的起源……………………………（8）
2．民族学调查…………………………………（9）
3．对古迹的实地考察…………………………（10）
4．调查与发掘方法的出现……………………（11）
第二章　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 ……………………（14）
一、欧洲的形成与发展期 ………………………（14）
（一）形成期（19 世纪 40 年代） ………………（14）
1．三期说的提出 ……………………………（14）
2．远古人类与石器的确认 …………………（20）
3．各地的考古发现 …………………………（23）
4．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28）
5．小结 ………………………………………（33）
（二）初步发展期（1867—1919 年） ……………（36）

1. 考古学研究 …………………………………… (36)
2. 各地考古发现 …………………………………… (42)
3. 考古学方法与技术的发展 ………………………… (48)
4. 小结 …………………………………………… (53)
二、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 世纪 40 年代—
1919 年） …………………………………………… (56)
1. 北美考古 ……………………………………… (57)
2. 中美洲考古 …………………………………… (64)
3. 南美考古 ……………………………………… (68)
4. 小结 …………………………………………… (71)
第三章　考古学的成熟（1919—20 世纪 40 年代） …… (75)
一、欧洲 …………………………………………… (75)
1.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提出 ……………………… (75)
2. 马克思主义在考古学发展中的作用 ……………… (78)
3. 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 …………………………… (85)
4. 各地考古发现与研究 …………………………… (86)
5. 方法的发展 …………………………………… (96)
6. 小结 …………………………………………… (97)
二、美洲的年代学 …………………………………… (99)
1. 地层学革命 …………………………………… (100)
2. 序列排队法 …………………………………… (104)
3. 类型学与分类研究 ……………………………… (107)
4. 直接历史法 …………………………………… (113)
5. 各地考古发掘与研究 …………………………… (114)
第四章　考古学转变期（20 世纪 40—60 年代） ……… (121)
一、欧洲的转变 ……………………………………… (121)
1. 理论的发展 …………………………………… (121)
2. 自然科学手段的进步 …………………………… (122)
3. 各地考古发现与研究 …………………………… (126)

二、美洲的转变……………………………………（128）
1. 发展中的新趋势 ……………………………（128）
2. 自然科学手段的发展 ………………………（140）
3. 年代学和时空综合研究的继续 ……………（141）
第五章　考古学发展新时期……………………………（148）
一、新考古学出现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
80 年代） ……………………………………（148）
（一）美洲新考古学的兴起 ………………………（148）
1. 进化论的复兴………………………………（148）
2. 新考古学的形成……………………………（152）
3. 研究内容……………………………………（155）
4. 研究程序与方法……………………………（171）
（二）欧洲的两种考古学 …………………………（174）
1. 欧洲的新考古学……………………………（174）
2. 考古学界对新考古学的反应………………（182）
3. 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183）
（三）对新考古学的评价 …………………………（186）
1. 新考古学派新在哪里………………………（187）
2. 新考古学派的研究是否可行………………（189）
二、当代考古学发展新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 …………………………………（190）
（一）新学派的出现 ………………………………（191）
1. 社会考古学…………………………………（191）
2. 认知考古学…………………………………（197）
3. 后过程考古学………………………………（205）
4. 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208）
5. 中程理论研究………………………………（210）
6. 小结…………………………………………（214）
（二）当代考古学实践 ……………………………（215）

1．田野考古学……………………………………（216）
2．考古学研究举例………………………………（218）
3．科技与考古学…………………………………（225）
（三）考古学科体系的建立 ………………………………（226）

A History of Archaeology Outside of China

Contents

Chapter 1 The Germination of Archaeology (Before 1840')

A. Antiquaries in Europe

a. The background of antiquaries

b. The emergence of antiquaries

c. The transition from antiquaries to archaeology

B. The Speculative Period in America

a. The origins of Indians

b. The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c. The field explorers

d. The first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

Chapter 2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aeology

A. Europe

a. The birth of modern archaeology (1840' — 1867)

The three age system

The antiquity of Ma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e main topic of study
Summary
b. The first development (1867－1919)
Archaeological Stud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s and techniques
Summery
B. America (1840' —1919)
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
b.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iddle America
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South America
d. Summary
Chapter 3 Archaeology Comes of Age (1919－1940')
A. Europe
a. The concept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b. Marxism in archaeology
c. Science in archaeology
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f. Summary
B. America
a. The stratigraphic revolution
b. Seriation
c. Typology and classification
d. The direct—historical approach
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studies
Chapter 4 Transitional Period (1940' —1960')
A. Europe

a. Development of theory
b. Scientific aids
c.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B. America
a. New tendence
b. The use of science
c. Continuing studies of chronology and time—space framework
Chapter 5 New Period of Archaeology
A. Emergence of New Archaeology (1960' —1980')
a. New Archaeology in America
The revival of 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New Archaeology
The studies of New Archaeology
The procedure and methods of New Archaeology
b. Archaeologies in Europe
New Archaeology in Europe
The responces to New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c. Evaluation of New Archaeology
New or not so new?
The assessment of its successes and limitation
B. Rethinking of New Archaeology and new developments (1980' —present)
a. Emergence of new schools
Social archaeology
Cognitive archaeology
Post—process archaeology
New marxism archaeology

Middle—Range theory
Summary
b. Practice in archaeology
Field archaeology
Some cases of archaeology study
Science in archaeology
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ames of archaeology

第一章　考古学萌芽期

（文艺复兴——19 世纪 40 年代）

考古学与许多学科一样，起源于收集。这个收集过程就是古物学时代。大量的收集品为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所以古物学是考古学的萌芽期。人们只有超越了收集、并获得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法，考古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欧洲的古物学

1. 古物学的历史背景

近代科学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不仅使人们挣脱了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枷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且还复活了人们对古典世界和古物的兴趣，使古典时代的学者（如希罗多德、卢克莱修）的思想重新得到研究。通过对这些古代文献的研究，使人们了解到当时的欧洲尚居住着没有文字的所谓“蛮族”。文艺复兴使自然科学以中世纪无法比拟的速度飞速发展，其中的地质学将对考古学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航海技术有很快提高，从而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欧洲人发现了至今尚未使用文字的原始民族。随后的工业革命开矿山、修铁路，使大批古物重见天日，同时工业革命还造就了一批有产阶级从事古物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使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人民要求民族统一，许多资产阶

级民族国家相继成立。民族独立后崛起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人们要了解自己的祖先。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以上变化促成了古物学在欧洲的兴起。

人类对祖先的历史和古物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希腊哲学以人学为中心，必然牵扯到人类的历史。荷马史诗反映的是一种使用青铜的文明。所以在希腊人看来，青铜时代早于铁器时代是毋庸置疑的。赫希奥德在《农作与日子》的长诗中假设人类经过了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铁器五个时代。罗马人卢克莱修在他的《物性论》中从哲学出发，提出人类发展最初是使用自己的指甲、牙齿以及石头和火，后来使用了铜，最后铁才得到广泛使用。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学者也有相似的见解。《绝越书》中袁康引用风胡子（B. C. 500 年）的话，提出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而且比罗马人早 4 个世纪。当时希腊人的周围仍是没有发明文字的民族，和这些民族的接触使希腊人对史前学和民族学产生了兴趣。希罗多德详细描述过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这些已被现代考古所证实）。希腊人和罗马人虽然没有亲自收集古物，但是他们的推测和记载对古物学影响很大。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正是通过这些文献了解到古代人对早期不同时代的观察。为了进一步了解文献所记录的那个时代，一些人到古典世界去寻找古物，另一些人则在欧洲大陆研究与希腊、罗马人共存的蛮族。

古物学的另一个来源是自然科学中的地质学。石器的确认是古物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古物学阶段的许多先驱者本身就是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为古物学注入了科学的养料，促进了考古学科的形成。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为古物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古物学一方面向着收集古典和欧洲蛮族的古物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向着对人类年代和石器确认的方向发展。

2. 古物学的兴起

(1) 对古典世界古物的收集

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存留到16世纪的遗产，不仅是在文字方面，而且还有大量有考古价值的遗存。16世纪，意大利学者和到意大利、希腊的旅行者发现并开始研究这里的古代历史遗存。关于古典时期古物的发现和记述构成了古物的重要内容。

对古物的兴趣导致了收藏之风的兴起。最早开始于15世纪末叶的罗马，教皇、主教及其他显贵把自己的别墅装点成古代艺术宝库。随后这种风气传到欧洲大部分国家。英国的古物收藏始于17世纪。白金汉公爵和查理一世纷纷派人到古典世界收集古物。当时有一位名叫约翰·特拉德斯堪的人，他的藏品异常丰富，后来成为阿什摩尔博物馆（牛津大学博物馆）的核心藏品。18世纪下半叶，随着希腊学第二次在英国的复兴，许多收藏家和旅行家游历了古典地区，记录、绘画并进行发掘。其中画家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建筑师尼古拉斯·列维特的工作最为著名。他们于1751年抵达雅典，花了3年时间进行测量、绘画和记录，其成果在《雅典古物》一书中予以发表

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人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这是第一部根据古物研究古代历史的著作，而且这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艺术品对后来的欧洲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2）对欧洲蛮族古迹的调查和描述

古典作家不仅向人们揭示了古典时代的历史，而且还指出：西北欧和北欧的祖先是蛮族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哥特人。他们有着奇特的习俗和“凯尔特巫师”那样奇特的神职人员。那么，这些蛮族的遗存是什么？正是古典作家的描述在欧洲学者头脑中划了一个问号，激起了对欧洲蛮族研究的兴趣。

这种研究出现于16世纪的英国。在地形学著作中，地面上明显的重要古迹第一次得到描述。利兰是这方面最早的成功者。他周游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对具有文物价值的古物作以登记和说明。卡姆登是另一位成功者。他游历了英伦三岛，1586年发表了《不列颠》一书。他认为哈德良长墙与巨石柱群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17世纪英国古物学更加繁荣。许多郡史学家既研究地形学，又从事历史学。他们调查、记录并解释了许多奇怪的地理特点。普洛特是以函调的方式了解哪里有巨人、罗马将军或古人墓葬，最后写成《斯塔福德郡和牛津郡自然历史》一书（17世纪70年代发行）。勒威德为了收集修订卡姆登的《不列颠》新版所需材料，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这是严肃的田野研究的开始。奥布里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他在威尔特郡详细调查了巨石柱群，认为这是宗教礼仪的活动场所或者是凯尔特巫师的神庙，由此奥布里被称为“英国第一位考古学家”，确切地说他应是第一位重要的田野考古学家。

18世纪英国虽然出现了古典研究的热潮，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古典世界周游的。因此当地的郡志研究并未中断，并且披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例如威廉·博莱斯博士在他的《康沃尔郡古物》（1754）中，对古代土冢、要塞、立

石和圆棚格外注意，并作了浪漫色彩的描绘。威廉·斯塔克利在田野调查中对凯尔特人巫师有着特殊的癖好。他在 1718 年和 1725 年，对埃夫伯里（Avebury）的巨石柱群进行了考察，对当时的田野考古调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他的考察仅限于调查，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田野发掘。

（3）石器与人骨的发现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们就从地下发现过石器。当时有一位与伽利略同时代的著名天文学家莫凯迪（michael Mercati）对石器产生了兴趣。他通过古代文献中的口头传说和各地航海者献给梵帝冈国的亚洲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遗物，断定地下发现的石器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并用化石分类的方法加以研究，考察它们的制造过程和用途。他的解释是根据古物的本身、古代文献和当代民族学，而这三者正是现代考古学解释的基础。

莫凯迪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被充分认识。1771 年埃斯珀在德国汝拉山中的盖伦罗伊特洞穴发现了人骨与洞熊以及其它绝灭动物共存。但是在发表材料时，他却不敢肯定这种共存关系。

尽管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不同意阿尔德罗万杜斯把石器看成是“雷电和某种雾状体与金属物质的混合物”的观点，而以为这是不会制造金属的古老人类的工具，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不知道如何证明人类不仅使用过这种石器而且其年代还非常古老。当时只有一位学者提出了这种古老性的证据，这就是约翰·弗里尔。1797 年他在写信给古物协会说明发现燧石工具时说，这些东西“虽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我认为必须依据发现它们的地层加以考察”。很显然，它们出土于未扰动的地层下距地表 12 英尺，并与绝灭动物骨骼共存，这就是古老性的证据。遗憾的是这一精辟论断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因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上帝造人的观点。如果相信《圣

经》钦定本的说法，即人类出现于公元前4004年，而且在这不到6000年的人类历史中，埃及文明和《圣经》时代已经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当然不会存在一个远古的石器时代。

（4）学术团体与杂志的出现

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古物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各种科学协会的创立是古物学成长的土壤。最早的一批科学协会是在17世纪成立的，如罗马灵采科学院，1660—1662年建立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的巴黎科学院。1707年专门的古物学会——古物学家协会在伦敦成立。1776年开始发行《考古学》杂志。10年后苏格兰古物学家协会成立。各种学会的成立为学者们说真话，交流发现提供了场所，推动了古物学的发展。

3．古物学向考古学的过渡

进入19世纪后，古物学的收集仍在欧洲和近东两地发展，1801—1803年英国人埃尔金在雅典工作，并于1812年将他找到的著名古希腊大理石雕刻艺术品运回英国，随后德国人开始了对古典世界的调查和收集。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本国蛮族古迹调查中。这些调查报告占据了《考古学》的绝大部分篇幅，反映了人们对非古典时代古物的兴趣日趋浓厚。这些调查还发表在当时发行的郡志中。同时根据这些调查还出版了许多专著，例如根据卡姆登的《不列颠》而补充成的《大不列颠的古墓遗存》等等。另外还出现了教科书和指南便览等方面的书籍，例如《古物与考古精要百科全书》。

从以上这些出版物可以看出，英国的古物学在19世纪有了很快的发展，不仅调查数量多（几乎遍及英国各个地区），而且已经过初步整理予以发表，更重要的是这时的调查目的和手段逐渐科学化。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威廉·坎宁顿和科尔特·霍尔。他们都在尽力避免他们的前人在18世纪时所采

用的浪漫主义研究方法。坎宁顿对索尔兹伯里平原土冢的发掘目的是要解释以前的疑团。霍尔发掘了339座土冢，并仔细记录了观察到的情况，然后对土冢的形制和葬式进行了划分。他尽可能抛弃那些涉及凯尔特巫师的术语，将土冢划分为长形和圆形等四种类型，同时还很早注意到了村落居住址。在调查手段方面，他们是继奥布里首次田野调查之后最早的田野发掘者，被誉为英国考古发掘之父。霍尔的《古代威尔特郡的历史》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它不再是地方世系和家族史掺上一些古物琐事的作品，而是试图利用这种古物资料专门讨论一个郡的历史，这标志着从艺术爱好的古物学向历史研究的考古学的转变。但这时还只是有明确的历史研究愿望，而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充其量是对古物进行分类，而无法搞清这些类别所反映的历史意义。所以经过10年的研究之后他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完全不知道这些墓葬出自何人之手，我们有根据说，威尔特郡土冢的年代非常早，但没有一个证据能够明确说明这些土冢属于何种部落。"所以最终他们还是将这些古物依旧称作"古代不列颠人"的。

法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法国早在17、18世纪就开始了发掘。主要是巨石墓的发掘。这时的法国出现了"凯尔特人热潮"。法国古物学家以本地本民族的考古而感到自豪。凯尔特科学院于1804年建立，1814年发展成法国皇家古物学家协会。1818年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全国的古迹进行了一次普查。然而对待这些调查的古迹却没有办法搞清其年代，只好用"凯尔特的"、"高卢的"、"古不列颠的"等术语来表示一切前罗马时代的遗物。

总之，1800—1840年古物学的发展由于资料的大量积累，研究历史的目的逐渐明确。但是没有判断古物年代的方法。经过初步分类的古物只得被冠以"凯尔特人"、"高卢人"等术语。这种情况就是丹麦古物学家尼厄鲁普所抱怨的"笼罩在前

罗马时代的古物学的那层迷雾"，这是由于史前学概念中还没有时间顺序的深度。因此提供一种排列前罗马时代古物的年代顺序的方法已迫在眉睫，说明这个学科即将从资料收集而进入真正形成阶段。

二、美洲的推测阶段

美洲新大陆在 1492 年哥伦布登陆和欧洲人开始殖民时，除中美和南美出现过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以外，大多数地区仍然处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美洲考古学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是从美洲最早出现人类（大约 2 万年前）至 1492 年殖民时代的开始，所以在美洲考古中，史前时代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1. 印第安人的起源

当欧洲殖民者一踏上新大陆时，他们就对这片新土地的人类以及他们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这就是美洲考古学的萌芽——推测阶段。

摆在欧洲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美洲印第安人是什么人？他们具有什么特征？他们是怎样发展的？当时的欧洲人普遍相信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而印第安人并不知道亚当和夏娃，也不知道大洪水和诺亚方舟，他们是人类吗？最早到达美洲大陆的西班牙人把印第安人看成是异类，是野兽，到了 1537 年前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印第安人也是与自己同类的人，从此许多学者开始推测印第安人的起源。许多人认为印第安人就是历史传说中丢失的 10 个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来自已经消失的大西洋世界。到了 1590 年，有人提出印第安人来自东亚，1637 年人们普遍接受了印第安人自亚洲经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假说。1648 年，托马斯·盖奇提出美洲印第安人和亚洲蒙古人在人种上十分相似，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支持了这一假说。但是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到达美洲，他们

当初是怎样生活？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还没有任何答案。当时人们的头脑中还没有时间、空间和文化的概念。

2．民族学调查

明确了美洲印第安人是亚洲移民之后，人们开始探讨印第安人的历史。他们也许也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但是美洲与旧大陆最大的差别是没有文献史料，无法向欧洲那样从事历史研究。于是，美洲的学者只得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美洲的过去——民族学调查。

在16、17世纪与西班牙殖民的同时，一些神职人员和行政官员记录了拉丁美洲的印第安文化，他们主要记录中美和秘鲁在殖民者征服时期和稍前一段时间的生活情况，这是一批宝贵的资料，因为随着殖民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民族的原始状态也慢慢消失了。正是这一阶段的民族学调查使得后来的美洲考古学与人类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这些最早期的民族调查材料中，由于调查人的兴趣和知识水平的不同，因而调查材料之间的可信度和适用性也有很大差别。在这其中，有两位调查者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对后来的研究有较大影响，第一位是西班牙人兰达主教。他在对玛雅地区的调查中不仅考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而且还对当地的古代遗存产生了兴趣。他调查了奇琴伊察的古迹，并绘制了主要庙宇的平面图，通过古迹试图复原更早时期的生活方式。因而他的资料对于玛雅的政治、社会性质、日常生活、宗教活动、象形文字、历法以及日用品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调查成果发表在他的著作《尤卡旦半岛纪事》中。

另一位调查者是卡萨斯主教，他毕生都在为争取印第安人的生存权利而努力斗争。他通过民族调查了解了印第安人，并将印第安文化与欧洲的古代希腊和当时的西班牙人文化作了比较。他认为16世纪的西班牙人、欧洲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当地的印第安人，是人类在从原始社会不断发展的道路上处于不

同阶段的人，因而印第安人社会可能代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这个观点具有文化进化的萌芽。同时他还十分注意印第安人文化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他是美洲考古学中生存环境考古的先驱。

3．对古迹的实地考察

到了18世纪，调查的兴趣从拉丁美洲扩展到北美，调查的范围不仅是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还考察古代遗迹。北美的调查者和旅游者在记述遗迹的同时，还推测发现物的发展和起源。这种调查方式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巴特雷姆为代表。1791年他在调查美国东南部土丘时完全采用了他以前从事自然史研究中的生物调查方法。到18世纪下半时，北美出现"文学浪潮"，为了在室内杜撰美洲的历史去收集更多的素材，从而发现了更多的新的遗存，其中最多的是土丘遗迹。

人们渐渐对土丘产生了兴趣：它们是谁建造的？当时人们不大相信土著印第安人会建造这么大型的土丘，因此想象在北美的古代一定存在着一支文明人，后来被印第安人取代，这些土丘就是消失的文明人留下来的，这可能就是美洲的"英雄时代"。1787年本杰明·巴顿认为土丘是丹麦人留下来的，这些丹麦人后来迁徙到墨西哥。但是在他后来1797年的书和1799年的论文中，他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他用更多的精力注意现存的印第安人，提出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很可能就是土丘的建造者。同时他还把印第安人从亚洲到达美洲的年代定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这是第一个确定的美洲前哥伦布时代历史的年代，尽管它与事实出入极大，但说明年代概念已经越来越重要了。1813年布莱肯里奇·H提出，土丘可以分为埋葬形成的土丘和建筑庙宇形成的土丘。前者的年代更早一些。他的观点已经具有功能和年代学的萌芽。他认为北美的土丘是托尔狄克人在去中美洲之前在这里建造的。

当时许多军人驻扎在俄亥俄州，他们开始对土丘进行调

查。例如普特纳姆将军绘制了俄亥俄州马利塔的土丘分布图，被后人誉为“美洲考古科学中的创举”，但是他的布局图还很不成熟和完善。卡特拉牧师调查了马利塔的土丘，并通过考察土丘上树木年轮来确定土丘的年代，这是美洲最早对绝对年代的测定。

1839 年，体质人类学家莫顿测量了 8 个土丘的人骨和当时印第安人死者的头骨，经过比较他认为两者属同一人种，但文化有差别。这是该阶段利用体质人类学解决学术争论的第二个例子。

1837 年和 1838 年，海尔和泰勒开始详细考察威斯康星州的土丘。1839 年，阿尔伯特·罗奇在密苏里州发现一种绝灭的大象骨与石器共存。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石器的古老，大象骨骼和石器分别成为英国和德国的博物馆藏品，只有罗奇本人意识到这种共存的意义，但没有被人理解。这一发现便被遗忘了。

4. 调查与发掘方法的出现

以上种种观点都是在对土丘外观进行描述的基础上作出的种种推测。到这一阶段的末期，开始出现通过实地的系统调查和发掘来解决问题的考古实践。

1820 年，阿特瓦特发表了他在俄亥俄州系统调查的结果。文章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土丘的详细描述、分类，后一部分是对土丘的种种推测。但是他的推测完全脱离了他的描述，说明这一阶段人们还不知如何运用已经获取的资料来论证问题。在描述部分，他将俄亥俄州的土木建筑分为三类：一类是现代欧洲人的；一类是现代印第安人的；还有一类是过去的土丘，他认为这是印度移民去墨西哥时途径此地建造的。阿特瓦特虽然在调查方面代表了这一阶段的较高水平，但是他的分析与结论则是错误的。在这方面詹姆斯·麦库鲁则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他在 1817 年发表的《美洲研究》和 1829 年出版的

《美洲土著历史的哲学和古物研究》两本书中指出，土丘建造者的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并且根据已有的文字资料提出，土丘建造者与印第安人是同一人种，印第安人完全有能力建造土丘；他还将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与拉丁美洲的高度文明作了比较。

1784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三届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为搞清弗吉尼亚洲土丘的性质，采取了发掘的方式。他在土丘上采用了打探沟的方法发掘，并识别出不同的地层。通过发掘，他搞清楚了这个土丘是经过多次埋葬人骨架而形成的，骨架层层叠压高达12英尺。这次发掘后来被惠勒誉为"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发掘……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

这次发掘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在这个推测的年代里，能够用发掘来解决和证实问题，已经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头；第二，在发掘中注意到了地层问题；第三，发掘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收集遗物，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这不论是在美洲还是处在古物学阶段的欧洲都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发掘。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这样先进的科学发掘对后来的考古影响很小，美洲的地层学发掘还是受欧洲影响的结果。

当时的学会组织有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杰弗逊曾任主席(1779年)。这个学会鼓励人们收集和发表考古资料。另一个是出版商托马斯·I于1812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美洲古物学会，它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美洲历史的浓厚兴趣。学会第一本杂志为《学报》，发表于1820年，刊登了阿特瓦特对俄亥俄州古代土木建筑的描述和推测文章。1826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史密松的英国人赠送给美国50万美元以建立一个"在人们中间增长和传播知识"的机构，这就是著名的史密松协会，它成立于1846年，史密松协会将对美洲考古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这时期是欧洲人刚刚来到新大陆的阶段，人们对美

洲的过去和古迹具有浓厚的兴趣，一些发现多属偶然，这时人们一方面记录下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同时对俄亥俄州、美国东南以及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秘鲁的遗迹进行了调查，这些都为下一阶段工作积累了资料。同时，阿特瓦特和杰弗逊的调查与发掘又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了具体的实例和方法，这时的惟一共识是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迁徙来的。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是种种推测。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料很少，另一方面缺少欧洲那种对考古资料解释的模式；所以不会应用所得到的资料。美洲考古的正式确立还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像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样的著作的影响，同时也没有丹麦人提出的三时代体系那种对考古资料解释的方法，这就是1840年以前美洲考古的基本情况。

如果将这一阶段欧洲和美洲的考古学萌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的考古学是由历史学发展而来的，史前时代考古是历史时代考古的向前延伸。欧洲考古研究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先，从而使这种研究富有一种观察自己历史的责任感，充满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美洲考古学是研究“别人”的历史，在研究中采取一种比较超然、客观的态度，其目的往往是想证实或解释某种东西，这种差别不仅导致了欧洲考古学与历史学、美洲考古学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密切联系，而且是造成这两个地区（至少是在考古学初期）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　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

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形成期（1840—1867 年）和初步发展期（1867—1919 年）前后两个时期。

一、欧洲的形成与发展期

（一）形成期（19 世纪 40 年代）

考古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两个标志：一是出现了一种科学解释资料的方法。汤姆森的三期说就是第一个根据遗存的制作技术手段来解释遗存分类、发展和变化的科学方法，而不是从文献历史的方法出发。第二个标志是远古人类及其石器的证实，从而确定了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畴和研究内容。

1. 三期说的提出

古物学在英国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考古学过渡的趋势，但是考古学的真正形成却是在丹麦，这与丹麦的历史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19 世纪初期的丹麦，经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一个尊重自己及其民族独立的国家，不可以只满足于知道自身目前的情况"（沃尔赛）。这是丹麦的现状，而丹麦的历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丹麦等北欧国家由于没有遭到罗马人的入侵，所以在罗马时代没有关于这一地区的任何文献记载，这里的文字历史比英国和法国还要晚 1000 年。丹麦的古物学

家无法把这里的前罗马时期古物贴上“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具有某种“历史意义”的标签，因而在这里揭示古物的历史含义的紧迫感更加强烈。另一个原因是，在对待文字和口头资料与古物的关系上，北欧的古物学家们已经懂得文字及口头资料只是第二位的，要尽可能服从考古所推导的事实。因此，丹麦古物学家更加重视对古物本身的研究。在这方面丹麦历来有对古物详细分类的学术传统。最早的分类成果是根据丹麦收藏家奥拉夫·沃姆的藏品整理的《沃姆分类志》。在19世纪，史前考古学的第一个开拓者就是丹麦的拉斯穆斯·尼厄鲁普教授。他在1806年发表了《我国古代遗迹一览》，并建议成立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他认为，只有通过综合性收藏以及细致研究才可能对史前史产生真实的认识。翌年，丹麦政府依从几位文人的请求，建立了“保护与收藏国家古物皇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命组建国家古物博物馆，负责管理远古及历史时期的古迹。尼厄鲁普担任秘书。他和他的部下在丹麦的墓葬、泥沼、贝丘等遗址中收集标本，加上他的私人藏品，形成了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藏品的核心。丹麦国家博物馆中的藏品越来越多，学者们不得不进行详细的研究，试图解释它们与丹麦早期历史的关系，这就促成了史前考古学中三期说的诞生。

1813年北欧的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在他的《略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的观点。他的观点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直到后来，汤姆森才把它明确地加以肯定。

克里斯琴、朱尔金森·汤姆森是哥本哈根一个商人的儿子。他开始只收藏古钱币，后来广及于所有古物。由于他对古物的爱好和丰富的知识，在1816年继尼厄鲁普之后担任了丹麦皇家古物委员会的秘书，同时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博物馆的首席馆长。他任职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寻找某种编排顺序，以便陈列日益增多的藏品。这时，古物藏品与各种没有考古意义

的古玩杂乱地堆放在一间小屋里。他依据武器与工具的制作材料，把它们划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组。这种划分代表了他所主张的三个依次继承的时代。1819 年博物馆按照这种分类方案进行陈列，对公众开放，1836 年汤姆森在《国家古物指南》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划分方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三期说并不是汤姆森第一个提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的三期说只是哲理性的猜测或是根据口头传说形成的观点，而不是从细致分析考古资料推导出来的。汤姆森是第一个用实物来证明三个时代为客观存在的人。它驱散了古物学家在古物分类中的迷雾，是古物学转为考古学的第一步。

三期说的划分方案首先被汤姆森的学生沃尔赛予以科学的证明。他在丹麦的史前墓葬和泥炭泥沼层的发掘中，观察到这三个时代的地层关系。在杉树层中发现了石器；在其上的地层——橡树层中有石器和青铜工具；铁器绝大部分出在最上面的山毛榉层。他的成果发表在 1842 年出版的《考古发现与墓冢所反映的丹麦古代历史》中，此书译成英文后题为《丹麦的远古古物》。

三期说首先在瑞典得以承认。隆德大学的 B·E·希尔德布兰德博士于 1836 年在汤姆森门下学习。他回到隆德后，把那里的博物馆藏品依照三期说作了划分。3 年之后，他到斯德哥尔摩负责那里的博物馆，他把那里的陈列也按三期说作了调整。多年来希尔德布兰德以三期说为研究基础，对斯堪的纳维亚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另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著名学者是隆德大学的动物学教授斯温·尼尔森，他在论述北欧渔猎起源的文章“斯堪的纳维亚狩猎与捕鱼简史”中也主张三个时代的发展，并在后来发表的《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原始居民》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书在 1868 年译成英文后影响颇大。

三期说在德国也得到采纳。1836 年弗·利施担任梅克伦堡

——什未林大公的博物馆馆长。他一方面按三期说划分藏品，另一方面撰文阐述三期说，主张以它为博物馆藏品分类的基础。与此同时，丹奈尔在研究扎尔茨苇德尔的史前墓葬中也使用了这一划分方案。不论这些见解是他们独自创立的，还是接受了北欧的影响，都说明三期论已开始在欧洲大陆确立了。

除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之外，汤姆森、沃尔赛和尼尔森对史前学发展中的许多最根本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精辟的论述。如果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认知，并把它们与后来的考古学发展相比较，这三位学者是当之无愧的现代考古学奠基人。

首先，汤姆森和沃尔赛在提出三期说时，他们并不认为这三个时代反映了丹麦历史的自身内在发展过程。他们认为丹麦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都不是从本身自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南欧和东南欧传播的结果。更明确地说，这三个时代在丹麦只是早、晚关系，没有内在的承袭关系。这个观点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提出了文化的传播现象。这种传播的观点正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史前学的理论支柱。二是沃尔赛意识到了传播过程中的时间滞差问题，提出利用地中海古物序列解决北欧文化及遗存的年代的可能性，这就是年代校准技术的端倪。三是沃尔赛还明智地指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术语，如果没有地理上的限制，就没有编年的意义。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在分期的细化过程中忽视了地域因素，使得越来越细的分期方案在普及中遇到许多的麻烦。

尼尔森一方面同意传播理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史前史作为一个整体表明了人类及其成就的逐渐进化。地质学表明了生物界的漫长发展过程；生理学证明了人类个体的发展；史前考古学则说明“尽管有表面的或是局部的退化”，但人类总是“不断地、循序渐进的发展”。这个时期传播理论和进化理论并未发生矛盾，它们在后来的激烈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将其

合理性无限地扩大而走向极端。但是就某一文化或地区而言，传播和独立发展（即进化）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困扰着考古学家的一个问题。（柴尔德在考察欧洲文化发展时对于欧洲本土的发展和近东传播各自的作用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至今也未完全解决）。

汤姆森和沃尔赛强调准确描述和区分古物的必要性。《国家古物指南》一书把史前时代的器物分成：石器、罐和瓮棺、据认为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器物、武器、装饰品、除石器以外的其它质料的工具、家庭日用生活用具、杂品。这代表了考古学早期的一种分类。从划分的类别分析，这个分类的标准既有形式，又有功能和质地。由于分类标准不确定，因而分类结果中各类之间有重合，即一件器物可以归入两类甚至三类中。随后他们对分类标准做了改进，变成只以器物形制为标准，做到准确描述。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汤姆森在《国家古物指南》中进一步探讨了器形学与装饰风格在史前器物断代上的重要性。"调查器物的形式和纹饰，仔细比较，找出各个种类的组合关系，就可以断定连续变化过程的顺序，而且仅仅通过观察装饰就能确认器物所归属的时期。这就是类型学方法的开端。

在考古发掘方面，汤姆森和沃尔赛指出应由内行人主持。因为“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如何运用所发现的器物解决科学上的问题。发掘应尽可能完整。例如发掘一个土冢应该从顶部开始，或者用交叉探沟法发掘。对待发掘中遇到的遗存，不仅要保护好有艺术价值的“古玩”，还要保持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例如和死者埋在一起的兽骨，因为它们都有科学价值。这种科学收集遗存的方法从汤姆森提出到在田野中严格实践（皮特——里弗斯将军）经历了很长时间。

尼尔森认为，对考古器物进行研究并不是获得史前知识的惟一途径，还可以通过传说以及其它比较方法。宗教和世俗的传说中通常包含着饶有趣味的事实，而它的真正涵义倒被人们

遗忘了。所以他主张广泛使用比较法，即比较史前的人工制品与现代原始民族所使用的具有相同形式和功能的器物。他的这一观点现在已经发展为当代民族考古学或叫做民族学类比法，是解释古代遗存的一种常见方法。尼尔森还在民族学比较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按生存方式为标准的史前人类分期法，把人类发展划分为蒙昧阶段、游牧阶段、农人阶段和文明阶段。这是泰勒和摩尔根所发展的相似分期法的先声。

沃尔赛从考古学和文献历史学的关系角度，讨论了考古遗存与古代族属的问题。是否应该把考古学上区分出的民族与语言和历史上的名称挂钩？经过多次讨论他认为不能赋予任何这类名称。因为考古上区分的“民族”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之前就已经消失了的，他们是不为人所知的更古老的人类。他们在身后除了埋葬死者的石墓以及一些质地不会腐烂的工具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所以沃尔赛明确指出：“关于最初居住在欧洲的所有民族，史料中不可能都给我们保留下记载。因此，在我们那些少得可怜而又靠不住的材料中，如果某个民族最先被提到，也犯不上就执意认为它是最古老的民族。”这一见解对于我们至今为考古学文化命名和确定它们的族属的研究仍是大有裨益。另外沃尔赛还大胆地对丹麦的相对编年提出绝对年代数据。他认为在公元前 3000 年第一批移民到丹麦定居，青铜时代在公元前 1400—1000 年。

以上是伴随三期说出现的其它有关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观点，其中许多在后来得到发展；还有一些当时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明智的预见。总之，当代考古学的许多方法和各个分支都可以追溯到汤姆森、沃尔赛和尼尔森的观点，所以他们应是史前考古的奠基人。

三个时代的划分是丹麦考古学家运用类型学和比较民族学的方法把一种分期学说引入史前学的结果。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整个考古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它都是史前考古的

理论支柱。它的意义首先在于驱散了笼罩在古物学家研究上的迷雾，正如沃尔赛所说："第一束清晰的光束……透过了北欧和整个世界史前学的黑暗。"它为古物学研究提供了第一种解释方法，使遗存研究最先向着排定其年代序列的方向发展，这也正是考古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由于它总结出武器和工具的技术发展序列，证明了人类发展的真实情况，从而使考古学成为人类及文化思想研究的一部分。而且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比起传统的文献史学更注重人类的生存方式。关于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给予很高评价。"从来的历史记述，都不甚注意物质生产的发展，那就是，不甚注意一切社会生活和一切现实历史的基础。但对于历史前的时期，人们至少根据自然科学研究，不是根据所谓历史研究，那就是，根据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它分作石器时期、铜器时期和铁器时期。"①最后，在考古学方法论方面，三期说经过地层验证后形成遗存组合，这个组合不仅是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基础，而且还揭示了遗存形态演变以及文化在技术和经济上发展的意义。因此三期说是文化划分、类型学研究以及史前经济研究的基础。

2. 远古人类和石器的确认

（1）新证据的不断增多

1828年，纳尔榜博物馆馆长图纳尔在《自然科学年鉴》上发表了他在奥德省（法国南部）比泽洞穴的发现。他在那里发现了人骨、陶器和动物骨骼共存（其中有些是已经绝灭的种属）。第二年，他又宣布在绝灭动物骨骼上发现了砍削工具的痕迹。

由于受到法国南部洞穴研究的鼓舞，施梅林·P·C博士在比利时列日省恩基等洞穴发掘。他将这一发现发表在《关于列日省洞穴中发现的骨骼化石之研究》一书中。他在洞穴中发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5页注52，人民出版社1956年。

了七个人头盖骨、大量人工制品、犀牛、猛玛象，并认为这些遗物是同一时期由于同一原因埋在一起的。莱尔参观了他的发掘后写道："施梅林就是这样，每天顺着绑在树上的绳子溜到恩基洞穴的第一个开口处，在这里曾找到保存极为完好的人类头骨。然后，走进第一级地下通路。匍匐着通过联接大洞室的陕道。在洞室里借火把的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指挥着工人们打穿坚如岩石的钟乳外壳，一块一块取出下面的骨骸化石。为了标明位置，防止丢失每块骨骸，一连几个小时站在泥浆里，水就从洞顶滴到头上……他急切地盼望着出版自己的劳动成果，然而这些资料出版后却没有受到人们重视。他的看法与公众的先人之见截然相反，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一般人都不同意他的意见。"

麦克内里的发现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在英国的肯特洞穴发现了在未被破坏的钟乳石层之下与犀牛等绝灭动物骨共存的燧石工具。他认为这证明人与绝灭动物在远古时代共同生存过。他在发表这一发现前，首先与牛津大学地质学首席讲师巴克兰院长通信。巴克兰否定了他的看法，断定这些人工遗物是"古不列颠人"的。他出于对巴克兰的尊重，采取克制态度，没坚持共存关系，并放弃了公布计划。但是到 1841 年逝世为止，他一直在肯特洞穴工作。

为什么这类证据在日益增多，而人们还不能承认人类的远古这一事实而放弃人类 6000 年历史的说法呢？一方面是因为人不愿承认人骨与这些动物共存而损害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是因为地质学学者仍然是灾变论观点。

（2）均变论的产生

灾变论的代表人物居维叶（1769—1832）认为：根据岩层提供的证据，人们只能设想在地球史上曾发生过一系列巨大的灾祸。《创世纪》中诺亚大洪水的叙述就是保留下来有关这些灾祸中最近一次历史记录。

越来越多的人对灾变论提出质疑。詹姆斯·赫顿（1726—1797）在他的《地球理论》（1785）提出，岩层叠压现象是由于海洋、河流和湖泊中一直在发生的自然作用所引起的，这些作用至今仍在继续。威廉·史密斯在他的《生物化石确定地层法》（1816）中，不仅提出了用岩石中的化石确定岩层年代，而且也认为地层沉积只有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可能形成。查尔斯·莱尔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均变论。他在《地质学原理》（1830）中认为：从地质学上来讲，古代情况本质上与现代相似，即它们的作用过程、方式、速度都是相同的，才能解释地质学上的地层现象。

均变论的出现为证明人类古老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且提供了科学方法，如地层叠压与年代关系；地层内涵与地层的年代；内涵之间的共生、组合关系等等。同时，均变论还是进化论的前提，只有证明地球古老并以同一方式变化，才可能探讨生物的古老，因而才可能研究生物的进化。达尔文曾充分肯定了莱尔对他的影响，生物进化一方面使人相信了人的远古年代和石器，人是在上万年前从猿变来的，从而产生了史前考古；同时进化的观点对考古遗存变化的原因提出了一种解释的模式，形成了文化进化论。丹麦学者提出的三个时代划分证明了人类历史中技术手段的进化。

（3）人类年代与石器的最后确认

尽管地质学变革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但它的最后确认还要有来自本学科的内证。这时有两项重要发现使科学界承认了石器。

第一个是福尔克纳和彭杰利在布里克萨姆的发现。1858年挖掘布里克萨姆港附近山上岩石时，发现一道缝隙。由于这里从未被扰过，就决定在这试掘。在1—2.5米厚的钟乳石下发现了燧石工具与狮子，鬣狗、猛玛、犀牛和驯鹿的骨骸共存。

第二个发现是彼尔特从1837年起开始在索姆河畔的砾石器中收集与绝灭动物共存的打制燧石器。虽然受到冷遇，但是他仍然坚持，最后在事实面前人们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参观者曾说：在砾石层下12米处发现了燧石斧、镞和象、犀牛。如果英国人可以追溯到犀牛和河马生存的时代，那么我们研究的古不列颠人的年代就太晚了。

从人类的远古及石器的确认过程可以看出，新的科学思想强调均变说与进化论，1859年以后，考古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在对人类起源的共同关注中走到一起，使得彭杰利和布歇·德·彼尔特的发现顺利地得到承认。这样，展现在考古学家面前的史前史不再是希腊人、凯尔特人和不列颠人了，而是更早的肯特洞穴和索姆河畔砾石层的主人。从索姆河畔砾石层中的粗制手斧所代表的那个时期以来，人类的文化是怎样发展的？这种发展又用了多长时间？这些就构成了史前考古学近百年来研究的主要问题。

3. 各地的考古发现

在三期说的提出和史前人类及石器的确认同时，各地的发现与研究在不断增多。

（1）埃及

埃及最重大的成果是罗塞塔石碑的释读成功。这块石碑是由希腊文、古埃及俗体文和象形文字写成。解决埃及文明早期文献记载的关键就在于释读罗塞塔碑上的古埃及俗体文和象形文字的铭文。1822年商博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释读成功，掌握了考释象形文的钥匙，奠定了埃及学基础，提供了最早的绝对年代。

文字释读成功引起了人们对埃及考古的极大兴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人纷纷去埃及寻找古物。其中意大利人贝尔佐尼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到埃及兜售灌溉机械，就留在这里盗掘古墓。1817年开始在底比斯寻找法老的墓。他的盗

墓行径是令人憎恶的，他打开一个墓只把里面他认为值钱的东西取走，其余的东西都遭到践踏。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每走一步就压碎一件木乃伊。我完全掉在破碎的木乃伊之中，骨头、大腿、胳膊，人头从我脑袋顶上滚下来，我简直毫无办法。"难怪他每盗完一座墓都要神经恍惚地呆上三两个星期。

埃及真正的发掘创始人是马里埃特。他于1850年由卢浮宫派到埃及寻找科普特人（古埃及人后裔，现在埃及土著居民）的文稿。他一到埃及就对埃及古物产生巨大兴趣，并留在这里。他在埃及主持工作30年，发掘了30多个重要遗址，如基泽的斯芬克斯神庙等。在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期间，他协调了埃及的各项考古工作，第一次对发掘和研究加以适当的控制管理。并致力于阻止埃及古物外流。他创办了近东第一个国家博物馆，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古物机构。但是他的发掘方法常常受到人们指责，因为他关注的是奇珍异宝和历史古迹，而对日常器物不感兴趣，他曾用炸弹炸掉一座神庙坍塌的废墟。他满足于收集大量资料，但既不记录它们的出处，又不估计它们在历史上的意义，当然他更不可能发表他的工作报告。

（2）两河流域

这里的工作与埃及是同时进行的，是英、法角逐之地。考古成果也分文字的释读和发掘两方面。罗林生具备东方语言的知识。他研究了贝希斯敦铭文（位于伊朗克尔曼沙赫，B·C·516年大流士一世时），他在1835—1847年拓印完刻在离地面120多米高岩壁上的全部铭文。1837年就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楔形文字铭刻的头两段，后又释读巴比伦文，不久也成功了，从而找到了研究巴比伦、亚述文明的钥匙。并为确定尼尼微的地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犹如甲骨文对于殷墟的确定）。

田野考古始于1811年英国驻巴格达宫廷代表克劳迪亚斯·詹姆斯·里奇对巴比伦城的两次勘察，并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

第一次发掘是法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尔·博塔于1842年

在尼尼微、1843年在赫尔巴德所做的。亚述帝国的都城有亚述（现在的沙卡特、摩苏尔以南48公里）、尼姆鲁德（摩苏尔东南约32公里）和尼尼微（从摩苏尔出发横渡底格里斯河的渡口处。其中有两处宫殿遗址：库云吉克丘和其南的内比尤努斯丘）。当他在1842年和1843年初在尼尼微发掘时，得知在此以北22公里处的赫尔萨巴德丘发现了石像，于是就到那里发掘。在一周之内就发现了一座亚述时期宫殿、巨大的雕刻石板和楔形文字铭刻。他认为这里是尼尼微，而里奇把库云吉克丘当作尼尼微是错误的。他通知巴黎："尼尼微已重新发现。"其实这里是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的城市和宫殿。他的发现使法国政府为他出资，并派画家弗朗丹担任记录及摹绘雕刻的工作。1849—1850年，他们以《尼尼微古迹》为题发表了在这里的发现，许多遗物运抵巴黎，藏在卢浮宫。

与此同时，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在大英博物馆资助下，发掘尼德鲁德。他发现了亚述几个国王的宫殿遗址，遗物运回大英博物馆。（在运输途中，有些古物和讲稿被盗。）

英国政府也给莱亚德4000镑资金，供他出版考古成果。他把这里认作尼尼微，于是他发表《尼尼微古迹》和《尼尼微及其遗存》。当1849—1851年再次到两河流域时，发掘了库云吉克和尼姆鲁德。这次他已经证明赫尔萨巴德和尼姆鲁德都不可能是尼尼微，而是像里奇所言，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才是尼尼微。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这里发现的泥版文书已经被罗林生释读成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1851年，维克多·普拉斯接替了博塔的工作，发掘赫尔萨巴德，并复原了萨尔贡宫殿建筑平面图。同年，霍姆姿德·拉萨姆接手莱亚德的工作，发掘库云吉克、尼姆鲁德遗址，发现巴尼帕尔宫殿、装饰猎狮雕刻的大厅，以及宫中藏有泥版文字的图书馆。后来洛夫特斯接替了他的工作，在瓦尔卡发掘到锥形镶嵌砖（最早的马赛克）和楔形泥版。1854—1855年英国

驻巴士拉的副领事泰勒发掘穆卡亚丘，发现了塔庙和泥版文书，并发掘了穆卡亚以南阿布沙兰的一组土丘。罗林生根据发现的材料认为穆卡亚就是迦勒底人的乌尔城、亚伯拉罕的家乡，而阿布沙兰则是《圣经》中的埃利都。泰勒的发掘发现了苏美尔人早期建筑，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里没有发现像亚述时期那样的精美雕刻。

(3) 希腊

埃尔金（Elgin）(1766—1841）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他发现希腊雕像被破坏严重，得到允许后把巴台农神庙（供奉雅典娜神的）前的雕像运回英国。1821 年法国大使秘书马艾律（marellus）买到维纳斯像，存放在卢浮宫。

1829 年希腊从土耳其统治下得到独立，希腊人渴望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于是出现了希腊人自己的考古学者，改变了从前外国的外交官从事希腊考古的局面。

这时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克尼多斯城的发现（Cnidos），是由英国人牛顿（Charle Thomas Newton）于 1858—1859 年发现的，他对城市布局首次进行了复原，并运用了照像技术。

(4) 意大利

1748 年 3 月开始发掘庞培城（罗马时代城址。公元 79 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埋没）。1763 年由所得铭文确知为古代庞培。

18 世纪的发掘只有几个人，采取了挖宝的方法，有时甚至不惜锯碎壁画来获取“珍宝”。

19 世纪初，那不勒斯国王制定发掘计划，开始对庞培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最多时达 600 人。

1860 年菲奥雷里（Fiorelli）主持庞培发掘，采取了层层揭露、保护现场的方法，研究建筑的结构和技术。他明确地指出，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城的全貌，不是寻找艺术品。所以他对富人和穷人的房子都做了完整的复原。

（5）野蛮人的欧洲

A．水上遗址的发现（1850—1875）

1853—1854 年冬季十分干燥，苏黎世湖水面下降，露出木桩、石斧、鹿角工具、陶器和烧焦的木头。凯勒研究后认为是一处湖上住宅。1875 年在瑞士发现 200 多座。意大利发现特拉马尔（terramare 即沃土）——湖上住宅遗存。北爱尔兰也发现水寨。

这些水上遗址的发现对于史前考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从地层上证明了三期说。沃尔赛在沼泽地区发现了植被和遗物共生和相互叠压的地层。最下面是苏格兰杉树和石器；中层是橡树、赤杨、桦树和青铜器；上层是山毛榉和大量铁器共存。这样，汤姆森根据类型学和民族学提出的三期说又从地层学上得到证明，同时使人们认识到仔细观察地层的重要性。其次，它证实了发掘有可能获得早期人类的详细情况，尤其是易腐的炭化苹果、梨、小麦、大麦、糕点、亚麻纤维和编织物。因此发掘不限于石器、陶器和金属器。这是 20 世纪动物、植物、岩石和金属冶炼等专题科学分析的开端。

B．前罗马铁器时代

欧洲属于前罗马铁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在当时仍贴上了不列颠人、高卢人等标签。

1846 年以拉姆绍尔为首的维也纳博物馆考古队发掘了哈尔施塔特遗址。这一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 1864 年，共发现了 993 座墓葬，代表了欧洲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1858 年施瓦布上校在瑞士纳沙特尔湖旁的拉登遗址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铁质刀剑。

1872 年希尔德布兰德提出铁器时代分期：早期即哈尔施塔特期，（公元前 1000—前 450 年）晚期为拉登遗存。（公元前 5—7 世纪）。并认为从时空范围看，它们皆是凯尔特人遗存。

这时还发现另外两支欧洲原史时代（protohistory）民族的考古遗存。一支是伊特鲁利亚人，1827年发现在意大利南部，有壁画洞穴和墓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前5世纪。另一支是斯基泰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对此有详细记载。1763年，A·N·麦里贡诺夫将军对斯基泰人的墓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1830年保罗·德尔吕在刻赤附近发现了斯基泰人遗存，《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之古物》一书对这次工作做了介绍。

4. 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三期说的提出和史前人类及石器的确认大大推动了史前考古的发展。作为考古学的第一个解释方法的三期说主要是解决遗存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对当时史前考古的发展方向有很大影响。因此，这一阶段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考古学遗存，尤其是史前遗存的分期问题。

三个时代的划分以及索姆河畔燧石器被证实的同时，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丹麦提出的三期序列是否适用于整个欧洲？如果是这样，索姆河畔的打制手斧能否归入以丹麦为代表的石器期？因为这两地的石制品有明显的不同。

1859年，约翰·伊文思在承认索姆河畔发现的真实性时曾暗示过问题的答案，他认为："索姆河畔砾石层中加工过的燧石器与一般石器时代的石器有很明显的不同。"三年之后，他在写信给彭杰利时把别人送到他那里的一件燧石工具说成是"不属于索姆河畔的砾石层期，但可以算是那个所谓的'石器时代'中一件未完成或未磨制的石凿"。很显然，他把石器时代分成"砾石层期"和所谓的"石器时代"（即丹麦的石器时代），前者早于后者。

最先明确提出两个石器时代的是法国考古学家。他们在石器时代中划分出"打制石器时代"和"磨制石器时代"。著名的英国学者、进化论的倡导者艾夫伯里（原名卢伯克）认为人

类的早期历史必须从民族学和考古学入手。他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认为"考古学是地质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真正边缘学科"。[①] 他在 1865 年发表的《史前时代》一书中接受了法国学者的观点。将石器时代一分为二：即旧石器和新石器，使丹麦人的三期说扩展为四期说，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广泛采纳。史前人类发展阶段的四分法成为所有考古发现都可适用的理论结构。

石器时代的划分又涉及到与地质时代的对应问题。莱尔在 1868 年的《地质学原理》第十版中，采用了艾夫伯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概念，不过他谈到在两个时代之间还提出了一个驯鹿时期，并且谈及冰期和后冰期。法国地质学家和史前学家把后上新世的时期称为第四纪和全新世，彭杰利用新生代来包括第三纪和第四纪。对法国人来讲，第四纪就是更新世，也就是旧石器时代。全新世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就在新、旧石器划分的同时，1850—1875 年间旧石器时代又有许多新发现，并进行了再分期，爱德华·拉代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拉代是法国热尔区的一名地方行政官。他放弃了对法律的学习，转而攻读古生物学。1837 年当施梅林和麦克内里的发现还很少为人注意的时候，他就已经承认第四纪人类的存在。1836 年他在桑桑的中新世地层堆积中发掘出上新猿化石，1850 年发掘出森林古猿化石。1845 年他宣布，在桑桑完全可能发现现代猿的祖先和现代人的祖先。拉代是从研究古人类学转到史前考古学的。首先他对一位铁路工人在 1852 年偶尔发现的奥瑞纳野兔窝里的人骨和后来随之找到的岩棚内的人骨、绝灭的动物遗骸、雕刻的骨片、燧石器的象牙工具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接着他考察了比利牛斯山地区的其它洞穴。由

---

① 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版社 1983 年。

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把注意力投向多尔多涅省的佩里戈尔区。在一位英国当银行家的朋友克里斯蒂的资助下，他于1863年起发现了一系列遗址：昂费尔狭谷、洛热里高地、马格德林、莫斯特、以及莱塞济耶。有些遗址在史前考古学中十分著名。这些成果拉代自1864年起刊登在《考古学杂志》上(关于"佩里戈尔洞穴"的论文)。克里斯蒂于1865年的去世以及后来的普法战争给拉代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他于1871年去世，发掘资料由鲁珀特·琼斯教授在约翰伊文思协助下进行编辑，以《阿基坦遗存，对佩里戈尔及法国南部邻省考古及古生物研究的贡献》为题完整发表（1875)。

拉代对法国旧石器时代的发现与研究主要有二个贡献：第一，他最先提出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拉代在"阿基坦遗存"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出：莫斯特、洛热里高地、马格德林三个地点"尽管都属于'无家畜伴出的简单加工石器时代'分期范围之内，可是在这三处所收集的人工制品却并不一致"。克里斯蒂建议把人类史前的石器按三个时期划分：1）最古阶段，即洪积层或砾石层中的石器；2）洞穴中发现的石器；3）最晚阶段，即在地表发现的石器。拉代没有采纳克里斯蒂基于石器发现地点的分期方案，而是根据古生物学的证据进行分期，他把法国南部洞穴发现分成：

Ⅰ洞熊　Ⅱ猛玛象、披毛犀　Ⅲ驯鹿　Ⅳ野牛

为代表的四个时期。但他逐渐认识到洞熊期和猛玛/犀牛期是不可分的。加里古在这四期之前又加了一个"喜暖"象（即古象)、"喜暖"犀（即梅氏犀）和河马时期。这样，拉代和加里古对石器时代所作的分期方案是下列四个时期：

Ⅰ河马/喜暖象期。这是阿舍利或阿布维利洪积层石斧时期。人类在这个时期主要生活在开阔地居址，与法国南部洞穴所代表的时期不同。

Ⅱ洞熊/猛玛期。以莫斯特遗址为代表。这时人类时而居

于洞穴，时而居于开阔地居址。

Ⅲ驯鹿期。大多数洞穴发现都属于这一期，并以洛热里低地和马格德林遗址为代表。

Ⅳ野牛时期。可以丹麦贝丘遗址及瑞士湖上住宅遗址为代表，属于新石器时代。

拉代的第二个贡献是在发现旧石器时代艺术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他向我们证明了生活在法国南部洞穴早期人类不仅是制造石器的工匠，而且还是艺术家。1860 年拉代在马萨洞穴发现了灶坑、驯鹿骨、打制的燧石器、鹿角制作的棘刺标枪、骨针和一个刻有熊头的残鹿角叉的顶端。他于翌年在《自然科学年鉴——动物学》第 15 卷发表了马萨洞穴的发现，并附有布鲁耶 1834—1843 年在塞维涅的夏弗（法国维埃纳省）洞穴发现的一段驯鹿骨上的图画。布鲁耶等人曾推测这幅画在风格上属“凯尔特人”，但拉代认为其年代要早得多。拉代对夏弗和马萨遗址考古发现的意义，以及对真实年代的认识，第一次揭示出法国——坎塔布连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

拉代的分期方案发表后，赢得了广泛的承认，但也有一些批评意见。例如博伊德·道金斯认为拉代利用古生物学作分期的想法毫无用处，“即不能适用于英国和比利时的洞穴，也不适用于法国洞穴”。

这时又出现一些新的分期方案。如杜邦的分期和保罗热韦的分期，他们的分期都是受拉代的影响以古生物为标准的。但是热韦分期中的后两个阶段却是考古分期，对后来莫尔蒂耶分期有很大影响。

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是拉代的学生和崇拜者，但他又是拉代分期方案最坚决的批判者。他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分期方案，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

威廉·彭杰利在他的肯特洞穴正式报告中，提出一种新的分期法，这种方法在许多方面都孕育着 20 世纪旧石器时代文

化划分的方法。他在肯特洞穴的旧石器时代堆积中划分出几个阶段，第一层是只含有石核工具的洞熊层堆积，第二层是只含有石片工具的鬣狗层堆积。他写道："在鬣狗层堆积中发现了石片工具，但洞熊时期的人类既没有从燧石核上打下的石片，也没有用石片作出工具，而是用燧石石核打制成所需的形状。"

总之，这一阶段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分期，各种方案的相继提出的过程是分期逐渐细化的过程。为了对比各家之说，将石器时代分期的发展过程附以图表（表一）。

表一　几种分期的方案比较

艾夫伯里	沃尔赛	拉代/加里古	热　韦	莫尔蒂耶
新古器时代（磨制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晚期	野牛期	湖上住宅期	罗本豪森期
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早期：(2) 贝丘和沿岸的发现 (1) 砾石层与洞穴中发现的石器			
		驯鹿期	使用驯鹿骨时期	马格德林期
		洞熊/猛玛期	猛玛期	梭鲁特期
		河马期	南方象时期	莫斯特期
				舍利期
				特奈期

以上分期方案尽管五花八门，但是如果从分期标准入手，可分三种：一种是以古生物为标准的；二是以地点为标准的；三是以遗存本身为标准的。这里只是艾夫伯里的方案，但彭杰利发展了这一标准，不仅以特征为标准，还包括了遗存的组合，例如洞熊与石核石器组合、鬣狗与石片石器的组合。第三

种划分标准成为 20 世纪文化划分的主要方法。

5. 小结

这一阶段是考古学的形成时期，经历了一个史前考古的出现到在欧洲范围内基本形成的发展过程。它的形成不仅仅表现在本文所综述的那些发现和研究结论上，而且还表现为对史前学研究的广泛承认。这种普遍的兴趣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体现在一般书籍和杂志上所刊登的文章以及这类书刊的销售量上。其中莱亚德的《尼尼微》、丹尼斯的《城市与墓葬》、艾夫伯里的《史前时代》和莱尔的《远古人类的存在》都是比较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书籍。另外具有考古内容的文章在《旁观者》、《绅士杂志》和《雅典娜论坛》等刊物上越来越多。二是体现在听众踊跃参加地质学和史前学讲演会上。无论彭杰利在什么地方演讲、无论是他讲什么题目——是肯特洞穴还是索姆河畔，会场上总是座无虚席，他的听众永远是兴致勃勃。三是体现在相继出现的学术刊物、国际会议和各地的协会上。莫尔蒂耶 1864 年创办《资料》杂志，在其后的 10 年里出现了一些最负盛名的国际性刊物，如布伦斯威克主办的《人类学档案》(1866 年创刊)，1869 年在柏林创办的《民族学杂志》，以及 1871 年创刊的《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维也纳人类学协会通报》和《人类学及民族学档案》。1865 年莫尔蒂耶在斯培西亚召开的意大利自然科学协会会议上提议创办一个古民族学或考古学与史前人类学的国际会议。这一倡议得到广泛支持。于是 1866 年在纳沙特尔召开了第一届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后来在巴黎、诺里奇和哥本哈根也分别举行了会议。在这期间组织的著名协会有坎布里安（英国）考古协会、基尔肯尼（爱尔兰）考古协会、威尔特郡考古协会。在 1867 年巴黎博览会上展出了有条有理的成果（在 1851 年英国博览会没有考古成就展览），这标志着人的历史和史前史在人类自己的知识中找到了适当的地位。所以我们把这一年作为考古学形成的标

志。

这时期各地的考古发现仍处在古物学向考古学过渡阶段，尚未出现正规的科学发掘，但这时期的发现为今后的研究积累了资料。埃及和两河流域在古文字释读方面均有突破性研究成果，从而为科学地利用古文献研究考古遗存以及追溯文明的源头奠定了基础。

这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丹麦人的三个时代发展成为法国史前史的一个复杂序列。考古学者的工作旨在说明人和文化由低级生物开始的进化，这在人类认识自己和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方面导致了革命性的变革，“可以和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相比”。[1] 它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人类思想体系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莫尔蒂耶在总结史前史研究成果在哲学上的意义时提出了三点：人类进步的法则、相似发展的法则和远古人类的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既是生物进化的证明，又是哲学思想的证明，然而正是考古学者总结出来的技术发展序列证明了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因此考古学成为人类及其文化总体研究的一部分。

在考古学的形成阶段可以看出，把古物学变成考古学一方面是古物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自然科学、尤其是地质学的引入，从而使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一阶段许多著名考古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如约翰·伊文思、彭杰利、博伊德·道金斯·拉代和莫尔蒂耶。因而从这一阶段起在考古学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考古学研究应采用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还是历史学方法？这个问题自考古学产生之日起直到现在一直存在。这是由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考古学研究的目标是人类、人类社会与历史，应属社会科学。但它所使用的史料——物质遗存，既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又是

---

① 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译，三联书店 1991。

人类行为过程的产物，所以考古学者既要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又要采用社会科学方法。

在这一阶段的三期说普及过程中，很多人不肯接受。其原因是这一学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研究上错误地运用地质学方法的结果。托马斯·赖特（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人。他们虽然承认地质学所揭示的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同时又认为靠地质学方法对历史进程所作的分期在历史上毫无意义。不能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对待历史，把器物分成种属。我们要与人类种族打交道，只能把我们要研究的器物按照他们分属的民族来划分。因为这些器物反映了他们归属民族的风俗和历史。

在 1870 年前后，一系列石器时代分期方案出现了。在 75 年后的 1940 年，著名旧石器时代专家步日耶评价道：它的特点是清楚、简单、极富逻辑性，但最后这一点显得太突出了，以至反而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现实总比我们对它的认识要复杂得多。步日耶的这段话对我们现今从事分期研究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对于 19 世纪的考古前辈们来说却无法理解，他们大多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或是人类学家。他们是用地质学的方法处理洞穴及砾石层的发掘，用地质学地层序列的刻板术语来处理人类历史。正如莫尔蒂耶自己所说：我的分期方案完全是地质学的引伸。旧石器时代艺术这种不寻常的发现再一次向考古学者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说明对于一个考古学者，尽管考古技术似乎更接近自然科学，但他毕竟是一个历史学者。因为我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仅仅是燧石工具的制作者，还是艺术家，还具有有意埋葬的原始哲理观念，所以单单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是无法胜任这种研究的。

（二）初步发展期（1867—1919 年）

1、考古学研究

这一阶段的考古学研究仍然是在三期说的基础上对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和铁器时代各自做更细的划分。

（1）旧石器时代分期

莫尔蒂耶对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在当时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仍然是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体系，但也有一些批评和修改意见。

在 19 世纪末叶，又出现了几种分期方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萨蒙、皮埃特、鲁托和莫塞利的意见（表二）。

表二　各地分期方案与莫尔蒂耶分期的对应关系

莫尔蒂耶	萨　蒙	皮埃特	鲁　托	莫塞利
1. 舍利	舍　利			
2. 阿舍利		杏仁岩	默　兹	佩鲁基耶
			坎皮纳	
3. 莫斯特	莫斯特	霞石岩 石片刮削器	后坎皮纳	维布拉蒂阿那
4. 梭鲁特			赫兹贝依	文蒂米利亚
5. 马格德林	马格德林	雕刻时代	佛兰德	法尼亚

以上不同的分期方案一方面反映了这时期对史前考古学的兴趣与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莫尔蒂耶的方案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莫尔蒂耶是根据法国的发现确立这一分期方案的，但是他却把这一方案看成是普遍适用的，可以用来划分人类历史。因而当这一方案运用于欧洲其它地区时便出现了许多问

题。鲁托的方案就是由于莫尔蒂耶方案用于比利时所遇到的麻烦而提出来的，于是他用更换本国地点的办法加以解决。但莫塞利在把莫尔蒂耶的方案应用于意大利时还发现，这些法国的分期概念可能与意大利的序列并不完全一致，于是他提出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序列。各地分期序列的出现又向人们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例如法国序列的梭鲁特期、比利时序列的赫兹贝依期以及意大利的文蒂米利亚期之间仅仅是时间阶段相同，还是人工制品的器物组合也相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各序列中的"期"的含义是什么？是时间概念还是器物组合的概念？

对于莫尔蒂耶来说，"期"就是时间概念。他的时间概念分四个等级：纪（第三纪、全新世）、时代（石器时代）、时期（罗马时代）和阶段（舍利、马格德林期）。莫尔蒂耶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这时的反对派以博伊德·道金斯为代表。他批评莫尔蒂耶的方案仅仅承认考古证据的纵向变化，而不考虑横向变化。但是他的意见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所以许多更合理的概念人们没有认识到。例如，如果考虑到地域因素，那么各地的分期序列中的阶段就不仅是时间上的时期，而且是考古遗物的组合了。再比如在按莫尔蒂耶分期方案布置圣日耳曼博物馆的藏品陈列时，馆长亚历山大·伯特兰把藏品标签上的"时期"二字改成"类型"，这在表面上解决了"时期"称呼混乱的矛盾，而实质指出了所谓"时期"的本质。但却引起莫尔蒂耶的大怒，把这看成是向当时的反对派满腔热情投降的行为，遗憾的是伯特兰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改动的高明之处。分期方案中"时期"的含义到下一阶段才得到解决。

（2）中石器时代的确认与新石器时代分期

在丹麦人的三期说和法国人的分期序列中，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在欧洲没有发展关系是公认的：马格德林期的猎人

被认为是为了追逐迁徙的驯鹿而北移；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家畜、作物和陶器都是由亚洲来的入侵者带到荒无人烟的欧洲。但是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尤其马格德林期的确认为寻找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标准。

1875—1900 年间在法国发现一系列晚于马格德林而又不是罗本豪森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1887 年爱德华·皮埃特在法国南部的阿齐尔遗址的马格德林堆积层之上发现一层厚厚的堆积，含有鹿角制成的扁平梭标和用赤铁矿彩绘和卵石以及赤鹿和野猪的骨骸，皮埃特把它命名为阿齐尔文化。1891 年夏梅松和达尔巴发掘了圣马托里（上加龙省）的吐拉斯岩棚，也发现了阿齐尔文化遗址。1879 年埃德蒙·维埃尔法官在塔登诺阿（埃纳省）的费尔堡公园发现一处遗址，遗存中有大量小型几何状燧石工具，他于 1890 年作了详细报道。1896 年莫尔蒂耶介绍了比利时、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埃及、印度等地类似的几何形燧石细石器，认为它们都属于塔登诺阿期。1886 年菲利普·萨蒙介绍了法国北部的坎皮尼遗址，其特点是穴居、以石斧、石凿、斜边锹、粗锥和刮削器为工具，共存牛、马、鹿骨和碳化的橡树和桉树。在这居址之上的堆积内有磨制石斧。

以上发现的阿齐尔、塔登诺阿和坎皮尼遗址应归入史前分期方案的哪一位置？丹麦的贝丘遗址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斯廷斯特鲁普把它归入新石器时代，沃尔赛则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艾夫伯里作一折衷决定把它归入一个特殊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面对这些问题，1892 年艾伦·布朗建议在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居中的时代，称作“中石器时代”。尽管这时莫尔蒂耶和皮埃特仍然在争论把这些遗存是放入旧石器时代末期还是新石器时代初期，但是他们都认为在马格德林期和罗本豪森期之间确实有一个过渡“时期”。

中石器时代的提出又促进了新石器时代的分期研究。根据

中石器时代的过渡特征，萨蒙在1891年发表的《石器时代》一书中放弃了新旧石器的划分，而把整个石器时代分为六期。他的前三期仍属旧石器时代、即舍利期、莫斯特期和马格德林期，后三期与新石器时代约相对应：坎皮尼期，夏塞——罗本豪森期，卡纳克期（即巨石遗迹时期）。

格罗斯和海尔利根据瑞士湖居文化提出瑞士新石器时代分期：Ⅰ夏万期，即从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期，Ⅱ莫塞多夫期，相当于罗本豪森期，Ⅲ文涅尔兹期，红铜文化期。

蒙特柳斯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四期：在贝丘文化之后的第一期以尖状磨制石斧为特征；第二期是细突状磨制石斧的"多尔门"巨石墓（即矩形成多边形巨石墓）；第三期是粗突状磨制石斧和有联接甬道的巨石墓；第四期是长形石棺。蒙氏的分期与当时的大多数人有所不同：第一，他没有沿用地点命名的方法，而是采用了罗马数字来表示各期，这样可以避免与某一国家的典型遗址纠缠在一起；第二，由于不用地点命名，因而每一期的标准更加强调了遗存的特点和相互间的组合，这有利于下一阶段"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出现。但他的划分方案仍然还是以时间顺序进行的分期。

（3）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

早在1859年，沃尔赛在他的《北欧考古发现》中提出德国北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青铜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特征是土葬，青铜工具和武器上的纹饰生动而有气魄；第二阶段为晚期，特点是火葬，青铜工具和武器在形式和装饰上均显露出衰落的迹象。德·莫尔蒂耶把法国的青铜时代也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是以日内瓦湖莫热的罗梭遗址命名的莫热期，特征为扁斧和短剑；晚期是以汝拉山脉的拉诺德遗址窖藏命名的拉诺德期，特征为有肩及穿孔的斧和长剑。

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发现青铜时代的两分法不符合本国实

际，而是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和青铜时代开始之间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皮戈里尼、科利尼和奥尔西等人都提出了铜石并用时代并加以说明。这一阶段后来在匈牙利、法国南部的迪弗遗址和布列塔尼半岛都发现了，并叫做红铜时代。

然而，这个铜石并用时代（或叫红铜时代）并没有被广泛采纳，其原因是奥斯卡·蒙特柳斯的著作及其本人的影响。蒙氏在对整个欧洲和地中海东部进行广泛的比较考古学研究之后提出了青铜时代的分期。他的分期方案中的第一期就是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过渡时期放入了青铜时代。由于蒙氏在考古学的地位使得“铜石并用时代”渐渐被人淡忘了。蒙氏的分期发表在他的《论青铜时代的编年问题，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主》一文中，这篇论文发表在 1885 年的《资料》杂志上，后来又扩展成三部著名的著作：《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青铜时代最早期的编年》（1900）、《金属输入之后意大利的原始文明》（1895、1904）和《瑞典与斯堪的纳维亚其它国家的史前时代》（1895）。

关于铁器时代的分期也出现了几种方案。1872 年希尔德布兰德已经把前罗马时期的铁器时代分成早期（即哈尔施塔特期）和晚期（拉登期）。1875 年德·莫尔蒂耶也采用两分法，但把晚期叫做高卢或马恩期。后来又把晚期一分为二，提出铁器时代的三期分法：哈尔施塔特期、马恩期和博夫瑞期（以法国博夫瑞山城命名）。1885 年奥托·蒂施勒运用蒙氏的技术类型学方法也把拉登期一分为二，把法国的铁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

这时期对遗存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发展阶段进行排列和划分，即研究遗存的时间阶段。这时的考古学家尚未意识到作为时间阶段特征的器物组合实际上乃是人类群体物质文化的特征，也没有认识到这些人类群体是可以同时共存的。整个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都是以“时间阶段”概念为中心，其原因一方

面是地质学的影响。史前考古学有一部分就是从地质学中衍生来的；另一方面是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动物界的肉体是进化来的，人类世界的器物也是进化产生的，所以考古学也可以按生物进化的“阶段”概念来研究。

各种分期方案出现后每每遭到否定，其原因是地域问题，也就是如何使分期适用于整个欧洲的问题。早在1858年，沃尔赛就曾建议欧洲青铜时代应按不同的地理划分进行研究。尚特尔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把青铜时代的欧洲划分为三大区：乌拉尔区（西伯利亚、俄罗斯和芬兰）；多瑙河区（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和英伦三岛）；以及地中海区（希腊、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等地）。

这时在希腊和爱琴地区的考古工作给分期问题带来了新的方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谢里曼在爱琴地区的考古发现并没有采用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的名称，而是用当地历史上的名称命名为迈锡尼文明和前迈锡尼文明等。这样就摆脱了欧洲分期的困扰。这是一种不同于原有三时代体系的分期，而是以文明和文化划分的方法。因而，它又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欧洲史前考古是建立在三时代体系分期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文明、文化划分基础上？蒙特柳斯赞成前者，认为应把三时代体系扩展到全欧洲包括地中海东部及近东古代文明研究中去。沃尔赛和尚特尔赞成后者，建议把地中海东部考古的方法扩展到整个欧洲。但是地中海东部考古学的发展并没有摆脱史学家的癖癖，总是企图用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诸文化，如迈锡尼。这样在其影响下在地中海东部出现了腓尼基文化、特洛伊文化、雅利安文化等等名称。

总之，随着分期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现的增多，如何修订三时代体系以适应考古资料与日俱增的复杂性的问题已经摆在了考古学者面前。

2. 各地考古发现

(1) 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的发现

上一阶段拉代发表的马萨洞穴和夏弗洞穴的艺术品并没有使人们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真实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864年出版的《前洪水时代与普瓦图的凯尔特人》。在这本书中列举的旧石器时代真正的艺术品中还掺有伪造的图画，还有一些竟是梵文字迹。

在这一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艺术又有新的发现，首先是1875年，索吐奥侯爵在阿尔塔米拉洞穴（西班牙桑坦德附近）后壁上发现黑色绘画，他认为壁画与洞内旧石器时代堆积是同时的。四年后，他的小女儿在洞室很低的，成人从未去过的地方，发现了动物图形彩绘。

这些发现和见解的发表，引起考古学界轩然大波。莫尔蒂耶承信壁画的真实性，有些人则认为它们是伪造的，甚至召开学术会议辩论绘画的真实性。

在这同时，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些小件艺术品，如1892年发现的布拉森普依妇女象牙小雕像。

1895年博梅鲁在塔亚克（多涅多省）拉木特岩棚壁上发现的绘画是在清理完洞内的新旧石器时代堆积后才露出的，这种堆积关系证实了绘画的真实性，使人们逐渐接受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艺术作品这一事实。

当1909年在法国多尔多涅省的孔巴雷勒和丰德高姆发现大量绘画和雕刻品时，这一问题几成定论。次年，卡尔达伊拉在《人类学》上发表题为《绘画装饰的洞穴：阿尔塔米拉洞穴——一个怀疑者的忏悔》的文章，讲述了对洞穴艺术真伪问题看法的转变。

人们普遍承认了人类艺术的童年。

(2) 埃及

埃及考古先驱马里埃特于1880年去世后，由马斯伯乐接

任。他对第五王朝末代王乌纳斯的金字塔进行了发掘，并发现了祝福国王的咒文“死者之书”。

埃及在这一阶段进入考古的黄金时代，这应归功于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F。他在1875—1889年曾在英国发掘斯通亨奇环状列石（stonehenge，即巨石柱群），使他逐渐具备了一个勘察者所必需的全面训练。1881年起，他开始在埃及从事考古。他的贡献首先是对埃及王朝以及前王朝的重大考古发现。埃及王朝时期最主要的发现有塔尼斯大神庙、三角洲的古希腊殖民城市瑙克拉提斯、阿姆和达夫尼的墓地。1888—1890年又转向法尤姆地区。1891年发掘了迈杜姆古代神庙，还发现了古罗布和卡昏遗址的迈锡尼和前迈锡尼时期的陶器，埃及前王朝文明的发现有纳卡达和巴拉斯（1894—1895），在纳卡达遗址揭示出一片含有两千多座墓葬的史前墓地，还有1898—1899年在迪奥斯波利斯帕瓦尔（胡）的工作。

他的第二个贡献是考古学方法与技术的创新和完善：首先是科学的发掘方法，早在少年时代他就为在英国怀特岛上罗马时代房屋的胡乱挖掘而感到震惊，此后他暗自下决心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发掘，以便了解地下的东西及埋藏情况”。“循序渐进”（就是按地层从晚到早地发掘）地发掘以及了解遗存的埋藏情况是对考古发掘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他在1885年根据埃及的发掘总结出四条发掘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便；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作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完整发表发掘报告。他的四条原则与埃及以前的发掘工作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他在考古方法上的另一个创新是建立了交叉断代法，推广了比较考古学方法。皮特里于1889年和1890年分别在埃及古罗布和卡昏两处发现埃及十八王朝末的遗物和迈锡尼陶器共存

以及埃及十二王朝陶器与爱琴彩陶共生。据此他建立了两地的年代对应关系，给爱琴地区的文化序列以绝对年代。1890 年他在巴勒斯坦的赫西土丘发掘，土丘文化堆积厚 18 米，他按地层发掘和研究陶器，他发现每一层都有自身特有的陶器类型，但陶器类型与层位又不完全吻合一致。他把赫西遗址的某些层位与埃及王朝材料进行对照，得以在 18 米厚的全部堆积建立起绝对编年序列，这处遗址由此而成为研究层位叠压遗址的典范。

皮特里在考古方法上的第三点贡献是创立了序列断代法。在纳卡达、巴拉斯和迪奥波利斯帕尔瓦等地的发掘揭示出早于埃及第一王朝的考古遗存，怎样判断它们的绝对年代呢？他设计出一种序列年代系统，并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迪奥斯波利斯帕尔瓦遗址所得出的史前陶器类型序列中。他的序列年代起始为 S. D. 30 年（S. 即 sequence，D，为 Date，意为序列年代），这是明智的预见，因为他预测更早的史前材料尚有待发现。他把史前时代的末端即王朝开始的年代定为 S. D. 80 年。从 S. D. 30 年到 S. D. 80 年这 50 年中，每年以 20 座墓葬为代表。这一体系最初发表在《迪奥波利斯帕尔瓦》和《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两书中。皮特里认为“具有众多考古遗物的史前时代应该像有年代记载的历史时代一样，明确而肯定地进行研究”。

皮特里的最后一点方法技术的贡献是强调对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人类所使用的器物进行科学的研究。他认为考古学家必须研究“考古遗物的一切细节，工具的颜色、结构和力学问题”。他奠定了考古学中人工制品分析的基础，这一方法在 20 世纪已产生出颇有意义的结果。

（3）两河流域

大英博物馆亚述部的职员乔治·史密斯在 1871 年发表了《从楔形文字释读得出的亚述巴尼帕尔的历史》。次年，他在整理碎泥版时发现了有关迦勒底人洪水记载的一部分。《每日电

讯报》出资一千英磅由他组织人员去寻找。他到库云吉克丘的第五天就找到了缺失的泥版碎片。古代泥版文书又一次证实了《圣经》中的历史史实，他的著作《亚述的发现》、《迦勒底人创世纪的记载》都成为畅销书。

霍姆茨德·拉萨姆接替了史密斯。1878年，他在巴拉尼特丘发现萨尔玛那萨尔二世的青铜大门。1880年在阿布哈巴发掘的泥版文书，证明这里是西帕尔，是供奉太阳神沙马什的神庙。在这里发现了记载巴比伦末代王那波尼德发掘阿卡德国王放置的基石这一事实。

这一时期揭开了苏美尔文明考古的序幕。上一阶段洛夫斯特发掘的瓦尔卡、泰勒发掘的乌尔和埃利都都是苏美尔人的遗存，但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罗林生将巴比伦文译读成功时，曾设想有一支早于巴比伦人的非闪米特人。乔治·史密斯释读的亚述文书也提到文书是抄自时代更早的资料。

然而真正向人们揭示出苏美尔人历史的是1874年斯·德·萨泽克（法驻巴士拉领事）对泰罗的发掘。其中发现了拉伽什第七任长官古狄的雕像，这个遗址正是苏美尔城拉伽什。

1884年美国派往两河第一支考古队——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在尼普尔的风神庙发现五万余件泥版文书，绝大多数是苏美尔文字写成的，时间跨度在一千年以上，是迄今苏美尔文献中最大的一部分。

20世纪初期，德国人在德国东方协会的赞助下开始了严谨的发掘。1899—1914年科尔德威和安德烈完整地发掘了巴比伦城和亚述城。两河的建筑是用土坯建造的，原来的发掘者对这类遗址的技术一无所知。科尔德威和安德烈最先成功地找到土坯建筑的墙壁。这种技术使两河流域第一次完整发掘一座巴比伦王国城市建筑，同时通过完整发掘土丘遗址揭示出地层叠压序列。他们解剖了伊斯塔尔神庙的地层，发现了连续叠压的神庙建筑。这不仅是把地层分析法引入两河发掘的首例，而

且还提供了苏美尔人宗教礼仪方面的详细情况。不过他们却忽略了对遗物的收集，以至人们抱怨缺乏巴比伦、亚述陶器的证据。

（4）希腊——爱琴海

希腊——爱琴海的史前史的开端是与谢里曼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谢里曼（德国人，1822—1890）自幼爱读《荷马史诗》，并且坚信诗中所述都是史实。他自学了英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等 13 种语言。他在 46 岁退出商界后，利用自己积攒的一大笔钱开始证实《荷马史诗》的真实性，尤其是寻找特洛伊城。

他经过研究，认定特洛伊城应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希沙立克。从 1871 年至逝世，他在此进行了四次发掘，证实这里共有七座相互叠压的城市，军事设防严密。他认为自下而上的第二座就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城，并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金质首饰（后证明第六座才是特洛伊城）。在发掘希沙立克的间歇期，还发掘了迈锡尼（1874—1876）。在这里他发现了阿伽门农一家的墓葬，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发掘过程中，他几乎每天向《泰晤士报》发去报道。迈锡尼墓葬的随葬品极为丰富，有金银瓶、错金银和青铜与红铜刀剑，指环和手镯、金箔饰件和金面罩。他把这里的发现命名为"迈锡尼文明"。关于迈锡尼文明的年代，谢里曼认为属于荷马时代，希腊人认为属于英雄时代，还有人认为是拜占庭时期。但许多德国学者认为是早于荷马时期，这已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谢里曼的贡献在于：一是证实了荷马史诗的真实性，提高了考古在历史学中的地位，"用考古发掘和对非文字材料研究也可以建立古代史体系。"二是他发现了前希腊文明：迈锡尼文明和以特洛伊第二层为代表的安那托利亚文明。

那么这两种尚不为人知的史前文明是什么关系？1894—1895 年雅典的英国考古学校在大英博物馆的塞西尔·史密斯指

导下发掘了米洛斯东部沿海的菲拉科皮遗址：最下层遗物与基克拉季斯石棺墓的遗物相似；其上的第二层的陶器与特洛伊二期相同；最上层的第三层有小型的迈锡尼文明宫殿。这个地层关系提供了前希腊文明的年代序列。

皮特里根据埃及古罗布和卡昏遗址迈锡尼陶器与埃及十八王朝末和十二王朝陶器共存的现象，将这些迈锡尼陶器定在公元前1400—前1200年。随后他又去迈锡尼核实古罗布和卡昏遗址的年代。他根据交叉年代法断言爱琴文明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迈锡尼文明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前1000年。迈锡尼的考古学者加德纳说："皮特里在一个星期里所作的工作比德国人10年内在埃及资料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东西还要多。"

迈锡尼文明起源于何处：德国人米尔希赫费尔在克利特岛的发现引起了英国人伊文思的兴趣，并于1894年发表了《克里特象形文字》一书，后又提出迈锡尼文明源于克里特的观点。1898年克里特岛从土耳其统治下独立了。次年，伊文思开始对这里进行发掘。在九个星期中，他发现了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史前巨石建筑，他认为这是米诺斯王宫，此后他在这发掘了25年。他把这里的青铜时代称作米诺斯文明（这是一位传说中的法典制定者和海上霸主），并根据与埃及的文化交往提出了克里特岛文明的分期与年代。同时他还发现了青铜时代之前的石器时代（即基克提泽斯文化），将史前史的研究推至石器时代。

（5）亚洲

1897年，法国人德·摩根开始在伊朗胡泽斯坦省苏萨遗址发掘，发现了极为精美的彩陶瓶等大量遗物。摩根将苏萨遗存分为一、二两期。（后来麦科思将苏萨遗存分为四期：A期即摩根的一期，与欧贝德期相当；B期相当于乌鲁克期；C期相当于捷姆叠特那色期；D期即摩根的二期，相当于早王朝时

代。)

美国人庞皮利和德国考古学家赫伯特·施密特于1904年对中亚安努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分南北两个丘，均12—15米高。他们的发掘报告题为《1904年考古队在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安努史前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环境的影响》他们将北丘定为一、二期，南丘为三、四期（近来麦科思将一期分为IA和IB，IA为新石器文化，有彩陶，大致与哈拉夫文化同时。IB有红铜和彩陶相当于欧贝德和乌鲁克时期。)。这次发掘采用了定位法、筛选法，收集了动、植物遗存。对动物骨骼的研究表明，这里的牛、羊、猪尚处在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这些早期农业的考古资料当时是十分少见的。

苏萨和安努的发现构成了当时对伊朗的里海地区史前史研究的基础。而且两河流域和中国、印度的发现也常常参考这一年代序列。

3. 考古学方法与技术的发展

(1) 发掘方法的科学化

在这一阶段以前，发掘的目的仍以挖宝为主。很多发掘者的目的就是“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金找到又多又好的可供博物馆收藏的古物。”因此常常出现在墓上打洞取出精美的随葬品的盗墓现象。在发掘中不懂得文物保护的需要，所以常常抱怨许多精美的珍品“一见空气就朽成了碎片”。为了给各自的博物馆提供藏品，英、法两国在两河流域展开了角逐。根据协议，尼尼微的库云吉克丘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归英国发掘，北部归法国。当英国人拉萨姆发觉法国人就要挖到“有油水”的地方时，他趁着夜幕到法属区中偷偷发掘，成为发掘史上的笑柄。

这种挖宝为目的发掘一方面破坏了许多珍贵文物，同时又为科学界提供了资料，当时的考古研究正是在这些资料基础上进行的。

在形成期的后半段出现了评判某人发掘方法的风气，通过这种批评使人们逐渐懂得发掘工作要有一定的标准。当人们在评论拉萨姆的发掘时说：他哪里是在科学发掘，简直是抢劫。马里埃特在埃及毕生致力于文物保护，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主持发掘。这显得专横，但是制止了盗掘现象。

在形成期与发展期之交，一种新的考古学方法在古典文明遗存的发掘中得到发展。它的显著特点是把复原历史作为发掘目的。这种方法始于形成期菲奥雷利对庞培的发掘和托马斯·牛顿对克尼多斯城的布局复原。

奥地利人孔泽于 1893 年发掘萨莫色雷斯岛（希腊）的遗址。这次发掘发表了完整的记录，全部城址布局绘有详图，并附有照片。

1875 年在奥林匹亚的发掘是由库齐乌斯负责，用了 6 年的冬季。在这里发现的每件器物都得到保存，在原地点建立起一所小型的博物馆来陈放这些东西。遗址的地层关系经过仔细、全面的研究。

真正的大规模的地层学发掘始于谢里曼在希沙立克的发掘。这次发掘是第一次发掘土丘遗址。正如迈尔斯所评价的，“这是首次在没有一点古迹遗物线索可寻的情况下大规模发掘一座旱地村落遗址。而在巴比伦和尼尼微，由于发现了地面遗迹，工作大大简化了。”从这一点看，谢里曼是当时考古发掘人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发掘中剖开土丘的剖面，分出七层人类活动的层位，这是考古学中地层学应用的新阶段：把地层学原则广泛应用于考古学。从前的考古学家在泥炭沼地、在瑞士湖区以及在特拉马尔遗址的发掘都证明了地质学的地层迭压是解决考古遗存相对年代问题的关键。谢里曼则证实了这些原则完全适用于大型土丘的发掘。但是应该指出谢里曼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地层学发掘的，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使用和理解了地层发掘的方法和意义。而且他的合作者德普费尔德这个曾

在库齐乌斯领导下参加过奥林匹亚发掘的建筑师，曾给他的发掘带来了德国古典文明考古学家的全新理论以及立见功效的技术方法。谢里曼的其他发掘原则还有：

1）保存发现的每一件器物，尽管他一心只希望找到埋在地下的珍宝，但还是把所有发现到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因为他认识到普通器物在提供历史真实情况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2）仔细记录每一件器物的发现地层，并对每件重要的发现物尽快绘图和照像。

3）尽可能迅速地，充分地发表工作成果。

皮特里·F 把地层学与类型学结合，利用其他遗址的已知年代，建立地层序列的绝对年代。使用这种方法，皮特里在赫西遗址的 18 米厚的全部堆积中建立起绝对编年序列。这种利用地层学解决年代问题的水平远远超过特洛伊发掘。同时他也根据自己的发掘实践总结出与谢里曼的大体相同的四条发掘原则。

最完整地提出地层学发掘原则的是皮特里弗斯。他原是一名英国的职业军人。他是从研究火器而开始了他的考古生涯的。1880 年当他继承家族的地产（大约 120 平方公里）并在已有的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开始对营地、村落、墓地、土冢和壕沟等类型的遗址作一系列发掘。这些发掘工作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科学发掘的典范。他的发掘均采取了大面积地按地层全面揭露，并一直挖到岩层为止（当时大多数发掘土丘都是打探洞，以找出主要的墓葬和随葬品）。他在发掘中强调全面综合的观察，强调地层观察。对于发掘记录既要逐件记录器物发现位置，还要有准确的平面图和剖面图。绘图不仅要详细，还要进行说明。另外他还把全部主要遗址都复制成模型。

皮特里·F 之所以能够走在同代人的前面，能够使发掘工作从挖掘土冢的闲情逸致变成对科学的潜心追求，许多人认为是由于他的充分的资金、时间和人力，还有人认为是由于他长

期的戎马生涯与从政经历所获得的组织、管理才能。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水平，从而使他在发掘中能够有的放矢。他在考古研究中十分注重普通器物的价值。他在研究民族学与史前时代的遗物时，就十分重视普通物品，因而使他在发掘中把追溯器物形式分布的现象看成是最重要的内容。这种分布既指不同层位的分布，又指同一层位的位置分布，也就是遗存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所以皮特——里弗斯被誉为科学发掘之父。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在发掘和出版方面所要求的标准高得不切实际，甚至令人生厌。

在这一阶段，谢里曼、皮特——里弗斯和皮特里创立了考古学发掘的科学方法和技术。这些方法与技术以地层学为基础，强调收集一切遗物，准确记录它们的位置，并及时、充分地予以发表。考古发掘方法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上一阶段三期说的提出开始，确定遗存的年代是首要问题，而丹麦人和瑞士人的发掘已经证明地层学是解决考古遗存相对年代的关键，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才逐渐发展起以地层学为基础的科学发掘方法。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目标往往决定了方法技术的发展方向，皮特——里弗斯从研究遗存入手而后完善了发掘方法就是一个例证。另外这时期发掘技术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科尔德威和安德烈按地层寻找砖墙的技术，使大型宫殿和神庙布局得以复原，一改两河流域考古发掘中以收集遗物为主的传统。因而他们的发掘被塞顿·劳埃德誉为两河流域考古的基石。[①] 没有这块基石，后来的两河流域考古发现都不会存在。另外还有庞皮利和施密特在安努遗址的发掘，开始使用筛选法。这是继形成期湖居遗址发掘后又一次对自然环境资料的系统收集。这些都是20世纪下半叶生态考古

① 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文物出版社1990，前言。

学的先声。

（2）以分期断代为目的类型学的确立

早在形成时期，汤姆森和沃尔赛就已经指出：从器物的形式和纹饰入手，确定各种器物种类的组合关系，从而确定器物所归属的时期，但真正把年代类型学付诸于实践的是蒙特柳斯和皮特里。

蒙特柳斯在《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中提出了系统的类型学。他用纯类型学方法对欧洲考古遗存中常见的金属制品（别针、刀、剑等）进行了分类、排列顺序和划分组合。类型学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万物都是以进化的方式发展的，所以都可以按类型学的序列排比出前后次序来。蒙氏的分期仍是在三时代体系下的细化。同时，他还试图给类型学的分期以绝对年代，他利用了沃尔赛和皮特里的交叉断代法的成果，并把这个成果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以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伦三岛。他推测英国的青铜时代历时 1700 年，从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800 年，并分出五个阶段。令现在人不解的是通过这种比较考古所得到的年代竟能精确到十位数。不过在当时，他的方案的确提供了一个研究青铜时代遗物的客观标准，第一次证明了交叉断代这一对照编年技术的价值和可行性。

皮特里把类型学与地层学首次结合起来，建立了赫西遗址 18 米厚堆积的年代序列。并创造了根据遗存序列一端与已知年代相联向前推测年代的年代序列法，把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结合起来，使相对年代更具有客观性。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沃尔赛的年代标准技术的构想，建立了交叉年代法。这些都是对类型学的创造性的运用。

总之，这时期的类型学主要是以形式和装饰为划分标准，具体作法是分类和排列发展序列，从而确定遗存年代。我们把这种以分期排队为目的的类型学叫做年代类型学。考古分类是以遗存特征为标准的，任何一个遗存都具有多种特征。分类的

目的不同，所选用的标准也不同。在年代类型学中划分类别的标准主要是选择那些因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的特征。

这时期对遗存的研究除了采用类型学方法以外，另一个变化是脱离了一味追求艺术品的作法，进而研究一切器物。皮特——里弗斯提倡对人工制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即“不想用精美与价值来哗众取宠，而只求给人以教益。为此，在陈列的序列中宁愿选择普通但又典型的标本，而不采用稀奇罕见的器物”。皮特里后来实践了这一主张，注重普通器物并全面收集当代与史前社会物质文化遗存相近的民族学资料。同时皮特里还提出对器物进行科学的研究，当今对器物的金相学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等方法正是这种方法的实践。

4．小结

考古学在1867年至1919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考古发现、考古方法以及考古理论等方面。

这个时期仍是一个发现的时代，考古学家被人类早期历史的考古发现深深吸引着，很少花时间来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技术与方法的发展构成了这一阶段又一最突出的特点。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学和资料整理研究中的类型学在这一阶段得以确立，使考古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提高了考古资料的史料价值，并使建立年代序列这一研究目的有了更加切实的方法和手段。

在这一阶段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按三时代体系所进行的更细的划分，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考古学作用以及它与外学科关系方面的认识。考古学的成果已经向人们提供了人类的技术发展史，但研究人类历史的学者不但想了解人类工具发展的过程，还想得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以及人类思想道德观念的发展变化。考古学者开始怀疑考古学是否是提供人类早期历史资料的惟一来源。于是，有些考古学家在这一阶段吸取

了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的成果，并开始在现代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寻找答案。

人种的划分自从林奈和布卢门巴赫的开拓性著作问世以后即成定论。里普利的《欧洲人种：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和丹尼克的《人类的种族：人类学与民族学概论》两书在 1900 年出版。它们是把体质人类学上行之有效的分类与推断用于史前考古学资料的优秀典范。约翰·特南姆博士在威尔特郡发掘时曾发现：长形土冢与长形颅、圆形土冢与圆形头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开创性地将考古与体质人类学结合在一起。

把比较语言学作为解决早期人类历史的钥匙，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威廉·琼斯爵士 1788 年在孟加拉亚洲协会上的讲演。他指出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并认为它们是源于同一种语言。1847 年邦森男爵提出以语言为根据对全部人类进行分类的设想。把比较语言学当作史前研究的可靠根据的著作可以伊萨克·泰勒的《雅利安人的起源：欧洲史前民族学和欧洲文明的解释》（1890）和赫胥黎同年发表的论文《雅利安人的问题及史前人类》。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相交之际出现了一种在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之间寻求某种对应关系的企图，并否定考古学作为史前学资料的主导地位。

研究古代文明与史前人类的习俗在现代民族中的孑遗，这种想法最早是由英国民族学家，最著名的进化论经典作家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被研究的文化特征有些是绝灭的遗存，有些是尚存人间的遗俗。在上一阶段，丹麦的考古学家已经提出比较民族学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继尼尔森的经济划分方案之后，泰勒在 1881 年也提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他在《人类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导论》一书中把农业作为野蛮阶段的开始，文字作为文明阶段的开始。民族学对考古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提供

了类比资料和用进化观点提出了人类历史划分方案，而且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方法论及其基本理论方面的影响。同其他进化论者一样，泰勒认为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他深信人类的性格和道德显示出现像的单一性和常态，而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是由于它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可以根据其落后和文明的程度将其排入一个发展序列中，基于这种理论，他主张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化现象。他认为进行自然科学分类是这方面的一个任务。他把一切类似的文化现象比作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植物和动物物种，主张应当象研究动植物物种地理分布那样研究文化现象的分布，例如弓、箭形式和砸扁小孩颅骨的习俗等等。了解了这时期民族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和对考古学的影响，使我们对这一阶段考古学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H摩尔根对科学的贡献是把进化论上升到了唯物主义高度，尽管不总是彻底地坚持这种观点。他除了在氏族制和家庭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外，还把泰勒划分的人类历史阶段充实了比较具体的内容，并把前两个时代分别划分了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1）低级蒙昧阶段，从人类的出现到火的发现；

2）中级蒙昧阶段，从火的发现到弓箭的发明；

3）高级蒙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到陶器的发明；

4）低级蒙昧阶段，这一阶段以陶器的发明开始，摩尔根认为这是蒙昧与野蛮的界线，以饲养家畜结束；

5）中级野蛮阶段，从饲养家畜到铁矿的冶炼；

6）高级野蛮阶段，从铁器的发明到文字的发明；

7）文明阶段，从文字与字母开始。这一阶段分为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

这个分期方案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它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志的，如用火知识的获得、陶器制作和农业兴起等等。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使人们能够把民族学材料和历史材料与考古材

料结合起来指出古代和现代的每个族在一般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用某种比较客观的尺度衡量各族的历史发展水平。这为考古学中进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范例。

当时的比较民族学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错误的倾向；考古学者把考古遗物与现代原始民族的使用方法相联系，大大增强了对人工制品用途的理解力；同时简单地认为史前人类与现代原始民族物质文化上的一致便意味着社会与精神文化上的相同。这种比较民族学的简单化、绝对化至今仍然存在。

从考古学发展历程看，由于考古学此时还很年轻，尚不能提供早期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使得考古学者从外学科中吸取养料，寻求帮助。这是意识到考古学遗存在历史研究中的局限性的表现，这也正是考古学走向成熟，从自在阶段走向自我意识阶段的重要契机。

二、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

（19 世纪 40 年代—1919 年）

美洲考古的发展比欧洲慢一些。在这一阶段初期，欧洲的考古学已从古物学中发展起来，而美洲是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才慢慢形成了考古学。所以整个阶段是美洲考古由业余向专业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末期，美洲的大学中设置了考古专业。

这一阶段是美洲考古的发现和描述阶段，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和欧洲人深入到北美和南美各个地区，到处都有考古发现。正如戈兹曼（Goetzmann，W. H.）所说："对美国西部的田野调查发展极快，记录了大量的资料，以至没有时间去探索其意义和功能。"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现是考古学科正式形成的基础，这一阶段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主要采取了认真描述和初步分类的方式，由分类导致了文化区概念的出现。但是始终没

有形成纵向的年代序列的概念，这有待下一阶段的到来。

这一阶段的美洲考古受到欧洲的极大影响。地质科学的兴起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为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准备了科学的土壤；古老人类的发现激发了美洲人寻找早期人类的热情；以三时代体系为代表的考古专业化为这里的考古提供了一个模式，欧洲考古对美洲的影响是很直接的，许多美洲考古学者是受训于欧洲，或者是来自于欧洲的移民。

这一阶段各地由于历史传统不同，考古发现和研究也有很大差别，分北美、中美和南美三个地区来介绍。

1．北美考古

(1) 关于土丘建造者的争论

北美考古兴起于东部的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流域，这里的遗存主要是土丘。自上阶段以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这些土丘的建造者是谁。到了这个阶段，争论更加激烈，最后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第一个对土丘进行全面、细致描述的是斯怀尔（Squier, E. G.）和戴维斯（Davias, E. H.）。他们在1848年共同发表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古代纪念物》。这本书代表了当时发表的最好的描述性著作。书中对土丘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按不同的形态对土丘的功能提出了假设，例如什么形状的土丘是埋葬用的，什么样的是庙宇的台基，然后再通过调查和发掘加以验证。这种方法是现代美洲考古中“假说与验证方法”的先驱。书中仍有推测成分，他们认为土丘的建造者是所谓的“优等民族”即墨西哥人，而不是当地的印第安人。1849年斯怀尔去纽约，为了寻找他认为的土丘建筑起源地，却意外地发现当地的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也建造土丘。面对这一事实，斯怀尔并没有改变他对俄亥俄州土丘的看法，仍然否认土丘是印第安人建造的。

斯怀尔关于土丘建造者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看

法。但是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他们认为当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就是土丘建造者。哈文（Haven，S. F.）和斯古尔克拉福特（schoolcraft，H. R.）是这一派的代表。

哈文是美洲古物学会的图书管理员，他对当时所有能够收集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于1856年他提出所谓“古代消失的土丘建造者的人种”这一假说是站不住脚的。他的研究成果被史密松协会发表。他的研究方法与当时流行的推测性成果相比，是一种基于资料与事实的讨论，因此他的方式代表了一种新的、向专业化过渡的趋势，并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成为考古研究中的主流。

斯古尔克拉福特一开始赞成土丘是由消失的文明社会的居民建造的这一观点。但是当他研究了俄亥俄州的“墓穴河谷土丘”（Grave Creek Mound）之后，他发现了土丘的建造者与当时的美国东部印第安人在文化上有继承性。他提出当地土著居民是土丘的建造者。他认为土丘不必非得处于文明阶段的人来建造不可，处于野蛮阶段的印第安人完全有能力建造它。他的观点发表在他的六卷本著作《有关美国印第安部落的历史、环境及前途的历史和统计信息》中（1851—1857年）。可惜的是，他这本书当时很少有人读过。

这场发生在1850—1899年间的有关土丘来源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讨论，它还有更深刻的政治背景。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印第安人已经面临灭绝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把印第安人描述得越落后越原始，显然会使对土著的残害和虐待行为更具有合法化。

这场争论最后由托马斯（Thomas，C.）的详细资料和有力证据作了终结。托马斯是一位伊利诺伊丝州的昆虫学家，1882年被美国地质考察局和人类学部的主任鲍威尔（powell，S. W.）任命为土丘考察处的主任。托马斯最初也认为土丘不是印第安人建造的，但是当他进行田野调查后便迅速改变了看

法，并和鲍威尔一起，成为主张土丘为印第安人所建的代表人物。他任职后制定了详细的、大规模的土丘调查与发掘规划，并着手实施。大量的调查、发掘资料说明，土丘与印第安人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同时他进一步发现，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所建造的土丘是有区别的，他根据土丘的差异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他的成果发表在 1894 年人类学部的年度报告中。他的详细描述和有力的民族学证据，使人们最终相信土丘是印第安人建造的。他的文化区划分，使长期以来的推测阶段最终结束，开始了专业水平的田野工作。一名考古学家说，托马斯的田野报告标志着美洲近代考古的诞生。

（2）学术团体的创建

在有关土丘建造者的争论时期，北美出现了两个最大的考古机构：史密松协会（1846 年）和哈佛大学的皮伯第博物馆（museum of peobody）。这两个团体在 19 世纪美洲的考古专业化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史密松协会为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奠定了基础。这个协会还有两个附属组织：一个是人类学部，它成立于 1879 年，鲍威尔任第一任主任，在 1894 年改名为美洲人类学部；另一个是建于 1879 年的自然博物馆。这个协会以及两个附属组织中有许多当时有影响的学者，如鲍威尔、托马斯和霍尔姆斯。皮伯第博物馆是在乔治·皮伯第（George Peabody）的外甥马施（Marsh，O. C.）的努力下建成的。马施受莱尔的影响很大，莱尔建议他去美洲从事考古。马施参加过俄亥俄州的考古发掘，他提议将皮伯第的遗产捐赠给哈佛大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皮伯第博物馆。博物馆的首席馆长是怀曼（wyman，J.），第二任是普特纳姆。他们都为当时的考古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时又创办了一些考古杂志，最重要的有《美洲古代》（创办于 1878 年）和《美洲人类学家》（创办于 1888 年）。

(3) 早期人类的研究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法国索姆河畔的砾石层中与绝灭动物共存的人骨，大大地激发了美洲考古学家的热情，他们希望在这里也会找到和旧大陆一样古老的人类。

普特纳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试图证明在更新世的冰期结束之前，早期人类就已经到达新大陆。为此，他组织了各种考古发掘项目，其中包括阿特（Abbott，C. C.）在新泽西洲特伦顿砾石层的发掘。在这里，阿特于 1876 年发现了看起来年代很早的泥质板岩石器，有许多似乎出在冰期地层中。但是这些遗物后来证明是年代很晚的。海内斯（Haynes，M.）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

寻找远古人类的工作是在欧洲的影响下展开的。艾夫伯里（卢伯克）的《史前时代》已经再版了许多次。但是遗憾的是这种研究在美洲大陆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基础，即 19 世纪的美洲的第四纪地质学还不成熟。当时既不知道更新世结束的年代，也不知道一些绝灭动物消失的年代，同时也不具备完善的地质——考古发掘技术来帮助解决人与更新世的共存问题。于是，北美考古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4) 类型学和文化区的研究

早在有关土丘建造者的争论中，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土丘状态的差异以及形态与地区的关系。但是正式根据形态区分类型，并根据类型确定文化区的研究是开始于 20 世纪初霍尔姆斯（Holmes，W. H.）和米尔斯（Mills，W. C.）等人对遗物和遗迹的分类工作。

霍尔姆斯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当他随美国地质考察队去西部旅行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地质学，后又转向了考古学。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国立自然博物馆和美国人类学部工作，并在 1902 年接替了鲍威尔的学部主任职务。他对遗物中的陶器和石器进行了分类研究。在石器分类中，他研究了石器制造

技术，并宣布那些所谓的冰期旧石器时代石器不过是晚近的土著工匠的用具。这个工作使他意识到人类到达新大陆只能是在更新世之后，在陶器分类中，他注重陶质在分类中的意义。在他对美国东北部陶器的分类中，有一类是佛罗里达的含纤质陶器。后来证明这类陶器是北美最早的陶器。这说明他的陶器分类已经具有区分不同时代的意义。他的分类有助于下一阶段美洲类型学的发展。霍尔姆斯的工作并不只限于分类。他把根据陶器质地、器形、纹饰和制法的综合标准划分的陶器类别与地域联系起来，划分出美国东部乃至整个北美的陶器分区图（图一）。

这是北美各大地区陶器研究的基础。研究把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在这之前人们已经简单地意识到一个地区的遗存与另一个地区的差别，但是霍尔姆斯把这种感性的认识带入到一个系统比较的新阶段，建立了文化区的研究方法。

米尔斯对遗迹进行了分类研究。他曾担任过俄亥俄州考古与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当他发掘了俄亥俄州的许多土丘后，他根据土丘划分出不同的区。以前这里的分区主要是根据地理条件，而他的分区是以文化之间的相似划分的。这种文化上的相似与否是他在发掘和详细描述基础上确定的。遗憾的是，他对于各种文化的年代和相互顺序只能做一些推测，他还不会科学地利用考古资料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这种基于实践和准确描述对文化和文化区进行划分的方法，无疑促进了考古学向下一阶段的过渡。

（5）各地的发现及其发掘方法

北美各地的考古学发展很不平衡。美国东部在上一阶段就已经开始调查、发掘，并有详细的记录，在此基础上还开展了分类研究，例如霍尔姆斯和米尔斯的工作。美国西部这时正处在开发时期，许多人随国家地质局考察队去那里调查、发掘，所以在这里尚处在发现和描述阶段。更北的加拿大和阿拉斯加

的情形大体与此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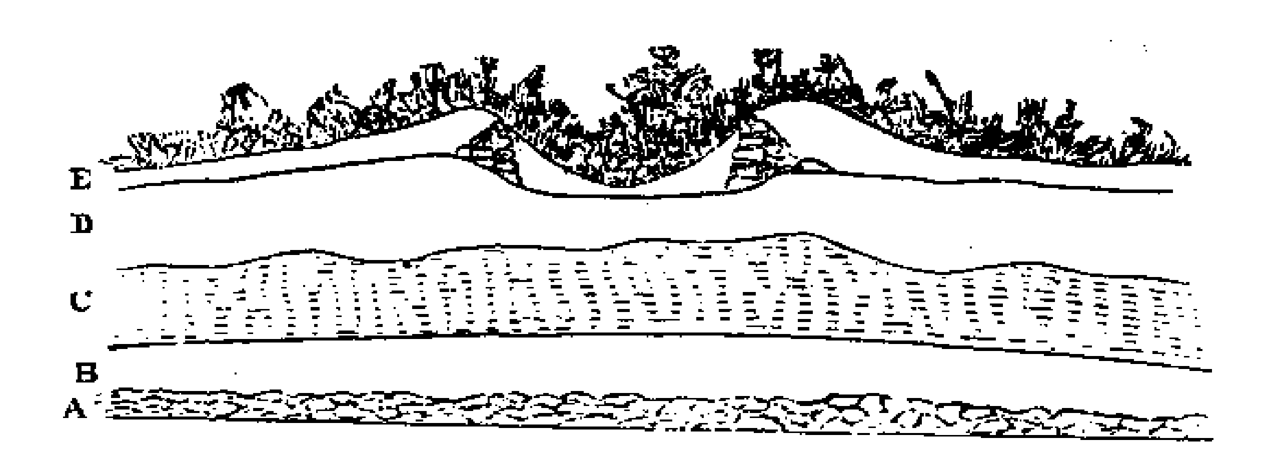
皮伯第博物馆开始对贝丘遗址进行发掘，怀曼发掘了加拿大的贝丘遗址。他是受欧洲瑞士湖居遗址的启发而开始工作的。他的工作证明了贝丘遗址是人为形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厨房垃圾构成的，而且早于当代的印第安人。后来华尔克（Walker, S. T.）又在佛罗里达州发掘贝丘遗址，他在发掘中识别出不同的地层，并据此确定了陶器变化的年代序列。戴尔（Dall, W. H.）在阿拉斯加也按地层学原则发掘贝冢。但是他们的工作对于后来建立文化的年代序列影响很小。

美国东部的发掘仍以俄亥俄州等地为主。皮伯第博物馆第二任馆长普特伯姆在这里进行过发掘，并在田纳西州发掘。摩尔（Moore, C. B.）在美国东南部调查和发掘过一系列重要遗址，他发表许多描述性报告，并附有大量照片。他还出版了两卷本的专著《北美的石器时代》。

美国西部的工作有许多是在联邦政府调查署的名义下进行的。这里的印第安人还未接触过欧洲人。一切工作都是从描述开始的，并渐渐开始了发掘工作。美国西南部的工作从埃默里（Emory, W. H.）开始，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工作。这一地区在下一阶段，成为了美洲地区文化序列研究的中心，这是与这一阶段大量发现分不开的。

加拿大考古的创始人是地质学家麦克吉尔（McGill）大学校长道森（Dawson, J. W.）。他还创建了直接历史法的思想。他把蒙特利尔西部发掘到的遗存与1535年卡提尔（Cartier）记录的易洛魁人村落的情况进行比较，并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他还用美洲考古资料来丰富旧大陆考古资料，给旧大陆史前史复原赋以血肉。他在比较土丘建造者使用的“锄”和法国松尼河谷的燧石器时指出：我不仅仅比较工具和其他遗存的相似性，而且还要通过比较来了解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从中得出一些在旧大陆考古中得不到的东西。

这个阶段有两个人的工作代表了发掘方法的最高水平。一个是普特纳姆，他的发掘技术是当时的典范，并训练了一批发掘者。他强调科学调查、准确绘图、划分剖面和对遗物进行定位记录。他在俄亥俄州流域的土丘发掘中，已辨认出地层，但他却没有进一步利用地层建立地区年代序列。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戴尔。他在阿拉斯加发掘贝冢遗址时，辨认出地层。地层分五层（A—E），最早是A层，只有硬壳遗物；其上是B层，有刺海胆；然后是C层，有大量鱼骨；再上是D层，有哺乳动物遗骸；最上是现代垃圾层。然后他根据各层包含的食物、狩猎工具和容器，将该地居民的经济发展划分为海岸阶段（以A、B层为代表）、捕鱼阶段（C层）和狩猎阶段（D层）（图二）。



图二　戴尔发掘贝冢遗址剖面图

这说明戴尔比普特纳姆略胜一筹，他不仅识别出地层，而且利用它建立了年代序列。此外，他还十分注重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生态环境，这与他的职业有关。他是一名贝壳学家，又拥有地质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他后来没再进行过发掘，所以对考古界影响很小。

2. 中美洲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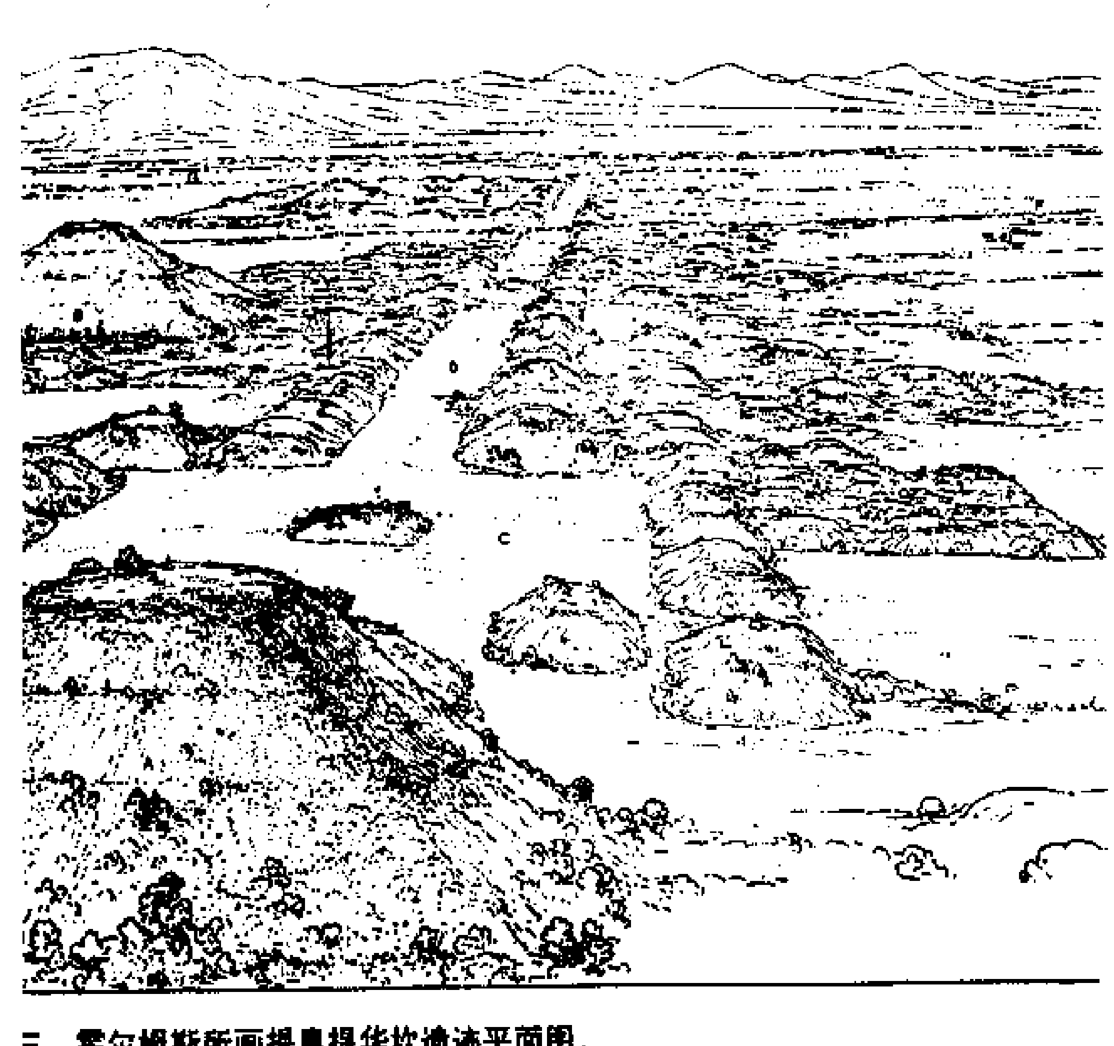
中美洲在殖民者到达以前曾有过玛雅文明，它构成了这一地区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玛雅文明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整个玛雅文明可以分为前古典期（公元前2500—前250年）、古典期（公元前250—公元900年）和后古典期（公元900—1520年）。玛雅文明的重要遗址有蒂卡尔、奇琴伊察、科潘、帕伦克、特奥蒂瓦坎和马雅潘。这些中心遗址兴盛于不同时期并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一阶段对玛雅文明的研究可以分为调查与发掘、文字破译和综合研究三个方面。

（1）调查与发掘

这一阶段中美洲的考古是从斯蒂芬（stephens，J. L.）和凯瑟伍德（Catherwood，F.）开始的。他们发表了工作的成果——“1841年在中美洲恰巴斯和尤卡旦的旅游和1843年在尤卡旦的旅游”。这些工作拉开了中美洲田野考古的序幕。他们对遗址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和绘图。这些工作激发更多人热情从事中美洲的考古调查。

1887年法国探险家夏尔内（Charney）带着刚刚出现的照相机，穿过森林，找到了销声匿迹的古城蒂卡尔。他的拍摄和绘图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后有许多人去玛雅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其中霍尔姆斯为中美洲考古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陶器和宗教建筑进行了分类，以便从比较的角度进行考古研究。在他1895至1897年的著作中，发表了他对提奥华坎河谷的测量图，其准确率与现代测量结果基本一致（图三）。

中美洲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皮伯第博物馆在古典玛雅的中心——科潘遗址进行的。发掘报告以描述为主。后来托泽（Tozzer，A. M.）、莫温（Merwin，R. E.）和赫威特（Hewett，L.）等人也进行了发掘，在他们的考古报告中，描述方面运用了准确记录和全部发表的方式，并试图利用发掘的



三 霍尔姆斯所画提奥提华坎遗迹平面图。

神金字塔 B. 太阳神金字塔 D. 死亡者大街

建筑和墓葬与玛雅文字中历法的共生关系探讨年代问题。

汤普森（Thompson）通过读兰达牧师根据当地传说所写的《尤卡旦半岛记事》后，了解到奇琴伊察有一口圣井，为了安抚雨神，隔一定时间要投入井里一个少女和一名卫士，人们还不断向井里投首饰。汤普森于1909年发掘了这口井，井内除了大量的淤泥外，发现了金器、玉器和40多具尸骨，证明了当地传说的真实性。

西拉姆在《神祇、坟墓、学者》一书中把汤普森称为美洲的谢里曼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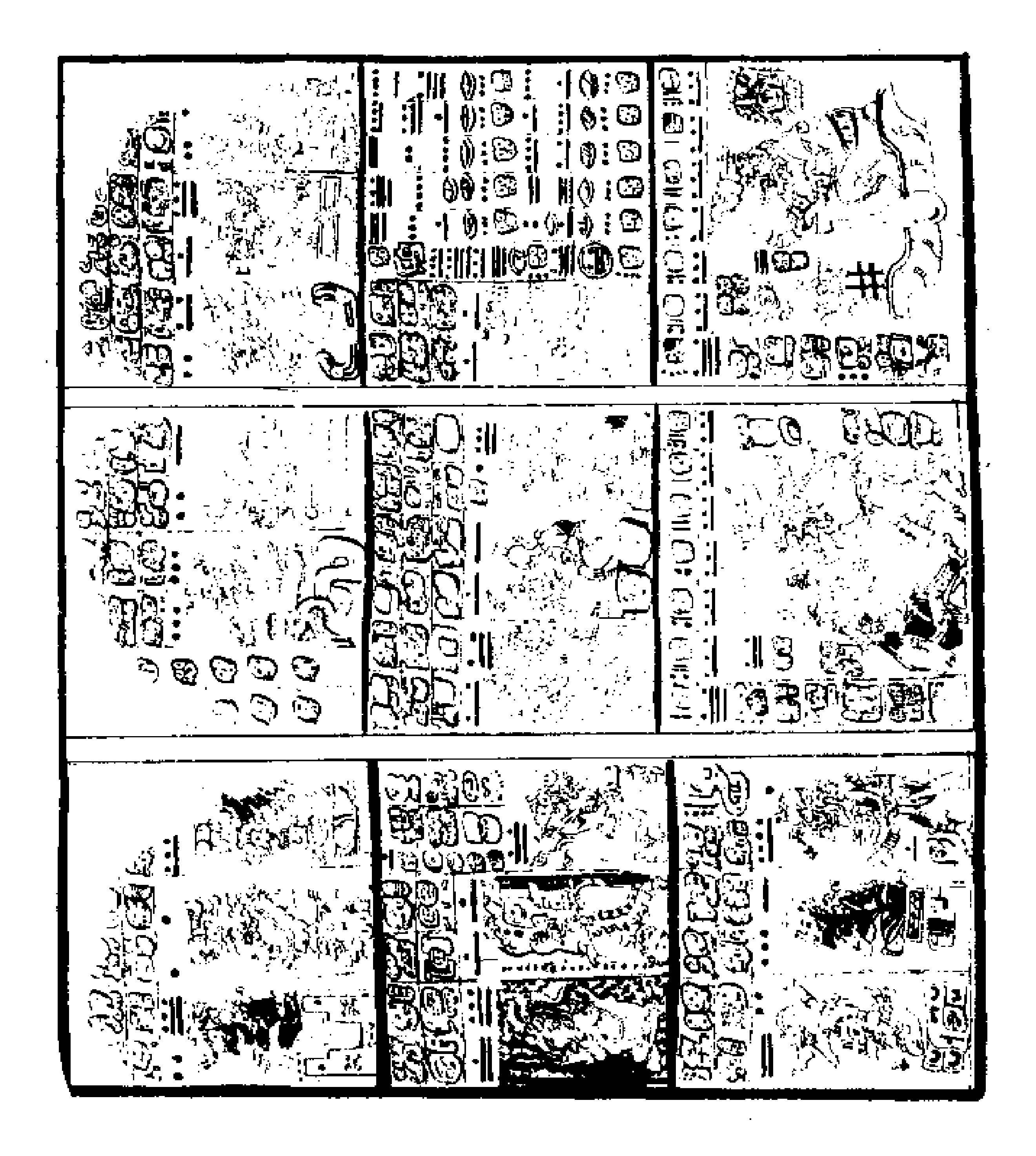
（2）象形文字的译读

这是这一阶段玛雅研究的第二个成果。许多欧洲学者都做了译读的努力。对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是福斯特曼（Forstemann）。他是根据一本玛雅文手稿“德累斯顿手本”破译了玛雅文字中有关数字和历法方面的文字。玛雅人用象形文字写过大量文献，都被西班牙人侵者付之一炬。据说，现在世界上仅存四部玛雅文书稿，一部叫做“德累斯顿手本”（图四）。

这是因收藏在德累斯顿图书馆而得名。当年搞到这批文稿的西班牙勋爵肯格斯鲍洛曾把它分九大卷自费出版，结果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监牢屈死狱中。最后这份手稿落入这里。第二部藏于巴黎图书馆，故称为“巴黎手本”。第三部发现于西班牙，被称为“马德里手本”。第四部1973年才发现，是一部收藏在私人保险柜里的书本。在福斯特曼见到的德累斯顿手本中，象形文字下面还有图面。这为文字的译读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个手稿写于公元7世纪，记录了对天文现象观察的结果，如月亮运转、月蚀、日蚀、云层和雨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文化科技水平，同时也使译读范围局限于天文、历法方面。

---

① 西拉姆著、刘迺元译：《神祇·坟墓·学者》，三联书店1991年。



图四　玛雅文手稿　选自《德累斯顿手本》

由于文字部分译读成功，考古学家可以确定玛雅文明中碑文或题刻等遗存的绝对年代。所以在这里古文字对文明历史考古的贡献可以与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碑和罗林生破译波斯波利斯铭文对于埃及学和亚述、巴比伦考古的重要意义相提并论。

（3）综合研究

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为中美洲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出了北美和南美。因此他们已经利用考古资料讨论一些重大的历史课题。例如，定居村落生活的出现问题、文明的兴起以及城市和国家的发展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这一地区的综合研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考古资料中，有关贵族方面，尤其是祭司的遗存占大多数，考古学者主要收集、记录的是精美建筑和艺术品，从而使研究者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对玛雅上层社会的研究。对中美洲历史的复原就是对上层历史人物的复原。这种倾向一直到下一阶段后期才得以纠正。

到了这一阶段末期，该地区已经出现了综合性研究的专著，即英国考古学家乔伊斯（Joyce，T. A.）的《墨西哥考古》。在这本书中，他收集了所有考古资料，并利用了有纪年的遗物，对该地区进行综合研究，力图建立这一地区的年代序列。这标志着中美洲考古已经从分类——描述阶段进入分类——历史阶段。

3. 南美考古

（1）秘鲁

南美的考古主要集中在秘鲁。这里在殖民者到达之前是印加帝国。首都是库斯科城。这个帝国只兴盛于公元 11 世纪到 1532 年。印加帝国的皇帝被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绞死，从此这一帝国便被征服了。

在这个阶段，这一地区受中美洲斯蒂芬和凯瑟伍林旅游发

现玛雅文明的影响，许多人也到秘鲁旅游，为了寻找已经消失了的神秘的印加帝国。在这些旅游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蒂亚瓦纳科城和它的太阳门的发现与记录。有些记录附有图片和精确测量。

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横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高山湖泊——的的喀喀湖。湖面海拔高度为 3900 米。湖东南 20 公里处就是这座古城，蒂亚瓦纳科城。在这个城里发现了城墙和一座由整块安山岩确凿而成的城门——太阳门。这个石门高 3 米，宽 5 米，重 10 吨以上。两侧有 3 排 48 幅神秘的方形图纹，中间有一个飞神似的浅浮雕像。

这一阶段对秘鲁进行正式发掘并建立了地区年代序列的是考古学者尤尔（uhle，M.）他出生和受训练于德国。在他担任德累斯顿博物馆馆长时，他结识了斯图拜尔（stupel，A.)。此人曾在秘鲁从事过发掘。尤尔通过他开始了解和研究秘鲁考古。1892 年尤尔去秘鲁发掘，此后在这里工作 30 余年。由于他在德国博物馆工作时已对秘鲁的印加和蒂亚瓦纳科的陶器和雕塑风格有所了解，使他选定了一处重要遗址，即秘鲁沿岸利马以南的帕查卡马克（pachacamac）遗址，在这里他建立了秘鲁地区的年代序列。他已经知道印加在西班牙人到来时刚刚结束，而蒂亚瓦纳科陶器要比西班牙人早得多。在帕查卡马克，尤尔不仅发现了印加陶器和蒂亚纳科陶器，而且还发现一种他以前未曾见过的陶器。这种陶器与印加陶器有些相似，但与瓦纳科陶器毫无关系。于是，他把这个遗址的三种陶器排出年代序列：最晚是印加陶器，稍早的是不知名陶器，最早是蒂亚瓦纳科陶器。这一序列得到发掘中地层的反复证实。尤尔的年代序列不仅利用了地层学，而且最早在美洲使用了相似序列法，即形态相近的年代相近。这与欧洲蒙特柳斯的类型序列十分相似。他的成果在 1903 年由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这个报告是美洲考古学史的一座里程碑。随后他开始把帕查卡马克

的年代序列扩大到整个秘鲁和玻利维亚地区，他在另一处海岸遗址发掘时，在蒂亚尼纳科陶器下面又发现一种陶器。这样便在原有年代序列中补充了一个更早的阶段，并命名为早期地区风格陶器，把帕查卡马克发现的不知名陶叫做晚斯地区风格。从此这一地区的年代序列正式建立了，它们从晚至早为：1）印加陶器、2）晚期地区风格陶器、3）蒂亚瓦纳科陶器、4）早期地区风格陶器。这一序列得到多处遗址地层的证明。尤尔不仅建立了地区序列，而且通过比较说明了各类型之间逐渐变化的过程。尤尔在欧洲学习工作时，受皮特里的影响很大。他最先意识到了年代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美洲研究中，首先要做的是引进时间概念，使人们意识到类型是可以变化的。"同时他开创了美洲地区年代序列研究的先例。但这时的美洲处在分类分区阶段，他的研究还没有良好的环境，既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广泛使用相应的方法。但他无疑为下一阶段的到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其它国家的发现与研究

南美洲除了秘鲁的工作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考古发现。诺顿斯基尔德（Nordonskiuld）在玻利维亚低地进行了地层学发掘，确立了这里早晚两个文化，其成果发表在 1903 年。阿根廷考古学者阿姆勃罗塞蒂（Ambrosetti，J. B.）在阿根廷西北部发掘，确立了墓葬的年代序列。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和哥斯达黎加也都进行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工作。其中哈特曼（Hartman，C. V.）在哥斯达黎加的发掘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他是在欧洲学习的考古学者，他在发掘中十分注重墓葬之间的叠压关系和组合关系，而且他的报告在图版和充分发表方面在当时也是一流的。

总之，南美洲的考古主要处在发现阶段，偶尔也有分类研究。与北美一样，这里也十分注重考古发现与当地土著人的联系。对这一地区进行综合研究的仍然是乔伊斯，他基于图书馆

和博物馆的全部考古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对南美这一阶段作了综述和概括。由于这时地区年代序列尚不是考古研究的主题，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艺术、尤其是肖像方面的理解和解释工作，把它作为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关结点，其目的是要了解南美的前哥伦比亚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

4．小结

在这一阶段，美洲考古学既受到欧洲的强烈影响，同时又与旧大陆有很大差别。整个阶段，美洲都受到欧洲科学地质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科学的环境中，对古物与历史进行推测的方法被系统考古所取代了。这里受欧洲更直接的影响是因为许多杰出考古学家就是来自欧洲或受训于欧洲。

这一阶段各地的考古水平有较大差别。北美和南美以原始阶段的印第安人为研究目标，北美东部在发现的基础上开始了分类和划定类型分布区的研究，西部仍是在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南美也是以发现为主，偶尔有一些分类研究。中美洲和秘鲁研究的是文明阶段遗存。与欧洲古典文明相似，古文字的考释是这时期的重要内容，并奠定了今后研究的基础。在中美洲也过于偏重对精美艺术品的收集和记录工作。总之，这时已渐渐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考古。详细记录有关过去的考古资料已经开始，类型学发展起来，并注重类型的地理分布。田野考古技术在不断完善。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博物馆在这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展品而鼓励人们广泛地从事田野工作，收集更多的藏品。政府对考古的兴趣也日益增强，无论是北美还是南美的政府。考古学兴趣的广泛兴起和田野工作的系统化是与考古人员的专业化分不开的。在这一阶段普林顿（Brinto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办了考古与人类学系，普特纳姆在哈佛大学也成立了同样的系。从上文我们提到过的对这一阶段考古有突出贡献的考古学家的职业中可以发现，这些人多是来自艺术、植物、

动物、地质以及欧洲历史学家，正是他们原来具备的知识帮助他们在考古上取得了成功。所以也可以说正是以上这些学科为考古的专业化提供了各种科学的方法，这一点与欧洲考古学形成阶段是相同的。

这一阶段的考古研究与欧洲大陆相比有两点最大的不同，一是注重分类和划分类型分布区的研究，这是一种平面的横向研究。而欧洲大陆在这时则是把解决年代问题的纵向研究作为重点。二是美洲考古重视与人类学的结合，这一点成为此后美洲考古与欧洲考古最大的区别。而美洲这两个特点又是相互联系的。

分类研究以北美最为典型。斯怀尔、托马斯乃至米尔斯根据土丘的地点和特征，对遗迹进行了分类和分区研究，并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别的土丘在功能上是否有所区别。霍尔姆斯建立了北美陶器研究的基础，将北美按陶器类型划分为十六个区。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种陶器研究的方法，注重陶器的纹饰、器形、制法和质地所反映出的风格的细微变化。分类研究把对遗存的研究从简单的推测带入系统对待的客观阶段。由分类所发展来的分区使遗存之间按组合进行系统比较成为可能，对类别用途的研究出现了功能解释的萌芽；把类别分布区之间的自然环境进行对比来说明类别之间差异存在的原因产生了生态环境考古的开端，从环境角度看待遗址定位、资源利用以至文化的特征。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各地屡屡出现的利用地层学建立年代序列的尝试为什么没有形成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答案应当从更大的学术环境中寻找。美洲几乎是一个没有历史文献因而也没有历史传统的地区。当欧洲人来到美洲后，一切民族和一切文化都处于同一空间平面，没有时间深度。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出现的考古学必然与人类学合作，也确实取得了重大成果。土丘建造者争论的结束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从此，考古学与

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在欧洲三者是独立发展的。考古学在与人类学结合方面受益很大。通过这种结合，考古学者意识到比较简单的原始文化在结构方面的差异，并导致文化历史的研究通过直接历史法来进行，即通过现在的民族学了解考古学的过去，为考古学者从事类比来了解史前情况提供丰富的民族类比资料。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与人类学结合给考古学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洲的人类学也是以进化论思想为主。但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以鲍厄士（Boas，F.）为代表的新学派。鲍氏是德国犹太人，定居美国后对印第安人的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方面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进化论和传播论，认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应当从每个民族的具体历史出发，不要用比较的方法匆忙地得出结论。因为外表相似的东西，其来源和功能可能并不相同。他承认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并不容易，需要十分审慎。他认为任何评价文化的标准都是相对的，即文化相对主义，不应用某一标准去衡量所有文化。鲍氏的思想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美洲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美洲人类学和考古学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研究和归纳，放弃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学派的民族学家对各个印第安部落和文化“区”的研究使本世纪头几十年里人们能够着手编纂大型的综合性著作。这也是考古学偏重分“区”研究的原因；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一些学生把他的思想发展成极端反进化论，使得这一思潮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界十分流行，否认历史进步的同一标准。考古学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能够考察到文化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发展和变化。然而美洲考古学却没有从事这种考察。欧洲的考古学在文化进化论指导下划分出的历史阶段证明了文化的进化，但是这些变化在美洲却无法证明，于是只

好承认美洲历史特殊。美洲之所以无法考察年代变迁除了以上文化背景原因以外，还与早期人类的探讨以失败暂告段落有关。在考古学上没有证据说明美洲土著人经历了很长时间。同时由于排斥进化论，考古学上没有文化细微变化及其重要性的概念，因而在考古学上没有证据说明印第安人与其祖先在文化上有较大变化。在考古研究中对类型的差别多从区域分布中寻找原因，而不是从年代上找原因；不知道分析时间推移给遗存带来的变化；只注意到当代印第安人与祖先的连续性，没有注意他们之间的差异，更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是时间造成的。了解了这个考古学环境，我们便可以理解以尤尔为代表的地层学和注重遗存细微变化而建立的年代序列研究为什么对当时的美洲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是美洲考古下一阶段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　考古学的成熟

（1919—20世纪40年代）

考古学科从正式形成经过初步发展后，进入了成熟阶段。这个时期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已经形成。旧大陆从年代分期研究为主到兼顾地域差别，新大陆则是从分区研究到排定年代序列。最后殊途同归，都形成一个以时间、空间和器物组合为基本要素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把人类历史的研究从单个文化特征上升到特征群体。从抽象的人上升到社会的人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为进一步全面复原人类社会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考古学进入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出现了建立在考古资料综合研究之上的理论阐释，并且使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了考古作为历史科学的目标，即通过考古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一、欧　洲

1．“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提出

（1）出现的原因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出现是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表明了考古学者对考古遗存认识的一次飞跃。它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受外学科影响的结果。

早在上一阶段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前考古发现，人们

逐渐意识到以法国发现为基础的旧石器时代分期方案不能广泛适用于整个欧洲。面对分期的困惑，欧洲考古学家注重了分区研究。例如在旧石器时代研究中，步日耶在旧石器早期的石片石器中划出了三个文化组。加斯唐研究新石器时代时，分成五组（欧洲组、北欧组、坎皮尼组、巨石组和湖上住宅组）。在青铜时代的研究中，蒙特柳斯的类型序列根深蒂固，因而转变慢。但是后来认识到哈尔施塔特和拉登不仅是铁器时代的不同阶段，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或文明。

人们渐渐认识到：不同的器物组合是可以同时共存的。对一个地区深入发掘和研究后，揭示了一个文化复合体。只用时间上的序列关系不行，只有用包含时、空的概念——考古学文化，才能解释。

与此同时，谢里曼在爱琴地区的发掘，揭示出早于荷马时代的遗存。他并没有采用任何欧洲已有的分期方案，而是以发现地的历史命名为迈锡尼文明。这种命名既摆脱了原有分期方案的困扰，又突出了这群遗存的地域特征。有人建议，文明一词只限于用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遗存组合，史前的应叫做文化。

正在这个时候，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著名德国人类学家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1912 年斯图加特版）中第一次注意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文化现象的具体条件和分布规律。而当时的进化论者则忽视每个文化现象存在的具体条件，只是把它看成是抽象的进化链条中的一环。拉采尔把文化现象（尤其是物质文化现象）作为各族相联系的标志。他的学生弗罗贝纽斯和格布内尔在具体研究中运用这一方法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弗氏在非洲划分出若干个文化圈。例如他划分的西非文化圈的特征有两面坡房盖的直角房屋，用植物作弦的弓、编制的盾、用植物作弦的多弦乐器、沙漏计时器式的鼓、假面具等，代表了这一地区的典型特点。格氏划分的

文化圈也由5—20个文化特征构成。（后来，他们把文化圈研究发展成传播论。其原理是，一切文化都是单个的、一次的现象，因此文化现象相同必然是传播的结果。）这些民族学研究启发了考古学家。按照同样的方法，详细地绘出各种遗物类型与组合的分布，也会得出考古学文化分布区。

正是以上诸种原因使人们普遍感到阶段划分的理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欧洲史前学应从研究人类发展阶段转入研究人类文化，这是研究方向的一个彻底变化。它标志着把人类历史作为自然史研究的一部分转变成把人类历史作为有机体——人类社会来研究。同时，研究方法也从地质学方法转变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

（2）概念的提出和意义

1913年雷纳克《第四纪艺术汇编》和舒哈尔特的《上古文化圈的问世》可以看作是概念的出现。前一本书还是完全按照莫尔蒂耶的阶段来阐释史前史，后一本书已将阶段划分的理论由文化圈理论取而代之。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正式确立应是在1924—1925年间。在这期间出版了麦克迪的《人类的起源》和戈登·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曙光》中普及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可以说它给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新起点。

丹尼尔认为考古学文化与阶段划分的理论一样，仅仅是一种概念工具。阶段概念体现了地质学方法在史前考古中的应用；文化的概念则体现着人类学方法。如果用历史学方法，研究的应是历史的环境和文化。布雷伍德和泰勒认为，文化一词应该被限制于它在社会科学中的现行用法上，考古学家应该用其它名称来称呼仅仅是器物组合的考古现象。例如“舍利文化”不过是“一种燧石工具类型和多种不典型的燧石石片工具”。

我们的看法是，首先应该把考古学上文化的用法同“社会

科学中的现行用法”区分开来，它们的含义是迥然有别的。其次，考古学文化不仅与阶段一样，是一种概念，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更合理的组织遗存研究的基本单位，这个单位包含时空和相同组合三要素。

考古学文化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它把遗存的研究由年代特征扩大到传统、地域的特征。考古学研究可以完全从遗存本身出发，摆脱历史年代的束缚，反映出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各地区时空框架和谱系研究的基础，并为探讨古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研究单位，是通过考古学重建史前史的前提。因此，考古学文化的提出与使用是考古学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2. *马克思主义在考古学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一直关注着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把有关落后的狩猎采集和游牧民族的材料作为对人类早期历史阶段进行历史重塑的实际补充材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提到了考古中划分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并高度评价了这种划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中，第一次广泛地提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全部历史过程的基础，劳动分工的历史形式以及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对这些现象的早期形式只作了总的描述，没有具体事例：作者谈到“部落所有制”是所有制的第一种历史形式，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是靠务农生活”。在《1857—1859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加详细地探讨了所有制的历史形式。这里最早的

---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一，（一），1。

形式被称为“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些观点对于考古学家认识史前物质遗存与社会的经济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 L·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历史理论的极其重要的补充，摩尔根对阶级以前社会作了全面的描写：以氏族联系和血缘联系为基础，以原始民主原则为基础。于是，“氏族社会”概念取代了过于广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认真研究了摩尔根的著作，写下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这本书不只是摘要，而是附有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其他民族学与历史学著作有独到见解的补充意见的精细摘录。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完成他的遗愿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这部名著。

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非常详尽地叙述了摩尔根的主要思想和结论，而且也叙述了他在民族学方面的大量观察材料和具体事实：澳大利亚人的婚姻等级，易洛魁人的氏族部落结构，各种类型的亲属称谓等等。恩格斯并没有以此为限。他批判地阐述了摩尔根的某些结论，提出许多自己的见解。补充最多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在最重要的《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一章中，则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补充，这一章论述了阶级以前的社会和阶级社会之间历史分界的基本问题，其思想完全是属于恩格斯的。对氏族公社关系的解体、私有制、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发展这一极其复杂过程所作的分析和简要结论是全书的精髓，至今在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仍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对前阶段社会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是对这方面资料用唯物主义进行综合研究然后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结果，反过来又指导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马克

思主义对考古学的影响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表现是不同的。这种影响最早出现在开始对考古学资料进行解释的考古学成熟期。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是一些西方考古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的原因作出解释。在其后的考古学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苏联考古学

前苏联早在十月革命以前，考古学已有一定的发展。曾召开过大规模的考古会议，出版过大量的考古期刊，创办了许多博物馆，一些考古学者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例如 B·A·戈罗佐夫的著作被译成英文）。总的说来，它只是西欧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地方分支，在理论和方法上还落后于西欧。

1919 年 4 月 18 日，经列宁同意，在当时的首都彼得堡成立了物质文化史研究院，把国内的考古工作者集中起来了。这个研究院的规模比以前的“国家考古委员会”要大得多。经过了近十年的准备阶段，前苏联考古学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一批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加入到考古工作的队伍中，他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在工作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并开始探索如何在考古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他们首先批评了原先的器物类型学研究方法，认为这是“单纯器物观”。类型学的创始人蒙特柳斯的观点被指责为产生拜物教、产生以生物学观点解释历史的资产阶级进化论。传统的考古学被看成是一种片面的研究，它限制人们分析考古资料的视角，看不到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批评有些是公正的，有些则过于偏激。

在批判的同时，新的方法树立起来。在解释文化变化时，全部否定了文化传播的观点，认为一切社会、文化的变化都是经济发展，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创造了一种“新方法”，即简单地从古代生产工具的遗存去直

接推测上层建筑。这种新方法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由于单纯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忽视了各民族物质遗存的传统文化因素，甚至把不同民族的考古资料说成是同一民族前后继承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仅从生产工具推断社会组织结构说明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片面、机械的肤浅理解，在研究中忽视了反映思想意识的雕塑和岩画等遗物。仅凭生产工具推测意识形态，这种历史观尽管相当简单化，但毕竟揭示了以前考古学中被忽视的方面，如文化面貌的突变，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生产技术发展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及物质文化是如何反映社会关系的。为了研究这些方面，考古工作者十分注重考察普通的古代遗物及其组合以及遗址的布局。这种研究在当时世界各地只利用遗物排定年代序列、划分文化区的模式，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进入30年代中期，这种研究由于忽视了全面的资料收集和系统整理而难以继续深入下去。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各个分支开始注重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前苏联考古重新开始了扎扎实实的描述性工作。这个阶段最大的成果是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C·A·谢苗诺夫关于石器磨损类型分析的考古实验。这时的边疆地区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如乌拉尔图王乌图墓地，特里亚列梯巨石冢和巴泽雷克石古群，帕提亚的第一都城。随着发现增多所表现出的文化多样性，把各民族历史纳入一个单一发展序列的作法已经行不通了。同时卫国战争导致的民族意识增长，都促进前苏联考古学按地区按民族从事研究的局面，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特里波列文化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发现，1934—1938年前苏联考古工作者采取全面揭露的方法，发掘了德聂河畔基辅附近科罗米辛纳Ⅰ的一处居址，面积达15000平方米，令人信服地恢复了特里波列人的有关社会生活图景。这是最早的聚落考古实践。中亚阿姆河流域的田野工作揭示了花拉子模从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的发展序列：

1939—1940年发掘的詹巴斯——卡拉Ⅳ是一座位于沙丘的大型公社住所，向人们展现出这个大约100—150人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的生产和生活情况。1937年组织的前苏联科学院花拉子模考古队的工作提供了中亚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诸如城市、水利灌溉、手工业制造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西伯利亚考古发掘建立了一条从旧石器时代经过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年代序列，通过考古研究重现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对黑海北岸古典时代的考古研究中，1914年奥里维亚城的发掘和1936—1937年在赫尔逊斯墓地的发掘提供了城市布局、城市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其它方面的情况。前苏联东欧部分的考古以斯拉夫人起源和古代罗斯城市发展为中心，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总之，从30年代以后，前苏联考古学在克服了脱离实际材料的抽象议论后走上了具体研究历史的道路，建立了各地区各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框架，在具体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2）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和运用

在19世纪历史学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影响很大。人类历史也按进步法则勾划出一个文化进化的模式。无论是汤姆森的方案还是摩尔根的模式，都是文化进化理论的结果。这种社会进化理论的核心是：相信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发生，并且具有方向性；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一致的。在这种进化理论的指导下，人们普遍使用一种比较的方法，即在同时和不同时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把不同的文化和民族纳入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序列，从而证实进化论学说。对于社会进化论者来说，比较方法是对文化进化的一种解释，正如自然选择观点对于达尔文生物进化作出解释一样。

进入20世纪以后，历史研究有了两个新的动因。一是考

古学研究已经发现了十几个埋在地下的文明。在发掘它们之间，这些文明已经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了。这些消失了的文明的发现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理解这些文明的发展和衰亡。另一方面，行为科学的进步使社会科学家已经不满足于单纯描述历史事件，而是要回答历史变化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发生的问题。他们对生态、人口压力和技术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也提供了辨认这类信息的手段。对这类问题作出解释的首先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家。德国历史学家施本格勒（Spengher，O，1880—1936）提出每个文明都是线形发展的，就像人一样，也有其出生、成长、鼎盛、衰落和灭亡的历史过程。他提出每个文明的寿命大约一千年。他在《西方的衰落》中预言现代西方文明也必将灭亡。他在研究各种文明中，运用一种直觉的跨时空的方法进行比较，强调从整体上把握。美国人类学家克罗勃（Kroeber，A·L，1876—1960）则认为每个文明都是由若干个部分构成，它们在文明内部是相互独立的。这些“部分”应当是研究的重点，从而把文明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来理解。因此克罗勃的方法已经具有系统论的萌芽。他利用数量表示不同文化内部各个“部分”的成就和水平，以此确定文化生长的频率、高峰、期限和水平。他反对施本格勒的直觉法，主张实证方法和数量统计方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A 1881—1976 年）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划分出 21 种独特的文明。他对文明产生的原因作出“挑战与应战”的解释。每个文明都出现在自然环境的挑战中，还有人口压力和战争。在面对挑战采取不同方式的应战中，便形成了文明。他把每一个文明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单位。他通过比较各种文明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机构，认为在一切文明中这些机构都是以同一方式发展起来的。他的研究方法是直觉的，而不是实证的。因为他认为历史事实本身并不能讲话，历史是当代对过去的看法。

在考古学进入成熟之后，考古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的史料被用于文明研究中。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综合，解释文明发展和衰亡自然是由考古学家完成的。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 生于澳大利亚，1892—1957 年)。他在 1915 年至本世纪 5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是当时对旧大陆考古最权威、最全面的综合和解释，而且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是由于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指导以及他的综合研究的概括能力。他研究的重点是欧洲和近东。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欧洲文明的曙光》（1925 年第一版，1957 年第六版）和《多瑙河史前史》（1929 年）是对欧洲考古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著作。他于 1928 年撰写的《远古东方》和 1934 年根据大量新资料重新改写的《远古东方的新见解》代表了当时对近东考古资料最高的综合水平。柴尔德一开始接受了汤因比的观点，把自然环境看成是文明兴衰的决定因素。后来他放弃了这种观点，采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过程。他把地理和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文化发展的条件和背景，把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力的变化直接影响该社会的法律、政治和宗教等上层建筑。他在综合研究中没有运用考古学中传统的阶段模式，而是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重新检验和使用摩尔根的模式。他的结论是：野蛮阶段的开始是从食物采集变成食物生产。文明阶段的开始是出现了使用文字、居住密集拥有复杂机构的城市。这就是他著名的“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观点。他认为这两次革命是人类自从学会用火至到工业革命之间最伟大、意义最深远的两次革命。

他认为文化发展是一个单一序列。不同时代但发展阶段相同的文化具有相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因此可以根据文化或文明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来判断它们的发展水平。

柴尔德在《远古东方新见解》一书中，对近东的埃及、两

河流域和印度河文明以及周围地区的发展作了全面的概括。这种研究不是只局限于对遗存特征的描述，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总体把握文化特征。他着重研究了从农业革命到城市革命之间的历史变迁。重点分析了资源产地、金属制造和贸易与城市形成的关系。但是他在综合研究欧洲的考古资料中，更多地注重近东文明对欧洲的传播和影响，认为欧洲史前史就是入侵与传播问题。

柴尔德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考古资料的综合把考古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其核心是从经济方面的变化寻找文明发展的原因。研究水平的提高必将导致下一阶段考古实践的变化，出现了以农业革命为目标的专题研究。

3. 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

这一阶段自然科学方法主要用于勘察技术和分析技术。在勘察技术中出现了远程的田野调查技术即空中摄影。

早在 1906 年，英国军人夏普受到一张漫画的启发，乘坐一个军用气球对当地的石柱群做了倾斜的垂直角度的拍摄。照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轰动，这些照片向人们展示出空中摄影对于记录古迹的辅助价值。它可以揭示遗存整体的面貌；可以观察到地面无法看到的由阴影表示的街道；还可以探寻出人工形成的文化景观特征。

空中摄影的技术在世界大战中得到很大发展。战争一方面培养了这方面的人才如拍摄人员和对军事摄影的判读人员，另一方面大量的军事照片又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遗址。

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的比兹利上校，在执行军事飞行任务时，注意到运河和地下水道的特殊形状，并且辨别出古代城市的布局，奠定了利用空中摄影照片解释考古现象的基础。

克劳福德的名字仿佛是航空摄影的代名词。在战争期间他获得了观测员和航空照片判读员的大量经验，1924 年他用二个月时间拍摄了 300 张考古遗址的照片，发表了《空中拍摄的

韦塞克斯》。这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土壤、阴影和庄稼的特点判断地面和地下遗迹，采用精确定点和从新俯视角得到正确的地形比例关系。

考古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越来越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运用。考古学者已经不仅仅是在野外遗址或在博物馆里对人工器物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开始依靠那些研究动物、植物以及环境的自然科学家。皮特·里弗斯把史前文化分布与史前植被的分布联系起来，考察了史前地理与文化的关系。

这时还开始了对遗存进行技术分析。如对人工遗存的物理分析和化学分析，了解人工物的成分、质地以及制造过程。例如石器分析要找岩石学家，青铜器分析要找冶金学家。由于求助学科如此广泛，英国考古联合会出版了《考古用科学鉴定指南》。卢卡斯的《古埃及的物质遗存》(1916) 和帕廷顿的《应用化学的产生和发展》(1935) 等著作都显示出对物质遗存和相关发现作科学分析所获得的丰富资料。总之，考古学家越来越依靠自然科学的帮助，以扩大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手段，以增大遗存的信息量。这种趋势在下个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

4. 各地考古发现与研究

(1) 埃及

在这个阶段初期，英、法垄断埃及考古的局面已不存在，美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也纷纷派出考古队，埃及古物部和开罗大学代表埃及政府独立进行发掘。

这时期的考古界代表人物仍是皮特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发掘一度停顿，皮特里利用这个时机开始了企望多年的综述性研究。他的《古埃及工艺品》(1909) 在战前就已发表，大战期间出版了《圣甲虫宝石与泥柱文书》(1915)、《工具与武器》(1916)、《主要的史前陶器》(1918) 和《史前埃及，附伦敦大学院千余件器物图录》(1920)。到 1926 年，皮特里离开了他从事考古 40 年的埃及，开始去巴勒斯坦发掘，直至去

世（194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的主要发掘成果有阿马尔纳土丘发掘，图坦哈蒙墓发掘以及前王朝遗址的发掘和序列的确立。

早在1887年，一位农妇在挖土作肥料时就发现了著名的“阿马尔纳文书”。这是一批用陶土烧制的泥版文书，用那个时期外交场合使用的巴比伦语楔形文字写成。经过一场争论，它的真实性才得到承认。1891—1892年由布里昂、巴桑蒂、格列波主持发掘，后来由皮特里主持发掘。1907年德国人发掘。1921年后埃及考察协会主持发掘。彭德尔伯里的《阿玛尔纳土丘》对发掘成果进行了综合介绍。这里是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埃赫那吞（约公元前1379—前1362）时的都城。这里的艺术品具有埃及其它时代所不同的特征，被誉为“阿玛尔纳风格”。发掘揭示了公元前14年世纪昙花一现的都市生活的详细情况。

这时期埃及另一项重大发现是图坦哈蒙国王陵墓的发掘。这是由卡特和卡纳冯在1922年发掘的。当时卡特已在此发掘了20年，正当他准备停止继续发掘时，他们意外地发现在岩石中凿成的16级台阶把他们领到这个惟一未被盗过的埃及王陵。经过11年的发掘（1922—1933），出土了5000多件文物，是历史上发掘品数量最多的一次。

墓葬形制分甬道、前厅、棺室、耳室和库房。棺房内有壁画，反映了详细的宗教活动和葬礼，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椁为整块石英岩雕刻而成，内装三重棺。第一、二重为人形贴金木棺，最内层为纯金人形棺。内装图坦哈蒙（约公元前1361—前1352年）的木乃伊，头部罩以形象逼真的纯金面罩。随葬品有家具、雕像、武器、王杖、包金战车等。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件镶嵌各色玻璃、宝石并包金的木制狮腿“宝座”。

这时期埃及史前和文明起源的发现与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在下埃及，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梅里姆德遗址。1924—1928年又对法尤姆凹地的史前文化进行了研究，划分为A、B两期，年代分别为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在开罗附近发掘了马阿迪遗址，年代为前王朝中——晚期。

在上埃及和中埃及，1922—1925年发掘了巴达里墓地和附近的遗址。其后又发掘了赫马米遗址，这个遗址的层位关系为建立前王朝文化序列提供了基础，在这里涅伽达叠压在巴达里之上，涅伽达Ⅰ Ⅱ的划分也得到了证实。1928—1929年在中埃及发掘了塔萨遗址，它被认为是巴达里文化的前身。这样，在上、中埃及，建立起由塔萨经巴达里到达涅伽的前王朝序列，并将前两个阶段放入皮特里序列年代中最早的S. O. 30年之前，把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一步。与此同时，埃及考古学家努力使下埃及的考古发现建立起文化序列，并和上、中埃及的序列相互对应。下埃及的史前遗存中，存在着一些外来因素，它们是来自东面的两河、波斯湾或伊朗。

(2) 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这个阶段的重大发现是英国吴雷1926年乌尔王陵的发掘。乌尔王陵以其丰富豪华的随葬品和人殉为特点。这个发现和埃及图坦哈蒙墓以及迈锡尼的发现一样引起了人们的轰动。

这时考古学研究集中在苏美尔文明和苏美尔文的起源上。发掘的主要遗址有乌尔和欧贝德（1922年吴雷）。在欧贝德完整地发掘了一座苏美尔人神庙。石灰石的地基泥版上的铭文为“乌尔王阿尼帕达……”因此这座神庙成为第一座可以与历史人物相连的苏美尔建筑。在这两个遗址的底部地层中都发现一种绘黑彩的绿陶片。

1932年，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掘了基什和捷姆叠特·那色遗址，出土陶器为黑黄两色的彩陶，这种陶器压在早王朝的墓之下。

1928年德国人重新在瓦尔卡发掘，陶器均为素面磨光的红陶和灰陶。在遗址的底层也发现黑彩绿陶，而顶层则出土黑黄两色彩陶。

1931年在莱顿召开的第十八届东方学者国际会议上，根据这些发现提出了两河流域前王朝的分期序列，早期为欧贝德期，以黑彩绿陶为标志；中期叫乌鲁克期，以素面陶为特征；晚期为捷姆迭特·那色期，出有黑黄两色彩陶。这一分期方案把两河南部的前王朝遗存纳人一个相对年代的体系中去。

在两河北部，1911—1914年德国人奥彭海姆发掘了哈拉夫丘，出有精美的三彩陶器，同时德国人赫茨费尔德在萨玛拉也发掘到彩陶文化的墓地。1933年英国人马洛温发掘阿尔帕契亚遗址，1930年美国人斯佩塞发掘高拉丘。1931年英国人坎贝尔、汤姆森再次发掘库云吉克丘，在距地表21米的底层，出现一种划纹陶片。这些发现把两河前王朝序列又向前推进一步。阿尔帕契亚和高拉丘证明哈拉夫文化早于欧贝德期，萨玛拉彩陶则说明它是与哈拉夫文化年代相近的一种文化，而库云吉克丘的地层不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序列，而且发现了两河后旧石器时代最早的陶器——划纹陶。

1933年伊拉克政府公布禁止伊拉克古物出口的法律。外国考古队纷纷移向叙利亚。最重要的是对马里皇城的发掘。1940年伊拉克政府开始了首次发掘，发掘了乌凯尔丘的壁画庙。1946年发掘了埃利都遗址，发现了欧贝德文化最早的遗存，1943年对哈孙纳的发掘把库云吉克底层的划纹陶片命名为哈孙纳文化。

两河流域一系列前王朝遗存的发现使人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哪些遗存是前苏美尔文化，它们来自何方？而在斯佩塞看来“辨明文字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某种民族构成因素，这是一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完成的任务”。

(3) 地中海沿岸（土耳其、利凡特）

1932 年以布利根为首的美国考古队在特洛伊重新发掘(这是在谢里曼发掘后的 40 年)，其目的是想核实原来的层位关系。他的简报将特洛伊ⅦA 认作荷马时代，根据是发现来自迈尼锡的进口器物，年代大约公元前 13 世纪至 12 世纪之交。

对安那托利亚的兴趣由希腊文化转入赫梯文明。1861 年乔治·佩罗在安卡拉以东 145 公里处发现博哈兹柯伊村有一座大型设防城址，并出土一种风格特别的雕像。1906—1908 年，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雨果·温克勒领导下发掘了这个遗址，并证明这就是赫梯人都城哈图沙。发现的大批泥版文书档案是公元前 1350—前 1300 年的外交文件。1924 年捷克人弗里德里希·罗茨尼将文字释读成功，使这些文件成为了解古代东方最早期历史的资料。

1926 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对安那托利亚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目的是建立中部地区的史前史完整序列。在发现的 300 余处遗址，他们选择了阿利沙尔丘进行了发掘。发掘者奥斯滕和密特划分了四个文化层：

A. 铜石并用　本色黑陶、红陶　公元前四千纪

B. 红铜　五个建筑层　公元前 3000—前 2400 年

C. 青铜早期　卡帕多细亚彩陶　公元前 2400—前 2000 年

D. 赫梯帝国

这个序列建立了前赫梯文明的研究基础。

1935 年以后，考古学家又对土耳其东南的西里西亚平原进行了发掘，其中有梅尔辛、阿勒颇和卡拉特普三个大遗址。

1936—1937 年由加斯唐领导的尼尔森考古队在梅尔辛揭示了 16 层连续叠压的层位，建立了这一地区文化序列。其中下部的 12—16 层为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两河流域的哈拉夫至乌鲁克时期。在第 16 层以下还有两种更早的文化遗存，

较晚的相当于哈孙纳文化，而更旧的黑色磨光陶和磨制石斧是一种近东地区最早的后旧石器时代遗存。总之，这一阶段该地区的研究是由西向东发展，年代从赫梯到前赫梯文明直至新石器时代。

利凡特地区是《圣经》中常常涉及的地区，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叙利亚北部沿岸与塞浦路斯岛遥遥相对的地方，1929年偶然发现了沙姆拉角遗址。谢费尔在此发掘了10年。遗址最下层的新石器划纹陶可与哈孙纳文化相比较，其上为铜石并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纪时，这里在阿马尔纳文书、赫梯文书和埃及铭文中被叫做乌加里特。在公元前14世纪中叶曾被地震毁灭过一次，最后被毁是由于12世纪初北方和海上民族的入侵，乌加里特是国际性港口，在公元前15—前12世纪受到埃及、赫梯和迈锡尼的影响。这里还发现了上百件年代在公元前15—前14世纪的泥版，是由最早的楔形字母组成的文字。

1930—1936年加斯唐发掘了耶利哥遗址，揭示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圣经·约书亚书》第六章所描述的毁城时代为止的完整序列。最早的为17层至10层，为无陶新石器时代，发现最早的人工培植小麦，人们住在烟卷形泥砖垒砌的房屋里。村落周围有围墙，还有瞭望塔，高9.15米，二十二级台阶，是世界上最早的城。第9层相当于哈拉夫文化。第8层为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欧贝德期至捷姆迭特·那色期。其上从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时代早期开始形成一座城市，至到毁城事件共划分出四个建筑期。毁城年代在11—13世纪之间。

1933年开始发掘拉希什遗址，这里的青铜时代晚期神庙中发现的钵和罐上刻有伽南人早期铭文，从而把原西奈文字和所知最早的腓尼基文字母联在一起。

利凡特地区的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开始于无陶的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直至伽南人的青铜时代城市，最后

在公元前1400—前1200年这些青铜时代城市被外来人——以色列人所毁灭。

（4）伊朗、印度和中国

30年代，伊朗北部的希萨尔、沙图朗丘，伊朗西北的吉延、夏尔克，法尔斯省的塔利巴昆遗址的发掘以及对伊朗东、南部的调查代表了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

夏尔克遗址是这一地区比较典型的遗址，共分四期。最早的第一期为粘土建筑，居住面下葬有屈肢葬，只洒红矿石，不见随葬品。彩陶有两种：光亮陶和黑陶。工具有投石、石斧，红铜锤制的针，饲养羊和牛。采集占有相当比重。第二期出现了手制泥砖，凹底纺轮，彩陶纹饰是一种新的风格。有波斯湾的贝饰，驯化猪和马，采集经济衰退。经过一段过渡，进入第三期铜石并用时代，有铜铸的銎孔斧，建筑中出现扶垛和壁龛。第四期为城市遗址，有双彩陶和泥版文书，是最早的埃兰人的边镇（表三）。

表三　伊朗遗址与两河序列的对应关系

两河流域	苏 萨	安 努	夏尔克	塔利巴尾	吉 延	希萨尔
前哈拉夫			一期		⑤A	
哈拉夫文化		LA	二期			
欧贝德时期	A	IB		B_1	⑤D	一期
乌鲁克时期	B		过渡	B_2		二期
捷姆叠特那色时期	C			A_2		三期
早王朝	D		三期 四期		④	（灰陶）

各地的发掘证明，在伊朗广泛存在着一种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群，主要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这种伊朗彩陶与以哈拉夫为

代表的叙利亚彩陶和以萨玛腊埃利都为代表的两河冲积平原彩陶构成了近东地区的三大彩陶。1942 年麦科恩在《早期伊朗文化的地层比较》中把伊朗彩陶分为红陶黑彩组和黄褐陶黑彩组。前者见于夏尔克、安努、希萨尔，后者见于吉延、苏萨和巴昆。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是由哈拉帕遗址和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发现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

哈拉帕遗址距离新德里西北 500 公里左右，1873 年在此发现了石印章。1921 年发掘了三座土丘，确定哈拉帕为史前时代。1923—1925 年沙尼在此继续发掘，1926—1934 年由瓦茨主持发掘，1940 年发表了完整的发掘报告。

摩亨佐达罗遗址距哈拉帕南 650 公里，卡拉奇东北 225 公里。1921—1922 上班纳基开始发掘，也发现了哈拉帕印章，发掘断断续续进行了 10 年。

这两处遗址揭示出古代的城市文明，即哈拉帕文化。年代为公元前 2350—前 1750 年。城市的特点是规划完善、人口密集、砖筑墙、并有水井、下水道、浴室和厕所等设施。经济类型以农业和贸易为特点，种植小麦、大麦、稻、枣和棉花，畜养瘤牛、黄牛、水牛、绵羊、猪、狗、象和骆驼，使用带轮子的车。手工业品有红铜、青铜和石质武器以及金、银、金银合金、红铜、青铜、釉陶、赤陶、象牙和光玉髓的装饰品。陶器以素面为主，少量红条带上饰黑彩的彩陶器。艺术品以雕像和印章为代表，使用二进制和十进制计数的衡量制，并有象形文字。从遗址发掘与调查看，哈拉帕文化分布范围比埃及和两河大得多。

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文明也展现在人们面前，仰韶村、齐家坪、城子崖、小屯卜骨以及后岗三叠层揭示了中国古老的文明以及其它史前史。

(5) 欧洲

这时期欧洲的主要考古发现和研究领域有第三纪人类的争论，旧石器时代分期以及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划分等。

在 19 世纪，考古界中就存在着关于第三纪人类的争论，是由德努瓦耶在 1863 年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的争论到 20 世纪头 20 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1907 年一个专门委员会否认了在邦塞尔的中渐新世地层中发现的曙石器，认为它们是由叠压在上面的移动地层形成的压力所造成的。看来，承认曙石器要比承认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要缓慢得多。对第三纪人类问题的态度由英国东部前砂质泥灰岩地层中人骨的发现而出现了普遍的转变。1920 年步日耶宣布承认这些考古证据。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曙石器都是人类制作的，而是证实某些前舍利时期的石器是可以识别的，尽管识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旧石器时代的发现与研究还有旧石器时代分期的进一步系统化。在这方面，步日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作出了更复杂的分期：其中奥瑞纳期和梭鲁特期分出三期、马格德林期分出六期。这时期对中石器时代的认识也有了重大进展。麦卡利斯特 1921 年在《考古学教程》中给中石器时代以明确的定义，格雷厄姆、克拉克在《英国的中石器时代》(1932)《北欧的中石器时代文化》(1936) 两书中也对中石器时代作了确切的阐释。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提出大大推动了欧洲的新石器时代研究。英国的新石器时代直到 1923 年还像福克斯所说的："凡是与早期金属时代墓葬堆积没有明显共存关系的石制工具都统统倾倒在这个毫无明确定义的'新石器时代'垃圾堆里。"舒哈尔特在 1913 年在西欧划分出一种袋式陶器，从而为确定新石器时代提供一个陶器标准。随后门京又提出英国新石器时代，存在两种特点各异的陶器：一种就是袋式陶器，另一种叫做彼

得博罗粗陶。后来利兹和皮戈特对两种陶器进行比较，将英国新石器时代划分出三种文化因素，即三种考古学文化：南方文化（风磨山文化）、东方文化（彼得博罗文化）以及西大西洋文化（巨石文化）。每个文化内部还可以细分为组（即文化类型）。这样一来，新石器时代从一个毫无明确含义的“时期”一跃成为以一系列时代约略相同的文化类型为代表的阶段。

北欧的新石器时代也有很大进展。考古学者不满足于蒙特柳斯提出的四个阶段，更重要的是不满意蒙氏在阶段划分上把各种墓葬作为主要标准，以致使用起来很困难。这时期在北欧的考古工作，特别是特勒尔德山、布兰德山、特雷尔堡、本瑟和林德等村落遗址的发掘，使北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情况日趋清楚，从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集体合葬墓这个多年来不解之谜上了。新石器时代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这时期的综述性著作反映了发现和研究的成果。本世纪初，约瑟夫·德谢莱特的巨著《考古学手册》是较早的一本（1908）。后来马克斯艾伯特的《史前学辞典》是一部规模更大的综述性著作。1921 年麦卡利斯特只出版了《欧洲考古学教程》的第一卷，而且只论及旧石器时代。对这时期史前学研究提供及时、清晰说明的是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1925 年首次发表）和霍克斯《欧洲史前学基础》（1940）。

（6）旧石器时代的研究进展

在这一阶段，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从欧洲扩展到世界各地。首先是在非洲。北非有尼罗河谷、利比亚的昔兰尼加，摩洛哥的丹吉尔；东非有乌干达，肯尼亚的奥杜威卵石工具文化以及南非的石器时代。在巴勒斯坦，卡麦尔山的一系列遗址揭示出一个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塔亚西文化、经过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石器文化到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的文化序列。在印度发现了一种由卵石砍砸器，克拉克当——勒瓦娄哇类型石片与石核为特征的索

安文化。这种文化与手斧传统在印度并存。在缅甸发现一种由砍砸器、粗制刮削器和木化石制作的砍砸工具文化即安雅特文化。在爪哇、马来亚、中国周口店、泰国班阁都有与安雅特文化类似的石器。1921年周口店的发现把中国史前史提到了旧石器时代。在西伯利亚发现了著名的旧石器晚期遗址——马尔他遗址。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发现，门京在1931年发表的《世界石器时代历史》一书中提出全球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居住的世界可以分为石片石器与石核石器两大区，前者包括中国、东南亚及东欧；后者包括西欧，非洲和印度。凡·希克等人又提出第三种类型：没有石片和石核的砍砸器和卵石工具组合，它包括索安文化，安雅特文化及周口店与东南亚诸文化。

5. *方法的发展*

发掘方法在这一阶段有很大进展。首先，发掘要事先制定计划，以决定采用相应的方法。其次，收集中的重点已变成对所有考古现象进行研究，完全摒弃了鉴赏艺术品的作法，收集物中包括骨骼和植物的种子，在发表报告中也报告一切遗存以及它们的分布。由于遗物种类的范围扩大到考古学家涉及范围之外，考古学家在发掘中更加依赖自然科学家的帮助。

这一阶段莫蒂默·惠勒把先进的发掘方法带到了印度，使印度史前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培训了一批考古学者。他采用了探方发掘的方法，留有隔梁和关键柱，以便更好地观察地层。他强调准确记录、细致观察、尽快全部发表结果。他明确提出发掘的目的：考古发掘是挖人，而不是物。考古学应是一门充满人类学趣味的科学，僵死的考古学是随风飘落的干土。

在考古研究中，开始吸收地理学等空间科学的方法，注重遗存之间的横向联系。克劳福德通过航空摄影搞清了各时期的地理分布。运用地理学方法作考古分析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古

物按分布特点进行研究，二是根据史前地理环境对古物类型和分布进行研究。克劳福德在1912年发表的《英国青铜时代早期居住遗址的分布》首次绘制了青铜扁斧，大口杯和半月形金饰件的分布图，进而联系英国地理情况研究这种分布的形式。

福克斯的《剑桥地区考古》是这方面研究的又一范例。他把克劳福德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一个小地区，即剑桥周围方圆三四十公里之内。他以自然植被为背景研究史前遗物的分布。他证明在青铜时代人们主要居住在较轻的渗透性强的土壤上，到铁器时代则转移到渗透性差、较重的粘性土壤上，由此划分出第一类和第二类居住址的分布地区。后来他将这种研究扩大到英伦三岛，发表了《英国的个性》这部名作。这部史前学上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使考古学家们为之震动。

6．小结

考古学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学问，其中包括各类技术、大量史料以及阐释人类早期历史的一套新理论，这些表明考古学本身的成熟和系统化。

这个阶段的考古发现在时、空两方面都有很大拓展。研究的地域由欧洲和近东扩展到伊朗、印度和中国；美洲考古也在向系统化发展；旧石器时代研究扩展到非洲和东南亚，考古学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研究的时间不断向前推进：根据地质年代学的推定，最早的人工制品的年代已达100万年前，而第一个村落的年代在8000年前，埃及和西亚新月沃地（巴勒斯坦——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扎格罗斯山脉）的第一座城市为5000年前，这说明我们所谓的文明相对来说是很晚的。自人类在地球上作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存在以来，文明史在其中顶多占有百分之一的时间。这种新的观点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将在思想领域带来一场革命。

史前考古学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壮观的人类历史图景，然后又引发考古学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即能够证明农业村落经济是

如何形成，城市文明又是如何兴起的哪？这一阶段在近东揭示出来的史前文明或是原史文明聚落被称为“新发现的历史”，使考古学朝着解决这些课题的方向努力。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发现，尤其是哈孙纳土丘等遗址已揭示出这里的史前史年代极为久远，美索不达米亚取代埃及成为文明的故乡。另外一些人，如奥尔布赖特和加斯唐，曾强调指出巴勒斯坦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年代久远，而赫茨费尔德则主张把伊朗作为最先采用农耕经济的发源地。这种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而经常改变我们的认识的现象使考古学者开始意识到考古资料（遗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由于发掘的偶然性所带来的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其次是可能存在着没有留下物质遗存的文化和文明，如门京提出旧石器时代存在过一种骨器文化，其遗物很少遗留下来，还有游牧民族也很少留下考古遗存，但他们在文化发展和传播中却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考古学是否只能研究留有物质遗存的人类历史？最后一个局限性是：既然考古学只能从物质遗存人手，那么被研究的文化或文明是否只局限于它的物质发展，而无法了解它的知识发展？对知识发展是否只能从有文字的时代之后开始？对这些局限性的认识是研究考古学本身的开始，对学科本身的认识往往要比认识它的研究对象更加困难。这标志着学科逐渐走向成熟，进人自我意识阶段。

这阶段对考古发现的理论阐释是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出现，它改变了从前把人工制品看成是地层中的化石、人类的史前时代是以这些地层化石的组合特点划分成的时期和阶段的研究方法，使文化群的研究从地质学和分类学研究方法中解脱出来，成为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新课题。在这一阶段前期，柴尔德等学者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看成是史前考古学者的主要任务。克拉克说：“考古学完全可以称为对历史文化特征在时空分布上的研究，以及对这种分布控制因素的研究。”柴

尔德说："史前学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区分文化群和各种民族，寻找它们的差异、活动地区和活动行为。"以上这些论述代表了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研究内容。到了这一阶段末期，泰勒在1948年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提出：史前学（撰写史前学著作乃是考古学家的目标）不仅仅是在时间序列上排列人工制品和其它文化现象，而且要建立史前文化整体结构，撰写了史前史著作，这说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应该从划分文化、确定时空框架上升到重现史前史的高度。但是在复原早期文化历史的研究中，经济的发展和艺术的发展是最使考古学者头痛的两个问题，它阻碍着史前史的复原工作。

这一阶段考古研究比之考古发现有更大进展，其客观原因是发掘经费日益提高使发掘减少，因而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对已发掘的材料进行核查和分析。这种研究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发掘水平的提高。这时对发掘者的评价并不是看他发掘的数量、规模和次数，而是看他对撰写或重新撰写人类早期历史的贡献大小。没有解决历史的观念，发掘只能又回到单纯收集遗物的古物学水平。所以由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使发掘从只注重艺术品到收集一切遗物直到这一阶段出现了带着问题有目的的收集，使考古研究与发掘有机地联系起来。

二、美洲的年代学

这一阶段就是《美洲考古学史》中的分类——历史阶段。这里所说的历史是狭义的历史，即一连串有时间顺序的事件。美洲考古从上一阶段以分类和分区的横向研究转入该阶段以确定年代序列为主的纵向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传入的地层学发掘，使美洲考古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其他方法也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到该阶段末期各地的年代序列基本建立。

1. 地层学革命

这里使用了“革命”一词是想表明这个转变发生的剧烈、迅速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地层学发掘方法大约在1914年从欧洲传入美洲。20年后即在美洲大陆得到普及，在这之前，美洲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地层学发掘，但对当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即使是利用地层学方法的发掘者也不全部采用这种方法。

关于美洲迟迟不采纳地层学发掘的原因我们已经做过分析，主要是由于人类学领域反对进化论、早期人类研究的失败以及忽视文化内细小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实践方面的原因，美洲很多土丘遗址，尤其是美国东部用于埋葬的土丘，地层堆积很薄，而且常常包括再生堆积，这给利用地层学方法带来很大不便。

地层学革命是在中美洲和美国西南部同时开始的，首倡者是盖米欧（Camio，M.）和纳尔逊（Nelson，N. C.）。他们都是受人类学教育的年轻人。其中盖米欧是鲍厄士的学生。鲍厄士鼓励他到墨西哥河谷进行地层学发掘，以区分和确认前哥伦比亚时期的文化和它们的年代顺序。早在1880年，霍尔姆斯已经注意到这里的阿兹台克和更早时期的陶片和其他遗物，他虽然没对此进行详细的地层学研究，但是这种分类已经暗示着遗存具有年代上的区别。1911年，盖米欧在一个名叫兹卡伯扎尔克（Atzcapatzalco）的遗址中采集到大量陶片，从这些陶片中可以辨认出阿兹台克和提奥提华坎陶器。剩下的第三类陶器风格无法确定。根据研究已经知道提奥提华坎陶器早于阿兹台克陶器，为了确定第三类陶器的年代，盖米欧决定用发掘来解决。他在这个遗址挖了一个7米深的探方。他是按人为划定的地层逐层下挖和收集遗物的。地层厚度0.2—0.6米不等。遗物最深出土在距地表5.75米处。经过对遗物分层整理发现：阿兹台克陶片出在最上两层，从第三层向下大约4.15米深处

是提奥提华坎陶器，从这向下至5.75米深为蒙他拿陶（图五）由此确定了三者的年代关系。蒙他拿陶后被叫做墨西哥河谷的古代陶器（Archaic Pottery），后又称为前古典或形成期陶器。盖米欧在扎卡坦可等遗址也发现了这种陶器，便建立了墨西哥流域的古代陶器阶段。盖米欧的地层学发掘建立了中美洲的考古年代序列。而前人在这里的长期工作只限于描述、分类和肖像研究。盖米欧的工作使这里的考古学家理解了时间的深度，明确了应该做什么。

纳尔逊的地层学工作比盖米欧晚三年，但其方法更加完善。在1913年他趁发掘暂停之际去欧洲参观了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发掘，在那里步日耶等人正在从事地层学发掘，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参加过在尤尔影响下的贝丘遗址的地层学发掘。他决定回到美国后再进行一次地层学发掘尝试。他也选择了美国西南部，并于1913—1915年开始发掘，在他发掘之前，这里已经区分出几种不同的陶器类型，据说它们与不同的皮埃布罗（Pueblos）印第安人遗存共生，但其中有一种与早期欧洲人遗物共存。纳尔逊要寻找更确凿的证据来解决它们的年代。

他发掘了一系列遗址。在这些遗址中他发现某两个类型之间的叠压关系，但却没有一处遗址能表明所有类型的地层和年代关系。他还发现在上下叠压的早晚两类型之间存在着时间缺环，从类型演变角度他推测其他遗址的某个类型恰好可以填补这个缺环。最后，他在圣克利斯多波尔遗址（San Cristobal）找到了包括这一地区全部类型的地层序列。这个遗址的文化层厚10英尺，并曾作过墓地，所以他指出这些文化层有被打破或扰乱的可能。他选择了一处没有明显打破和扰乱的地点进行发掘，面积3×6平方米。这里的堆积剖面土质细腻，没有明显的颜色、质地和掺杂物的差别，因此他按1英尺一层水平向下发掘。他按地层分别存放出土陶片，并对各层陶片进行分类

和统计。（表四）

表四　纳尔逊按地层对陶片的分类和统计

堆积厚度	皱纹陶(1)	方格纹(2)	类型Ⅰ 双彩或三彩陶（白地黑彩）(3)	类型Ⅱ 双彩釉陶			类型Ⅲ 三彩釉陶(7)
				红陶黑褐彩(4)	黄陶黑褐彩(5)	灰陶黑褐彩(6)	
1英尺	57	10	2	24	23	24	5
2	116	17	2	64	90	76	6
3	27	2	10	68	18	48	3
4	28	4	6	52	20	21	
5	60	15	2	128	55	85	
6	75	21	8	192	53	52	1
7	53	10	40	91	20	15	
8	56	2	118	45	1	5	
9	93	1	107	3			
10	84	1	69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皱纹陶和方格纹陶从上层到底没有明显变化；白地黑彩陶在底层最多，向上逐渐减少；双彩釉陶在底层出现。中层达到顶峰，上层又慢慢减少；多彩釉陶从上层开始出现。所以纳尔逊推测：如果遗址继续使用的话，这种陶器还将增多。他的统计结果很像现在考古学家经常使用的陶器风格变化的单峰曲线模式。从他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他的作法是一种创新，但没有认识到创新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纳尔逊的工作使地区迅速建立了年代序列。同时他还用典型遗址确立的年代序列确定其他只有采集遗物的遗址年代，并且描述了陶器特征的缓慢变化过程。

在美国西南部第一个大规模利用地层学原理，并把它从一个遗址推广到全地区的是基德尔（Kidder，A. V.）他与纳尔逊是同时代人。他曾在哈佛大学的托泽（Tozzer）门下学习并跟著名的本世纪的发掘专家、埃及学者里斯纳尔（Rersner，G. A.）学习田野工作方法课程。他最大规模的发掘是在派克斯遗址（Pecos）。这个遗址分两部分：福克·莱丁（Forkde lightning）和派克斯·皮埃布罗（Pecos Pueblo）。发掘结果表明：人们首先居住在福克·莱丁，年代为皮埃布罗第一至三期。在此之后，这一地点被废弃了，人们大约是在1200年离开的。然后人们占据了派克斯·皮埃布罗，年代为1300—1700年，并断断续续达19世纪。在这里，基德尔首先打一个很深的探沟，以便用剖面来控制发掘。他所划分的地层是根据其内在的物理特征和包含物，因而是一种真实的堆积地层。他按地层记录陶片的出土位置，在剖面上仔细观察和辨认打破和扰乱的痕迹，并将其排除，还在发掘区留关键柱，它的四面都暴露着纵剖面，为发掘与证实地层提供了方便。

陶片也是按地层进行统计的，并制成了百分比图表。他的结论与纳尔逊的相同，从而证实了这个变化序列的可靠性。基德尔把这种研究进一步扩大到区域范围的文化年代研究。他的具体步骤是：

1）初步调查地区遗存。

2）选择确定这些遗存年代序列的标准。

3）对这些标准进行比较，以便暂时排定这些标准遗存的年代顺序以及相关遗址的序列。

4）对出有这些标准遗存的遗址进行发掘以便发现它们之间的地层关系，从而检验暂定的年代序列，并获取更多用于形态学和发展谱系研究的资料。

5）利用已经掌握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地区进行再调查，以便确定所有遗址的年代序列。如果需要，还可以选择新的遗

址发掘以便弄清在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基德尔从事地区年代序列研究的同时，美洲各地都开始进行地层学发掘。有关地层学方法的应用已经被承认和普及，但是对如何划分地层则看法不一，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像盖米欧和纳尔逊这些地层学倡导人这样，用测量来划分地层，而不必按照可以观察到的自然地层发掘。对于测量的或叫做人为的地层，许多欧洲考古学家表示怀疑。例如惠勒曾说过，只有可以观察到的自然地层才是确立过去事件年代序列的可靠保证。在美洲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概只有基德尔坚持和提倡自然地层。他清楚地阐释了他自己的看法：在划分地层时，必须注意堆积中的自然差别，例如一个灰层或炭层、一个坚硬的活动面等等，而不是一道人为划定的界限。

但是美洲仍然广泛采用人为的测量地层，这构成了与旧大陆发掘的一个重大差别。发掘者阐述了他们采用人为测量地层的原因：首先测量地层有助于发掘中控制平、剖面；其次这里的自然地层堆积很薄，年代跨度小，所以意义不大；另外好多遗址都是在山坡斜向堆积而成，这使得按自然地层发掘十分困难。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得美洲考古发掘大多采用人为的测量地层，同时也注意土色、堆积性质的变化，记录它们在平剖面上的分布。尽管我们知道自然地层要比人为地层可靠得多，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用人为地层控制发掘并注意自然堆积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发掘方法。

2．序列排队法

这是一种按照顺序的原理，排列考古现象的时间序列的方法。它是根据遗存的特征以及特征之间的差异确定的。序列排队法的原理有两条：第一，假设随时间推移文化发生的变化是按某种不可避免的顺序发展的，例如在文化进化中是由简单向复杂方向发展；第二，是相似度原理。就是说遗存、遗存组之间的排列是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两者相似程度高，在序

列中的位置便接近，反之亦然。这实质上是认为文化的变化（至少是同一传统的）是一个渐变过程。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上一阶段欧洲学者蒙特柳斯所从事的类型排队的方法。但是这种根据进化原则排出的年代序列还要靠绝对年代或地层学加以验证。如果这种方法运用正确，它的结果是可信的，并且经得起考验。因此，在以确定年代序列为主的阶段，这种方法使用十分广泛。

这种方法在欧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沃尔赛在墓葬整理中首次在墓葬组合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序列法的概念。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作法被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美洲受欧洲影响采用这种方法的渠道有两条，第一条是美洲考古学家尤尔受埃及考古之父皮特里的影响，尤尔看到皮特里在墓葬整理中常常使用这种方法排定没有打破关系的各个墓葬的年代。另一条渠道是人类学家鲍厄士，他出生在德国，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他对欧洲的序列排队法十分熟悉。正是由于他根据遗址地表采集陶片排列出了年代序列，才让盖米欧从事地层发掘来证实这个序列。但是在美洲首次利用序列排队法确定美国西南部年代序列并证实了这种方法可行性的是克罗勃（Kroeber A. L.），他是鲍厄士的学生和同事，也是尤尔的合作者。

克罗勃在1915年到祖尼皮埃布罗（Zrmi pueblos）从事民族学研究。一次散步，他在半小时之内路过了祖尼遗址中18个地点，他无意中发现有的地点的地表是白地陶，有的是红地陶，于是他开始着手系统采集这些地表的陶片。同时他开始查阅这一地区历史方面的资料，他了解到这里的祖尼人在17世纪广泛使用红地和红地黑彩陶，但对白地陶却没有任何记载。显然白地陶年代更早，很可能是在欧洲人未来之前没有文字记载能力时使用的。这样，他确定了这个年代序列的两端：最早的白地陶和最晚的红地陶。还有一些两种陶器都出的遗址，他根据各种陶器所占比例确定了它们在年代序列中的位置。例如

红陶比例多的遗址晚于白陶比例多的遗址。这样，他把这个年代序列划分为六个阶段。他的这一序列得到了与之共生的皱纹陶数量的证实。皱纹陶随时间发展，数量在稳定地递减。克罗勃的研究不仅确定了这两种陶器的早晚以及许多遗址的年代序列，而且揭示了陶器发展的渐变过程，由此证明红地陶取代白地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始终与皱纹陶并存，因而不是两个不同人种之间的变化。

继克罗勃之后，斯拜尔（Spier, 1.）在这里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他用发掘来验证克罗勃的年代序列。结果表明，红地陶和白地陶的变化与地层发掘情况完全吻合，但皱纹陶的变化则不是从多到少，而是从少到多又从多到少。这说明地表采集情况与地下堆积是有出入的。在斯拜尔的文章中，序列排队法作为一种方法首次被提出，大大促进了它在美洲的推广，而且从陶器研究扩展到其他遗存的研究，例如确立了从单间地穴式房屋到多间地面建筑的发展序列。

这时在秘鲁出现了另外一种顺序排队法，尤尔在欧洲时常常看到皮特里在整理埃及的墓葬时使用这种方法，于是他在秘鲁进行墓葬整理时也运用了这种方法。对于大量的出自没有任何层位关系的墓葬中的陶器，首先根据其形状、颜色、纹饰和制法分成不同的风格群，然后排列陶器上各种特征的变化序列并划分为不同的组。后来克罗勃继承了尤尔的工作并给以详细的说明。这批墓中共出有 600 件陶器。他根据器形颜色装饰和制法划分为 7 个风格群。这些陶器在墓葬中的共生关系说明风格之间的年代是不同的，因为没有一座墓中共出两种不同风格的陶器。所以风格群至少是一个时间单位。把每件陶器归人不同的风格群之后，便开始排列陶器上各种特征的变化序列，如器形的发展，装饰母题的发展和颜色及制法的发展。然后再根据排出的特征发展序列确定风格群序列和墓葬序列。在 7 个风格群中，有一端是欧洲人到达时印加帝国的末期，从而确定了

这一序列的末端，由此向前推，这就在没有层位关系的前提下确定了印加帝国乃至前印加帝国的文化序列。斯特朗(Strong，W. D.）在风格群的序列安排上用统计系数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对陶器特征的肉眼观察的真实性。

30年代福特（Ford，J. A.）在美国东南部的工作以及罗斯（Rouse，I.）在海地的工作都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方法。福特为避免采集陶片中的偏差，每个遗址分别作三次采样工作，然后取其平均数。罗斯对这一方法从方法论角度予以详细阐述，提出了方法的程序，并为风格群和特征等概念下了明确定义，分别定名为类型（type）和样式（mode），并明确了它们在分类中属不同级别。

3. 类型学与分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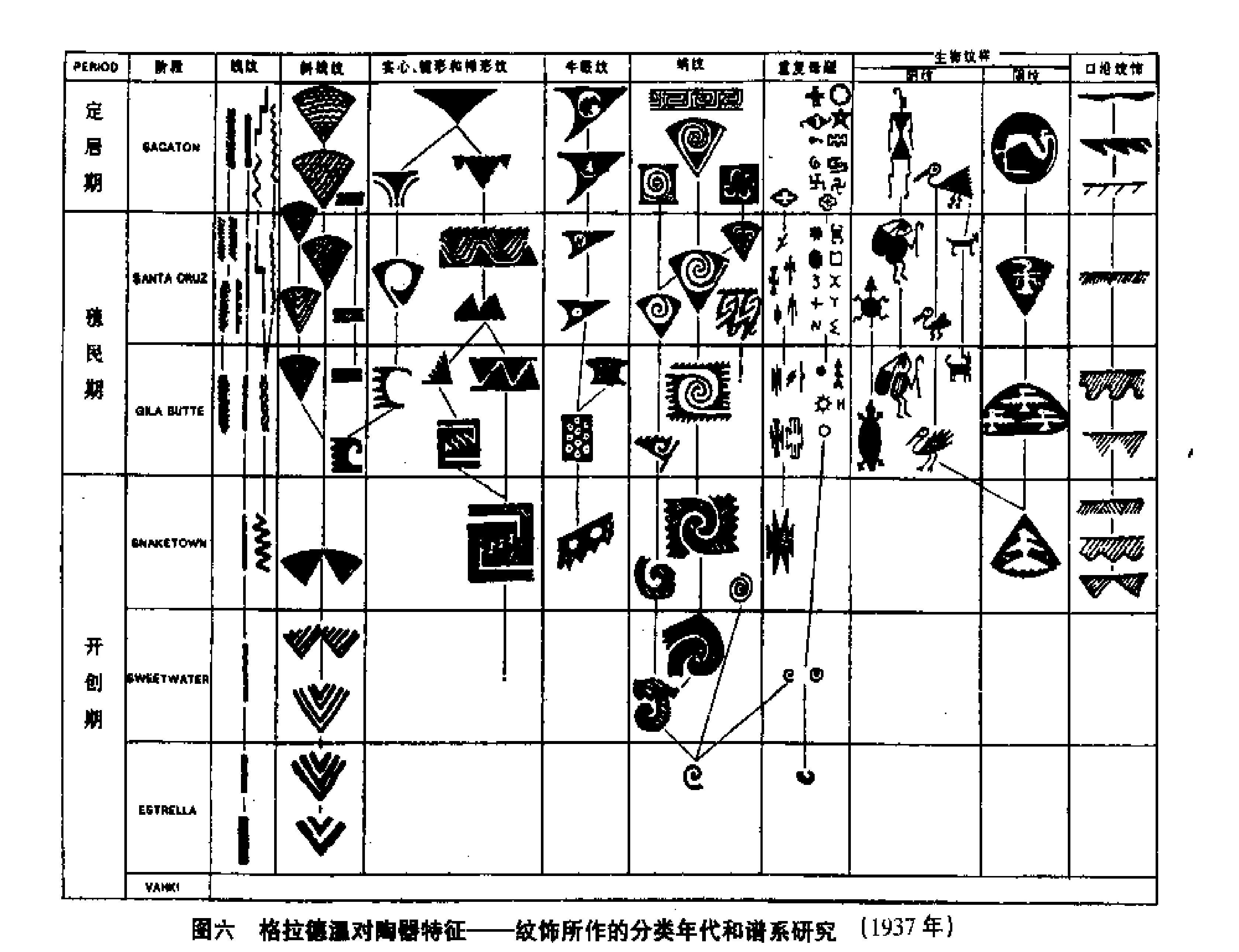
类型学和分类研究是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所说的“分类——描述”和“分类——历史”说明分类在考古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前一个阶段，类型学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描述遗存，从而可以排定它们在博物馆展览时的位置，并且使遗存研究向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在解释分类意义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它们的地域分布，并根据类型分布划出文化区域。到了这个阶段，年代学研究成为中心，使得考古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根据时代敏感的特征对遗存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地层学发掘和序列排队法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以这三者方法为手段的考古年代学研究。

在该阶段早期，存在着从描述性分类向年代性分类的过渡。其代表人物是劳斯洛普（Lothrop，S. K.）他在1926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两卷本的《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陶器》。在20年代初，他在当地博物馆发现这里出土的3500—4000件陶器。这些陶器都是早期业余考古爱好者收集的，没有准确的出土记录，只有大致的地理范围。劳斯洛普意识到这

批陶器在资料价值方面的局限性，便首先按照描述性分类法进行研究。他对陶器进行了分类，先把陶器分成单色、双色和多色三大类，然后各类再根据纹饰和制法分成小类，并划定了各种陶器的地理分布，然后参照邻近地区建立的年代序列对这群陶器进行年代学研究。

首先建立年代类型学的仍然是在地层学和序列排队法最先出现的美国西南部，由此可以看出这三种方法的密切关系。在年代类型学中，残破的陶片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根据这些陶片，这一地区的文化序列建立起来了，它们的变化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地区年代和谱系的变化。这在全美洲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隐藏着一种危险。许多考古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陶片上，尤其是那些时代变化敏感的口沿陶片上，使人们忽视了完整陶器的器形和制法这些更大的文化基体，丧失了陶器除作为年代标志外的其它史料价值。所以翻开美洲的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时，大量进入人们眼帘的是成版的陶片。

陶器分类研究的著名人物是格拉德温（Gladwin，H. S.）。他在 1928 年发表了他的成果。他以美国西南的陶器研究为基础，讲述了研究的程序、遗存的描述、分类方案的设计、陶片的收集和命名。他的分类方案中引用了生物分类方案，例如他把陶色和器表处理作为“属”，把地理位置作为“种”。这一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他提出的研究程序具有实用价值。他提出把陶器类型作为一个研究的单位，这样便于对陶器的变化作以时间和空间上的考察。他对类型进行描述的格式是名称、形状、纹饰、出土的典型遗址、地理分布、文化属性和有关年代的资料（如出土地层、遗迹单位或共生关系等）。通过他的研究，美国西南部已经形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以陶器类型为基本内涵的文化序列。陶器特征成为文化变化的指示计，陶片成为时空框架中的核心。这种研究在全美洲都处于领先地位（图六）。



图六 格拉德温对陶器特征——纹饰所作的分类年代和谱系研究（1937年）

30年代，这种年代类型学从西南向美国东部推广。福特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此之前，这里已有一些描述性的分类方案，例如侯伯威尔陶器（Hope well）、林地陶器（wood land）和密西西比陶器，并且开始意识到这些分类具有年代意义。1936年福特在这里的研究首次把类型作为文化在时空变化上的一个单位。他提出"类型"应综合一切能够发现的特征，如质地、羼合料、制法、装饰等等，但是分类的标准要选择互不共生，即排它性的特征。由于研究涉及的主要是陶片，所以标准最好是器表的处理方式。他对类型的命名和美国西南部一样，也采用一种生物分类方式。例如这个陶器装饰是拍印纹，分布在斯威夫特·克里克地区，那么就叫做斯威夫特克里克的拍印纹陶。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仅仅为描述而做的分类是不够的，这样做只是把原有的材料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应当对文化史作出解释，这种解释的工具就是代表遗存等级的"类型"。

这一阶段只有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出现了这种年代分类法，即从遗存本身的分类和类型学研究来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在中美洲，情况则完全不同。例如在玛雅低地，遗址可以分到若干界限明显的建筑层。这些相互叠压的建筑层就是最理想的年代序列。每个建筑层都有自己的陶器组合。因而在这里人们很少研究每种陶器或陶器类型延续的时间和出现频率，以及根据这些来排列陶器的年代序列。

这一阶段不仅对遗存进行分类研究，而且对遗存复合体——考古学文化进行分类，出现了三种文化分类方案：

第一种文化分类方案叫做年代分类法。由于这时注重遗存时空框架的研究，因而对文化进行分类的需要出现了，第一个方案仍然是出现在地层学、序列学和类型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西南部。由于是基德尔根据派克斯遗址提出来的，所以又叫派克斯分类。

1927年，当时在美国西南部工作的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派克斯召集了一次考古学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提供一种普遍的文化分类方案，以便于考古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当时在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年代问题，所以考古学家想把西南部文化的年代分类扩大到更大的区域中。在此之前，基德尔对美国西南的考古遗存的综合研究中已经提出了这里的文化年代序列，这次会议只不过是确认了这种按年代对文化进行的分类。

在这个分类方案中，最早的文化叫做制篮人Ⅱ（Basket-makers Ⅱ）这个文化分布于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这个序列之所以从Ⅱ开始，是因为人们认为还有可能发现这种文化的源头，所以Ⅰ便是为这种更早的发现保留的位置。这与皮特里创立年代序列法是很相象的。制篮人Ⅲ的人们居住在地穴式房屋中，从事农业。他们的后代——制篮人Ⅱ发明了陶器。继承制篮人Ⅲ的是皮埃布罗Ⅰ—Ⅴ（Pueblo Ⅰ—Ⅴ），各时期的变化主要反映在建筑、聚落形态、陶器风格和其他遗物方面。其中这一序列最晚的皮埃布罗Ⅳ和Ⅴ分别代表了前哥伦比亚向殖民时期的过渡以及殖民时期（即历史时期）向现代皮埃布罗印第安人的过渡。这一文化序列被后来的考古研究反复证实，并不断补充、修改。后来的树轮年代使这一序列具有绝对年代的标准，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同一绝对年代，各地区不属于同一文化。比如按照建筑风格，A地可能属皮埃布罗Ⅳ，而B地可能仍是皮埃布罗Ⅰ或Ⅱ。格拉德温对这一分类方案提出了异议。由于地区之间的时间差和这一分类方案不适应其他地区，格拉德温提出了另一种文化分类方案。

这种分类方案可以叫做谱系——年代分类法，是在他进行的遗址调查和陶器分类基础上形成的。他在1934年发表的“文化及其变体命名的方法”一文中详细阐明了他的方案。这

一方案很像比较历史语言学中的家族树模式。最基础、最根本的文化组织是“根（root），它是指美国西南主要文化群，例如制篮人就是其中一个。“根”可以再分为“系”（stem），这是以地区命名的，例如制篮人根的桑琼（san Juan）系。“系”还可以分成更小的文化单位——支系（branches），支系用更小的地名命名。“支系”可以继续划分为最小的单位——阶段（phase）。它是指考古遗存中一个具体单位，是根据遗址间和遗存成分之间的比较提出来的，同一个“阶段”内的遗存在特征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这个划分方案的出发点是文化特征之间的相似度，但也含有时空因素。“根”、“系”、“支系”是根据地域和文化面貌提出来的。时间的概念也含蓄地表现在这种分类模式中：“根”早于“系”，“系”早于“支系”。这个方案的另一个含义是，西南部文化的起源是一元的。越往前追，文化祖先越少。另外这一方案还可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一个遗址可以被划分为若干个“阶段”，这些阶段可以按照地层学和类型学排列出它们在地区时空框架中的位置。

总之，这一方案除了呆板地运用谱系模式而被修改后至今仍在使用，尤其是运用其中的“阶段”作为地区年代序列中的基本单位比派克斯方案更加适应，便于从年代方面把握考古遗存。但是从全局出发的考虑则稍逊于派克斯方案。

第三种划分方案叫做谱系分类法，是由麦肯（Mckern, W. C.）在30年代和40年代根据美国中西部和中东部的考古实践提出来的。这一地区的遗址堆积很薄，缺少地层，并且在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中有大量的没有出土记录的收集品。谱系分类法就是为了整理这些遗存而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不考虑时空因素，“是一个完全基于文化因素的类别划分”。[1] 分类首先从

① 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译，三联书店1991年。

一个文化复合体的单位开始。这个复合体是由考古遗址中的遗物和遗迹构成。有时它是指一个遗址，如果遗址有地层就是指遗址中某一层。这个文化复合体单位叫做“组合”（Component），是这个分类中最基本的单位。然后把在文化特征上极为相似的组合合并成“集中点”（foci），所以集中点是这个金字塔式的分类方案中的第一个阶梯。集中点之间又根据某些文化上的相似性合并为“面”（aspects）。“面”还可以合并为更高一级的“期”（plases），“期”又可合并为“形态”（patterns），“形态”之内只有很泛泛的文化相似性，例如在美国东部的陶器文化中，只有两个“形态”，一个是林地（Wood land）形态，一个是密西西比形态。前者为半定居，陶器表面处理粗糙并施绳纹，器体近锥形，使用有铤或有槽的打制尖状器。后者则是定居，陶器表面多刻划纹，器形丰富，有小的三角形投掷尖状器。这两个形态仍可以合并为最高的等级——基础（base），基础之间的区别是有无陶器或有无农业经济的区分。

这个分类方案仍然具有一元起源的思想，因此也包含着时间的因素。如果所有遗存都在这个分类方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的年代关系也就明确了。所以以上三种划分方案是根据不同的考古实践和不同角度提出来的，可以直接或间接解决年代问题。

4. 直接历史法（The 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

美洲考古的最大特点在于考古学与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它在这一阶段的具体表现就是出现了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直接历史法。这一术语是由威德尔（Wwdel, W. R.）于1938年首次提出来的。它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角度研究史前时代。在考古中首先要选择从历史早期仍居住印第安人的遗址。然后把发掘到的遗存与当地民族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认被发掘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此基础上，寻找与这些遗存有

相似性的更早遗存，这样便可以追溯到这支印第安人最早的源头。

1935年斯特朗（strong，W. D.）发表的《内布拉斯卡地区考古简介》（Nebraska）是这种研究的典范。斯特朗对该地区印第安人的早期文献记载十分熟悉。他和威德尔一起选择了历史时代的帕内遗址（Pawnee）进行发掘。根据民族志确认了这支印第安人遗存后，他们又发掘了这个部落从史前向历史时代过渡的原史（protohistory，即有史初期）阶段遗址。根据这些他们又发掘了更早的史前遗址。这种发掘和研究搞清了内布拉斯卡地区史前、原史和历史时代的文化序列，这种年代学和民族学的结合为说明明显的文化变化提供了基础；这里的河边园艺经济在原史时代后期变成了牧马的游动经济。所以这种方法对于文化的解释和考察文化变化是很有潜力的。这种方法是美洲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在那些有悠久文献历史传统的旧大陆，很少能有与考古遗存相关的历史文献。它们之间的结合从实质上讲与直接历史法是一样的，都是遗存与文献的结合。通过确认文献上描述的考古遗存，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也可以将这些遗存追溯到早期时期，甚至史前时代。这在确认遗存的族属研究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5. 各地考古发掘与研究

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除了普遍采用了地层学方法以外，另一个进步就是对遗迹的发掘。中美洲和美国西南部主要是建筑遗迹。中美洲那种外表包着一层石头的纪念性建筑非常容易发掘。但美国东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土丘和木构房屋留下的痕迹很不清楚。他们通过人为的控制点来发掘、测量和定位。土丘发掘是在划分成五英尺宽的探沟中进行。但是这种划分为格子的发掘方法在发掘、记录的同时也破坏掉了遗迹，无法从一个整体平面上观察遗迹。于是，这里开始采用中东使用的剥落技术（pealing technology）即大面积成层下挖，遇到遗

迹则全面揭露出来。利用这种方法，居住面可以小心地剥离开，柱洞、灶坑等遗迹可以清理出来，这样便可以拍照完整的遗迹，这比单纯用文字描述遇到的各个遗迹让读者在自己头脑中作想象复原方便得多。显然这种揭露遗迹的发掘尚处在初级水平，但它是下一阶段发现遗存的基体、解释遗存功能和理解文化过程的第一步。

这一阶段考古发掘的进步以及使用的地层学、类型学、序列法所从事的研究都是为建立地区年代序列。这些地区有美国西南部、中美、秘鲁沿岸、美国东部和阿拉斯加。这些地区与当代土著的民族文化区基本吻合。在这些地区的年代序列中，西南部的序列由于有了树轮测量以及中美洲序列由于有历史文献而成为绝对年代序列，其余皆为相对年代序列。

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年代序列我们在介绍文化的年代分类法中已经提到，它是由基德尔提出的。基德尔把西南部（包括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犹他和科罗拉多四个州）分成九个小区。他的年代序列主要是根据新墨西哥的阿尔伯克基（Albupuer-pue）附近的派克斯遗址建立的。在本世纪 20 年代，天文学家道格拉斯（Dorglass, A. E.）为这一地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年代标尺。他是为研究太阳黑子的周期，开始探索西南部树轮生长形态的。这些有着上千年树龄的古树很多就生长在皮埃布罗人的遗迹上。1929 年他发表了两条年轮序列，一条是从现在直到史前时代晚期，另一条完全是史前时代。后来在亚利桑那州东部的史前遗址又找到一棵树，它恰好是上面两条序列中的缺环，于是将上面两条年代序列联结起来了，这使美国西南部年代序列更加清晰了：

制篮人Ⅱ	公元 500 年以前
制篮人Ⅲ	公元 500—700 年
皮埃布罗Ⅰ	公元 700—900 年
皮埃布罗Ⅱ	公元 900—1100 年

皮埃布罗Ⅲ　　　公元1100—1300年
皮埃布罗Ⅳ　　　公元1300—1600年

中美洲的年代序列在1914年以前已经提出，但主要限于玛雅低地，并且根据这里发现的铭文译读成果了解到遗存在玛雅历法中的年代，然后再把玛雅历法换算成公元历法。但是对于这种换算是有争议的，争议年代相差600年。自20年代末期，威兰德（vaillant，G. C.）开始研究这一地区的年代序列，于1941年发表了他的成果。他认为在目前发现的最早印第安人文化之前还应存在过更古老的文化，因此他把这个尚待发现的中美洲最早时期叫做远古印第安文化（paleo Indian Cultures）；下一个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古代期，他叫做中期文化；再下一个阶段是独立文明的鼎盛期和晚期，分别相当于以前的古典文明早期和晚期。最后一个阶段叫做阿兹台克——皮埃布罗混合文化（Mixteca—puebla），即后古典时期。

秘鲁也是美洲最早出现年代序列研究的地区，尤尔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不仅树立了一个年代标尺，而且找出标尺上的每个点所具有的该地区的风格，从而把这个年代标尺推广到整个地区。克罗勃继承了尤尔的研究。他于1927年发表的论文"史前秘鲁的海岸和高地"总结了尤尔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调查，并介绍了其他人的工作，进一步阐明了这些新发现资料之间的年代关系。在30年代，本内特（Bennett，W. C.）和豪尔（Hoyle，R. L.）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工作。在这之后，克罗勃再次到秘鲁考察，与这些发掘者交谈，他写了一篇访问秘鲁的文章"秘鲁的考古"（1942年）。在这篇文章中，他接受了豪尔等人提出的查文（Chavin）文化的概念以及它的远古性，并把查文文化作为秘鲁沿岸地区另一个时代。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对时代风格（horizon Style）作了明确的定义。

美国东部地区流行谱系分类法，这里的年代序列首先是从范围比较小的地区内分别建立的。这些序列主要是帕克

(Parker) 和里特奇 (Ritchie) 建立的纽约州序列、斯特朗的内布拉斯卡序列和塞兹乐 (setzler) 的北部密西西比序列。但是更大的以美国东部为空间范围的年代序列，是以 30 年代以来政府资助的大规模调查与发掘为基础的。这些活动除了政府在资金上的支持以外，还有各有关组织的合作，如博物馆和大学。在这里从事发掘的有大批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考古工作者。这里发掘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发掘与遗存的鉴定分析相结合。许多发掘品刚出土就立即送进了实验室。这里的考古学家注意相互交流信息和意见，并经常召开东南部考古学会议。第一次是于 1938 年在密执安州的安阿伯举行，后来在南部各州经常举行这种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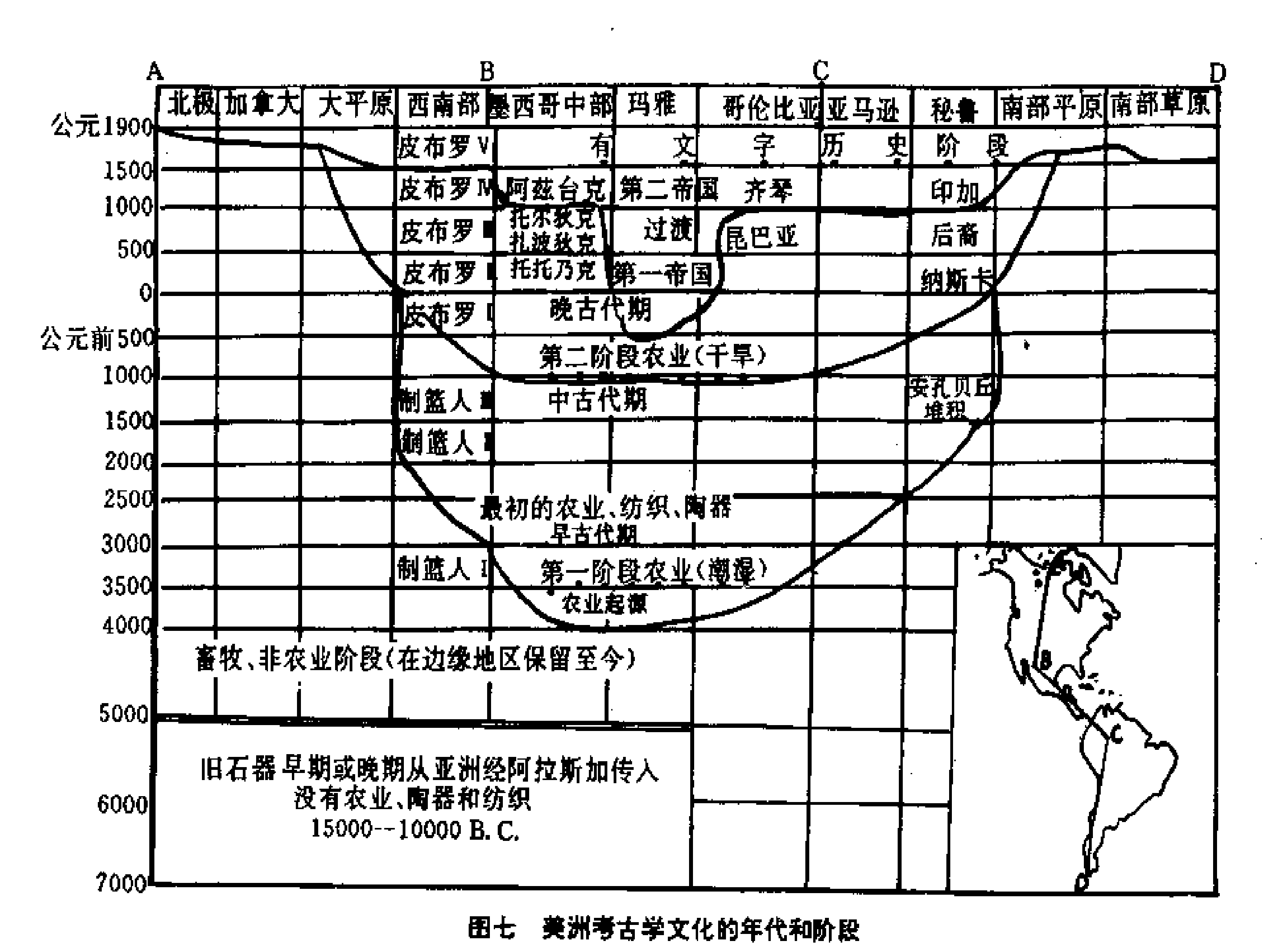
在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基础上，福特和格里芬 (Griffin) 首次提出了全地区文化序列的综合研究成果。1941 年，福特和威利 (Willey, G. R.) 模仿西南部的派克斯系列也发表了东部地区的年代序列：这里由于没有发现美洲的早期人类，所以他们把东部最早时期叫做古代期 (Archaic)，这一阶段没有陶器，并估计也没有农业。福特没有说明这个古代期的来龙去脉。然后是最早的陶器阶段，叫做埋葬土丘〔相当于以前的早期林地文化或阿地那 (Adena) 文化〕。这个时期南部年代早于北部，并逐渐向北部传播。继承埋葬土丘阶段的依次是埋葬土丘Ⅱ (又叫林地中期或霍普韦尔文化)、神庙土丘Ⅰ (密西西比早期) 和神庙土丘Ⅱ (密西西比晚期) 三个阶段。这个年代序列比派克斯序列更加庞大，它涉及的地域广、文化多。同时，这一年代序列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文化作以动态的描述。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福特的这一描述过于简单化，但整个发展序列以及序列提到的各种文化的划分都是正确的。几年之后，格里芬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他把东部地区分成古代、林地文化和密西西比文化三大阶段，但是对于文化传播他则持谨慎的态度。总之，福特和格里芬提出的年代序列为东部今后的工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美洲其他地区，如阿拉斯加、海地、加利福尼亚、阿根廷、智利等地，也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年代序列。

建立各地区的年代序列是这一阶段考古研究的主要目标，但是这时也出现了在各地年代序列基础上对全美洲进行综合的、跨地区研究的尝试。这种研究首先是从年代学的角度进行地区之间的比较，在比较中人们发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年代大体相同但相距很远的文化中有某种陶器在形态或纹饰方面十分相似。这说明早在史前时代，地区之间就存在着文化接触。有些人在研究文化之间的传播和贸易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由于这一阶段各地区和年代序列还没有绝对年代数据，因此很难确定两地区之间哪些文化在年代上是真正同时的而不仅仅是发展阶段相同。这使得有关文化间传播、贸易的结论无法得到证实。

对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的另一个成果是斯宾登在1917—1928年提出的古代期假说。当时盖米欧在墨西哥河谷进行的地层发掘所揭示出的年代序列给斯宾登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最下层的遗存（即后来命名为古代期的遗存）所代表的文化发展阶段是那样的原始：手制陶器，粗糙的泥像、简单的农业。但就是这种简单的文化在墨西哥河谷发展成为十分发达的提奥提华坎文明。后来斯宾登在中美的玛雅文明区、秘鲁、阿根廷和美国西南部都发现了这种简单文化（图七）。于是，他提出古代期时代的概念，在美洲中部地区广泛分布着这一时代。这一概念既包括了绝对年代又包括了发展阶段。这个古代期时代实际上就是美洲的新石器时代。他发现在古代期分布地域内，墨西哥河谷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表现的更为原始，所以他认为古代期起源于墨西哥河谷，然后向四周传播。后来的发掘表明，斯宾登所提出的古代期只是这一阶段的晚期，而且文化面貌也并不像他当时发现的那样原始。但是他的古代期



图七 美洲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阶段

时代假说是正确的。正是这个古代期奠定了美洲的农业和陶器的传统，后来的各个古代文明正是这个古代期分化、发展的结果。

第四章　考古学转变期

(20世纪40年代—6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学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与战后的世界格局和人们思想的变化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密切相关的。考古学也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从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手段的文化史研究进入对古代社会的重构与研究。这种变化在欧洲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的，与上一阶段联系紧密；在美洲变化则十分明显，与上一阶段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由两地考古学背景的差异造成的。同时美洲的矫枉过正导致了下一阶段形成更为激进的新考古学。

一、欧洲的转变

1．理论的发展

造成欧洲转变的首要原因是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它导致了考古实践方向性的变化。这一阶段站在理论前沿的仍然是戈登·柴尔德。他在这时期写了一系列综合性研究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影响着当时的考古学者，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在这些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类创造了自己》(1936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40年)和《欧洲文明的曙光》(再版)。

柴尔德提出，为了便于考古学文化的解释，考古学文化的

分析应该从两个层次入手。一是确定考古学文化结构的形式与功能，二是寻找导致考古学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样才能既描述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又能解释文化变化的原因。

有人评价柴尔德是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确，他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成名的。正是他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考古资料的模式，提供了确定史前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的模式。同时，这种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他提出的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为在考古上确定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可靠的、能够实践的标准，并成为其后几十年内考古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基本方法。这是继谢里曼用发掘证明特洛伊之后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新起点。他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分析的两个层次把描述性考古发展到解释性考古，揭开了文化过程研究的序幕，是考古学与人类学结合的新开端。这些导致了考古学发展方向的转变。在这一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农业革命专题研究的开始。人们开始按照柴尔德勾划出的发展模式去寻找新的证据。这些证据一方面来自于对原有遗存从新的视角的新观察，另一方面借助自然科学手段，增强人们认识考古遗存以及它携带的历史信息的能力。后者构成了该阶段又一重要内容。

2. 自然科学手段的进步

自然科学手段主要用于测定年代，勘测遗存和分析遗存方面。

（1）测定年代

测定年代的手段是这一阶段科技进步的重大突破。用格林·丹尼尔的话来说：“在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学中，没有什么比1949年利比发明的碳14断代法更重要了。”这种技术在五六十年代刚刚运用到考古界时，引起了极大的混乱。首先它提出了一系列很早的有关史前欧洲的年代。这些年代比蒙特柳斯和柴尔德等人用交叉年代法取得的数据要早得多。更重要的是埃

及原史早期的碳 14 年代数据与根据准确的文字记载所得到的埃及既定年代不符。因此碳 14 定年法似乎存在着什么错误。

1925—1950 年发展起来的树轮年代学解决了这个矛盾，使碳 14 断代学得到普遍承认和推广。树轮年代学首先在美国发展，那里巨型红衫的树龄有 3000 年，在俄国的诺夫哥罗德证明美国的树轮图表可适用于欧洲，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用树轮年代校正碳 14 定年奠定了基础。生长于加利福尼亚的刺果松使树轮年代学的测定年代扩展到 7000 年前，并证明碳 14 测定的年代并非像原来认为那样为实际历年。碳 14 年代与实际年代之间的出入是由于地球大气中碳 14 含量是不恒定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由费城的拉尔夫、图森的 C. W 弗格森和圣迭戈的休斯研究得出，并用曲线图表示出来，从而解决了碳 14 定年与埃及早王朝实际历年不符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碳 14 数据中仍然存在着经过树轮校正的年代（一般用大写字母表示）和未校正年代（一般用小写字母表示）；在未校正年代里有以旧的半衰期（5570±30 年）计算的数据，还有用新的半衰期（5730±40 年）计算的年代（前者乘以 1.03 即成为后者）。

碳 14 定年法的出现对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它把考古学者在年代学研究中解放出来，使得他们的视线能够看得更广，有精力去从事其它方面的研究。其次，^{14}C 定年数据证实了近东向欧洲传播的假说。最后，^{14}C 定年数据扩展了以往人们研究的时间框架，一直追溯到农业起源时代。对这一时代的研究，人们认识到了史前文化变化的缓慢，与历史时代完全不同。这些使得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性质。

其他测定绝对年代的方法还有钾—氩断代法、古地磁法和热释光，适应不同质地和不同年代的遗存的测定。

有关测定相对年代的方法，早在 1940 年就出现了孢粉分析测定年代，这时又发展出其它方面，如氮分析法、氟分析法

和铀分析法。

（2）遗址勘察

空中摄影的技术由于摄影机的改进产生出极为多样的方法，并开始采用立体镜观察大面积范围中完整的垂直覆盖区域。剑桥大学成立了空中摄影系。

这方面的杰出人物是约翰布雷德福。他在地中海中部担任过航空摄影照片的判读工作。他的著作《古代自然景观：田野考古学研究》（伦敦，1960）发表了他用空中摄影为意大利南部最早的农人、伊特鲁里亚人以及罗马军团百人队等问题提供的新证据。巴拉德上校利用现存的平面图和航空片查找出罗马人在北非建立的边墙，发表了题为《非洲的堑沟：罗马时代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建制之调查》的研究成果。罗杰·阿加舍的《高卢——罗马及中世纪原史时代遗迹的航空调查》（阿眠，1970）。在他的提议和合作下，阿眠科学院教育资料地区中心站出版《我国皮卡迪地区：皮卡迪的航空考古》一书（1971）；这部书有一份24张35毫米的幻灯片和一本带插图讲解及平面图的说明，向世界各地的学生展示史前和历史遗迹的航空调查图。

地球物理学的方法丰富了勘察手段。电阻测量法在近半个世纪中一直被土木工程师、地质学家、地貌学家所采用。1946年阿特金森首次把这种测量土壤导电程度的技术用于探查多尔切斯特（英国）地下的考古遗存。他向人们展示出如何利用电阻计调查地面上根本无法看出的建筑结构、坑穴和壕沟等考古遗迹。磁学方法于1957—1958年引进考古研究。哈尔德——美国工作队就是利用这一技术发现了锡巴里斯遗址。

1955年，卡罗·莱里奇在米兰创立了多种技术研究所，其中发明的一项技术是在未发掘的墓葬的墓室中插入一架带照相机的潜望镜，它可以拍摄整个360度角内的情况。1956年他在塞尔维特里和塔奎尼亚（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大墓地开

始使用这种技术，其效果大大超出了预期的结果。

（3）分析手段

在分析技术中，比较侧重对人工物成分、质地的测定，以确定它的产地、制造地区和贸易路线。用地质学方法识别岩石的技术自 1936 年以来在英国得到发展。利用这种技术对石斧的石料进行分类，以确定制作石斧粗坯的石器加工场的地点。对陶器的陶土成分的分析可以确定陶器的制造地点。对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支流哈布尔河附近的七个哈拉夫文化遗址的陶土分析表明，在哈拉夫文化早、中期，各遗址的陶器都是取自本遗址周围的陶土自己制造的。到了晚期，各遗址的陶器都是从当地的中心遗址恰加尔·巴扎尔输入的。伦佛儒和卡恩等人发展了黑曜石分析技术，以确定墨曜石贸易的出口地区。西亚新石器时代黑曜石产地的鉴定所划分出的黑曜石贸易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区的划分是吻合的，只是在边缘地区有交叉现象。

另外，这时在田野发掘中普遍使用一种利用系统的浮选法回收碳化植物遗存。发掘的遗址中的每个层位都使用浮选法回收遗物，为自然生态环境和农业起源以及经济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细小的动物和植物标本。

在欧洲出现了专门致力于科学方法在考古中应用的研究机构，如牛津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和米兰与罗马的莱里奇基金会，并分别有自己的杂志《考古计量学》（创办于 1958 年）和《考古学展望》。其它两种这方面的杂志是：《科学与考古学》，1970 年创办于英国，以及 1974 年创刊的《考古科学杂志》。这方面的概论性著作有 1947 年英国考古学联合会发表的《考古专用科学鉴定指南》，1970 年再版改名为《考古专用科学方法及科学证据手册》。

（4）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的萌芽可以上溯到 16 世纪意大利人在海底探寻沉船。到了 20 世纪初期，人们开始重视水下遗存，把地中海

底视为“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最早一次有组织的沉船调查是在突尼斯的马赫耶港由赤身潜水员在水下40米发现的一条罗马沉船，船内满载古代希腊的艺术珍品。这时的水下考古由于潜水条件的限制，调查时无法做精细的操作和记录。

1943年发明了潜水肺，二战后又改进了各方面的设备和条件，这才使真正的水底考古学得以成立。60年代以来，有库斯托（法国人）在马赛附近海底发掘沉船，接着是美国考古队在乔治·巴斯带领下在土耳其附近海底发掘希腊罗马时代和青铜时代晚期的沉船。乔治·巴斯用立体照片从摄影测量学的角度发展了沉船的绘图方法，并使用双人潜艇进行工作。

由于手段的先进和方法的发展，这时的水下考古不仅能够获得船中的许多古物，而且还为研究古代造船术、航海术、海上交通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水底考古学的对象从沉没物、沉船扩大到淹没于湖底、海中的都市和港市遗址，而勘察、发掘及摄影记录的手段和方法也在逐步完善。在斯堪的纳维亚，水下考古发现了几艘近代著名的船只，如1625年由古斯塔夫·阿多尔菲斯二世国王下令建造的“瓦萨号”船以及北欧的海盗船，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实例。

可以断言，水底考古学将成为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

3、各地考古发现与研究

（1）早期人类的发现与研究

B·李基在1931年开始了东非奥都威峡谷的考古研究，1951年他出版了《奥都威峡谷》一书，以总结1947年以前的工作。1959年，玛丽、李基在Ⅰ层中发现了类头盖骨，年代为175万年。

（2）考古遗迹成为人类共同财富

埃及在1955年，开始动工兴建阿斯旺水坝以及水库（纳赛尔湖）。水库将淹没位于埃及和苏丹之间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自古称为努比亚，在大坝以北扩宽尼罗河，也要威胁到沿

岸的许多古遗址。1959 年，埃及和苏丹两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援助要求。次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开始抢救这批文物遗产。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阿布辛贝尔与阿斯旺之间的 22 座神庙完整地移到较高的安全地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的负责人评价说："这是第一次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努力承担起文化事业中的这种工作，也是第一次各国政府使其国家理解了这种工作的意义。这也是第一次根据以下一种观念所作出的努力：某些宗教、历史和艺术的遗迹……属于全体人类，是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

（3）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

柴尔德在 30 多年前提出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和把近东作为最古老的文化区的预见，由这一阶段西亚新石器农业起源研究得以证实和发展。

在巴勒斯坦卡麦尔山附近的纳吐夫、耶利哥和贝哈遗址和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附近的沙塔尔遗址以及在两伊边界扎格罗斯山中部的沙尼达遗址、耶莫遗址和南部的阿利库什遗址揭示了这个环绕在两河低地的新月形地带从狩猎、采集向畜牧农耕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萌芽于公元前 1 万年至前 8 千年，从公元前 8 千至 6 千年普遍发生了这一变革，使农业村落得到普及。

这一农业起源区是人类最早的小麦、大麦、山羊和绵羊培育地区，这些动植物品种一直是这一地区以至整个欧洲的食物主要种类。它与东亚小米、稻作农业和中美红薯、玉米农业构成了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地，并且是这三大区中研究最详尽的地区，而且它对其它地区的影响也最大。例如现在根据碳 14 定年更加证明欧洲的农业就是从这一地区传过去的：巴尔干半岛出现农业在公元前 5200 年，中欧在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北欧则是在公元前 2800—前 400 年。

总之，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既有偶然的重大发现，又有根

据研究课题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后者比重较小，但有上升趋势。研究方面由于理论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课题。这主要是对史前经济和艺术的研究。经济研究成果有乔治·海曼的《史前经济通史》(1944年)、班迪的《瑞士的驯鹿时代》(1947年)、克拉克的《史前英国》(1940)。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克拉克的《史前欧洲：经济基础》。他提出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很新的，而是把非常细致的发掘工作与其他学科，包括地质学、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以及环境科学、实验室科学等非常密切地结合起来，尽量用各种不同的科学方式以及非常仔细的发掘来采集古代遗址里非常细致的动植物遗骸，并进行综合研究，以详细地反映古代居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情况，这就是他所说的经济基础。

同时人们开始研究史前的艺术，以便了解原始居民的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方面多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艺术，对于定居农业居民的艺术涉及很少。当然这只是对史前人类知识方面的一鳞半爪的认识，有些甚至只是一些主观猜测。

二、美洲的转变

美洲的转变比欧洲更加明显。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都在实践这种转变。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仍然是建立和完善各地区的年代序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美洲的综合研究。所以这一阶段仍然是上一阶段的继续。但是这种转变所带来的新趋势决不容忽视，它导致了下一阶段美洲考古学的彻底变革。

1. 发展中的新趋势

(1) 最初的不满

早在30年代后期，一些考古学者已经对美洲考古学只研究年代序列的局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例如斯特朗在1939年

发表的"人类学理论与考古学现实"一文中指出：考古学与民族学应努力理解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他还用他在内布拉斯卡进行直接历史法研究的事例说明，民族学理论对考古学研究有很大的潜在的价值。马丁也赞成斯特朗的观点，并在 1938 和 1939 年发表的两篇西南考古遗址报告中，利用当地民俗学资料解释史前皮布罗遗址之间在规模和内涵方面的差异。

人类学家也对考古学提出批评。斯特瓦德（steward，J.H.）一直研究北美大平原的民族学材料和考古资料。他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还非常狭窄，没有掌握更重要的目标。考古学课题有许多方面与民族学是一致的，例如不仅要搞清文化在时空框架上的位置，还要了解文化的变化。考古学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把握自己研究的考古学文化。就是说，不仅要注意镞的形状或陶器纹饰，还要了解该文化的生存基础，还要通过考察物质遗存和聚落形态了解当时的人口规模。他主张从考古学的和民族学的聚落资料出发研究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美洲考古学产生很大影响。

克拉孔（kluckhohn，C.）在三四十年代参加了中美洲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年代序列问题。但是他以一名社会人类学家的眼光对当时的考古学作了评价。他认为考古研究只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和所涉及资料本身，缺乏理论和概念。当时的理论只是一些猜测，诸如对文化的稳定性、传播的机制以及人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假设，都是未经检验的。他在 1940 年发表的"中美洲研究的概念结构"等文章中对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方式和目标提出意见。他列举了当时传统的古器物研究的代表作——一篇英国有关研究"三个齿的叉子起源"的冗长论文，他对这种繁琐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对三个齿的叉子作如此深刻的琐碎的研究，对于历史有什么贡献？知道了三个齿叉子的历史对于我们的一般知识有什么增进？他认为现在应该重新明确考古学的目标及收集和发表资料的目

的。他提出考古学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历史的"方向，研究每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以及它们的特性；另一个是"科学的"或叫"比较的"方向，从发展趋势与共性的角度研究资料。他认为目前的中美洲考古只向第一个方向发展，他提倡第二种发展方向。尽管他承认第二种发展方向是以第一种为基础，即这两种方向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阶段，但是他也承认为"历史的"研究方向所收集的资料很难进行"科学、比较"方向的研究。

这一阶段比较全面地评判考古学现状的是泰勒（Taylor, w. w.）。他在 1948 年的博士论文"一个考古学的研究"中不仅尖锐地批评了考古学的现状，而且提出了位置联系与功能研究的新方法。他同克拉孔一样，也将考古学分成"历史的"和"科学的"（或叫人类学的）两个层次。但是他认为这是考古学发展的先后阶段，而不是同时并存的两个方向。他在文章中对美洲当时杰出的考古学家、地层学革命的领袖基德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基德尔的田野工作和报告只局限于年代比较，没有通过发掘来复原过去的生活。他在派克斯遗址对陶器进行研究时，只注意陶器上是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不去分析该遗址陶器的构成以及相互关系。他对玛雅文明的研究不注重聚落形态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意义。连基德尔本人也抱怨说，30 年来的研究竟然没有搞清玛雅低地是否有城居现象，也不知道普通人的住房形式和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泰勒认为基德尔只注重陶器研究，这种研究只局限在年代序列上，忽视了陶器的功能。除此之外泰勒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在其他地区从事时空研究的专家，如从事玛雅研究的汤普森（Thompsom），西南地区的豪利（Haury）和罗伯特（Robert），以及美国东部的威伯（Webb, W. S.）和克里枫（Griffin, J. B.）他非常赞成 40 年代各种从事功能研究的企图，如马丁（Martin）、威德尔（Weclel）、孝内特（Bennett）等人。

泰勒与其他的批评者不同的是，他不仅在“破”，而且试图“立”。为了改进考古学方法，他提出一种“缀合法”（Conjunctive approach），即把所有考古发现的现象，即原来是有机联系的现象，但现在又被分散开来的零零碎碎的现象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年代学与功能联系起来，把人工物及特征的研究与其他人工物及特征联系起来。例如，在研究中发现大贮藏罐的数量急剧减少可能暗示不需要贮藏水了，于是就应该动手寻找证据以证明气候可能发生了变化，降雨量增多了。再比如发现防御性设施的增多，就要注意投掷器等其他武器是否也增多，这就说明这时期战争的频繁。泰勒提出应当注重文化模式，因为在其中可以找到各种遗存之间功能上的联系。有时两地同一种人工物在制造者和使用者心中的功能是不同的，这可以从这种人工物特征和出土地点的比较中看出。但是究竟是什么功能，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所以泰勒说，考古需要推测，尤其是研究文化的非物质方面，推测使考古这门学科永远充满活力。

泰勒的这篇论文在当时考古界中引起极大反响。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纯属一派胡言，还有些人认为他的观点太理想化了，大大超出了考古资料所能做到的研究能力；还有些人感到在实现泰勒的所谓“人类学”的研究之前，时空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对当时考古学有限的研究课题不满，这些人佩服泰勒的批评勇气。尽管对泰勒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占多数，但是他的话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后来的新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2）研究人工物反映的人类行为

在对当时考古学的批评中，人们主要有两点不满。第一是应当说明考古遗存反映了什么样的人类行为；第二是应当注意文化发展的过程。这一阶段人们首先是试图解决第一个问题。

通过人工物能够了解人类行为，这是因为文化不能简单地

被看作物质实体，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行为的形态，这个形态是由该社会人们代代相传的传统所制约的。马丁通过民族学研究了不同文化之间类型的差异是否代表这两个文化之间的区别，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在原始社会，人工制品在风格上的差异与其制造者心中认定的这种差异所代表的意义之间的差别是相等的。同理，随着时间推移人工物变化的程度与创造该文化的人们所在的社会的变化程度是一致的。

从人工物来了解人类行为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人工物出土的位置、环境（Context）来确定遗存的功能，从而说明人类行为，这种行为主要是人工物的使用行为；二是通过类型学寻找当时制造者和使用者心中的分类，来了解人们的行为，这主要是制造行为，同时也不排除使用行为。

对于遗物功能的研究在人们对古物发生兴趣时就已经产生了。识别一件石器的用途为石斧就等于把遗物与人们的行为联系起来。但是从遗址中的全部发掘品来考察它们的功能是从这一阶段出现的。例如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克尔（Cole，F. C.）和迪尤尔（Deuel，T.），在 1937 年发表的《伊利诺的再发现》中，把一个单一时期使用的遗址或一个遗址的某一层的全部遗存列在表中，按功能进行分类，如“建筑——居住”类、“农业和采集”类、“军事和狩猎”类等。苯内特在 1943 年发表的“考古资料的功能解释的进展”一文中正式提出“功能考古”这一术语。在前哥伦比亚后期的美国东南部普遍流行一种铜或贝质的遗物，苯内特在对它的形状、质地和出土点的研究后，把这种遗物解释成宗教佩带物，是地位和权力的标志。苯内特在这项功能解释中不仅着眼于微观的某个遗址的出土位置和环境，而且还着眼于宏观的跨遗址、跨文化的出土位置和环境。1944 年林顿（Linton，R.）发表“北美的炊器”一文，他研究了林地文化普遍流行的一种长形圆底粗陶罐。他从器物的形状等特征和它出土的分布区分析，认为这是用于炖肉的炊器，是

狩猎居民使用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民族考古学的证实：从事农业经济的文化中没有这种陶器。苯内特还研究了中美洲对美国东南部的文化影响，他通过文化特征的比较确定了文化因素的原产地、传播路线和接受地点。从这里他发现，接受者并非接受所有传来的文化因素，有些吸收，有些则拒绝。苯内特从功能的角度讨论了各种文化因素被吸收或被拒绝的原因。

文化间的传播与吸收不仅从功能角度进行研究，而且还从发展过程的角度进行探讨。威利（Willey, G. R.）在 1953 年发表了“传播——吸收形态”，就是从文化接触现象讨论发展过程。他利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一种文化因素在另一个文化区内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这种文化因素在另一文化区内独立存在，其次是这种文化对另一文化区间断地影响，最后是另一文化区中融合了这种外来文化因素。1955 年威利又发表了“文化接触情况的考古学分类”一文，他将不同的文化接触情况归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遗址为单位的影响，例如该遗址或遗址中某些单位发现了外来文化的遗存与本文化的共存；另一类是以特征为单位的影响，即两种文化的特征共存于同一件遗物上。

通过类型学寻找当时制造者和使用者心中的分类，是了解人类行为的另一个途径。1939 年罗斯（Rouse, I.）在发表的论文“海地的史前史——一个方法论的研究”中提出一种设想，即设计一种对年代和功能都敏感的类型学。他的研究重点是人工物的质地和形状，复原人类的制造行为，而不像马丁那样把组合和位置作为研究中心以探讨使用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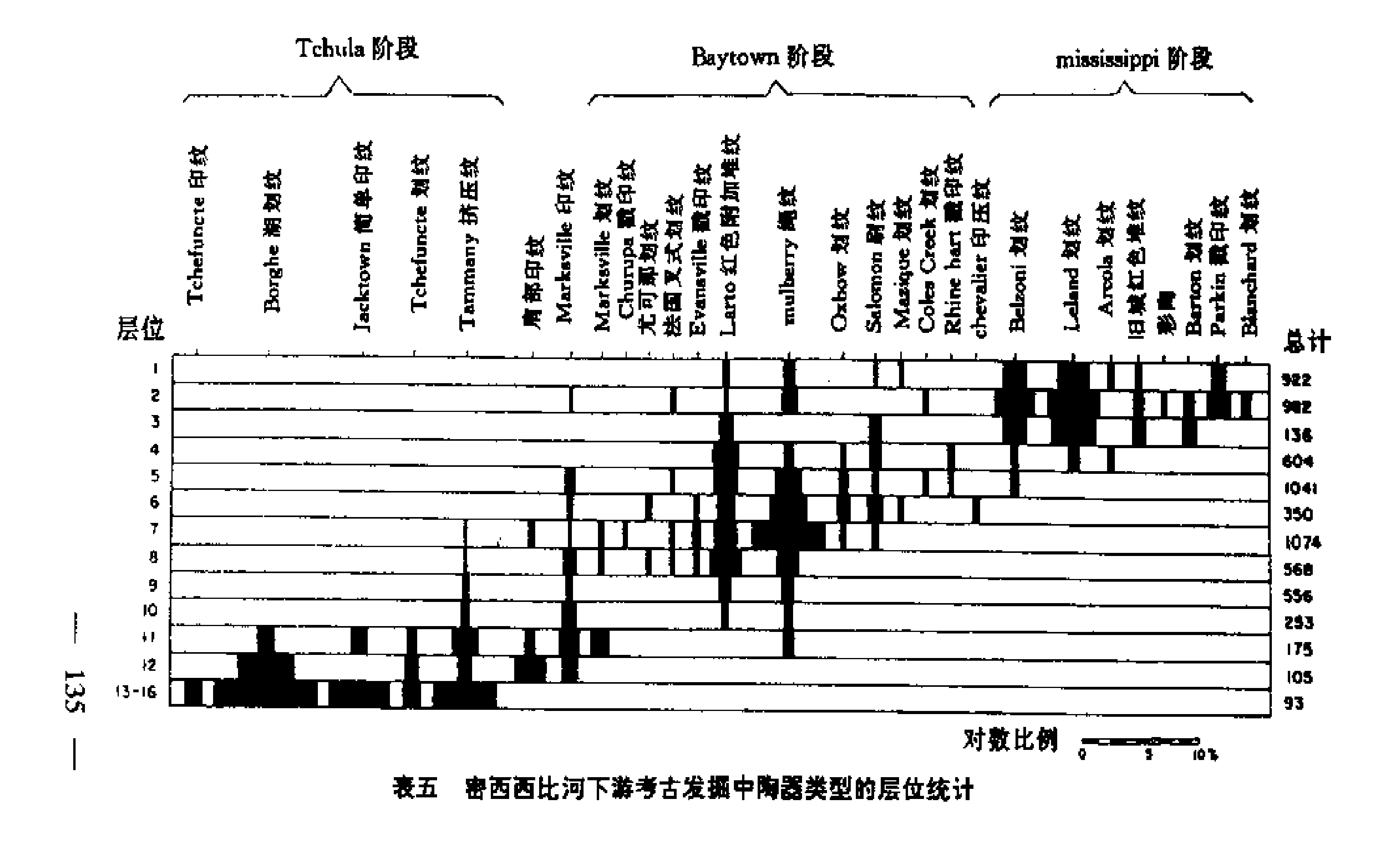
在如何从事类型学研究以了解人工物功能从而复原人类行为方面，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以福特（Fod, J. A.）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类型学只是为了进行年代学研究，因此类型实质上是分类者强加给资料的，因为分类的标准是主观的。他对密西西比河下游考古发掘的陶器作了出现频率百分比表，各种陶器类

型按层位统计，是“福特派”的典型之作（见表五）。

以斯包丁（Spaulding，A. C.）为代表的另一派反对福特的看法。他认为类型是在遗存资料中发现出来的。斯包丁批判地分析了福特在1952年发表的“美国东南部一些史前纹饰发展的测量”一文。福特在这篇文章中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陶器与佛罗里达西北和得克萨斯东北的同类陶器进行了比较，并根据典型遗址的地层和遗址间的排比得出了相对年代序列。这种排比仍是以每一种类型出现的百分比的单峰曲线为基础的。这种年代序列反映了陶器类型从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时空的变化。因此福特所谓的“测量”就是观察类型、时间和空间这三个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样做才能提供考察长时期内文化变化的基本原则、原因、速度、不可避免性以及数量等方面的基本资料。但是斯包丁认为，福特在“测量”文化发展变化中使用的人为的单位，切断了变化过程中内在的连续性，因此应该发明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他在1953年发表的“发现人工物类型的统计学方法”一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发展并不是平稳的、连续不断的，而是“成群的”、“不规则的”，有时突起，有时相对静止。这种现象通过统计分析是可以观察到的。分析将揭示特征以及相互组合的多样性。这种特征的组合就是类型。由于这种类型是被发现的，是真实的，因此这种类型能够比人为选择标准划分的类型告诉考古学者更多的有关人类行为的信息。

（3）聚落形态研究

这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另一种新途径。在40年代以前，美洲考古学很少注意聚落形态。当他们绘制地图时，只是注意了遗址的地点以及周围的地貌特征，而从未分析过这个遗址在整个区域的定位和遗址内各个遗迹的布局。1946年，斯特瓦德鼓励威利去秘鲁的维鲁（Viru）河谷从事聚落调查和分析。选择维鲁河谷从事这项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这里考古工作开始很



表五　密西西比河下游考古发掘中陶器类型的层位统计

早，这里已建立了一系列年代序列，了解这里各种文化所反映的人类行为已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因为这里年代研究的发达为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聚落形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维鲁河谷的各个阶段中，维鲁地区各个聚落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分别起着什么作用。

聚落形态研究首先要准备一张详细的地图，包括河谷的各个地区，航空摄影为地图的绘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通过徒步调查核实地图。遗址的断代是通过对一些遗址的发掘和对遗址地表采集中的分析确定的。

威利认为，聚落形态是人们在地形中选择自己居住位置的方式，它涉及居住房屋以及相互间的布局，还有和社区内其他功能建筑的关系。它反映了自然环境、建筑技术和社会关系与结构等等。聚落形态是文化需要的产物，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功能解释的出发点。聚落形态的单位有不同的规模；最小的是单个建筑，包括房屋、作坊、谷仓、祭室等等；再高一级的是一个聚落里各个建筑或遗迹之间的关系；最大的是聚落与聚落之间在一个比较大的面积里彼此之间在空间上的关系。这种研究提供了把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当作人类社会和文化活动来研究的具体作业的一个框架。

威利首先将所有遗址标明文化属性和年代，然后再按功能分成有房址和垃圾的居住址，具有明显的礼仪或公共事业功能的金字塔式土墩，具有公共事业——宗教功能和居住功能的金字塔——居址混合体、墓地和城堡。通过各类遗址的年代比较可以看出每种功能的遗址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其中居住遗址和宗教遗址可以追溯出 1500 多年的历史演变。而不同时期该地区的各种功能遗址的构成则说明，随时间发展遗址构成方面的变化。最后，威利在聚落形态研究的基础上从居址到人口乃至当时的社会政治组织做一大胆的理论方面的讨论。

威利对维鲁河谷的研究是这一阶段聚落形态的代表作。其

他一些聚落形态研究，有些侧重于细心地描述遗址及其分布，有些讨论位置与功能的联系，还有极少数人大胆地讨论了聚落形态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

这时还有一种把民族学与聚落形态联系起来的研究。例如1958年张光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社会群体的研究：来自新大陆的例子”。他根据旧大陆民族学材料建立了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和聚落形态之间的联系，然后把这些联系用于新大陆的聚落形态研究中，从而讨论这些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组织。这是因为考古学家应首先对社会群体诸如家庭、社区和社区集合体具有明确的定义，而不应该根据物质特征的时空变化来确定考古区域，因为文化特征脱离了所在的社会环境没有任何意义。他这种社会划分先于考古研究的方法，虽然有许多人提出异议，但这也说明了美洲考古长期局限于年代学因而没有掌握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形态。

在聚落形态研究的开展基础上，1956年召开了“社会形态的功能和进化含义”的研讨会，会上对各种社区按聚落形态进行了分类，包括定居的，也包括游动的。分类是通过比较得出的，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并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学资料进行比较。然后对各类聚落形态的功能意义以及它在进化道路上所处的阶段作以分析和解释。这次研讨会是对当时聚落形态研究的很好总结，并使这项研究向更高的研究文化过程的阶段发展。

（4）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之前，美国考古中很少注意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这主要是受人类学影响的结果。在以鲍厄士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中，反对把自然环境作为文化发展的原因来看待。欧洲大陆则很早就注意到自然环境的变化。早在沃尔赛用地层来证明三期说理论时，就发现了植被的发展变化。英国的福克斯和克劳福特在地理学的影响下也一直从事着自然环境和地貌方面

的研究。在美洲，只有特殊的遗址如贝丘遗址才收集非文化遗存，其目的是对自然环境作以简单的描述。但同时也有个别研究把自然环境的变化作为文明兴衰的直接因素，例如在研究玛雅文明突然消失的原因时，干旱、地震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常常被提到，但是还缺少考古资料来证实。

在这一阶段，对文化进行功能解释以便了解人类行为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复原文化所在的自然环境，把环境作为文化所在的背景来理解文化，便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最早对环境进行复原的是威德尔在美国大平原的工作。他试图从环境背景中（尤其是气候条件）来理解人们的生存活动。另一项研究是豪利在亚利桑那的一个洞穴的工作。他运用了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手段复原了这里的史前环境。约翰逊（Johnsor，F.）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遗址（Fishweir）所进行的自然环境复原利用了考古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动物学和花粉孢子分析等多种学科。吉福特（Gifford，E. W.）等人在加州贝丘遗址的工作尤为出色，他们根据贝丘垃圾的数量与重量推算古代的饮食，进而推测当时的人口。

以上的研究都是侧重对自然环境的全面复原，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化。斯特瓦德的研究则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把自然环境作为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来研究。在聚落形态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自然环境的研究中他也有两个重要的贡献：一是文化生态学，二是多线进化论。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他的文化生态学观念出自他对内华达州肖肖尼人的研究。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也就是说，劳动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的技术和正在开发利用的资源的性质。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什么比劳动更具有社会性和交往性，对人们生存而言，也没有什么比从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更为至关重要。因而，这种由技术和资源所决定的劳动类

型必然会对社会的其它方面，诸如居住法则、血统、村社规模和位置，产生强烈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在评论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时说：“这是功能主义的一种简单应用。这种理论并非是某种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因为斯图尔德认为技术乃是历史所衍生的，环境的关键部分是资源。通过文化认识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源，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理论。”①

斯图尔德通过比较特殊自然环境中特殊文化的发展，发现文化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在美洲首次提出自然环境对文化影响的方式。正是由于不同自然环境导致文化不同的技术手段、劳动类型，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多线进化的模式。1949年斯特瓦德发表文章——“文化因果关系及规律：一个早期文明发展的系统阐释的尝试”，这是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成果。1955年他出版的文集“文化变化理论”，对美洲考古影响很大。他按照威特福格（Wittfogel，S. K.）“水力国家”假说的思路，注重灌溉与文明的关系。在南美洲的考古研究中他提出了“环加勒比海”假说，这不仅引起了争论，还引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反驳意见。

同斯特瓦德同时的另一位人类学家怀特（White，L. A.）在1949年发表了“文化的科学”，但是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对考古学影响较大的倒是他的学生梅格斯（Megges，B. J.）。她在“文化发展中环境的局限性”一文中对环境决定论提出怀疑，讨论和区分了几类不同的自然环境，这些环境可以促使或阻碍文明的形成。这篇文章当时遭到激烈的抨击。其实除了个别例子有误差外，文中有许多重要见解。而她在田野工作中证实了有关进化和环境学说的一些假说。

---

① 罗伯特·墨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迺基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总之，这一阶段人们越来越关心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把理解自然环境作为文化功能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只有到了下一阶段，文化与环境之间才形成了一个系统，并把这种动态系统看成是文化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寻找环境在文化进化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这一阶段的新的发展趋势是由一些学者对于单纯年代学研究现状的不满而引起的。他们对考古学的批评导致了考古学发展方向的转变，即考古学者不但要研究文化和遗存的年代，还要通过了解它们的功能复原人类的活动。于是出现了从出土位置和环境以及类型学方法对人工物的研究、聚落形态和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使人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到遗存背后的人类行为。

2. 自然科学手段的发展

这一阶段另一个变化是考古学家开始普遍意识到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界应用的广泛性和它带来的学科变革。上文已经提到航空摄影在聚落形态研究中以及调查遗址中的作用；地质学、动植物学和花粉分析是自然环境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类型学研究中，人们开始借助于统计学方法。于是考古学家开始关注那些能够帮助考古学的学科，诸如物理学、化学、环境学、生物学和数学，并主动向这些专家请教。

但是这一阶段自然科学引起考古学界巨大变化的还是碳14定年法在50年代的广泛的应用，首先它使传统的年代序列研究更加精确：它表明人类最初到达美洲是在1万多年以前，同时它还告诉我们在到达美洲的早期人类和后来北美的定居文化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缺环。在大平原地区，碳14定年法帮助杰宁斯（Jennings, J. D.）建立了一条长达1万年之久的年代序列：从不毛之地的游动居民到假说中长期存在的荒漠文化。在中美洲，碳14定年法证明了神秘的奥尔梅克文化比玛雅文明早几个世纪，为中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

料。在年代学研究中，碳 14 定年法不仅可以排定不同文化之间的年代序列，而且可以确定它们的时间范围。

这种方法还帮助了美洲考古学的转变和向下一阶段的发展。首先，这种方法的使用使考古学家不再集中全部注意力来研究年代了，他们开始研究遗存反映的人类行为，并提出："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其次，由于这种方法建立的年代序列有确切的绝对年代，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观察文化的进化，可以研究在相同的或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文化变化的速度；并且可以对比某一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各种文化，以便观察引起文化之间相同和相异的因素并提出假说。尽管有人怀疑这种定年方法的准确性，但是这种方法已经对世界考古和美洲考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他定年的方法有年轮法（主要在美国西南部）、古地磁法、黑曜岩水合法、骨头中含氟量测定法等等，这些方法都适于不同的遗存标本和不同的年代范围，可以相互补充、验证。地质学年代对考古学也有很大帮助。一些考古遗址、尤其是早期人类遗址，通过地质地层、冰期沉积、气候变化等方法建立了年代并解释地层的形成。

3. 年代学和时空综合研究的继续

(1) 各地的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的发展主流仍然是年代序列和地区范围内的时空研究与综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洲考古(尤其是美国)又有了很大发展。这主要是公众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战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使考古发现成倍地增多。例如仅在 1945 年的"抢救性考古"中就发现了上千个史前遗址，遍及整个美国。

战后考古工作的进展使我们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美洲历史。关于早期人类，已发现上百处重要遗址。碳 14 定年说明北美普遍流行的带槽投掷尖状器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后者是前者发展成的一个分支，最晚可延续到公元前 7000 年。关

于这一阶段的研究，人们就是否存在比尖状器时代更早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认为存在“前尖状器时代”的学者的观点是，最早的克洛维斯尖状器不见于亚洲，它应当是从亚洲来的早期人类到达美洲后逐渐形成的，因此就有更早的“前尖状器时代”。

从公元前 7000 年以后至前 2000 年，美洲进入“古代期”，或叫中期印第安人。50 年代以后这一阶段的考古证据不断增多。这时的生存经济有狩猎、渔猎和采集。这一阶段人口明显增多。由于经济生活的变化，生产工具也在逐渐变化以适应新的采集经济活动，磨制石器逐渐增多。

公元前 2000 年以后的考古情况与更早阶段的相比，有很大不同。首先是遗址数量成倍增多，年代连续紧密，地域性特征明显，所以要按地区来介绍。

南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要研究重点是秘鲁的印加帝国，并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年代序列。这时，这个年代又向更早的年代推进，从海岸拾贝渔民和最初的园艺居民追溯到更早的狩猎和采集者。这一转变从堆积较厚的遗址中出土的食物遗存和共生的人工制品中清楚地反映出来。通过对沿岸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开始探索这一地区城市形成的过程。通过对最早的陶器文化——查文文化的陶器演变序列的研究，搞清了无陶文化向查文文化的过渡。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是介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的中间地带，这里的研究对两地文明研究的深入有着重要意义。厄瓜多尔在这阶段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地层发掘和综合工作，揭示出漫长的陶器发展序列，这个序列的开端在公元前 3000 年，比秘鲁和中美洲的陶器还要早。哥伦比亚也进行了一系列地层发掘。从这两地反映的文化特征来看，它们与中美和秘鲁文明的文化风格有较大差异，这主要表现在陶器风格上，其次很少有大型公共或礼仪建筑，说明城市聚落的发展比较落后。但是这

里人口密集，手工业如制陶业和冶金业发达。这应当是反映了比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次一等级的文明，说明了文明时代的聚落等级。

环加勒比海地区的研究扩至委内瑞拉和亚马逊河流域。这里不仅建立了各地区的年代序列，而且从陶器研究中还建立了与秘鲁和厄瓜多尔的联系。60 年代开始对巴西东部以及大西洋沿岸一系列贝丘遗址的发掘，建立了从公元前 3—4 千纪直到公元后 1 千纪的年代序列，并为这一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南美南部的阿根廷和智利的考古也有很大的发展，阿根廷西北部一系列洞穴遗存的地层发掘建立了这一地区的年代序列，并在此基础上与智利北部根据陶器演变排列的年代顺序进行比较研究，建立更大地域规模的年代序列。

中美洲仍是新大陆考古研究最发达的地区。这一阶段不仅在前古典期和古典文明各阶段有一系列重要发现，而且在研究中向年代序列和功能研究两个方向发展。在前古典期研究中。麦克内什（Mac Neish）有一系列重要发现，揭示了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和前陶文化的发展序列。在古典早期发现了奥尔梅克艺术风格，40 年代推测它应是很早的一种文明。后来的碳 14 定年法和地层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美洲发现的最早的文明，广泛分布在中美洲南部，年代约公元前 12000—前 8000 年。玛雅文明的研究一方面在 60 年代在文字释读中取得了新进展，了解到有关政治组织的王室世系的新史料；另一方面对早已发现的提奥提华坎城的规模及各部分的功能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了解到它对当时中美洲的商业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在古典文明晚期的工作主要是探讨了玛雅低地在公元 600—900 年时与中美地区其他文化的关系。

北美考古最发达的地区仍然是美国西南部，这里最先开始了大规模的地层学发掘和年代序列研究。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

问题是这里与南面的中美洲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皮埃布罗和沙漠农人这些陶器农业文化的起源。碳14定年法已经证明这些文化与早期人类之间有很长的时间缺环，而所谓的中期印第安人文化恰恰处在这段时间内，因此对中期印第安人文化的研究就成了寻找陶器农业文化起源的主要问题。

美国东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对陶器农业阶段的霍普韦尔文化的研究已由类型学转入对文化的全面复原。在探讨它的起源时，早于它的中期印第安人文化也成为研究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发掘工作都集中在大平原地区的流域附近，大多属于抢救性发掘，这些大量的新资料使威德尔研究大平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可能。

更北部的加拿大从40年代才进入了自己的考古黄金时代。在此之前，这里连年代序列都不清楚。位于美国中西部和西北部的加州、大盆地、西北沿岸及高原的考古内涵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不是农业文化，而是广泛分布着从事渔猎和采集经济的文化。这里的考古学者以时空框架为基础，研究文化的变化以及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等课题。

亚北极地区的考古是从这一阶段才开始的。通过一些发掘，考古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地区的文化的起源以及传播方向上。这一地区既受北美古代文化（即中期印第安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北极文化的影响。北极地带的考古是从建立爱斯基摩人的年代序列开始的。研究表明，早于猎取海象文化的是分布十分广泛的北极小工具传统文化，它流行琢制细石叶，这种石叶是亚洲中石器时代传统的继续。

（2）研究方法的发展

这一阶段研究方法的发展体现在三个概念的提出：时代风格、文化传统和文化阶段。

时代风格是1949年克罗勃提出的。它们是“在某一广大地区存在的一种明确的、特有的特征，它们与当地的地方风格

有联系，这种联系包括主次、共生或继承联系”。例如秘鲁的查文时代风格、亚瓦纳科时代风格和印加时代风格，它们都被反复证实过。（同理，中国黄河流域的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普遍的时代特征也是时代风格。）还有一个与时代风格含义相同但范围较小的概念——时代标志。例如地纹彩陶和红地白彩陶。这种时代标志主要反映的是技术上的差别，而不是传统或观念上的差别。区分时代风格和时代标志是有意义的。从功能角度看，传统高度复杂的观念和简单的饰彩技术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但“风格”与“标志”有时很难确定。

文化传统这个概念是1945年威利在考古中使用的以便与时代风格相对应。时代风格强调的是一组复杂的因素（风格）在较大的地理范围和较短的时间内的传播，而文化传统则是强调某种文化特征在同地区内较长时间的延续。威利只使用了陶器传统概念。他认为一种陶器传统包括了陶器在技术和装饰范围内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一条或若干条线索。在陶器有明显变化的几个连续阶段中，某些风格从传统中孕育出来。其中的一些风格由于广泛传播而形成时代风格，另一些风格则始终保留在当地成为文化传统。例如秘鲁的陶器传统主要表现在它特有的制造方法上。文化传统是一种历史的、遗传的概念，很像生物学中的基因。这一概念对于划定文化区（即有固定文化传统的地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时代风格和文化传统的结合作用，对于分析陶器特征的意义，确定陶器之间的年代与谱系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文化阶段的概念出现的很早。丹麦人提出的三期说和人类学家蒙昧——野蛮——文明的三段论都是使用了文化阶段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在美洲的使用是从斯特瓦德开始的。他在编辑《南美洲印第安人手册》一书时，涉及了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要把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资料组成一个有意义的体系，他采用了文化阶段这个概念来组织材料。用文化阶段

概念来控制全美洲考古资料的是威利在1955年发表的“历史发展解释”一文和1958年《美洲考古的方法与理论》一书。威利一方面受到斯特瓦德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地的研究现状已具备了使用这一概念作跨地区的研究的条件：美国西南早在上一阶段就已提出具有发展阶段意义的派克斯文化分类方案，东部地区、秘鲁和中美洲也具有相同性质的文化序列。根据这些成果，威利将整个美洲大陆划分为五大文化发展阶段，代表了当时全美最高的综合研究水平。

（3）全美范围的综合研究及洲际研究

在这一阶段初期，跨地区的综合主要是对各地区进行年代方面的描述和总结。一个典型的成果是马丁等人于1947年发表的《前哥伦比亚时期的印第安人》，这本书的意义是按地区介绍了考古发现的年代顺序，它没有打破地区界限进行综合比较研究。1950年和1955年弗劳（Frau，S. C.）的《美洲史前史》和《美洲的史前与文明史》也是这种综合成果。但是这种研究尚处在跨地区资料汇编的水平，还未达到真正的综合。

50年代以来碳14定年法的普及使不同地区的文化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可以从文化传播和发展阶段的角度看各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综合打破了地区之间的界线，将文化史和进化发展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1968年出版的《北美史前史》（吉宁著）和1966年以来出版的《美洲考古学概论》（威利著）。这两部著作是大学的教科书和基本参考书，前一本偏重历史与阶段的结合，后一本遵循了历史——谱系的模式。威利在综合研究中，将美洲分成：1）石器期（古印第安人和其他早期人类在美洲定居的开始）、2）古代期（后更新世狩猎采集阶段）、3）形成期（定居与农业聚落）、4）古典期（城市发展的开始）、5）后古典期（帝国时代）。

美洲与旧大陆的联系集中在二点：一是旧石器时代的联系。这一工作是从前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发现开始的。现在普遍

的看法是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从亚洲传到美洲，在美洲发展成一种双面打制石叶的技术，最后出现了富有特征的克洛维斯投掷尖状器工艺。亚洲的中石器特征是从北极传到美洲的。第二点是关于前哥伦比亚时代晚期美洲与亚洲的联系。人们对于穿越太平洋进行文化接触的说法普遍持怀疑态度。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凯尔登（Gelolern R. H.）坚信，中美洲和秘鲁文明的兴起是亚洲文化穿越太平洋对其传播的结果。大多数考古学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现在在亚洲很难找到年代相近的美洲文明的祖先，两地相似应是分别独立发展的结果。但是与中国商周青铜器文化同时的查文文化确实有与中国十分相似的石雕和陶器。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梅格斯等考古学家在厄瓜多尔沿岸发现了这一地区最早的陶器——瓦尔蒂维亚（Valdivia）陶器类型（公元前3000—前2500年）。这种陶器的器形与纹饰都与同时期的日本绳纹陶相似，两地都是渔猎经济。因此发掘者推测，日本绳纹陶居民曾借着太平洋的海潮来到厄瓜多尔沿岸，将他们的制陶技术和渔猎方式带到这里。这些发现和假说并没有说服大多数考古学家承认这种文化联系，他们仍采取观望的态度等待更多的证据。

总之，这一阶段是一个转变时期，从狭窄的年代学研究转变到丰富的历史联系与过程的探索中去。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从陶片等人工物所反映的年代扩大到以遗址和遗物群所反映的社会行为的联系、文化结构和自然环境背景。在这些研究中，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但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对遗存功能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这些研究将帮助考古学家了解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的古代社会，并为探讨文化变化的原因准备了条件。

这时的时空框架研究一方面向着更细致更完善的地区年代序列发展，另一方面又向着更大规模的综合发展。这种综合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为探讨文化发展阶段和原因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　考古学发展新时期

60年代以来，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出现了新考古学派，新的理论与方法，这使考古学界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分歧与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对立的双方各自反省自身并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从而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丰富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加强了学科自身建设，出现了融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古学体系。这一时期以70年代末为界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新考古学派出现为标志；晚期是对新考古学派的反思，也有人称作“后过程考古学”。

一、新考古学出现时期

（20世纪60—80年代）

（一）美洲新考古学的兴起

1．进化论的复兴

要理解和评价新考古学，必须首先明确它产生的历史背景。进化论的再现是新考古学形成的重要理论前提。

早在本世纪初，以著名学者鲍厄士为代表的人类学家用文化相对主义（或叫历史独立主义）来反对进化论。他认为：经典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文化是自成一格

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己独有环境的产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一种文化的发展趋势，只能从该文化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①]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洲考古学家在本世纪初开始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进行重新归纳和总结，而拒绝用旧大陆的发展模式套用美洲的考古资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考古学家揭示了美洲各地的文化发展序列，威利对全美洲的发展阶段总结又一次证明了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决定社会性质的因素是生产方式。人类的文化是多样的，但是生产力水平是可以比较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是普遍的、共同的，由低向高不断发展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从不排斥历史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威利对美洲历史五大阶段的划分，从客观上已经承认历史发展的进化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进化论从历史中抽象出来，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方法是进化论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承认了历史决定论；另一方面也说明把进化过程从它的历史母体中抽象出来是十分困难的。

考古学中进化论的复兴是人类学影响的结果。在上一阶段，人类学中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斯图瓦德已对考古学有所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这一阶段。他把发现文化的规律看成人类学最终目标。在具体研究中，他使用进化论和文化生态论，在不同文化序列比较中（埃及、两河流域、中美洲、南美洲、中国的序列）提出了多线进化的模式。他的研究方法是对当时在人类学中占主流的反进化论思想的反应。他认为，目前人类学家之所以普遍反对进化论，是因为他们反对摩尔根等早期人类学家的过于偏激，以至于在倒洗澡水时把婴儿也倒出去了。如果 19 世纪的理论有错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目标

---

① 《原始人的心智》第 106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不客观或不切实际，而是因为当时资料不充分，方法不完善，而涉及的面又太广泛了。

由此可以看出，新兴的进化论与19世纪的进化论是有区别的，它克服了19世纪经典进化论中简单化、忽视文化多样性的缺陷。进化论的再现过程经历了否定进化论——否定反进化论的否定之否定的两个阶段。这两次否定都是扬弃的过程：每一次否定都克服了自身缺点，使之更加完善。所以新的进化论是在承认人类发展进化规律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多线进化论。

在多线进化理论基础上，著名人类学家怀特更加强调在多线进化轨迹中仍可以划定一些范围较宽的普通发展阶段，强调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许多学者都以埃及法老阿赫那吞宗教改革为例，说明个人可以改变历史。怀特则认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所有个人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小舟。阿赫那吞崇拜阿吞神为惟一的神，这只不过是在王权与祭司贵族之间的斗争中采取的一种策略。如果没有出现阿赫那吞，历史也将如此发展。他以此为例，说明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

在研究具体的文化时，怀特把在其它学科早已存在的系统论引进考古中，用以研究和解释文化。系统是一套相互联系的变量。它们之间的相互反馈导致系统发生变化。文化系统是十分复杂的，而且考古学家所能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文化系统中大部分变量都已经消失了。因此在文化研究中运用系统论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是考古学家尚未估计到的。但是系统论在考古学中仍有很大潜力，它是了解文化发展的一个视角，使我们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一个用于解释的框架。

怀特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对考古学的影响远不如他的学生、从事考古学的梅格斯女士。她主张进化论，反对当时流行的用心理学来解释文化变化的方法。她认为，进化论的效力就

在于它可以使观察到的事件容易被理解，尤其是在研究地区发展阶段中应用进化论来解释。梅格斯在《进化论在美洲考古中的地位》中进一步指出，考古学中的进化论就是物质文化随时间在形态、功能上的变化，并反映了人们行为和思想的变化。威利则强调文化进化过程并不是由某种不可避免的规律决定的，而是可以选择的。在选择中，技术对自已环境的适应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将进化论观点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是阿丹斯（Adams）。他在两河流域和中美洲文明起源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在《早期文明的进化过程》一文中，他研究了两河与中美洲从神庙中心社会到城邦社会这--过程中量的变化，并对文化变化原因作出独特的解释。首先，他认为文化变化中的因果关系不能只靠阶段划分和文化间的对比来确定。其次，他怀疑单一原因的结论，例如斯图瓦德关于人口过剩引起战争的结论和威特佛格尔关于大规模灌溉产生行政机构最终出现专制国家的水力国家假说。最后，他提出要防止将文明产生原因简单化，必须充分认识到导致重大阶段转变的复杂性和各事件之间的依赖关系，并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和反映这些因素。他指出，文化史研究和进化过程是不矛盾的，将年代学与过程研究连结起来的桥梁是功能分析。阿丹斯的另一部著作《城市社会的进化：两河流域早期历史与前西班牙时期的墨西哥》，对比了新旧大陆两个社会的进化过程，从血缘为基础的农村到有等级的政治组织的国家。斯图瓦德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作者论述了最初对农作物的改进，如何较好地利用小自然环境、专业化增长、当地人口相互间依赖性的增加，并把这些看成是导致国家机构产生的新过程。

从阿丹斯的具体研究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继承了柴尔德的理论。他对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的过程的重视及系统描述，清楚地表现了他的研究与研究美国印第安人文化的先驱们的研

究之间划时代的差别。他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为了有效地说明城市革命，我们必须描述一个功能上相关的制度之核心。一个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性联系，只能通过揭示这一系统怎样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来阐明。在这种描述中，必须把自变量与因变量区别开来。

阿丹斯的研究，实际上成为后来进化研究的主要模式。研究重点由文化物质转移到了与人类学模式相符的社会参数上。对于文化的变化是从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寻找原因，但阐释的构架仍是功能式的，变化具有进化的性质。

总之，到了60年代，考古学家们已经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考古学本身的研究成果即各地文化序列已经揭示了文化进化过程；其次是人类学进化论再兴的影响；最后还有政治上的原因，这时已经不再把进化论与政治信条联系在一起了，讨论进化论已经成为一个纯学术性问题了。

2. 新考古学的形成

新考古学最初是由一些年轻学者提出来的，这些人大多数是研究生，既受到人类学又受到考古学的专业教育。他们关心的问题是阐明文化发展的过程，而且他们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了。他们乐观地认为，对于考古资料利用新的方法研究，能够解释文化发展过程并找到历史发展规律。这不仅有利益于人类学的发展，而且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也会有所帮助。

新考古学的完整思想是由路易斯·宾弗（Binford, L.）提出的。他在1962年发表了第一篇新考古学的代表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因此它的目标和人类学一样，是“说明和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现象。”为了这个新的目标，在研究中就应采取新的方法，即利用系统论对遗存进行分类。他把考古遗存分成技术经济类，社会技术类和意识形态类。遗

存的功能要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理解。这种方法对于人们利用遗存复原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在实践中人们会发现，同一件遗物可以同时属于几类。例如陶器，它既可以归入技术经济类，反映当时人们制陶技术和食物加工与食物结构；又可以归入社会技术类，它的分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它的造型及纹饰又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传统及宗教信仰。

宾弗在 1965 年发表的《考古学的系统论与文化进程研究》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在遗存分类中如何探讨特征形成的原因，从功能的角度理解当时社会与遗存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达到对文化过程的认识。当时大部分分类是对考古学文化和遗存的特征作等级式的排列，以表现这些特征在时空上的分布。他认为分类结果不能只从时空方面解释，更重要的是从因果关系考察。他以陶器和考古学文化为例说明他的观点：

陶器的外形包括了形状和装饰，它们的变化是由生产工艺和外形设计造成的。外形设计的种类受到特定社会环境下该器物功能的制约，即宾弗所说的“原生功能”的制约。例如哈瓦纳传统的陶器以大口锅为主，是因为这里以大家庭为生活单位，而与它同时的俄亥俄州西奥传统是以小容器为主，这里食物是分开供应的。外形设计的式样和纹饰则受社会联系（如劳动分工）和世代承袭的变化所制约，即“次生功能”制约。宾弗把分类与导致分类的原因联系起来，赋予类别以功能的含义。

这种功能分析与年代学研究有关。年代学中的“文化传统”就相当于次生功能因果的连续演变，也就是当地生产的陶器外形的明显连续性。年代学中的“时代风格”[1] 包括了原生功能所造成的陶器种类的空间分布，它暗示了同一时期若干考古遗存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的地区往往包括若

① “文化传统”与“时代风格”的术语见本书第四章二：3（2）。

干考古学文化，这就构成了应付同一种自然环境的“适应地区”。宾弗认为，只有按照这种思路研究下去，才能在遗存之间的区别以及变化的原因中了解到文化发展的过程。

从宾弗以上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宾弗初期的理论主体，或者可以说新考古学在出现的头 10 年中，主要是在时间、空间的结构中整体性地表明文化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包括其构成要素在内的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全面地把握和说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文化相似与相异。

宾弗虽然接受怀特的观点，把文化看成是人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主要侧重文化内部系统的划分，这就是通过人工物功能确定文化的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三部分。他还缺乏文化与环境之间系统联系的观点。

在这一阶段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线形模式——作用与反作用。这一阶段则由线形模式发展到系统模式，把文化看成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最初用系统观点看待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是桑德斯（Sanders，W. T.），他把史前墨西哥中部叫做“共生区”（symbootic region）。麦克内什（MacNeish，R. S.）在寻找新大陆农业起源中也进行了这种尝试。最完整的北美史前生态系统研究是由亚内尔（Yanell）和克里兰德（Cleland）进行的，他们是根据当地动物和植物的种类及分布，并配合考古发掘完成的。但是在动植物分布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之间，尚没有很好地结合，真正建立生态系统使其成为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适应性变化的基本模式，当归功于费兰纳德（Flannery）。他在 1968 年发表的“考古学系统论与中美洲早期历史”一文标志着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

在这个文化生态系统模式中（图八），技术系统是理解文化与生态关系即人如何适应环境的关键。它可以解释许多考古现象，并且可以复原生存系统以及恢复文化适应过程。用计算

机进行模拟研究，可以了解到一个假说中某一部分发生变化使整个系统及其他部分引起的漂移扩大或相互反应。例如有人考察了史前西南美洲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自然环境中的生物资源和居住地点之间的联系，发现任何一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导致文化不同程度的发展或衰退。

但是应当强调，尽管许多变化首先发生在文化的技术系统中，并且可以引起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及任何一部分发生变化，但是技术发展并不是变化的惟一原因。

总之，新考古学是以复原和解释文化为目标，运用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说，研究遗物所反映的文化各部分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了解文化发展过程。这些新的理论与方法，都有助于考古学记录长时段中特定文化系统中的变迁，这在社会科学中是独具特色的资料，从而提高了考古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3. 研究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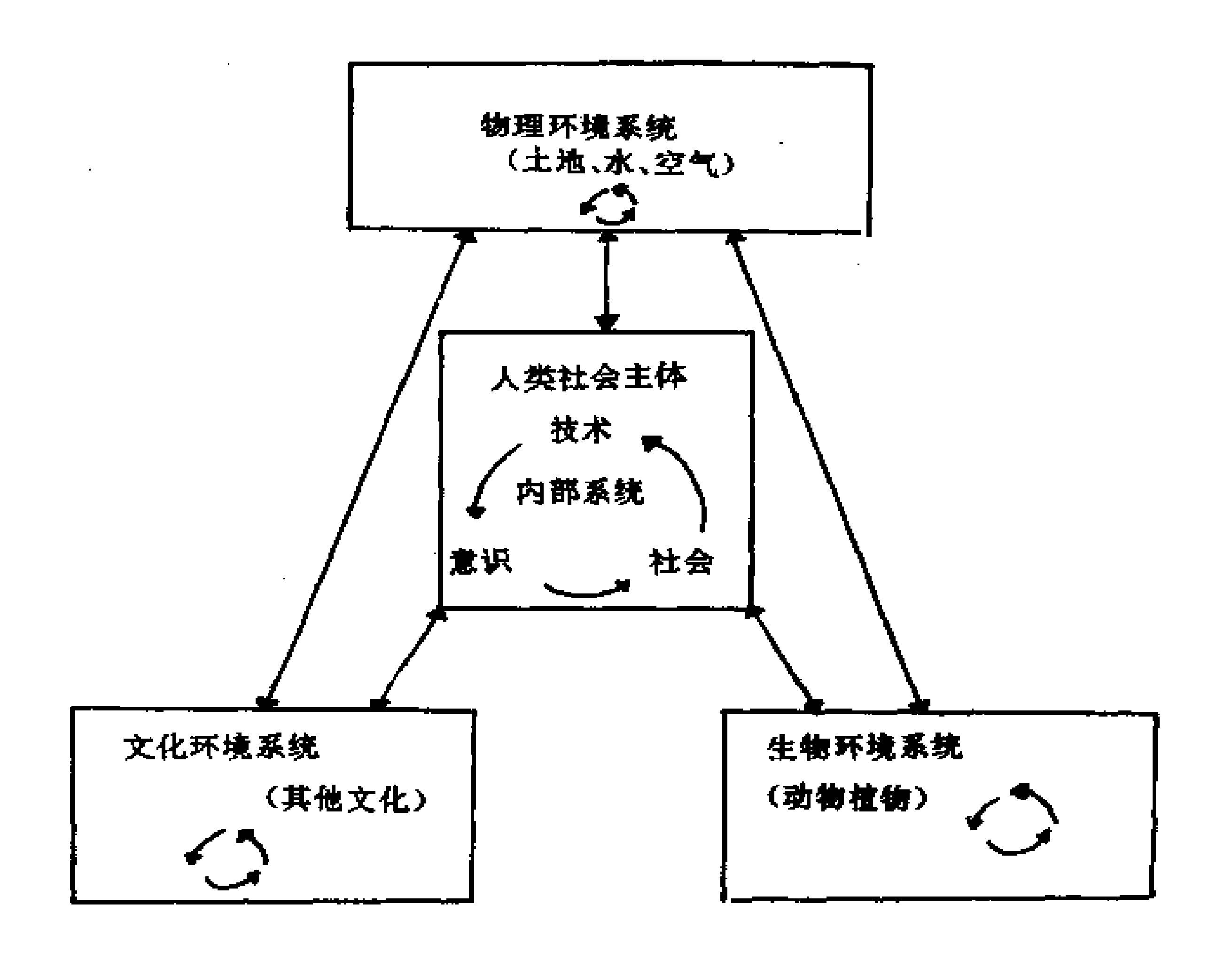
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和课题尽管纷乱繁杂，但是可以归为以下三类：重建文化史（时空框架及谱系）；重建（史前）文化形态（主要包括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发展变化的原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前者为基础的，因而构成了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①]。新考古学批评传统考古学只局限于时空框架的研究。他们认为应把考古学研究中心转移到文化的全面复原和解释方面。这些便构成了新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1) 考古学文化的全面复原

通过对人类学中文化间的相互比较人们发现，文化之间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是文化的结构是相同的，即文化的普同模

---

① 参见：杨建华“试论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及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图八　文化与环境系统示意图

选自 Sharer and Ashmore: Fundamentals of Archaeolgy

式（Universal Pattern）。这个模式包含三个主要部分：A. 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物质生产方式；B. 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组织；C. 反映现实的人与超自然界关系的宗教信仰。历史上许多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已消失，它们只留下了一些物质遗存，即考古学文化。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化演变成考古学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考古学文化间接地记录或反映了当时存在过的文化。所以考古学文化的全面复原也可以从文化的普同模式的三个部分出发。

A. 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方式

对于考古学文化这一部分的复原包括了对生产技术、自然环境及人口方面的了解。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从遗物功能及技术特征的研究来了解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利用环境；从聚落的生存战略出发考察人地关系，这包括了人口研究，自然环境研究，人们利用自然的策略等等。

宾弗继承了美洲上一阶段功能考古的传统，把文化看成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人类适应环境主要是通过工艺实现的。因此技术特征的变异首先要从与生态的关系来理解，从技术的效率、资源分布及密度和场所来理解。遗物的变化是人们行为变化的结果，而行为发生改变是环境对人类的刺激及人类作出反应的结果。宾弗举例说，假如同样型式的石器群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以不同的比例出现，这种比例差异应与那里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姆斯泰里安的石器群就是如此。[①]

柯奇进一步讨论了遗物变化与文化适应的问题。他在《考古学中适应的研究》[②] 一文中提出，文化适应是：从大范围的行为变异中选择性地保持一套行动的战略。他认为，人类的行动方式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能够以一定的规范为中心产生变异，这种行动的变异是它适应力的源泉。因为当环境变化后，就能从这个变异范围内选择一部分适应的行动方式。柯奇从适应的角度看待文化变化，并解释了变化与传统、与选择的关系。他指出，类型学中技术特征的变化最清楚地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变化。他通过研究某一时空的特定遗物中的变化幅度发

---

① Binford, L. R: Interassemblage variablity: The mousterian and The 'Funectional argument' 选自 Renfrew, C 主编的《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 1973 Lonion》.

② Kirch, P. V. 1980 a. The acheologieal study of adaption: theoratical & methodological issues AAMTS.

现：变异幅度小则代表了该文化对环境的高度适应；变异大的时候则表示适应性很低。柯奇在分析波利尼西亚鱼钩在时、空上的变异，使用了这种方法。例如，初期鱼钩变异大，说明波利尼西亚人进入新环境时适应能力很差。

威尔姆森（Wilmson）于 1970 年发表了《石器分析与文化推测》，是从遗物分类研究人类行为的更成功的例子。他研究了出自八个北美印第安人遗址中的叶状投掷器。首先他确定了这些遗物的年代和文化属性，然后统计所有标本的角度、尺寸等特征，用计量法确定它们的类别。这种分类既考虑了地域和文化组合，又反映了投掷器的原料、技术特征和功能特征。他根据投掷器的原料、技术分类和功能分类分析遗物的制造过程。在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讨论遗址中的人类行为。这些行为便构成了遗址之间差别，这些差别反映了不同人群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反应，涉及到人群的大小、社会构成，占居遗址的时间、迁徙程度、季节等等。通过八个遗址的比较，他区分出两类遗址："有限活动地（limited activity location）和多样活动地（multiple activity location)"。有限活动地是同一人类群体在此从事某种活动留下的遗址。多样活动地是一个长时期形成的季节性遗址，有屠宰地（发现 9 个骤犁）、骨器和石器制造场所，其中许多石器原料是外地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区别。威尔姆森认为这个季节性定居遗址提供了许多人们群体聚集的场所，在这里从事狩猎、交换原材料和技术。所以威尔姆森的研究把人工物的差异上升到人类活动的区别。

聚落形态的研究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角度，这也是继上一阶段这方面研究的发展。乔奇姆在《生存战略——从生存学角度看待文化行为》一书中，把适应环境的战略分成：食物战略（决定需要哪些食物、需要的数量和种类）、供给战略（四季粮食各在什么地方获取）、聚落战略和维持战略（贮

藏、交易、人口控制)。[①]

聚落战略是从聚落的持续性、选择地点、规模和结构四个方面来考察。聚落的持续性分为定居、迁徙两个极端，它们之间还存在定居程度不同的季节性迁徙。聚落的持续性主要是受周围生态环境制约，如果资源丰富，人们就定居在这里，一年四季都会获取足够的食物；反之，人们就要按照周围生物收获的不同季节迁徙，以获取不同生态带的食物。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处于相同生态环境的不同文化有时也采取不同的定居方式。例如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和美洲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分别采取季节性迁徙和安居两种方式获取生态带的食物。[②] 这说明文化内的生产技术和传统也是决定定居方式的重要因素。

对于居址地点的选择，主要是从生产和交换活动出发的。因此研究生产区域是理解定位的重要方法。希格斯（Higgs）提出原始部落集团的大致生产区域：狩猎——采集者使用离遗址两小时的步行里程为半径的区域，农民则使用 1 小时的步行里程为半径的范围。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甚至同一文化的人在不同季节里的生产区域就大不相同，如尼加拉瓜密斯基特（Miskito）印第安人在四月和七月的生产区域相差很大。[③]

聚落规模和定居方式与生产区域有关。聚落结构则与它的功能以及专业化程度相关。规模与结构不像居住时间与地点那样与自然环境有着那么直接的关系，而是与生产力和社会组织联系密切。

---

① Jochim, M. A. Strategies fo survival: Cultural Behavior in an Ecological Context.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② 后藤明："欧美考古学的动向"，《史前研究》，1986 年 1—2 期。

③ Watsnabe, H. Subsistence and ecology of Northern food gatherers with special referenec to the Ainu. In: man the hunter ed. by R. B. Leeand I. Devore, Aldine, Chicago 1968.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生存战略与聚落形态的关系，出现了一种遗址区域分析方法。[1] 区域（Cathment）一词是从地貌学中借鉴来的，表示河流中水流的来源地区。因此一个遗址的区域就是指遗址居民使用的资源的来源地区。

这种研究有以下前提：首先，人们从居住地向外活动得愈远，获取资源所需付出的能量也就越大。因此遗址周围开发程度与它距遗址的距离呈反比，最后达到几乎不宜开发的地步。通常认为这个范围在遗址周围半径为 10 公里的地区。其次，遗址的居民对于获取不同资源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由于这种"资源重要性层次"，便出现了对聚落周围地区利用的差异和分带。最后，生物自然环境是随地域与季节发生变化的，所以在确定遗址区域中要考虑这些因素。

从事遗址区域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首先限定分析领地：可以使用一个或几个以遗址为中心的圆周或由等时线限定的形状不规则地带，或者通过与邻近遗址的关系来推测（必须首先确认这两个遗址是同时的）。然后测量出各遗址领地内的每个资源带范围，把这些数字制成图或表，或利用它们进行遗址领地的统计分析，从而研究不同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各遗址年代明确，保证被研究的遗址必须是同时的，第二是该地区进行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从而了解尽量多的同时期遗址。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必须要有详细正确的时空框架研究为基础。

限定分析领地有不同的方法。希格斯在研究希腊伊庇鲁斯旧石器时代时，使用了遗址周围 10 公里半径的领地范围。后来又改成等时线测量，即猎人以离遗址 2 小时步行、农人为 1

---

① 多纳·C·罗珀："论遗址区域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

小时步行的距离确定领地范围。这两种计算方法目前已被欧美考古学者广泛采纳。卡斯尔斯则利用构建环绕遗址的塞森(Thiessen)多边形，来测定领地。需要指出的是，领地（territory）和区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一个遗址的居民可以直接达到并经常开发的地区，后者则是一个遗址包含物的所有来源地。确定领地是为了进一步推导出区域。

区域分析的另一种方法是弗兰纳瑞创立的。他只从植物、动物和矿藏资源出发，寻求遗址的区域。后来他又把程序倒转：从遗址中发现的植物、动物和矿藏资源出发，寻求遗址资源的来源范围。

汉森（Hassan）在研究遗址区域时，提出遗址的人口也是确定遗址区域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考古学方面具有突破性的创新。他在《人口统计学在考古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如何通过人骨、村落遗址、食物遗存、人工物、生态环境以及文献资料来统计人口，其中原始村落可以从遗址面积、地基面积、住宅数、住宅中的房间数、每间房估计的人数、窖穴的容积以灶坑数来推算人口，尽管每种推测方式都存在着漏洞，但是人们还是能够看到这种研究经过不断补充完善，是有希望的，使用同一种标准可以得到相对人口数量，同时它还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使人们注意到在收集中了解哪些信息，在研究中知道某些遗物携带信息量的潜力以及遗物间相互关系在说明历史方面的潜力。

汉森在《人口分析与考古学研究》（1979 年）[①] 中进一步探讨了人口分析与食物供应、居住方式、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立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式。

弗兰纳瑞和麦克内什是直接通过自然遗存和人们的食物遗

---

① 汉森·F·A："人口统计学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三秦出版社 1991 年。

存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1] 弗兰纳瑞研究了墨西哥高地的生态系统和聚落系统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解释这种关系，他在1968年发表的“考古系统与中美洲早期历史”一文代表了当时这方面研究的杰作。他根据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复原了墨西哥高地公元前5000—前2000年的狩猎采集者获取生存资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了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海洋、海滩、低灌木丛、港湾、红松林、干盐湖、混合热带林、低地、热带大草原等等。每个地理环境都有人们利用的独特的生物资源，如海洋的海龟、鹈鹕；海滩有螃蟹；灌木丛有巨蜥、犰狳、负鼠；港湾有牡蛎；干盐湖和混合热带林有鹿……。当时的狩猎采集者是利用季节性迁徙的方式获取这些生物资源的，但人们最主要的生存系统是采集龙舌兰属植物、仙人掌科水果和野生草籽，猎取鹿等野生动物。根据这个复原系统，弗兰纳瑞提出了当时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战略：人们利用季节性和计划性来控制生存系统，一方面要防止任何一种获取方式太集中以至威胁到资源的再生，另一方面又要保证高效率的获取。

麦克内什自40年代以来开始潜心研究美洲农业起源，其核心问题是发现玉米在何时、何地首先变成人工栽培作物。他从寻找与玉米有关的野生作物分布区开始，并发现这个地区就是墨西哥。然后他把工作范围缩小到墨西哥干旱地区，因为这里植物遗存保存条件最理想。最后他在墨西哥城东南的提华坎河谷（Tehuacan）发现了与野生作物相似的作物，在这里发现了距今60000年的谷物花粉化石。在这一地区，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洞穴遗址，因为这里的堆积层位和共生关系可以提供植物遗存的年代。他终于在一个洞穴的堆积下层（Coxcatlan 洞穴）发现了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玉米。这是美洲迄今发现

---

① 后滕明：“欧美考古的动向”，《史前研究》1986年1—2期。

的年代最早的玉米，形状细小，长度仅为1英寸（2.54厘米）。这个发现使人们普遍意识到这一地区是美洲农业起源中心。但是这个玉米是野生品种还是野生向人工栽培的过渡，尚无定论。如果后者是对的话，就暗示了野生品种是经过人们不断的采集和选择性栽培才逐渐变成人工品种。与这个原始玉米共存的其他文化遗存表明，原始玉米的出现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采集经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大约到了公元前3000年，考古遗存说明出现了人口增长和定居加强的聚落变化。这时的玉米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玉米棒和玉米粒变大。把这些现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玉米栽培已经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已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到了公元前2000—前500年，每公顷农田可收获200—250公斤玉米，这已足够维持提华坎河谷发现的聚落规模的人口了。这时占有肥沃土地的村落已经开始成为这个河谷的中心聚落了。

这项研究说明人口压力与作物栽培不是人们以前认为的因果关系。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这里并没有人口增长的迹象。随着农业起源事实的日益清晰，7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找农业起源的原因以及逻辑发展过程上了。

B. 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组织

这个课题是新考古学关心的第二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通过遗物、遗物与遗迹的关系以及聚落形态等方面入手的。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有家庭关系和阶级或等级等。

对家庭形态的研究，是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内容。宾弗在60年代初对北美东部的墓地发掘时，发现墓地的头向分为南北向和东西向两大类，他认为这说明了这个墓地埋有两个婚姻集团。在另一处墓地他发现小孩与妇女的头向一致，与男性不同，他推测小孩归属母方集团，是母系社会。

戴兹（Deetz, J. F.）是通过研究居住形态来推测古代的家庭形态，这种方法对后来的年轻考古学者有很大影响。他在1965年发表的“阿里卡拉（Aikara）陶器风格变化的动态研究”一文代表了他的最高研究成果。他分析了阿里卡拉平原在原史时代（Proto－historic）和向历史时代过渡时期遗址的房屋中出土的陶器。陶器分类以陶质和纹饰为标准，并结合发现陶器的房址特点。他把这些因素输入计算机中，由电脑对陶器分类和分析。他提出一个假说：在母系社会中，陶器纹饰的组合应是有规律的。随着母系制度的瓦解，纹饰组合从有序向无序发展。计算机分析的结果正好说明陶器演变序列中纹饰组合向无规律发展，而且在纹饰发展的同时，大房屋逐步为小房屋取代。当地民族志证明，这里历来是妇女制陶，母系社会中人们居住的房屋大于父系小家庭的房屋。所以，戴兹揭示的陶器纹饰和房屋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过程。

郎艾柯（Longaere）也利用戴兹的方法研究了北美西南部皮维布洛（Pueblo）印第安遗址。他对卡塔·兰奇（Cartar Rarch）遗址中20余座房址出土的6000余片陶片的纹饰进行分析，共划分出175种纹饰母题。然后他又统计出土每一种纹饰母题的房屋特点，他发现遗址南部和北部的房屋中有自己独特的纹饰母题。他认为这个遗址中居住着两个从妻居的社会组织。郎艾柯又分析了遗址附近墓地出土的陶器纹饰，发现在北区墓地的陶器与北部居住区的相似，南区墓地的陶器与南部居住区的陶器相似。中央墓地的陶器混合着南、北两区的纹饰，并且北部墓区与南部墓区埋葬人骨的头向各异而中区头向混杂。郎艾柯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北部墓区埋葬着北部的居住者，南部墓区埋葬着南部的居住者。中央墓区由于随葬品非常丰富，可能用于埋葬两区地位较高的人。

社会等级及其发生过程的研究，是新考古学研究的另一个

重要课题，这在文明起源的探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墓葬材料，研究社会阶层化是一种常见的方法。1971年，宾弗详细论述了墓葬研究的社会意义，发表了“埋葬行为：它的研究和潜力”，并以此为题发表了一个论文集。这个论文集中收录了三篇这类研究的代表作。第一篇是拉森（Larson，L. H.）对埃吐瓦（Etosah）墓葬的研究。土丘和村落中都有墓葬，但是土丘中埋葬有大量精美的随身用具。拉森认为埋在土丘的人社会地位高，说明已存在明显等级差别。另一篇是皮波斯（Peebles，C. S.）在蒙德威尔（Moundville）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包括若干个遗址，通过对这些遗址的遗存进行统计学研究，在很高概率把握下把这些遗址分为三个等级：当地社区、当地中心社区和地区中心社区。蒙德威尔遗址是地区中心遗址，是整个这一地区的都市。根据这些研究，他以为当时社会已经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有专门的政治——宗教组织。最后一篇是布朗对斯派罗（spiro）墓葬的研究，也运用了与皮波斯相同的方法。

拉瑟耶（Rathie，W. L.）考察了不同时代墓葬的变化，研究了玛雅低地从前古典晚期到古典时代墓葬的随葬品数量与种类、墓葬形制、墓主年龄与性别，以及墓地及居住址的关系，证明了阶级等级日益严格的发展过程，并把墓葬这个亚系统放在文化大系统中，提出了有关玛雅文明衰落的解释性假说。

还有不少学者通过对聚落组织的综合性调查来探讨社会阶层化问题。史密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调查了15个地点，通过对遗址功能分类，各类遗址比例以及遗址群在河流的分布等方面分析，发现了在不同时代的聚落阶层化中有社会集团分散和集合的现象，并从文化环境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变化。

弗兰纳瑞在中美研究中，提出一套研究体系，其中包括居住单位；部落内各居住群的关系；生产区域；地域内各集团之

间关系；地域间贸易及礼仪交往关系这些由小到大的空间范围。他用这种方法研究了瓦哈卡河谷（Oaxaca)。这里在公元前7800年左右开始栽培植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形成农业定居村落。在村落形成的前、中期（公元前1500—前300年），以家族为居住单位的平等村落中出现了具有公共建筑的村落。在这种村落里，从居住地域的划分上能够看到身份差别已经萌芽。在公共建筑周围有宗教用品鱼刺，而平民居住区只有鱼刺的仿制品，这说明具有公共建筑的村庄与周围的村庄有等级差别，前者对后者有政治和宗教统治权。宗教礼仪具有把身份高的人物神圣的作用。弗兰纳瑞这种研究是对文化各方面进行分析的综合研究。

70年代后期，帕尔森（Parson）又研究了墨西哥盆地的聚落形态演变，了解提奥提华坎城及周围遗址的发展历史（图九)。在公元前200年以前，盆地的人口都集中在南部，位于东北部提奥华坎及周围只是一些小村子。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初，提奥提华坎发展成一个万人左右的大城市。到了公元1世纪末，它的人口已经增长到5—6万人。到公元600年已发展成为面积20平方公里人口15—20万的都市。在都市发展的同时，原有的早期大型遗址消失了，河谷的人明显减少，说明人口在向都市集中。在人口的迁徙中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一定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从公元600年起，提奥提华坎开始衰落，到1200—1520年，它已不再是都市了，这时又兴起了许多中心遗址。

C. 反映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关系的宗教

由于新考古学在考察社会变化中非常重视自然环境以及人们适应环境手段的作用，所以在新考古学出现时期，对人们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习俗的研究比较少。

在聚落形态研究中，人们一般是从聚落组织和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的功能关系入手。但是这不能解释所有遗址布局。例如

卡斯（Kus）在研究18世纪非洲马达加斯岛中央梅里纳王国首都安波西满卡（Ambohimanga）的布局时发现，它是由四个方位构成的，东北部是王侯居住区。从当地的传说中她了解到，在当地人的世界观中，北部象征高贵，东部象征神圣。所以在北部是等级最高的人居住的。都城布局正好是由北到南由贵到贱，从东到西由圣到俗分布的，所以卡斯认为，必须考虑到在社会生产品里，与由生产活动得到的物品一起还包含象征，和社会制度一起还包含再现体系。

米勒（miller）考察了介于美拉尼西亚和波里尼西亚两大文化系统之间的所罗门群岛的聚落组织，发现各岛之间形态各异。特莱尔（Ferrel）用生物地理学中自然环境的变异解释聚落形态的差异。米勒认为，仅用这种外因来说明是不充分的，聚落组织的变化并不直接适应自然环境，聚落组织的形成要用人的世界观这种内在逻辑来认识。还有人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一些岛的定居点分靠海和内陆两种，在这些岛中分为从事两种不同生产集团，因而聚落组织不同。这种说法在面积达500平方公里的马拉依达（Malaita）岛是成立的，但在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最宽处只有2公里的新波（Sinbo）岛上就说不通了，这里聚落形态无法用自然环境以及生产部门解释，而是人为的或者某种观念的象征物。

沙林斯曾在斐济的民族学调查中，探求环境、经济以及象征在考古遗存解释上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批判到现在为止考古学上归纳的聚落组织的模式，即仅依赖于居住在热带沙漠和亚洲北极地带受环境制约非常明显的地域内现存原始民族的局限性。

（2）对考古学遗存和考古学文化的解释

对考古学遗存以及从中归纳的考古学文化进行解释，并不是这一阶段的新特点。它是伴随着考古学的形成出现的，而且与历史学的解释有密切联系。早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哲学

家就指出人类发展经过了金、银、青铜、英雄和铁器五个时代，这种思想与人类历史呈线形发展的思想是一致的。近代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人类历史经过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考古学者用实物证实了这种观点，并使这种观点成为考古学解释的第一种方案，或叫做历史解释模式。

这种历史解释模式在美洲没有被运用。一方面由于新大陆最早的人类是在最后一次冰期出现的，所以历史解释中的石器时代与美洲的含义不同；另一方面这里缺乏文献传统，所以考古学与历史学联系小。于是美洲的考古学者便寻求人类学解释。人类学成为解释模式的主要来源，而且许多人类学者也从事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

用于美洲考古学解释的第一个模式叫做文化规模模式。它是由人类学家鲍厄士提出来的。他认为，所有人类活动都有其形式，这就构成了文化。文化“规范”的概念是说，在某个社会，行为的形式是由行为的规范或规则决定的。这种规范在一个家庭里或一个职业中代代相传。当然也有一些个体行为失传了。

在某一文化系统中，一系列行为是相容的，规范也有一定范围。例如在新婚夫妇选择居住地点的行为范围中，有许多种方式，如住在娘家，住在婆家，也可住在叔叔家，还可以自立门户。但事实上所有文化都限制了广泛选择。人们知道他们生活的文化中哪种居住方式是被允许的，是符合规范的。如果违反规范将会遭到惩罚或谴责。

如果把这一模式用于历史研究时，它的含义是：文化变化是规范变化的结果。规范变化是文化中出现了新思想。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规范概念强调的是文化的稳定方面。

这个概念用于考古中，遗存被认为代表了过去行为的规范。例如陶器被看作过去文化的指示剂，反映了制陶技术行为的规范。尽管制陶方法很多，但每个文化只用几种，这说明制

陶者的行为如同居住地点一样，也受行为规范制约，这种规范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这样，考古学家可以通过研究陶器的异同来推测制约制陶的法则。这种模式在鲍厄士和基德尔的影响下，成为美洲20世纪初期主要的解释模式。

继文化规范模式之后，美洲考古中又出现了一种模式——文化功能模式。它是来自于法国、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的功能学派代表有涂尔干（Durkheim，Emile）和布朗（Browm，Radeliffe）。但是完整的功能学派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提出的。在马氏看来，文化是由“传下来的人工物、技术、思想、习惯和价值观”组成的。这种观点从狭义理解与“规范”概念中的文化基本相同。但马氏认为，每个完整文化都包含一系列各自独立又有相互联系的方面，这些方面在维持社会的生存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下表是他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看法（表六）。

表六　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结构与功能

基本需要	文化反应	作为手段的规则	相关的规则
生理需要导致→	通过行为组织来满足需要的文化手段→	由原理和认可维系的行为组织→	支持的原理和认可
新陈代谢	生存		
再生产	血缘		
身体舒适	居住		
安全	防卫	社会与政治组织	知识
运动	行为	经济	价值观
生长（发展）	训练	教育	宗教
健康	卫生	道德法规	巫术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文化各部分是相关的，各有其用途，形成了一个系统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在规范模式中，人们把住地的选择看成是由社会规范决定的。功能学派则研究这种定居法与文化其他方面的联系以及它们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作用。于是，特定的居住法就与婚姻形态、权力、继承、父母与子女关系等几个方面产生了联系，而且注重居住形态在文化中的作用。例如从妻居的方式在维系经济的连续性和母系继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使社会保持稳定，以免使母方失传。居住形态尽管没有直接影响社会的生存（像文化和技术方面那样），但是它对维系社会系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通过促进正常的权利与财产的转让和继承，减少了争斗，为母系集团的联系和合作创造了条件。

功能模式也是从共时的角度看待文化（与规范模式相同）。它把社会看成一个连续调节的、稳定的、能自我控制的系统。尽管它不适用于考察文化发展过程，但是它可以将考古中观察到的特点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网络，所以是有重要意义的。

考古学正是受这种功能主义的观点影响，从二战以后开始了研究方向与课题的转变。考古中功能模式的完善是宾弗提出来的，他根据功能观点将考古遗存分为技术、社会和意识三大类。

考古学运用功能的观点看待文化的发展，便形成了文化过程模式。在这类模式中，一种是文化生态模式，它是从文化适应能力出发，把文化变化看成是适应手段变化的结果。这种模式主要是描述文化过程的每个具体情况。还有一种是多线进化模式，它认为每个文化的变化都是由该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的积累逐渐形成的。所以它看重研究广泛的过程和文化进化的趋势。无论是文化生态模式还是多线进化模式，都把技术因素作为主要原因，并考虑社会和意识两个方面，确定三者之间联系。

在研究文化过程的变化原因中，有两种方案：一是观察宏观变化，以寻找原动力。使用这种方法的始祖是柴尔德，其后

有阿丹斯。在这个方案中，人口增长常常被看作是文化变化的根本原因，其他原因还有自然环境、战争以及经济交换系统。另一种方案是观察微量变化，采取多变量战略，以了解文化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积累过程。这些方案都要求考古工作者能够识别文化的各个部分以及相互关系[1]。

这种文化过程模式是新考古学派普遍使用的，所以又把新考古学派叫做文化过程学派（The Cultural Processual Ap-prach)。

4．研究程序与方法

新考古学派的研究方法以“假设——演绎法”为特征。这是一种从一般理论、特定的假设演绎出内涵，再用考古发现的实际资料加以验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程序：a．首先探寻与史前或历史时代社会生活、行为有关的某种假设；b．由于我们不能直接看到以前的社会，所以不能验证假说；c．因此需要通过考古学的观察，从假说中演绎出可能的内涵。d．因为内涵是从假说中演绎出来的，假说如果是真实的，内涵也是真实的，假说如果是不真实的，内涵也是假的。e．因而内涵的真伪可以确定假说的真伪。考古学中的假说许多是来自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还有一些来自对考古现象的综合和归纳。

新考古学派研究方法的第二个特点是运用计算机使对象数量化，以便进行统计研究。

多伦（Doran，F．E．）和荷德森（Hodson；F．R．）合著的《考古学上的数学和电子计算机》[2] 以及奥顿的《考古学中

---

① Robart J. Sharer and Wendy Ashmore: 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 1979.

② Doran, F. E. & F. R. Hodson: 1975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Archaeology. Harvard Univesity Press, Cambridge.

的数学》[1] 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论著，在这些书中，使用“研究对象”与“变数”这两个基本概念。如果单个遗物是研究对象，那么遗物上的各种特征就构成变数；如果一群遗物是研究对象，那么遗物的型、式以及数量、比例就成为变数。

在研究一或二个变数时，常常采用 T——检验法和 X^2——检验法。前者用于确定两种遗物之间特定变数的平均值是否有关，例如可用于检验出自两个遗址的石镞和鱼钩在大小上有无区别；后者用于调查两种所属的变数之间是否有关联，例如用于探求陶器器表修整与纹饰两个变数的关联，是否某种修整方法与某种纹饰具有较高的组合概率。

当需要同时处理多种变数时，常常采用因子分析。这种方法是在许多变化中把密切相关的变数（相联中有正、负两个方面）整理成若干群，探求用于说明一个群中的一些变数变异的“因子”，由于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因子（假设的变数）说明数据内的变动，所以因子是从对说明数据变动意义较大的变数中提取的。这种方法适于遗物类型和遗物群研究。

由于采取了这些数学方法，使计算机成为一种需要的研究工具。尤其在从事多变量分析时，只能利用计算机进行。考基尔（Cowgill, G.）的《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2] 详细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目前，计算机主要用于贮存信息，通过统计确定年代序列，对遗物进行分类以及对遗址进行概率选择发掘区，还可以对文化形态进行多变量分析。1962 年宾弗曾使用计算机通过遗物组合、聚落形态对文化系统进行推测。

除此之外，计算机可以进行模拟，从而对整个文化系统进行研究。考古学家设想，将来可以把整个文化系统中经过细致

---

① Orlove, B. S. 1983 Mathematics is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iv. Press, Cambridge.

② Cowgill, G 'Computer Application in Archaeology' American Feder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ie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 31 Washinglton 1967.

研究的某一亚系统输入到计算机中，由此形成几种模拟的整个文化系统，然后用考古资料进行检验。还可以通过变换其中某些因素，了解它会对其他因素乃至整个文化产生什么影响。

新考古学派研究方法的第三个特点是采用民族学类比的方法。在美洲的考古学中，考古学与民族学联系密切，它始于“土丘建造者”的争论，后来发展成“直接历史法”，并且在解释遗存的位置联系和功能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新考古学派继承了美洲考古的这个传统，在陶器与社会结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注意民族学类比的关键作用。许多考古学家亲自参加民族学调查，克服了原来民族学调查中对特殊行为与相关实物的联系缺乏注意与记录的弱点，使民族学资料在解释考古遗存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种由考古学者参加的，特别关注考古学上可能保持下来的文化成分与民族学上看到的那些行为体系之间联系的民族学调查与研究叫做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朗艾柯教授在重点研究陶器的同时还到菲律宾从事民族学调查，从中了解陶器变异的原因和反映的社会意义，使人看到了这种研究的希望（他于1991年6月在中国临淄举办的中美陶器研讨班上介绍了他这方面的研究）。

在上一阶段，斯特朗利用内布拉斯卡地区的民族学材料，将这一地区的考古序列复原成这一地区印第安人从史前到历史乃至历史早期的全部历史，这种方法叫做特定历史类比，强调类比物与考古遗存在地域以及文化上的一致性。还有一种方法叫做一般比较性类比，类比物和考古遗存可以是跨时空的，例如北欧旧石器时代遗存与现代爱斯基摩人的民族资料的比较。张光直在1967年发表的“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关系的几个主要问题”① 一文详细地讨论了特定历史类比和一般比较性类

---

① Charn, Kwang—chih: 'major Aspects of the interelationship of Archacology and Ethn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al. 8 N. 3 Chicago, 1967.

比，并强调了前者在考古学中的重要作用。宾弗则认为，如果考古学中完全依赖特定历史类比，便限制了类比在考古解释的作用，在解释文化过程中，一般比较性类比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特定历史类比和一般比较性类比都有自己独特的应用领域，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分别在特定的考古序列研究和文化过程的探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当充分利用特定历史类比并结合一般性比较类比，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学类比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

（二）欧洲的两种考古学

这个时期的欧洲，不像美洲那样出现很多理论、方法和研究课题，而是在原有传统上逐渐变化：开始注重对文化的全面复原。对于美洲的新考古学，大多数学者持反对、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也有少量考古学家赞同新考古学，并提出独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新考古学。

1. 欧洲的新考古学

自上一阶段克拉海姆·克拉克在 1952 年发表了“史前欧洲：经济基础”一文以后，欧洲与美洲一样已经形成了新的以古代文化生态学和聚落形态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在实践中“采取非常详细的发掘和有关学科的合作来形成对古代文化生态学的细密研究，并通过聚落形态把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宗教活动等，从空间做其彼此有机性联系的结构研究和社会群与社会群之间关系的研究。”[①]

60 年代初当美国出现新考古学派以后，欧洲也出现了以剑桥大学考古学家大卫·克拉克和克林·伦福儒（David Clark 和 Colin Renfrew）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家，其代表作是克拉克

① 张光直：“当前美国和英国考古概况”，《考古与文物》，1985，3。

在1968年出版的《分析考古学》[1]。这是一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巨作。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讨论了考古学的历史、性质、目的和一些术语；第二章介绍了系统论和文化系统论的模式；第三章把文化作为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讨论了二者关系；第四章至第八章详细阐述了物质文化系统；第九章讨论了考古学文化与各种人们集团的关系；第十章描述了考古学物质文化系统的自身发展过程；第十一章讨论了学科理论、程序和考古学遗存所代表的实际历史意义即考古学"语法"。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从头至尾都以系统为指导，构建了非常理想的不同层次的考古学实体的模式和发展过程，在各章节中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考古学性质

克拉克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有关发现、系统描述和研究过去物质文化的学科。考古资料不是历史资料，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加以综合。考古学有自己独特的资料、术语、概念，一个考古学文化既不是一个人种集团，也不是一个历史部落或一个语言单位。当我们考察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精确的术语和理想的考古学模式后，我们可以区分考古学中与社会学、历史学中相似的部分。

克拉克把考古学归入人类学。民族学是共时的人类学，只涉及某一代人。考古学是历时人类学，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研究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过程。考古学的工作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发现资料，从事收集和发掘；二是系统描述，对资料进行分类和分析；三是综合研究，形成模式、假说和理论。这三个内容循环往复，相互促进，把资料上升为理论，并使理论逐步完善。

---

[1] David L. Clarke: Analytical Archaeology Second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考古学资料主要是遗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关系是很重要的考古资料，遗存这类资料主要是从遗存的特征研究入手，这些特征一类是能够直接观察的，另一类是通过特殊手段分析出来的。克拉克主要涉及的是第一类特征。要了解这部分考古资料的性质就必须讨论观察与特征之间的关系。观察是有选择的，观察内容往往取决于观察者，对遗存的观察中，反映遗存从原料中被制造出来的那些特征是最值得观察的，因为这些特征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克拉克提出考古学的目的有三点：第一，确定各种物质的基本实体以及它们的成分、结构、形式、过程，以及过程对实体在时、空方面的作用，通过实例进行静态和动态研究。第二，寻找在形状、功能、联系或各地区、各时代、各种自然环境的特定实体的发展序列中的共性或规律。第三，发展能够综合和联系现有资料并具有预测价值的更高级的知识或原理，发展更加复杂和资料更加丰富的总模式和假说。

物质文化系统

克拉克把考古学中的实体按初级到高级的顺序确定为特征、遗存、遗存类型，遗存组合、文化、文化群和技术复合体。每个实体（除了特征以外）都是由比它级别小的实体组成，这就构成了由考古实体组成的物质文化系统。每一个实体的组合有单一组合和复合组合两种情况。我们以特征构成一种遗物来说明这两种情况。从表七可以看出，A. B. C. D. 四件遗物由于都具有 1．2．3．4．个特征，所以我们把它们归入一种遗物。由于这四件遗物的特征完全相同，叫做单一组合。E——J 这六件遗物基本具有 5．6．7．8．个特征，我们也把它们归为一种遗物。由于这四件遗物的特征大同小异并非完全相同，我们把这种组合叫做复合组合。在实际划分中不存在单一组合，因为事实上不可能这一类的每个成员的特征都完全相同。复合组合中的每个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变化幅度，是

表七　特征与遗物的关系

特征＼遗物	A	B	C	D	E	F	G	H	I	J
1	V	V	V	V						
2	V	V	V	V						
3	V	V	V	V						
4	V	V	V	V						
5					V	V	-	V	V	V
6					-	V	V	V	V	-
7					V	-	V	V	-	V
8					V	V	V	-	V	V

V：有

-：无

遗物与特征可由任何比它们高的实体代替，但它们必须是两个相邻的实体。

非常适用的。这种划分同实践上凭直观的相似性而归并的组合完全是两回事。考古学研究只有从直觉观察上升到系统统计，才有助于深入发展。

尽管考古学实体分为不同层次，但是各实体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它们的发展都经历了出现、增多、繁荣、减少和消失等阶段，呈正峰分布，每个阶段都可以从遗物的种类，差异大小以及精致程度观察到。这个模式可以更精确地反映彩陶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变化过程。在较高层次实体如文化和文化群变化中，克拉克提出了“转变”和“置换”等不同的变化模式。

克拉克通过对各种实体的构成、变异和发展的讨论，确定了各个实体在考古类型学上的实际意义。例如特征是最小的、不能再分的实体，许多特征构成一个遗存。技术复合体是最高的实体。它是一个具有相同经济、技术和环境战略的“适应地区”。这使类型学向科学化、定量化、系统化的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模式是非常理想化的，所以不适宜研究零散的考古资料，但是对于整理大规模发掘的、年代相互衔接的考古资料是非常有益的，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的视角、更精确的尺度来驾驭繁杂的考古资料。①

① 笔者在整理山西白燕遗址新石器时代陶器时，运用了克拉克的部分模式，证实了这个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到考古学文化发展中的突变时期和相对稳定时期。

考古学文化与人类集团的关系

在英国考古中，文化组合和文化群是常见的考古学实体。自柴尔德提出“考古学文化”之后，这些概念便由考古学文化取而代之。丹尼尔认为：考古学文化只是在缺乏确定绝对年代方法时归纳遗存的一个概念手段。有了断代方法以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可以摒弃，这便于更好地描绘原始人的生活。克拉克认为，丹尼尔忽视了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因素，它与一定的人类组织相当。还有人认为，考古学文化不能明确表示人类行为。例如，澳洲从事渔猎的居民在不同季节使用不同的物质文化组合，它反映了一年四季中人的生存战略。

克拉克坚持使用考古学文化这个实体。在划分考古学文化分布时，他主张用分析的方法，考察每种遗存的分布，利用数量统计来确定随着距离增加，相似度下降的曲线，这是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遗存的分布边界并不是考古学文化边界，前者往往大于后者。但是相互共生的遗存相似度下降曲线地带可能就是考古学文化分布边界，其中心稳定区就是考古学文化分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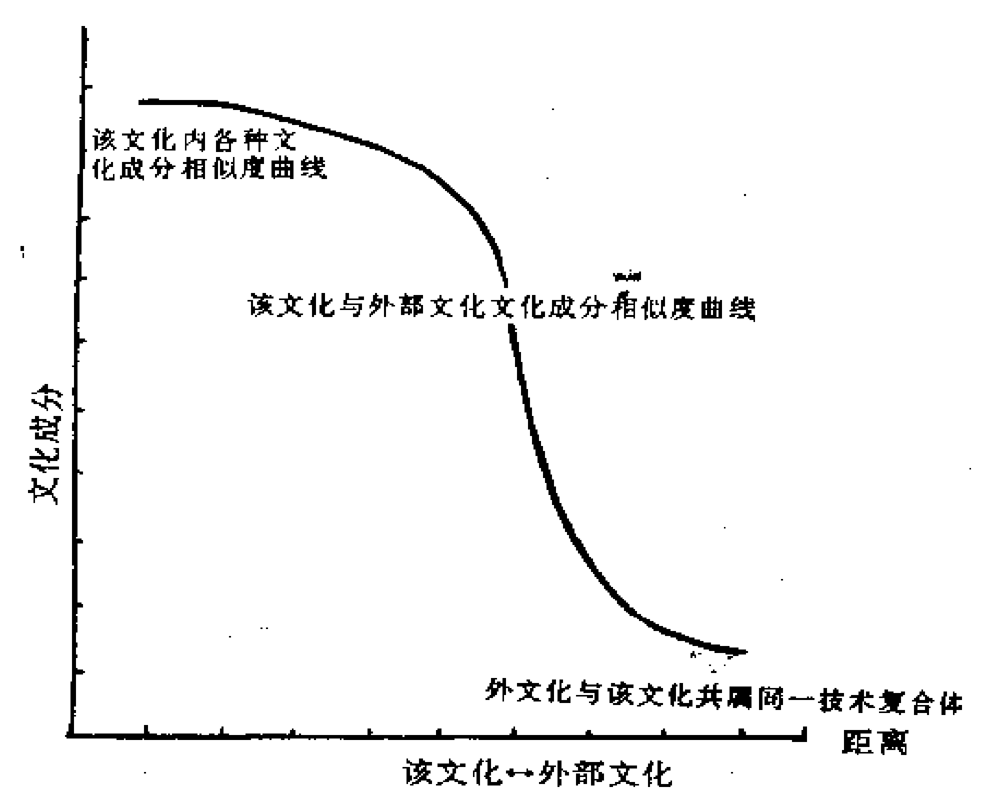
克拉克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州八个印第安部落。发现随着距离的增加，文化相似度在下降。文化区内相似度曲线是平稳的凸型曲线。在文化分布区边界，曲线急剧下降，从 65% 下降为 30%，即从同一文化下降为同一技术复合体内的不同文化。[①]（图十）

在讨论了考古学文化实体的划分之后，克拉克试图建立不同实体与社会、语言、人种有关实体之间联系的假说（表八）。

克拉克认为，要解决考古学实体与社会、语言、人种集团的联系问题，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注意考古学内证，考察各

---

① 克拉克所用的文化相似度是考古学上所能见到的 100% 的特征，它是民族学上能观察的全部特征的 15%。



图十　考古学文化边界的划定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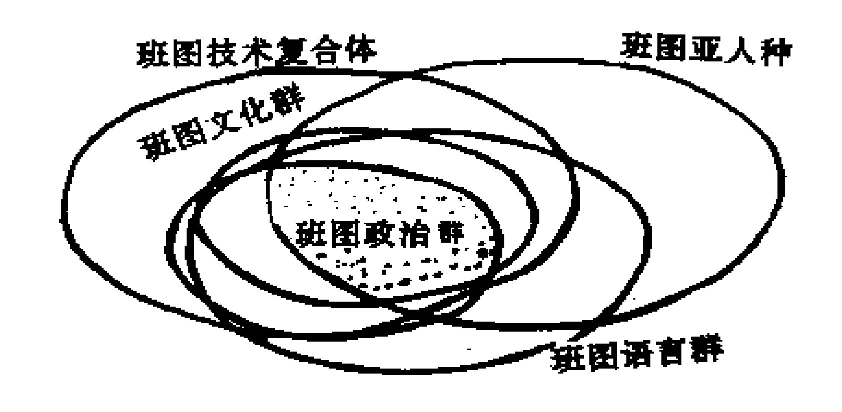
实体在时空上的分布和相互之间的联系。第二种途径是通过现在民族学的证据来了解。他研究了非洲班图（Bantu）族的情况。“班图”是指非洲许多操各种方言或语言的人，它是一个语言群。作为相互联系的班图人，有固定的种族的、人类学的、民族学的和分布上的规则。大部分班图人是非洲人种中混合的亚人种，个别是移入的其他亚人种。班图人在自己的时、空范围内，有特定的社会、民族特征，是复合性实体。因此并不是全体班图人都具备完全相同的特征，而且一些班图人还具有非班图人的特征。他确定了班图人的语言群、人种群、文化群、政治群和技术复合体，发现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人类集团都有少许空间差异，但都有重合部分（图十一）。

这项研究说明：考古学文化与其他人类集团虽然不完全相

表八　社会、语言、文化与人种关系假说

社　　会	物质文化	语　　言	遗　　传
家庭 2～10 人	遗址组合	方　言	亚人种
家庭群 10～100 人	亚文化	语　言	人　种
部落 100～1000 人	文　化	语言群	人种群
部落群 1000～10000 人	文化群	复合语言	
部落联盟 100～(民族)10000 人	技术复合体		

注：这些都是人为划定的，每个实体都无明确定义。



图十一　班图人各群体的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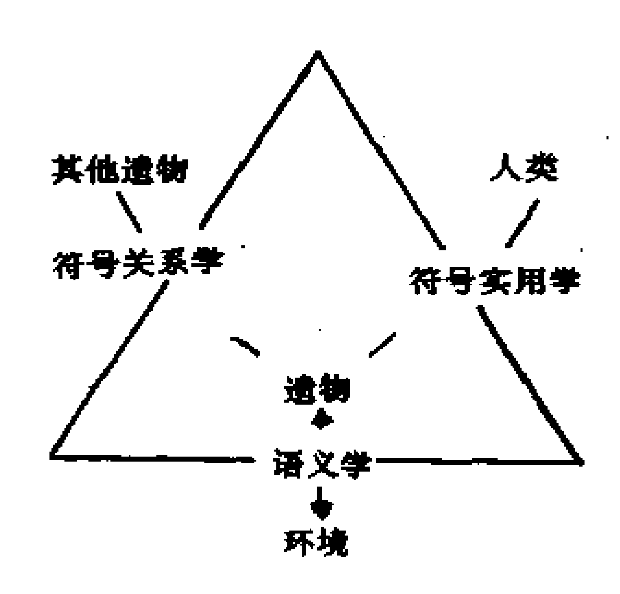
同，但是有一致性。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各种人种集团，虽然十分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

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历史民族的记载来了解。他列举了中欧的瓮棺葬文化群，考古上见到的证据有遗址、陶器、青铜工具和武器、墓葬以及宗教遗物，这与该地区公元前 9—前 5 世纪的文献记述的情景大体相同，这证明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有意义的，尽管不能和历史文献绝对相等。

1．考古学“语法”

克拉克强调考古资料、研究方法和研究术语的特殊性。但是要使考古学研究价值得到社会、学术界的承认，就要明确这些遗存、术语所表达的实际意义，就要把它们“翻译”成一种人人都能读的语言，这就是考古学“语法”。

针对宾弗把遗物分成技术、社会、思想三类的想法，克拉克提出遗物之间的三种联系或“语法”，它们是语义学、符号实用学和符号关系学（图十二）。



图十二　考古遗物语法示意图

语义学表示遗物与物质环境的关系；符号实用学表示遗物与人的关系；符号关系学表示遗物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建立了遗物与其他遗物、与人、与环境的联系。这种语法只是提供了一种用遗存说明历史的思路，至于怎样建立这种联系，克拉克并未予以详细阐释。

克拉克的《分析考古学》与美洲新考古学相比具有自身特点。首先它与原来的考古类型学联系较多；其次它以系统论为指导，但很少谈及进化论。克拉克把系统论与考古类型学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多元模式，但是他没有从技术的发展说明社会

和文化的发展变化。

欧洲的另一位新考古学派代表人物是伦福儒。他在1972年发表了《文明的出现——公元前3世纪的基克拉季斯岛和爱琴海》，这是从新考古学角度研究爱琴文明的杰作。

2. 考古学界对新考古学的反应

在欧洲，赞成新考古学的只占少数。大多数人持否定或观望的态度。丹尼尔在《考古学简史》中对新考古学的评价是有普遍代表意义的。

关于新考古学产生的原因，丹尼尔认为：在美国兴起的这种新运动当然是由于缺乏哥伦布时代之前的古代文献，几百年来没有对世界史学产生过有普遍意义的事件，既没有巨石柱群，也没有马尔他神庙。美洲考古学者对他们掌握的考古证据的贫乏而感到沮丧。为了寻找避难场所，于是便埋头于理论与方法，花费许多时间去讨论"文化过程的阐释"和"文化动力法则"。所以在丹尼尔看来，这些"新的"方法和概念都是在美国研究最无收益的考古资料中发展起来的，"在确立北美较高的文化或文明上并没有迈出几步，也没有一种刺激可以使北美考古学者相信，他们是在研究历史主流中的事件"。

关于新考古学到底是"新"还是"旧"，丹尼尔认为，宾弗把研究进化作为新考古学目标，说明新考古学并不"新"，因为考古学历来都在研究进化和文化过程。这些新考古学家似乎不了解考古学历史，他们应当重读一下汤姆森、沃尔赛、蒙特柳斯和柴尔德的书。丹尼尔还列举了一些美国考古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例如泰勒在评价宾弗的文章时说，文化系统观点始于马林诺夫斯基，宾弗的其他观点也是重复泰勒在1948年发表的"一个考古学的研究"中的看法。布雷伍德对新考古学抨击更为激烈，他认为，新考古学者声称60年代以前的考古学著作都不值一读，是因为他们读不懂，而新考古学的著作只能给学术界带来混乱。

对于新考古学的具体研究，丹尼尔认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运动有许多值得称道，它是植根于泰勒的“一个考古学的研究”，其特点是统计学的应用，环境考古及地理学的类型划分。60年代的新运动有必要归人正规的思想和研究中。目前，特别是对美国以外的研究者来讲，它已经是一团乱麻，其原因是大量艰涩难懂的行话，还有“逻辑——演绎——进化系统的范例”之类的新术语，关于新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丹尼尔认为考古学将重新回到研究人类历史的轨道上去。研究人类行为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对人的将来也是无益的。对人类历史只需要记录、描述、评价和理解。

3．各地考古发现与研究

这时期的发现与研究有着各自的特点。考古发现从原来的埃及、两河流域、中美洲、希腊、罗马引向世界各地的各个时代，被发现的考古遗存的时空范围由点向面发展，因此介绍这时期的考古发现是十分困难的。与此同时，考古研究却形成了几个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研究领域越来越集中。当前世界史前学和考古学主要研究课题有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

人类起源的研究主要在东非等地，包括了化石人类学研究、考古器物学研究、环境科学研究，灵长类行为研究和现代渔猎民族行为及生活的研究。著名的奥杜威地点继1959年玛丽·李基在层位Ⅰ中发现人类头盖骨（年代为175万年）之后，1961年在这一层中又发现一具少年的下颌骨，后来命名为能人，用钾氩法确定的年代为170万年。1966年奥杜威峡谷新丛书第一卷出版，1971年M·D·李基发表《奥杜威峡谷3》和《地层Ⅰ和Ⅱ的发掘》。1972年，理查德·李基宣布在鲁道夫湖东部发现人属头骨，年代早于260万年前。这一发现不仅把人类的出现提早到260万年前，而且找到了人类体质与文化进化的早期阶段，从而证实了达尔文有关非洲可能是人类起源地的

预见。

农业起源的研究在新旧大陆同时进行。旧大陆的研究中心仍然是西亚。上一阶段的考古发现已经勾划出一个新月形的农业起源地带。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加深入。首先是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填补了这一研究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空白，例如1964年萨约吕遗址的发现。这是一个介于安那托利亚高原和利凡特地区之间的早期农业村落，大致相当于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发现了西亚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公元前6800年左右）。另外还开展了对整个西亚动物和植物从狩猎采集到人工驯养栽培的详细研究，涉及到野生品种分布区的研究，鉴定野生与家养骨骼的技术，从各地山羊与绵羊的考古发现揭示这种动物从集中猎取到人工畜养的全过程。最后，在综合研究的同时，还加强了区域性的研究，例如弗兰纳瑞发表的《德卢兰平原史前史及人类生态》，这种微观研究促使农业起源研究更加深人细致。同时，区域性研究把新石器初期的遗址与晚期遗址联结起来，为文明起源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早在二战前两河与埃及已经建立了前王朝序列。但是这些序列基本上是根据陶器确立的。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大大丰富了这些序列的内涵。1964年伊拉克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梭万遗址（es－Sawwan）和英国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乔加·马米（Choga Mami）遗址，使人们对萨玛腊文化的认识从陶器扩大到居住房屋、祭室、聚落形态、墓葬、生产工具和灌渠等方面。前苏联考古队对伊拉克北部耶里姆遗址（yarim）在70年代的八次发掘以及伊拉克考古队对阿尔帕契亚的再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哈拉夫文化的认识。从原来根据陶器进行的文化分区研究发展到对各个遗址功能、地位的研究，发现了这一文化超聚落组织建立的详细情况。人们现在普遍把哈拉夫文化看作是典型的酋邦社会（chiefdom），这是从原始的平等社会向文明阶级社会的重要转折。各国同行对西亚发掘和

研究的另一个意义是把各国不同的方法和手段结合起来，诸如前苏联考古学者对探方地层与遗址地层的准确记录和发表，日本学者对石器的精确统计与分析。这些国际交流将促进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基于这些新资料之上的研究，其内容已经由陶器的比较研究扩大到黑曜石贸易、宗教、聚落形态、陶泥制品出现以及印章在贸易中的作用等许多方面。这些研究更详细地描写了人类在进入文明阶段前夜的历史事实，为研究文明各种因素的起源过程和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河流域东、西边缘的两个发现。西边的叙利亚依布拉遗址（Ebla）是罗马大学发掘的[①]，它揭示了一个尚未发现的王国，发现了城址、皇宫和大量的泥版文书。这个王国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王朝的历史文献中都提到过，它是自乌鲁克时期在两河南部影响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城邦国家。两河东部的重大发现是6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兰伯格——卡洛夫斯基（Lamberg—Karlovsky）在叶海亚（yahya）遗址的大规模发掘[②]，建立了南伊朗从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500年的发展序列（从公元前2500年以后有时间缺环）。从这个遗址可以了解到这里与两河南部和俾路支斯坦的文化联系。依布拉遗址和叶海亚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两河流域与外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考古史料。

在新的理论、方法和发现的基础上，出现了对世界范围内考古成果的综合研究。哈佛大学兰伯格——卡洛夫斯基的墨西哥大学萨布罗夫（Sabloff, J. A.）合著的《古代文明：近东与

---

① Paolo Matthiae: Ebla: An Empire Rediscovered Hodder and Stoughton Editional Office, London 1980.

② C. C. Lamberg—Karlovsky and philip L. Kohl: The Early Bronze Age of Iran as Seen From Tepe Yahya Expedition Vol. 13 (1971) 14—21.

中美洲》对比了两地从农业起源到文明形成的发展过程。[①]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范根（Fagan, B. M.）发表了两本有影响的综合性专著：《考古学导论》和《地球上的人》，[②] 前一本书是概论性质的著作，总结了当代比较成功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研究事例，到1978年已经出版了三版。后一本书是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研究综述，时限从人类起源到人类早期文明的结束。到1986年已经出了第五版。地区性综述有剑桥大学琼·奥茨的（Oates, J.）的《文明兴起》[③]，伦敦大学麦拉尔特（Mellaart, G.）的《近东新石器时代》[④]，曼彻斯特的伯尼（Burney, C.）的《古代近东》，[⑤] 英籍考古学家哈蒙德（Hammond, N.）的《古玛雅文明》[⑥] 和哈佛大学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⑦] 这些书主要是对近东、中美洲和中国的三大古文明地区的研究。

（三）对考古学派的评价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一方面取决于考古学者的学识水平，同时又受到所在国家考古学

---

① Lamberg — Karlovsky and Sablof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Near East and Mesoamerica 1979 by Benjamin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② Brian M. Fagan: 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Fifty Edition Litter,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Toronto 1986 by the Lindbria Corporation; In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tion to Archaeology Third Edition 1978 by Litter, and Company.

③ David and Joan Oates: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Elsevier. Phaidon 1976.

④ James Mellaart: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 1975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⑤ Charles Burney (Cornell Univ.): The Ancient Near Eas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⑥ Norman Hammond, Ancient Maya Civilization Rutgers. 1982.

⑦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our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Yale Univesity Press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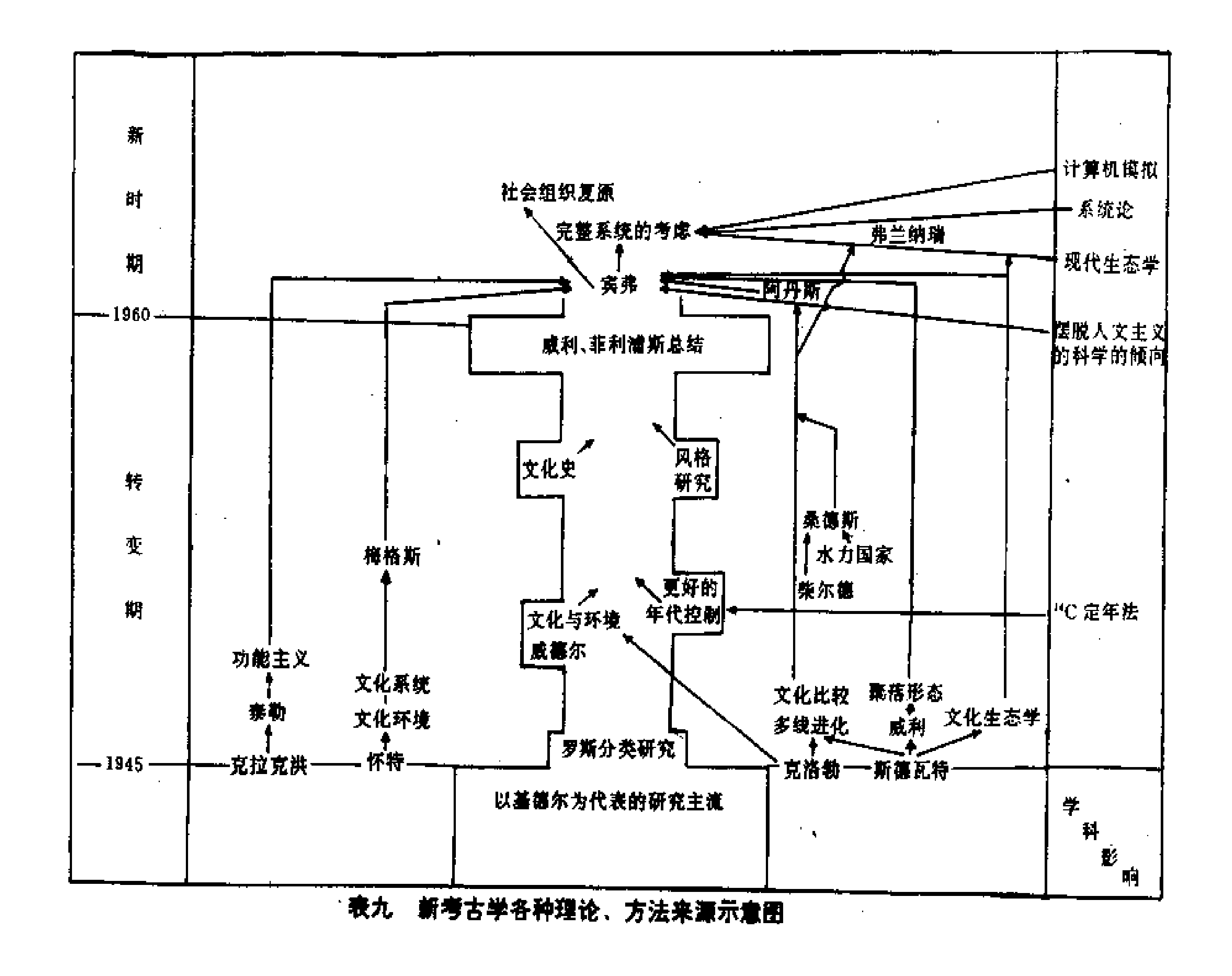
派的影响。总归各种评价，可以划分两类：一是它新在哪里？二是这种研究是否可行？

1. *新考古学派新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新考古学派与从前的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通过以上的详细介绍，可以将新考古学概括为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从系统论角度看待遗存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和社会，运用演绎逻辑的类比、统计方法，探讨不同时空人类文化的异同的文化发展过程。所有这些特征，都不是新考古学派发明的，《美洲考古学史》中清楚地介绍了它们的来龙去脉。(表九)

在表九中，主线是传统的时空框架研究。在1939年罗斯对方法论进行讨论时，人类学影响增强了，有克拉克洪、怀特、克洛勃和斯德瓦特。克拉克洪的影响可见于泰勒的《一个考古学的研究》，这篇文章指出了年代学研究的局限性，主张进行位置联系与功能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对考古学产生影响。向右的第二条线可以看到怀特对梅格斯的影响，这是美洲考古50年代文化进化的再现。再向右的一条线是克洛勃的文化史以及斯德瓦特对环境研究的影响。从斯德瓦特这里发展出三条线：一个是进化论思想指导下，通过多线进化和跨文化比较作为了解文化发展规律的手段；二是威利的聚落形态研究；三是文化生态学，它促使考古学者接受现代生态学方法。在转变期后段，在中美洲从事考古的学者如阿米拉斯（Armillas, p.）桑德斯以及人类学家帕勒姆（Palem, A.）和沃尔夫（Wolf, E.）受到欧洲学者柴尔德的影响，这种影响促进了考古学界对多线进化和文化生态的接受。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使考古学者有更好的控制年代的方法，使考古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对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新考古学就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渐形成了。



表九 新考古学各种理论、方法来源示意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考古学的重要特征从世界范围看不是新的。只是有些特征（诸如进化论）对美洲来说是新的。但是这些原有的特征重新组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特有的研究方式和目标，就构成了新的学派了。例如系统论在没有与进化论结合之前，是从共时的、静态的角度观察和了解文化的变化，有局限性。这种系统论运用的是“机制平稳模式”，很像一个钟摆。在这个模式中所有反馈都是负的，因而抵消了偏差，保持了系统的平衡。这种模式不适合研究文化的进步和变化。当系统论与进化论结合在一起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看待社会和文化时，才能揭示文化进化的轨迹。在这个系统中，反馈有正有负，这种正反馈导致偏差扩大，使整个系统发生变化，促使社会和文化向前发展。

2. 新考古学派的研究是否可行

关于这个问题应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是新考古学提出的目标是否可行？其次是它应用的方法是否可行？最后是按照这一目标，采用这些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怎样？

新考古学把“试图说明和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现象”作为考古学的目的。这个目的使考古学成为一种跨时空的说明和阐释。它对于从前把精力放在某个考古学文化的详细描述是截然相反的。这样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追寻人类发展规律，同时也把个别文化的研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跨时空的阐释使得考古研究不求个案文化的深入研究。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个案文化研究作为基础，将成为无本之木。新考古学的目标把考古学遗存的研究从描述上升到解释、从个别扩展到一般，应当是学科发展的进步，但必须是建立在个案文化的描述研究基础之上。

新考古学的许多方法来自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它令人耳目一新，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丰富了研究内容。例如通过考古遗存对当时的人口进行研究，使人们看到了遗存在这方面的

潜力，尽管方法中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一些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时，往往会发现许多晦涩、生硬的语言，完全是从外学科中照搬来的。许多例子都是来自于民族学研究而不是考古学研究。这里不禁使人想起了罗珀在“论遗址区域分析的方法与理论”[1]一文结尾的一段话，“如今，一个不太光彩的事实是，考古学嗜好于借用别人的方法，而不去发展他们自己的方法。”这说明考古学在大量吸收外学科的方法后，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使其完善为符合本学科实际的研究方法。

新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与它的目标和许诺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夏鼐先生在1984年题为“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不客气地说：“他们叫嚣了二十多年，‘新考古学’变老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拿出一条大家公认的新规律来。”[2]似乎与考古无关的问题也许在新考古学者看来就是研究成果。在新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中，诸如从墓葬研究社会等级化的课题，在没有新考古学的中国和前苏联早已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新考古学研究成果的缺乏主要是许多方法不适用于考古学。所以到了70年代末期，人们不再那么乐观地看待新考古学了。于是新考古学将转入反思阶段。我们将从下一阶段新考古学不断完善、反思自身理论和方法中，更清楚地看到新考古学派的不足。

二、当代考古学发展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至今）

70年代末至80年代，考古学又有新的变化。由于这个阶

---

① 多纳·C·罗珀：“论遗址区域分析的方法与理论”，《当代国外考古学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②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10期。

段距离我们视线太近而且尚未完成，所以很难把握和预测它的发展轨迹。但是如果和新考古学出现时期相比，我们确信这一变化确实发生了。描述这种最近的过去还是一个尝试，它只能是初步的概略，以便从中看出最近发展与过去的联系和区别。只有当正在进行的阶段转化成较稳定的背景时，才能够更详细、完整地描述它的发展过程。

继前一阶段新考古学的兴起和全球范围内关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争论之后，考古学发展进入了反思时期。这是因为60年代考古学的目标与80年代初的实际成果尚存在着很大距离：在解释社会的变化中多是从生态、经济方面寻找原因；把人类文化仅仅看成是环境和技术水平的被动反映；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方面并没有什么重大成果，而且忽视了文化的个性；在利用考古遗存复原历史方面有简单化倾向，忽略了考古遗存从人类活动变成物质遗存直到被考古学者发现这个复杂过程。于是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考古学界出现了一些学派，有的试图想使过程考古学更加完善，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诸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和中程理论，还有的认为过程考古学已经过时了，现在已进入了后过程考古学阶段。

（一）新学派的出现

1．社会考古学

新考古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生态学和文化进化论，这种理论是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们在技术领域中作出的反应来说明社会形态和文化的变化，具有生态学决定论的倾向，比较片面。研究文化变化的原因还应包括社会性的环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探求文化——环境的整体关系。瑟维斯也批评斯图瓦德的文化生态学，提倡研究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文化进化论强调技术是适应环境的手段，并把技术的变革

看作文化变化的首要原因，这是柴尔德以及新考古学解释文化过程的主要理论。这个理论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批判。这是因为这一理论把一切物质现象都看成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手段，于是可以用功能来解释。但是功能主义并不能解释一切文化现象，而且它也不能说明物质和文化现象的起源，不能说明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形态而不采取具有同样功能的另一种形态。这种以文化生态学为代表的过程考古学被称为功能——过程学派。

一些西欧考古学家通过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反对生态学和文化进化论，诸如伦福儒和申南（Shennan）的《阶级、资源和贸易》[①]、斯普里格斯（Spriggs）编的《在考古学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②]。他们引用了许多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这使得80年代在欧洲形成了社会考古学。彼特斯·博古斯基（Petes Bogucki）在"欧洲考古学的理论趋向"[③]一文中把社会考古学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并把1984年伦福儒编辑的题为《社会考古学研究》[④]的论文集作为组成关于社会学目标的明确的纲领性宣言，他们认为，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可利用的自然环境，哪些人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社会产品的所有和分配以及剩余产品和社会加给它的价值。本德（Bender，B.）还批判了以前研究农耕起源时，到环境变化、技术革新和人口压力这些物质因素中探求原因的方法。因为"人口压力和既存社会结构形成不均衡时才成为问题，决定一个社会人口结构的许多因素里有阶层，在那中间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因此向农耕社会过渡最主要的是社会原因。"[⑤] 克利

---

① 参见后滕明："欧美考古学的动向"，《史前研究》1986年1—2。

② 参见后滕明："欧美考古学的动向"，《史前研究》1986年1—2。

③ 选自《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④ Renfrew C., Approaches to Social Archae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⑤ 参见后滕明："欧美考古学的动向"，《史前研究》1986年1—2。

默等人（Creamer，W.）研究中美洲考古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时发现，这里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只有酋邦（Chiefkom）社会，还有部落制社会，他们从考古学上能够观察到的特征，诸如聚落形态、建筑、集中劳动成果、剩余生产、贮藏、专业化、等级、代表地位的遗物、地区内和地区间的贸易、战争和考古学文化边界的变化等，来确定酋邦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差别，丰富了瑟维斯原来的定义。[①]

1993—1994 年笔者在剑桥大学听了伦福儒教授的社会考古学。他在序言中说，社会考古学是要帮助建立重构过去的社会、社会结构及社会相互作用的方法，它是利用聚落考古、遗存的空间资料、贸易交换方式以及墓葬材料来进行研究的。在这门课的讲授中，他用自己研究的成果来具体说明社会考古学的方法和作用，如爱琴文明的形成及复杂社会的演变；英国铁器时代的社会结构；从墓葬、聚落形态、生业、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来揭示北欧从部落走向城市化的过程。在 1991 年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伦福儒提出了具体的社会考古学的方法和内容。

社会考古学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规模，它涉及到社会与空间的关系，怎样划定社会单位。我们常常发掘一个个单独的遗址，它在社会中是个什么单位？它与其他遗址是什么联系，从而确定它是独立的还是从属的，同时每个遗址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例如获取各种原料的地域。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的内部结构，它要回答的问题诸如是平均主义社会还是等级社会？有没有手工业专业化分工？有没有行政管理机构？社会的内部结构与社会规模有密切联系。关于社会发展阶段，伦福儒采用了瑟维斯的划分法，把社会发展分为游团（band）、部落、

---

① Winifred Greamer and Jona than Haas, Tribe Versus Chiefdom in Lower Central America America Antiquity Vol. 50 N. 3.

酋邦（chiefdom）和国家四个阶段。在社会考古中，对于游动的狩猎采集社会和定居的复杂社会在方法上和研究内容上是大不相同的。第三个问题是各个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60 年代以前主要是根据传播论从文化间相互影响来研究这一问题，现在则更注重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

确定社会性质和规模的方法有三步。首先是调查，要搞清遗址之间是否存在着等级差别。采取系统调查法，寻找中心遗址。第二步是聚落形态分析。第一步调查的结果是一张地图，上面标有遗址的面积、年代、建筑等遗迹。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对遗址进行分类，如地区中心、本地中心、聚集在一起的村落、分散的村落、很小的村子等等。在各种遗址中，首要的问题是确定中心遗址以及它的社会、政治范围，从而建立地域内的政治组织。下一步可以根据遗址的范围确定诸遗址的等级。确定的方法可使用"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s)。但是同一等级的居址不一定范围相同。例如在边缘地区的城市可能小于位于中部地区的镇子。XTENT 模式则考虑到遗址距中心址的距离，克服了这一缺陷。最后一步是研究有关社会组织的其他材料，对考古结论加以补充和验证，如古代文献、口头传说、民族志及其他考古遗物如印章和画像。

具体的社会考古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游团社会，它多处于狩猎采集经济水平。确定遗址中的各种活动是一个主要研究课题。这类社会的遗址一般分为洞穴遗址和开阔地遗址两类，它们是临时居住址还是长久定居址？根据遗物的分布要力图确定人们的活动区域和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另一个研究的问题是游动社会范围，例如他们的狩猎区、采集区和季节性迁徙路线。

第二类是研究定居社会，它多处于前国家农业部落发展水平。首先要确定遗址布局，其次是分析单人墓葬有无级别差异，主要是分析随葬品，利用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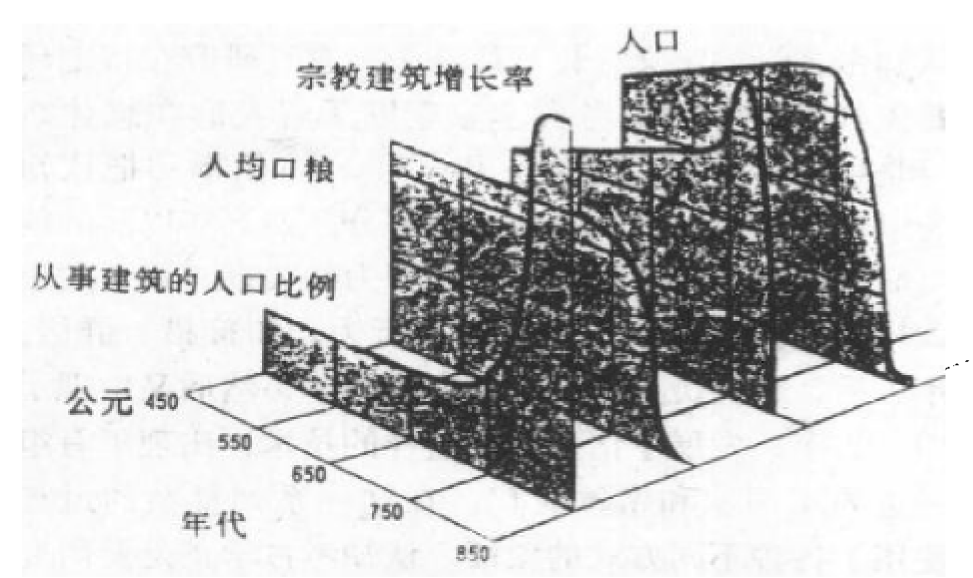
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第三是研究公共纪念性建筑，这种建筑多出现在部落和酋邦社会阶段，如欧洲的巨石建筑（stonehendge），它并不是文明的标志。研究这些建筑主要是搞清它们大致需要多少劳动力建造以及它们在地貌上的分布。第四个问题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婚姻关系、贸易伙伴关系，宗教方面的联系。例如英国南部的公共建筑就是宗教中心，是部落集中和举行礼仪的中心。陶器纹饰则揭示了社会间的联系，但是在陶器纹饰的各种特征中，哪些是部落标志，哪些只是时代风格，是需要谨慎分析的。第五个问题是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手工业专业化问题。在定居社会阶段，出现了村落、墓地、公共建筑和宗教中心，这些都说明这时的社会比游团阶段复杂多了。而了解社会复杂程度的手段就是研究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手工业专业化问题。这时农业已经逐渐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如犁耕、梯田和灌渠，并开始利用动物的乳汁和皮毛。这时的手工业一般处在家庭生产阶段（horsehold unit）。

第三类是研究酋邦社会和国家，它与定居部落社会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要确定最重要的中心址，即首都。这需要调查遗址范围、内涵，并参考古代文献记载。然后利用一系列考古资料的多变量统计，从数据中建立当时的空间结构。其中的一个数据是遗址间的相似系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考古学家琼·杰瑞（John Cherry）利用王室档案和考古资料复原了皮罗斯（pylos）的迈锡尼王国的地理。第二个问题是研究中心遗址的各种功能，可以从血缘关系、官僚机构、储藏和再分配的规模与方式、宗教、手工业专门化以及外贸等不同角度了解社会的运行，这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发掘。第三个问题是中心址以外的行政管理情况，反映这方面情况的许多证据都不出自中心遗址。中心址以外反映行政方面的遗物有陶制印章、度量衡器和保存较好的交通道路系统。第四

是调查社会的等级分化情况，主要是从住房和墓葬两方面入手。第五是研究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农业生产情况（有无犁耕、灌渠等遗存）；赋税、贮藏和再分配情况（例如有无中央政权控制的永久性储藏设施，典型的例子是印加帝国）；有关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情况。最后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是各个独立的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贸易方面的，还有政治方面的，而且常常是对峙的，一种形式是战争（玛雅的战争的目的比较特殊，它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从邻国或邻近集团抢掳首领作为祭祀太阳神的牺牲），另一种形式是竞争，例如在礼仪地点举行竞赛仪式。

在对遗址和文化的变化进行解释中，社会考古学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寻找古老帝国和辉煌灿烂的文明衰落的原因，一直是解释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玛雅文明的消失。在这些解释中，单一原因模式逐渐被多原因、多变量的系统模式所取代，这是与资料的丰富和详细、计算机应用以及系统论在社会考古学中的影响分不开的。在讨论玛雅衰亡原因时，霍斯勒（Hosler）、萨布罗夫（Sabloff）和朗格（Runge）用社会多变量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图十三）。玛雅的衰亡是农业生产率与宗教建筑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在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玛雅的宗教建筑如金字塔一直在大规模地兴建。同时人口也在迅速增加，这些都给粮食生产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变化给社会系统带来的反馈就是人均口粮的减少和宗教建筑的增加。粮食的短缺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面对这种局面，统治者并不是采取增加农业投入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修建神庙，想通过取悦于神的方法求得神的保佑，其结果是人口中更大的比例投入修塔造庙中去，这如同雪上加霜一样更加速了玛雅帝国的灭亡。

从以上研究内容可以看出，许多方面的研究在出现了“社会考古学”这个术语以前就已经相当成熟。社会考古学这一分



图十三　玛雅文明衰亡社会多变量分析

支出现后，把有关社会组织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人们从整体看待社会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

2. 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

认知考古学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是在 80 年代。它主要是研究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剑桥大学考古学杂志在 1993 年发表了五位著名考古学家有关的看法，题为《什么是认知考古学》①，它反映了当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首先，他们一致认为：研究任何历史上的或现实的社会，如果只了解人们的行为，即做了什么，而不了解人们的思想，即人们在想什么，这种研究是不充分的。这说明人们普遍认为研究认知考古学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的研究从自然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组织发展到人类的精神世界，正说明了考古学家本身认识能力的提高。但是关于认知考古学的定义，可行性及其在整个考古学科

---

① Viewpoint: What is Cognitive Archaeology?《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3: 2 (1993).

的地位，尚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关于认知考古学的定义，伦福儒认为，它是研究在特定环境下象征着怎样被使用的。考古学家难以了解人们在想什么（what），但是可以了解人们怎样去想（how）。伦福儒把认知考古学分为以现代人出现为界的前后两部分。四万年以前的前一部分主要研究的内容有工具的制作与智力的关系、语言的出现、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合作行为，如狩猎、群居。距今四万年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定居村落，然后又出现了城市，使用了文字，发展了诸如冶金这样的技术，出现了有组织的宗教，进入了国家和帝国时代。在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中，人们使用了各种不同方式的象征。认知考古学正是要研究人们在设计图案、规划和测量单位中，在处理社会关系以及与超自然的关系中，用文字和绘画等艺术手段表现思想时象征符号的使用。

皮伯尔（Peeble，C.）认为，认知考古学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哪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认知能力？第二，当时人们掌握了哪些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知识？

荷德（Hodoler，I）认为，认知考古学首先要研究遗物所代表的语言，即它的象征意义，这就好像现代人看到国旗和交通信号灯就能理解它们所代表的语言一样。其次，它要研究遗存或遗存分布状态所代表的人的行为。例如我们研究墓葬，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死者的社会地位，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可以了解人们处理死者的一种行为。最后，认知考古学还要研究考古学者本身认识历史的能力。荷德的定义既包括了本体论，又包括了方法论和认识论。

苯德（Bender，B.）对认知考古学的定义与荷德的最后一个研究内容相同，即研究我们认识历史的途径，把认知考古学放入方法论、认识论的范畴。比如，我们关于“野生”和“人工栽培”的定义很可能与远古人们的看法不同。这样我们在划

分“野生”和“人工栽培”的定义时就是把我们的认识强加给古人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与“他们”在观念上的这种差别。

弗兰纳瑞认为认知考古学具体研究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宗教、思想观念和肖像的象征，世界上所有文化有自己的宇宙观，即对万物的起源、结构和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根本概念的看法。它既受该文化的环境、生存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它们。例如希腊人把自然环境看成是神的活动领地，他们崇拜森林，禁止随便砍伐，砍掉的要在适当的时间再重新植树。罗马人则认为，自然界就是被人类利用的，因而意大利的森林被罗马人砍光了，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进口木材。这两种宇宙观反映了对环境的解释，又直接决定了人们对环境的态度。宗教可以分成信念本身、为达到信念的一系列活动和神学观。他举例说明马来西亚、缅甸和爪哇的许多现象都可以从佛教来解释，这些都是由印度商人传播过去的。思想观念也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没有等级的社会中，每个村落有自己的祖先神，一般只能追溯三～四代。等级出现以后，每个地区都有统一的谱系，各神之间也分等级。酋邦社会以后，贵族世系变成世袭的，只有一个神有实际权力，其余的神只有道义上的权力了。肖像象征主要是研究在艺术中人们观念的表达。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林娜里斯（Olga Linaes）在 70 年代对一批高等级墓地中随葬的彩陶器纹饰的研究。她在研究中从民族学文献、动物学常识、遗物出土的具体环境和器物类型学这四方面入手解释了陶器上各种动物纹饰的含义。这里是美洲热带丛林，动物种类非常多，可以表现人的不同性格，有吃人的，有被人吃的，那种凶猛的动物多是表示武士，象征他们的勇敢、凶悍（图十四）。

关于认知考古学的可行性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地位，作为惟一的一位美洲考古学家，弗兰纳瑞提出了一系列鲜明的观点。



图十四 陶器纹饰中的凶猛动物

他认为，认知考古学是相对于生业——聚落考古而存在的。最初，有许多人怀疑这种学说，认为它没有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80年代以后这个学科逐渐被普遍接受。但是它的可行性是有条件的，是在资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像那种在不了解任何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把前陶时代大量的女性塑像都简单地说成是“母神”像，实在算不上认知考古学研究。弗兰纳瑞根据林娜里斯研究动物纹饰的象征意义的例子说明，认知考古学也需要做田野工作，扎扎实实地分析大量考古资料，决不是像少数不从事田野工作和分析考古资料的“沙发考古学家”靠灵感所能完成的。

关于认知考古学在整个学科中的地位，荷德强调它的社会性，即认知考古学不能够脱离它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社会结构来讨论。弗兰纳瑞也认为，由于林娜里斯也是一名出色的生业——聚落考古专家，因而认知考古学并不是由某些专门的人来研究的，它需要其它考古方面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认知考古学不应作为一个分支从考古学中分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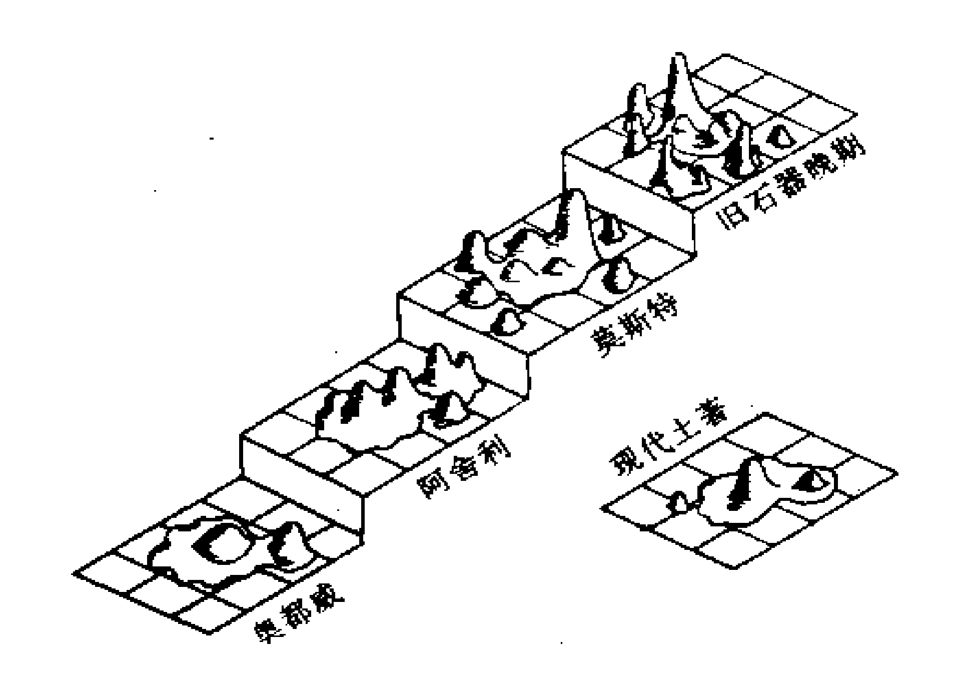
关于认知考古学的兴起，荷德认为这与相关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心理学中计算机的使用使智能研究产生了革命。人们认识到，人类的智力理解也可以利用诸如数学、逻辑学等正式方法进行分析。这个影响最先出现在人类学，例如研究亲属称谓所反映出来的人们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然后才影响到考古学。

伦福儒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认知考古学，系统地阐述了考古学中有哪些证据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要进行认知考古学研究，首先要了解它的理论与方法，即符号象征理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人类会使用象征。一个物体在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一个符号，如一幅画，一个字或一个音，所有思想和语言都基于象征。词汇本身就是象征，某个词或某个音节就代表或象征着

现实世界的某个事物或概念，而这个词所象征的事物或意义完全是人们赋于它的，是人为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人”这个词为什么要代表最高级的灵长类而不代表其他别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每个特定的文化传统中都有自己的符号象征系统。我们基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了解到的符号象征意义去推测和理解考古遗存中的象征意义往往是会失败的。在从事认知考古学研究时，只从遗物本身是难以推测其含义的，还要看它的使用方法和它所处的具体环境（如出土时与其他遗存的相对位置和共生关系），对遗存的象征意义可以得出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需要新的资料进行验证，不断完善解释。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没有用处，我们发掘到的遗存主要是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的思想的产物。伦福儒认为，认知考古学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发现的遗存部分是人们的思想、意志的产物，即精神产品，任何时代的人都有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在头脑中构成一幅认知图（Cognitive map），同一社区的人们具有同一文化，操同一语言，所以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图。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这种同一群人的认知图，以便了解这些人使用符号象征系统的方法和这群人内部的关系。

从人类在地球出现到现代人的形成这段漫长的人类体质进化过程，人们的思维也在发展。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研究了旧石器早、中、晚期石器类型的种类和数量，发现随着人类的进化，工具种类在增多，某一种工具的比例在不断的增大，这说明人们在制造工具之前在心中已有逐渐明确的工具形状了（图十五）。在距今200万至150万年前的遗址中已经可以确定出活动区居住遗址了。这种可以辨认出来的人们活动的地面是需要比较长期的、反复的行为才能形成，它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已经比较固定。旧石器时代考古一个仍未解决的重要问



图十五　石器种类、数量变化图

每个山峰代表一种工具，山峰域和高度代表该种工具所占比例

题是，从什么时候起住在邻近地区、开发相同资源的人们出现了行为和物质设备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功能不同（即代表了不同工具类型），还是文化的不同？现代人之前人们认知方面的另外两个问题是，人们从什么时候并且怎样有意识地埋葬死者？怎样用绘画、雕像表达思想？以上问题还有待更多的资料和更先进的分析手段才能回答。

现代人形成以来，人类的思维活动的产物种类繁多，非常复杂。但是可以把它们大致归入以下几类：1）人们对于时间、空间、重量和体积等等的测量符号系统，它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2）规划布局，从新石器时代村落到金字塔和城市布局，这些表现了人与未来的关系；3）社会组织与权力的象征，例如历史时期的货币，它既是一种价值的符号，又反映了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史前时代的价值与权力的象征物常

常发现在墓中，有些可以从现代社会中的军衔中去理解。这一类象征系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宗教遗存象征着人类世界与超自然界的关系。对于如何确认考古中的宗教遗存，伦福儒提出了四类标准。第一类是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地点、建筑和设施。举行宗教活动的地点是在自然环境中经过精心选择的，常见的有洞穴、小树林、泉水边和山顶部。这种建筑是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即祭室庙宇和教堂。建筑内有特殊的设施，如祭坛、供桌，长凳和焚化供品的灶。另外还有一些可携带的设备，如灯、钟、礼器、香炉等等。第二个特点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即圣区往往和普通活动区域有明显的界限，并且常常有清扫、维护的设施，如池塘。第三类是被崇拜的物体，常常是以人像、动物像或某种抽象符号出现，在墓葬也常会遇到。第四类是参加者和供物，对神的崇拜要有崇拜者，并举行一些活动。在苏美尔神庙中常常发现依墙而立的成排的还愿像，它们代表着崇拜者向神祈祷。在神像的底座下有时还印有向神祈祷 内容，例如希望神保佑他的病体早日康复。还有一些舞蹈、音乐和服药等活动。供物有作为牺牲的人和动物，还有各种食品和被有意毁掉的精美彩陶器，以及大量的财富及资源（这些往往反映在它的建筑和设施上或作为窑藏形式保留下来）。以上这些确认宗教遗存的证据，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地点全部发现，但是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在发掘和整理中注意这些线索。

最后一类人类思维的产品是艺术品，它们是直接通过符号来表现人们的内心世界。所以艺术品是我们窥测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的窗口。雕塑是一种三维表现形式，是人们思维上的飞跃。它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只限于欧亚地区，进入农业社会早期，世界各地都有发现。这些肖像多以女性为主，有的性别特征并未完全表现出来，一般把它们称作“地母”或“丰产女神”，但是论据非常脆弱。到了文

明时代初期，或更早一些时候，许多地方出现了近乎真人大小的塑像，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创造。绘画或刻画是二维表现"形式"，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表现的往往是若干事物以及它们的构成方式，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人们如何看待空间。还有一些艺术表现形式是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装饰，它往往采取抽象的表现形式。尽管分析装饰纹样的方法很多，但目前比较成功的是对称分析法。数学家发现，纹样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对称个体，有人提出纵向对称纹样可以划分为17种，横向的可以划分为46种。从人类学资料中可以看出，原始民族对母题的排列决不是随随便便的。某一群人偏爱某一种对称纹饰，两个人群之间选择相近的对称纹饰往往是联姻的结果。神话是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人类学家根据神话传说研究当时人们的思维逻辑，原始民族的神话有着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哲学。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创世纪"。只有了解了该文化的神话，才能更好理解它的艺术作品。

以上几类遗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人类的思维、观念和信仰，研究的结论只是一种假说，而且还需要参考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资料。

3．*后过程考古学*

后过程考古学是由欧洲考古学家相对于美洲的过程考古学提出来的，并且受到外学科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超现代派的很大影响，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荷德·I[1]。顾名思义，后过程考古学意味着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过程考古学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种看法遭到许多社会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研究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过程考古学并没有结束，只不过进入了自我完善阶段。由于后过程考古学是作为一个阶

① Hodder·I,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In M. Schiffer (eds.) ＝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s and Theory8, 1985.

段而不是作为一个学派提出的，所以内容比较繁杂，分支也比较多，但是它们有一些明显的、区别于过程考古学的共同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结构主义和象征理论。这是荷德在研究非洲民族考古学中提出来的。他在探讨不同风格遗物的分布时，开始是利用过程考古学派的功能主义理论来解释。但是他发现很多现象难以适应功能理论。于是他转向了符号、象征理论，把它作为研究物质文化的理论方法。这些考古学家受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影响，强调人类的行为是受信念和符号概念控制的。不同文化中人们思想常常有一些普遍的东西，例如一些反意词在许多社会中是一样的：生和熟，左和右，肮脏和清洁。有的学者研究陶器纹饰的排列，认为排列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对称与血缘划分及其在空间分布有关。但是他们尚不能证明这种联系是一种必然。

后过程考古学的第二个特征是把"读史"[1]和了解遗存的意义（meaning）作为研究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提出一种诠释的方法（Hermeneuties）。这如同读一本书，每句话和每个段落要靠理解其中的每个字为基础，了解每个字又离不开对它所处的句子和段落的理解。每个字就是考古中的单个遗存，它所在的句子和段落就是遗存所在的背景（Context）。荷德强调对遗存背景的研究。这个背景小到遗存出土的地层、单位、相对位置和共生关系，大到它所在的遗址、文化和自然与社会环境。他把这种研究叫做背景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它的理论根据是，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是特殊的，是历史传统延续下来的结果。同样一件物体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所以考古学应采取人文的、历史的方法，而不能像过程考古学那样过多地依赖自然科学，去寻找人类社会发

① Hodder, I. Reading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展的普遍规律。自然科学只能提供各种信息、数据，这些信息和数据在具体文化中的意义还要靠历史学和人文科学来解释。

后过程考古学的第三个特征是把人作为一种能动因素来看待的，而过程考古学是把物质文化和人类行为看作是被动的，是对环境适应的结果。后过程考古学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经济基础的从属现象，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解释文化变化时，运用辩证法把文化变化原因归结为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过程考古学则是从环境变化，人口压力和技术，生业的变化中寻找原因。

后过程考古学目前有以下几个分支：第一个是以荷德和他的学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主要特点是象征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背景考古学和诠释学；第一个是以佛里德曼（Friedman）等人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重视对社会的多种解释，提出中心地区——边缘地区理论（Core—Periphery Theory）；第三个是以布莱德利（Bradley）等人为首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主要是剑桥大学以外从事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研究的考古学者，强调社会考古学；第四个是以迪兹（Deetz）等人为首的北美历史考古派，重视社会政治方面的研究，运用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领域有意义（meaning）、个人与阶级、意识形态，奴隶制和少数民族以及欧洲的影响等问题；第五个是女性考古，主要产生在北美和斯堪的那维亚，研究妇女在当代考古的地位，研究对历史的解释与当前性别不平等的关系；理解历史上性别构成与人类自身的繁殖；第六个是社会——政治研究学派，这一学派研究的问题很分散，如再生堆积、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工业社会遗址等等。

后过程考古学派和外学科的联系比较紧密，一方面把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思潮带到考古学中，另一方面也有把考古学引入哲学的倾向。有人曾在文章中写道：考古学只讨论事实，如果在研究真理，请到隔壁的哲学系去。这反映了一些

考古学者对后过程考古学派的看法。

4. 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以上的新学派（即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和后过程学派）所研究的问题并不全是新提出来的，但是他们把相关的问题集中起来系统研究，一方面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同时又加快了方法的成熟。这些学派尽管观点不同，但都是针对过程考古学的某些倾向提出来的。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解。一般把它叫做新马克思主义，以区别柴尔德、前苏联和过程考古学以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

西方理论界一直很活跃，不断地出现各种“主义”。但是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①②]。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承认，虽然在政治上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分析社会、解释文化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辟的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对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古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地位相同，意识形态有时也会起决定作用。这一观点促进了认知考古学的形成。后过程考古学把人和人的意识作为能动的因素，反对简单的反映论，重视社会实践。

新马克思主义另一个特点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要是为了交换而从事的生产）相互作用原理来理解社会的结构、运行机制和变化原因。新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社会之间的交往，研究地区之间相互依赖和不平等的关系，提出中心地区——边缘地区理论。社会考古学派虽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分析的模式，但是他们不轻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中总结

① Matthew Spriggs (eds.) Maxist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MeGuire, R. A Marist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1992.

出来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主张用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绝对尺度去衡量每一个文化的具体社会形态。例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部落阶段没有阶级，那么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等级差别？如果有，这种等级与阶级应该如何下定义。所有这些新的学派都主张把考古遗存放人特定的文化传统中研究。

新马克思主义在考古学界主要分两支：一支是欧洲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形成于 60 年代的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受法国人类学中结构主义影响很大。另一支是北美历史考古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社会史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关系、种族关系和性别关系。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考古学中的反映。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同所造成的，尤其是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的认识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重视马克思早期富于思辨的著作，东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则比较重视马克思的较为成熟而定型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实践观和主体性以及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东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则比较强调物质本体论，客体性和认识的客观性研究。”[①] 另外，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还与西方学术传统有关，反映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特点，例如人本主义强调人及主体性作用，对新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新马克思主义注意研究和吸收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部分或因素，说明他们没有使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脱离。

总之，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仍是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与意识，在历史上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① 张翼星：“关于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94 年 2 期。

的关系以及人的活动是被动的反映论还是主动的实践论；共性与个性，即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5．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

早在1973年伦福儒编辑的《文化变化的说明》这一论文集，对新考古学初期作一总结，其中李奇（Leach）指出：考古学者能得到的推论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考古学者不能直接观察过去。这时社会学中的“中程理论”由拉伯（Raab L. M.）和古得耶尔（Goodyear，A. C.）介绍到考古学。[①]

中程理论被介绍到考古学后也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仍然把它看成是纵向模式的连结点。拉伯认为，考古学正面临着理论建设的挑战，要摆脱当前理论处于一个平面的局面，就要按理论规模和复杂程度建立等级关系，最后集中到更普遍的理论。在这个等级中界于低层经验型和高层普遍型之间的就是中程理论，谢弗的观点与此略有不同。[②] 他认为中程理论不仅仅局限在对文化过程进行阐释的社会理论中，在对过去生活方式进行复原的复原理论和收集、分析遗存的方法论中也都存在不同等级，也有中程理论。

中程理论的第二种理解是仍然把它看作是横向模式的连结点。张光直教授来我校讲学时是这样阐述中段（程）理论的：中段理论模式是决定文化中各种个别成分彼此间交叉的法则。假定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在生存时各种文化成分是彼此关联的，当它死亡后，各种文化成分分散了，关节破开了。现在就要通过关节之间的联系规则复原过去的社会。这些规则都到哪里去找？这就是考古学与民族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到各种文化成分联系的关系。以上这段话不仅形

---

① Raab，L. M and Goodyear，A. C. Middle—Range Theory in Archaeology：A Critical Review of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American Antiquity Vol. 49 (1984).

② Michael B. Schiffer，The Structure of Archaelogical Theory American Antiquity Vol. 53 (1988) N. 3

象地说明了中段理论，还指出了研究的方法。这种观点虽然出发点是横向模式，把散乱的个别成分组合起来，但实际上也就是把资料上升为理论的过程。

中程理论的第三种含义完全摆脱了社会学中中程理论的影响，而且应用也最为普遍。它首先是由宾弗提出来的，它是指从静态的遗存通向动态的古代人类社会的桥梁①。既然人们无法看到和检验通过遗存得出的推论，那么就只有通过研究遗存形成的过程来检验对遗存作出的推测和解释，并发展这一方法。要想通过现在遗存了解过去的人类行为，就必须了解过去的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如何形成现在的遗存的，也就是要在过去与现在、行为与物质遗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已知的此岸走向未知的彼岸。从过去的人类行为到现在的考古遗存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是遗存的制造和使用过程；其次是遗存使用后到堆积的形成这一过程，最后是堆积形成到现在遗存被发现的过程。与这三个阶段相应的分别是物质文化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理论、废弃物形成堆积的文化转化理论和堆积后的自然转化理论，这三者就构成了宾弗的中程理论。

根据现在的遗存复原过去的社会，首先应用的中程理论是堆积后到被发现时的自然转化理论。这种研究的第一个作用是通过科学方法去掉非人工所为的遗痕，从而使遗存和文化行为的联系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在影响考古遗存时也留下了自身行为的记录——自然遗存，因此这种研究的第二个作用是为复原自然环境及变化提供证据。

自然转化理论在考古学中是一个基本独立的领域，并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例如生物学中木头腐料原理，啮齿类动物和其他动物影响的动物行为原理以及地貌学原理。宾弗在这方

---

① Peter Kosso, Method in Archaeology: Middle Range Theory as Hermeneutics American Antiquity Vol. 56 (1991) N. 4.

面有很多深入的研究。考古研究通过这一领域达到多学科合作。但是考古学对外学科的需要一般只是它们的低层理论，例如我们只关心全新世的形成过程，而不需要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气候变迁等高层理论。

在复原过去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排除了遗存中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把人工物的有意识行为状态（即代表文化系统的制造和使用遗存的行为）与无意识行为（即废弃活动）区分开来。

在有关废弃活动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废弃物的处理，它有助于推翻一些既定的看法并促进新的分析技术的产生。例如许多研究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被分析的人工遗存是作为最初的（原生的）废弃物被堆积在此的，所以就根据这些遗存推测在这里发生过什么行为。但近来的研究表明：在遗物堆积中，保留在最初被废弃地点的遗物是有限的，在所有的聚落中，当从事的活动完结后，都会产生破碎和磨损的人工物，它们变成了废弃物进入了废弃过程。它们的废弃过程大体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活动区内不保留任何废弃物，一旦用品报废便被扔到堆放垃圾的地方，这种废弃物叫做“原生废弃物”；第二种情况是在活动区内经常暂时保留一些废弃物，隔一定时间后才被运到堆放垃圾的地方，这种废弃物叫做“再生废弃物”（也许在堆放在活动区内还被重新利用过）；最后一种情况是有些废弃物始终被遗留在活动区内，例如小型骨针等废弃后掉在活动区内或被踩入地面中。这种废弃物叫做“残留原生废弃物”。以上这些划分都是通过实验和民族学观察得来的。谢弗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是十分突出的。[①②]

---

① Schiffe M. B, Behavioural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② Schiffer M. B.,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8

排除了自然因素影响和废弃行为之后，复原工作便进入了物质遗存与人类行为和文化系统相互关系的课题中。确定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物质文化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联系是考古学科的一个核心内容。一方面，人工物凭借着它的形态及发展演变、空间分布、数量以及相互联系，提供了推测人类物质文化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文化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理解物质文化就能够得到关于社会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运转和变化的重要见解。因此，物质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理论与阐述社会的理论又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是根据遗存的形态和痕迹等特征了解遗存的制造和使用情况。遗存的制造研究如打制石器，可以从石核台面的形状以及位置、角度判断打下的石片的形状和大小。遗存的使用如石器微痕研究，可以将使用关系和留在石器上的痕迹联系起来，这些关系可以从实验中得出。

其次是有关物质现象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了这个目的许多考古学家开始了民族学调查，试图在现代落后的少数民族中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许多考古学家经过民族学调查或民族志研究后发现，以往通过物质现象所做出的社会复原往往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婚后居住原则与世系计算并不像考古学家认为的那样有着直接联系，甚至一个社会的婚后居住原则与实际的婚后居住选择之间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实际婚后居住选择要受到各种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样，陶器风格的稳定与变化，除了与婚后居住原则和世系计算有关，而且还反映了使风格与器型以怎样的规范存在的社会理想。荷德在《活动的象征》一书中讨论了埋葬制度与亲族制度的联系。他以麦萨肯族为例说明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这个民族按母系计算世系，但却从夫居。因此女子出嫁到丈夫集团，死后归葬于婚前所在集团的墓地。他对此的解释是：这个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是男性优越的社会，而死后却强调按母系计算的理想。荷德还从民族志

和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文化不能完全反映文化与人口的传播和流动。他对非洲西肯尼亚三个部族之间的人、物交流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物质文化分布在说明这种现象的有效性。部族中常常有女子嫁到边界以外，可是物质文化分布显现的却是与男性有关的物品的向外传播，这是因为女性地位低，因而迅速被新部族同化，她们的移动很难被实际的物质文化所反映。以上这些民族考古学虽然并不能推翻以前做出的各种结论，但是已经提出了质疑，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今后下结论时要充分考虑到民族调查中揭示的复杂因素。

6. 小结

从这些学派的形成与特点看，它们都与60年代的过程考古学有一定联系，是从不同的角度弥补了它的不足。在这些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主要在欧洲。中程理论主要在美洲，尽管美国的克拉克早已提出了类似的堆积前理论、堆积理论和堆积后理论，但大量的研究工作是以谢弗为代表的美洲考古学家进行的。在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

与人类学有密切联系，并受其很大影响。在方法方面注意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在研究中重视生态环境、生业情况和经济因素。

欧洲各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特色。它一方面取决于各国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受到考古遗存特点和美洲过程学派影响大小的制约。欧洲各国受美洲过程考古学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这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有关。英国也出现了以大卫·克拉克为代表的有自身特色的过程考古学派。其次是西班牙，也受到美洲过程考古学的影响，再次是斯堪的那维亚，受影响最小的是意大利等远离大西洋的欧洲国家。从学术传统看，意大利有长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产生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法国以人类学为特点，结构主义结论有重要作用。德国有地理学传统，因而注重聚落分析。受各地考古遗存特点的制约，希腊由于它在古典世界的巨大成就只以古典时代考古为主。法国和英国等一些国家的考古则分为当地的史前考古、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和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为主的近东考古三个部分。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考古是文化史研究的典范，60 年代受新考古学的影响产生了四种研究方法：人类学方法；运用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的定量分析类型学方法；受英国新地理学影响的、以聚落史为目标的地理学方法；生态和经济研究方法。总之，用荷德的话来说，欧洲考古学与美洲的不同有三点："强调历史学、倾向马克思主义、重视社会结构"。[①]

（二）当代考古学实践

当代考古学的发展和变化很快，它不仅体现在各理论学派

---

① Ian Hodder：《Archaeolgical Rheory in Euope — The last Three Decades》London，New York 1991

的提出和变化，而且还反映在日益改进的发现技术、新的分析方法以及资料处理程序方面。这些进步大大丰富了史料信息的数量、种类并提高了质量，这使得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都使考古学科的性质发生着变化。目前普遍认为考古学“危机”，或称作考古学方法论的革命，因为现在已经认识到过去的手段、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了，但是我们除了那些旧的、大家已经公认的手段以外，还没有出现什么非常普及的新概念和方法来代替和补充它们。这就是反思阶段的特征。

1. 田野考古学①

近20年来，田野考古学变化很大。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的规模都在增加。大量的遗物面临毁坏的危险，各国纷纷制定立法，拿出一些经费用于抢救遗址。这时的田野发掘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夏季组织大学生进行发掘，而是建立了固定的行政组织来管理发掘。另一方面，田野考古工作者和室内研究者已经取得共识，要把理论、方法和实践结合起来，解决具体问题。在制定发掘、研究方案中，往往是几个考古分支，如聚落考古、比较考古、民族学考古、实验考古结合起来完成一个共同的题目。

在田野工作之前，首先要制定一个研究计划。研究计划一般是以地区为单位进行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个文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田野工作大致分三步：首先是遗址定位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二步是调查和试掘，第三步是选择遗址进行大规模发展。

调查可以分两步，先是初步调查，可采用航空摄影和地面调查两种形式。主要是为了搞清遗址及其大致年代和面积，然

① 选自《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19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后是比较细致的地面调查，目的是了解遗址的功能、准确的空间范围、人口密度、遗迹布局。地表调查可采用电阻率方法，根据地下土壤的导电率差别，找出地下的建筑遗迹。也可使用地磁法，通过磁性的变化判断出被人类活动扰动过的土壤。硝酸盐调查法是用化学试验的办法寻找地下的有机物废弃物，可以通过探方采样确定它们的范围。

根据以上的调查工作，可以选择比较理想的遗址进行发掘。发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了解遗物和遗迹的类型，还要了解人类在这里从事了哪些活动。这需要详细了解遗存的空间布局和它们出土的具体情况。为了这个目的，发掘中的探方法渐渐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大规模的全面揭露法（open area excavations on a large scale），这使得空间分布形态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方法是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考古学家在30—40年代创立的，从5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完善。它强调的是遗址的平面而不是剖面，这要求对发掘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和记录。例如采用摄影测量学（photo grammetry）和新的描述地层关系的方法。但是如果整个遗址都按这种方法进行的话，如果遇到堆积为许多薄地层构成的遗址时，发掘会持续几十年，所以常常是对某一时期的地层采取这种方法以便揭露它的全部平面，其它层位则不采取这种方法。在抢救发掘中，往往是用机械手段下挖直到接近遗迹布局显露出来时，才采用全面揭露法。

在收集遗存中，自然遗存和反映经济生活的遗存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它们是复原历史的基本素材。这需要非常细致的工作来收集土壤标本、动物标本、鱼骨头、植物种子等等，常常使用选筛法和浮选法等技术。

在记录遗存时，开始使用微型计算机。尽管这些技术还不成熟，但是这种方法将来会有很大发展前景，尤其是在资料的发表和编辑中以及遗址分析中。它将促进所有信息，不论是以

地区为单位还是遗址为单位，用计算机汇总起来进行讨论。[1]同时记录的严格化和标准化也有助于重要遗址之间的比较。但是有一点不应忘记，以上这些方法只能使得发现这些已经保存下来的遗存的方法更加完善，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推测和了解那些导致遗存在形成堆积和直到被我们发现这一漫长时期被歪曲和消失的因素。所以我们想要找到的信息与我们已经获得的信息总是有很大差距。

2. 考古学研究举例

当代考古学研究是文化史研究上升为历史重建的结果，是不同学派结合的产物。

A. 首先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进展[2]：

a. 对自然遗存研究的拓展

哲通遗址位于中亚土库曼共和国，在新石器时代属于西亚文化区的东端。1989—1992 年英国、俄罗斯和土库曼联合考古队对这个遗址再次进行发掘（1904—1908 年美国考古学家庞皮利发掘了两个土丘。1957 年麦森再次发掘，并命名为哲通文化。见 D. R. Harris and others, Investigating early agriculture is Central Asia: new research at Jeitun, Tulkmenstain, ANTIQUITY, 1993）。这个遗址自然遗存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 90 年代初的研究水平。

对动物的研究，主要是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人们开发利用了哪些野生动物，它们在生业中起什么作用？（2）家养动物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被饲养和使用的？（3）建筑遗迹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可否帮助我们认识建筑的功能？（4）从动物遗存

---

① 杨建华、滕铭予：“恰塔尔遗址发掘——国外田野与发表工作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9 年 8 月 11 日。

② 杨建华：“西亚史前考古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6，11。

中可否了解生业的变化?(5)这里对动物的使用、利用情况与该区其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哪些差别?

通过动物遗存的分析，大致可以说明这样三个问题：猎取瞪羚、野羊、狐狸等作为辅助食品；以畜养羊为主，并以食肉为主要目的，采取公山羊畜牧的方式；了解了动物宰杀和食用的场所。

除了动植物遗存之外，对石器的使用痕迹的观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石片用于狩猎和屠宰，镰用于割谷草，杵、臼和磨盘用于加工谷物，刮削器用于制皮，刮刀用于抹砌房屋的墙壁和地面。

从哲通动植物研究这一实例中可以看到，研究的内容已从单单确认野生与家养的种属及其比例扩展到与生业有关的各个方面，如从收割到加工的整个过程，由燃料到羼和料等。研究中采用设问的方法，这是基于几十年的研究经验来预测发现的内容，从而有助于开发发现物潜在的信息。

b. 利用人工遗存研究生业活动

80年代以前对生业活动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动植物自然遗存，多采用自然科学手段，8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逐渐应用人工遗物、利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这一课题。

伊拉克北部杰齐拉平原的乌姆·达吉巴亚遗址在70年代初由克科布莱德女士带领进行了四次发掘。这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

在全部打制石器中，有92.6%是原料和废料，没有二次加工的痕迹。余下的是经过二次加工的工具，共1009片，分为二十六种，即：石叶197、石片165、镞41、钻54、喙形石片7、刮削器132、雕刻器26、齿状石叶50、镰叶2、刀形片158、四边形器3、新月形器2、边刃石片及石叶120、火石29、镐2、锤21件。在这些打制工具中除石叶和石片外，石刮削器和刀形石片数量较多，其功能是刮削与切割，主要用于

加工兽皮和切割兽肉，说明当时人们以猎物和制皮为主。但令人不解的是，镞的数量并不多。镰的数量很少，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中镰的数量往往占总数的10—15%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收集谷物不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从石叶、石片、石钻、齿状石叶等石器看，这里还是一个石器制作地点，并有大量的原料和废料。

其他种类的遗存也反映了这个遗址的经济生活。在收集的动物遗存中，野驴数量高达全部动物的66—70%；羚羊次之，为16%；羊占9%，牛、猪、狗共占2%。这说明猎取野生动物应当是当时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墙壁上的壁画描绘出网猎野驴的情景，不仅反映了猎物的种类而且回答了镞的数量很少的原因。遗物中收集的植物遗存有豌豆、小扁豆、小麦，这些植物都生长在潮湿的环境理想的地区。这个遗址的自然环境是石灰岩地质，上面是很薄的一层耕土层，不适宜农业。遗址中发现的作物很可能不是当地生产的，应当是从外地输入的，遗址中基本不见农具也证明了这一点。大量的野驴、羚羊和网猎的场面以及石刮削器和刀形石片暗示出，当时人们很可能用这些野生动物的肉和皮去换取粮食。在遗址的建筑中，成排的库房占全部建筑的二分之一以上，库房面积很小，一般2米×2米，无门，墙比居住的房屋厚，可达50厘米，当是起隔热作用的。它们可能是加工贮藏大量野生动物的地方，以备与外界交换。

从乌姆·达巴吉亚研究事例可以看出，对石器类型、比例和功能的分析是了解当时人们生产活动的重要渠道，同时还应结合建筑、壁画等其他人工遗存提供的情况和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结果以及当地自然环境。综合各类资料并进行分析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乌姆·达巴吉亚遗址是一个专门化遗址，主要从事狩猎、制皮和石器制造，并用其产品与外界换取部分谷物。

c. 由点至面的区域性研究

80年代以前，经济活动的发掘和研究以单个遗址为单位，研究重点是遗址中是否存在人工畜养的动物和种植的植物及其所占比重。它们构成了史前经济活动的一个个点。根据这些点的位置和年代可以勾划出农业起源地区与农业发展阶段。80年代以来，随着发掘遗址数量的增多，许多地区的遗址点已经连成了面，开始采用聚落形态方法从事区域性研究。空间单位扩大和研究方式的改变使研究内容有了很大的拓展，如某一地区的发展阶段和某一阶段不同的遗址类型。

扎格罗斯山区游动向定居发展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以公元前9千年以前的扎兹（Zarzi）文化为代表，特点是每年有计划地在一定区域内迁徙。

第二阶段：以公元前8千—前9千年的扎威·克米沙尼达（Zawi chemishanidar）和卡里木·沙希尔（Karim Shahir）遗址为代表。每年的迁徙仍在继续，但其中二三个地点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变成半定居遗址。这些遗址的自然环境优越，并辅以最初的农业和畜牧。

第三阶段：以公元前8千—前6千年的乌姆·达巴吉亚文化诸遗址为代表。一些半定居遗址变成小的永久性村落。环形年迁徙圈由以小定居点为中心的放射性系统取代。这时，村落周围有一些地点被人们用以暂时从事某种生产，例如平原上的狩猎地点、屠宰地点、放牧点……。乌姆·达巴吉亚遗址恰好属于这一阶段的一个地点，而同时的大遗址马格扎利亚（Magzalia）是永久性村落，发现许多农具和人工培植、畜养的植物和动物遗存。

把聚落的差异和其共存的石器结合起来，可以将整个纳吐夫文化的遗址分为三类（表十）。

表十　纳吐夫文化遗址的分类

遗址类别	打制石器	地　貌	其他遗物	定居情况
A	不规则细石器	森林、海岸	石核少，正式工具多杵臼、磨盘	集中，定居时间长，堆积厚，遗迹多
B	齿状石片刮削器	台地、沙漠		较集中，定居时间较长，活动种类多
C	几何形细石器			临时住地，狩猎为主

注：本表选自 Byrd, F. B. Natufian Encampment at Beidha, 1989.

d. 从农业起源向发达农业研究的延伸

80 年代以前，对生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这一阶段，目的是了解人类是怎样从狩猎、采集经济变为畜牧、农耕经济的。80 年代以来，随着“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的深入，发达农业的进步和变化作为一个重要原因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使这项研究的时间范围大大向后延伸，同时更加注重经济类型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与社会组织的内在联系，因而推论的成分比较大。

哈孙纳（Hassudan）文化和萨玛腊（Samarra）文化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支彩陶文化，属发达农业阶段，年代均在公元前 6 千纪下半叶（Reinhard Bernbeck, Lasting Alliance and Emerging Compet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Early Mesopotamia JOURNAL OF ANTHOPOLOGICAL ARCHAEOLOGY, 14, 1995）。两者相邻，哈孙纳文化在北，萨玛腊文化在南，两者交界处恰好是雨水分界处。北部的哈孙纳文化在雨水线分布之内，所以这里的年降雨量基本可以维持靠雨水浇地的旱作农业；南部的萨玛腊文化则位于雨水线之外，年平均降水量难以维持农业的需要，只有人工灌溉才能从事农业生

产。对萨玛腊文化的梭万遗址（es－Sawwan）出土的植物种子进行鉴定得知，这些作物是需要大量雨水才能生产的，如麻类作物。萨玛腊文化晚期的乔加·马来（Choga Mami）遗址发现了灌渠遗迹，所以萨玛腊文化居民从事着简单灌渠农业。

对比这两种农业生产方式，哈孙纳文化的农业生产过程比较简单，而萨玛腊文化的农业生产有许多道程序，比较复杂，因而这个文化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也会有所不同，这些直接影响着两个文化的社会结构。萨玛腊文化及其后继者率先进入文明的源头正是植根于这种复杂的农业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达的家族形态，这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同时加速了社会的分工和等级的形成。

B、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是社会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采取聚落形态的分析方法，在以聚落群为单位的研究中，主要解决中心遗址出现的问题，可以伊拉克北部杰齐拉地区为例。通过对这一地区不同阶段遗址的调查，搞清了这一地区产生中心遗址以及它与普通遗址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过程。在这一地区中心遗址的出现是在文明产生前夜的欧贝德文化时期。中心遗址达到最高比例是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和哈布尔时期（约相当于古亚述时期），这正是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帝国形成期。①

在以聚落为单位的研究中，通过揭示不同文化的房屋建筑格局，以了解不同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基本细胞——家庭的构成的不同。它是制约文化的社会结构、功能的一个根本因素②。

交换和贸易是社会考古学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它实际上是对文化中传播问题从功能角度的考察。西亚史前时代的乌

---

① T. J. Wilkinson, The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 in the North Jazira Between the 7th and 1st Millennia BC IRAQ 1990

② 杨建华："黄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华夏考古》1999，4。

姆达巴吉亚遗址、阿尔巴契亚遗址和巴昆遗址中生产和库房地点的布局使我们了解了史前贸易的发展过程：

从各种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看，乌姆·达巴吉亚文化时期两者是按功能集中在一起，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社区布局以广场为中心。到了哈拉夫文化阶段，从事最重要活动的建筑占居了社区的中心，周围是住宅。巴昆A遗址尚未发现住房，但是生产区也位于遗址中心，住宅有可能在未发掘的西部或东部边缘地带。这种布局的安排反映出同一社区内不同活动之间已出现了地位差别，地位重要的则占居聚落的中心位置。

从生产活动和贮藏活动的区域布局看，在乌姆·达巴吉亚文化和哈拉夫文化时期，两者是在一起的。这说明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没有明显的区别，生产者同时又是交换活动的从事者，他们有权决定自己产品的去向。在巴昆A遗址时期，生产区和贮藏区完全分开，说明生产活动和对产品的保管与交换活动出现了区别，生产者很可能不再负责对产品的贮藏与交换，印纹的分布说明对产品的保管和交换是由不同所有者负责的，他们之间的权力是不同的。这种生产与贮藏区域布局的变化说明对其产品的交换先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然后是由社区内从事这种生产活动的人群进行，最后变成由专门从事交换的不同的人或人群所垄断。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从事交换活动的人群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小，这将导致贸易的专门化。

根据不同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和交换的产品看，乌姆·达巴吉亚遗址的狩猎、屠宰和加工的专门化生产是由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造成的。阿尔帕契亚遗址的制陶生产则是长期生产活动中竞争的结果，哈拉夫文化每个社区的不同的制陶能力将造成他们相互间在财产和地位上的差别。乌姆·达巴吉亚向外输出的狩猎产品和换回的农产品是为了满足全社区的需要，这种交换起到了经济类型互补的作用。阿尔帕契亚遗址向外输出三彩盘，是为了满足当地特殊身份的人的需要。同一功

能的器物在质量上出现不同的等级，说明使用它的人群中出现了相应的不同等级。我们常说那些精美的艺术品“代表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是生产它们的动力则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特殊人物或特殊活动。这些质量不同的器物反映并强化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简而言之，乌姆·达巴吉亚遗址的生产和交换活动是一个文化内平等的分工，社区内和社区间都体现着这种平等关系。生产和交换活动是为了满足各社区全体人民的生存需要。阿尔帕契亚遗址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出现了不平等，制陶活动高于其他活动。各社区制陶水平也不相同，精美陶器的交换是为了满足当地上层人物的需要。但是这些差别仅仅体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巴昆 A 遗址的社会分工已经发展到同一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之间了，对产品的贮藏和交换权的差别说明由分工造成的差别已经体现在个人之间。以上这些变化构成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3. 科技与考古学

1991 年 2 月在英国由皇家科学院举办一次专题学术会议，讨论和研究近 10 年来考古科学的新发展。从这次会议的内容我们可以窥见国外科技考古的一斑。

会议讨论的内容分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过去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讨论的题目有树轮年代学与过去自然环境的变化；瑞典南部地貌的复原；考古学中土壤微形态学（Soil Micromorhology）；怎样帮助我们了解堆积是由什么原因形成的，代表了哪些人类活动。

第二，人工物的研究，有铅同位素研究，早期矿场与采矿、电子显微镜学对陶器研究的影响、巨石柱群石料的产地、

① 杨建华：“从聚落布局看史前社会交换方式的变化——来自西亚地区的三个实例”，《考古》1999 年 5 期。

运输研究中的地球化学和碎陶片的统计——陶器组合中的统计学。

第三，古代食物的研究，关于食物残迹的存留和食物遗存、食物链及生态环境的研究。

第四，遗址调查新技术，具体有考古研究中的远程观察和地球物理探测的新发展。

第五，人骨研究，有稳定同位素与史前饮食成分研究、碳氮同位素与牙齿化石氨基酸生物地球化学研究（Biogeochemistry）以及生物分子考古学。

这些内容反映了自然科学在考古学应用的领域，使用的方法和研究的问题。既有新出现的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的应用，又有传统的课题如陶器研究。如果我们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与20多年前（1969年）的第一次会议相比，会更清楚地看出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发展趋势。上次会议共有17篇论文，其中8篇是关于年代的（其中5篇是^{14}C定年法）；1篇是关于统计的，用序列法统计与确定年代，3篇考古调查的；5篇是关于人工物分析的。将这两次会议内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首先生命科学和环境考古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可以和物理学并列了。其次年代问题已不再是研究的中心了。第三是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开始了真正的结合，不再使人感到自然科学和考古学是两回事了。但是这两次会议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论文的作者没有一人是考古学者，他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新培养出来的考古科学家。

（三）考古学科体系的建立

中程理论的研究说明考古学者对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意识到了遗存的局限性，并开始通过对它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来了解这种局限性，以便采取各种手段克服它的局限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在能力。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学科

的重新思考，用大卫·克拉克的话说，这时的考古学已经进入了批判的自我意识阶段。[①] 在这个阶段中，考古学家不仅仅注重学科的知识和资料的性质，而且开始了方法论的讨论，如推理论证的形式、理论和概念的关系以及原始资料的归类等等。人们争论的焦点由原来的具体对象扩大到解释和说明、概念和理论，因而逻辑学、认识论和理论思维在考古学研究中占有了重要位置。在中程理论研究中，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他们在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能够获得知识和不能获得知识的限度，并根据承认的遗存和方法的限度去判断已有知识中的可靠性，开始对已有研究结论进行评判。

另一方面，中程理论的研究又使得一些考古学家研究学科体系的内部结构以及外学科的潜在影响，以便控制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命运。谢弗不仅在研究遗存的废弃过程方面成就显著，而且在 1988 年发表了他对考古学理论构建的大作。[②] 他把考古学研究的程序分为发现和分析遗存、复原过去、进行解释这样三步，每个步骤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分别是方法论、复原理论和社会理论。方法论中包括发现理论（如调查原理、发现原理和发掘原理）、分析理论（类型法和计量、多变量分析）以及推理理论（评估和综合分析结果进行推理）。复原理论中包括物质文化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理论，废弃物形成堆积中的文化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理论、废弃物形成堆积中的文化转化理论与自然转化理论。社会理论主要是解释文化的差异和变化，小到一件器物，大到一个社会。比较普遍使用的理论有 60 年代之前的传播理论和 60 年代以后的生态学、新进化论理论。谢弗认为，这三个理论领域的关系是平行的，各自都是由一系列

---

① 戴维·克拉克："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② Michael B. Schiffer: The Structure of Archaeological Theory American Antiquity Vol. 53 (1988) N. 3

根据抽象程度的不同组成的由低到高的理论构成的。

综合谢弗的理论框架与中程理论，并结合一些个人看法，[①] 从考古学遗存的形成过程和研究程序出发，我们试图建立了一个囊括更多既有理论方法的框架（表十一）：

表十一　考古学理论、方法框架

考古学理论	解决的问题	方法、理论及相关学科
堆积前理论	文化系统与人类行为（制造、使用）	生态考古学、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功能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堆积理论	废弃、再使用、功能、符号	物质——文化关系、废弃过程研究、民族考古学、人类学
堆积后理论	证据的保留与转变	自然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埋藏学、古生物学、地理学
再发现理论	调查、发掘、收集	遗址勘察、选样、地层学、物理、化学、统计学
分析理论	信息的组织、模式的确认	形态学、遗物物化分析、分类与统计
推理理论	复原过去文化系统	评估和综合分析结果、文献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聚落考古
解释理论	用普遍的或特殊的对人类科学理解的术语解释模式与系统	人类学、民族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们首先看一下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人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存，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他们所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同时又在影响着社会形态。人类的行为有的能够留下物质遗存，有的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留下的

① 杨建华："试论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及方法"，《吉林大学学报》1988年2期。"从学科结构看中间理论含义的差别"，《东南文化》1992年5～6期。

物质遗存所代表的人类行为主要是制造和使用行为，这就是堆积前理论。然后遗存被废弃，变成了考古堆积，这就是堆积理论。从堆积形成到被考古学者重新发现，是堆积后阶段。在这个阶段，遗存受到各种因素干扰和影响。以上都属于遗存的形成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活生生的社会和人类行为变成我们手中发现的遗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量递减的过程，是“活文化”变成“死文化”又变成“再发现文化”的过程。从这些少得可怜的，并且可能受到“歪曲”的遗存中复原过去的社会和文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而这正是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

从遗存被考古学者再发现开始，遗存便进入考古学研究阶段。首先是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和记录遗存，然后要对遗存进行各种分析，并综合这些分析结果进行推理，重构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并解释这个文化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发展变化的。这种复原和解释工作的目标就是力图再现当时的社会形态和人类行为，这就把遗存的形成过程与考古学研究程序联系起来了，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理论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都有特定的方法、理论及其来源。其详细情况见表十一，不再赘述。

表十一中列出的理论方法，基本上包括了目前考古学界使用的基本方法。由此可知，尽管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种类繁多，而且互有争议，它们仍然可以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各有其适当的位置和特殊的作用。例如前苏联学者 B. 布尔金等在总结苏联考古学成就时提出了苏联同时存在的七大学派，都可以放入以上的体系中。[①]

对表十一中列出的不同理论方法从考古学史的发展角度考

---

① 布尔金等："苏联考古学的成就和问题"，《史前研究》1985 年 4 期。

察，可以发现这些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增多的历史过程。在考古学初期，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再发现理论中的地层学和分析理论中的类型学，在社会理论主要是传播论和进化论。现在，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而且原有理论还在不断完善。80年代以来，有两种分歧最大影响最广的理论，一个是美洲的中程理论，他认为考古学应当像自然科学，用实证方法来证明过去行为与现在发现的行为遗留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客观性；[①] 另一个是欧洲的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他认为美洲的方法对人的思想活动不敏感，而遗存只有在了解了人们制造和使用时的思想和规范之间的联系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所以考古学方法不应像自然科学，而应象阅读和理解一篇文章一样。[②] 虽然这两种观点分歧十分明显，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入遗存的整个形成过程中就会发现，他们各自强调的是整个过程的某一段，美洲的方法研究的只是遗存从制造、使用、废弃和堆积的过程，而且主要是废弃到堆积的过程，而欧洲则是从遗存是一种象征性符号的观点出发，研究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如何影响遗物的制造和使用的，反过来遗存的制造、使用形态也反映了个人和文化的社会规范。

总之，学科整体构架的建立对于考古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考古学的完整性，尽管有些领域及使用的理论方法尚不成熟，但这正是今后努力的方向。结构的建立正是“竖起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帽架’，以便挂上我们所有局限性的‘帽子’”。[③] 它将专业化分工日益狭窄的考古学结合成

---

① 参见路易·宾弗：“美国新考古学的发展”，《当代外国考古学现代与方法》三秦出版社 1991 年。

② Peter Kosso, Method in Archaeology: Middle—Range Theory as Hermeneutics American Antiquity Vol. 56 (1991) N. 4

③ 戴维·克拉克：“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考古学文化论集 2》文物出版社。

一个整体，使每个人看清自己的研究领域在考古学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从而意识到每个人的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企图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考古学中有多种方法和多种课题存在的必要。进行分工协作往往可以完成从前一个人无法完成的重大研究课题，使考古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本书即将结束时，我想起了一位考古学家的形象比喻。1991 年初当我参观美国新墨西哥的派克斯遗址时，当我站在 60 年前基德尔开创地区年代序列研究的典型遗址时，我问及美国新考古学现状时，一位热心的美国考古学家是这样回答我的：新考古学要研究文化发展的过程。要想更清晰地看清这个过程，分期研究还应该更为精确细致。这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一样，一分钟 60 张拷贝和一分钟 120 张拷贝的效果是不同的。分期越细，越能看清这个变化过程。我想这个比喻最清楚地表述了新考古学和传统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新考古学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脚踏实地地从事基础研究，同时原有的考古学也应有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总之，考古学的发展已由单一的研究发展成各自独立的领域而又向着更高层次的统一发展。而现在正是在学科整体构架中重新统一的起点。